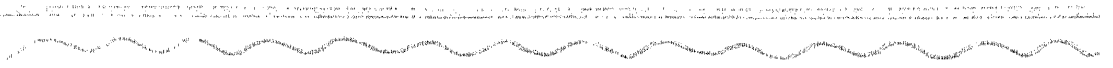


5
985888-92

瞿秋白文集

一種雲

天總是陰着眉頭。太陽光如果照射到那面土地也似乎
微的淡薄的。至於一草一木，那更不必說，他只是偶然露出青面將他
那悽涼的眼光看一有這罪孽的人間，他氣喘完落婦的眼色，那瞳
裡含着悲憤還沒有流定的眼淚。曾遇不止一次對禪六典的山岳
至少有大截二了天，只留一且山脚給人看。黃河長江，這這是
中國文明的父母，也不知道怎麼處了心對於他們的親生骨肉而
擬出一付一付悲涼的面孔。從春天到夏天，從秋天到冬天，這樣一年
年的過去，淅淅的兩處風和蕭蕭的霜雪更去的去，一旦光明也
沒有。這樣的雲，看他已經二十年了。這新學一種雲在作祟，那雲
為什麼這樣厲次三番的指弄光明？那雲到底什麼做才來的？這
是太平洋上的大風暴吹過來的，這是大西洋上的狂風吹過來的，這
是那牙羅細曲曲由一柳枝底下滴着的檉柳的由肉蒸蒸出來的。
那完全無符的人，一會寫借據會寫多票的人，就見這雲符符在
呼口。那吃田地的土物株，一班說死了也不過只要六天土地葬
他的貴紳，可是活著總要吃這么二三畝田地，一班望土物株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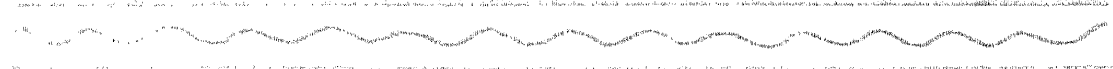


翟秋田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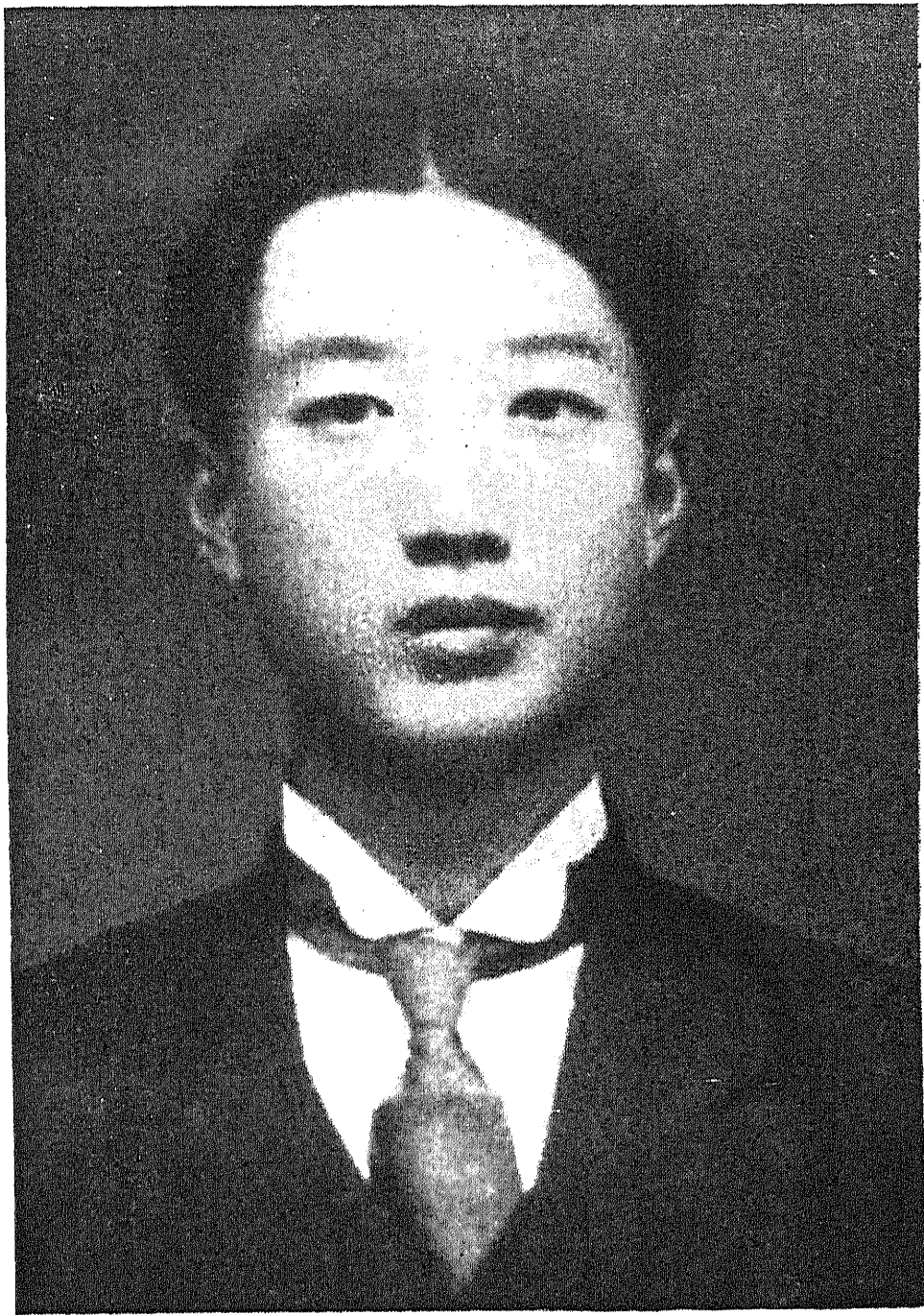
文学编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二十年代初摄于北京



与杨之华合影（1924年底摄于上海）



《蕭伯納在上海》书影

好杜伊，新杜伊！

小小的停蓄

写着许多生命，

陈腐的死去

我手不释卷之时。

看那沙滩的贝壳堆积，

经过风浪涛的再生，

难道不是无意中的杰作？

却是美丽的作品

手 迹 (1929年3月)

目 录

文艺杂著(续辑)

自杀	3
唉! 还不如.....	4
心的声音	5
绪言	5
一 错误	8
二 战争与和平	10
三 爱	12
四 劳动?	14
五 远!	18
“矛盾”的继续.....	20
青年的九月	31
美国的真正悲剧	40
王道诗话	48
苦闷的答复	51
曲的解放	55
迎头经	58

出卖灵魂的秘诀	61
最艺术的国家	64
《子夜》和国货年	68
内外	73
透底	75
关于女人	78
真假董吉诃德	81
人才易得	85
读《子夜》	88
“儿时”	95
中国文与中国人	97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100
关于高尔基的书	106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111
择吉	115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118
鬼脸的辩护	121
慈善家的妈妈	126
“美”	128

俄国文学史

一 民间文学	135
二 古代文学	139
三 俄国文学之中世纪	143

四	俄国文学与西欧文明·····	145
五	俄国文学之黎明·····	151
六	普希金·····	156
七	歌歌里和列尔芒托夫·····	162
八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	170
九	农奴解放与文学·····	175
一〇	六十年代·····	180
一一	七十年代·····	185
一二	平民运动与六七十年代的文学·····	190
一三	托尔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	194
一四	八九十年代·····	201
一五	社会运动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	208
一六	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与旧文学·····	212
一七	俄国的诗(一)·····	220
一八	俄国的诗(二)·····	226
一九	文学评论·····	230

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论辑

托尔斯泰的妇女观·····	237
序沈颖译《驿站监察吏》·····	245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	248
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	250
斯大林和文学·····	261
论弗理契·····	267

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	277
-----------------	-----

萧伯纳在上海(部分)

写在前面	299
Welcome	302
《一半儿恨他一半儿爱》按语	303
儒林最新史——倡优苦	306
《马相伯老人之答问》按语	312
张资平著作义务广告	314
呖萧的国际联合战线	316
《字林西报》的“幽默”	318
《大陆报》和萧伯纳的“不诚恳”	323
《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	326
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卑污	330
俄国公主论萧伯纳	333
白俄报的义愤	337
胡适博士的词令	342
政治的凹凸镜	344
补白(三则)	354

—

二 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

三 两雄吟

诗歌说唱辑存

雪意	359
----------	-----

赤潮曲	360
飞来峰和冷泉亭	362
铁花	363
过去	365
天语	366
江南第一燕	367
爱	368
失题	369
寄××	370
群众歌	373
小小的蓓蕾	374
东洋人出兵	375
上海打仗景致	395
读《自由谈》有感	397
题远东第一伟人铜像	398
江北人拆姘头	399
英雄巧计献上海	404
狱中题照	409

书信辑存

致胡适	413
致鲁迅、冯雪峰	415
致郭沫若	417

文艺杂著

(续 辑)

本辑收入作者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的散文、诗、小说、杂文等三十四篇。题名系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编者所加。

自 杀*

青年呵！你要自杀么？你如其没有觉着“自杀”的必要，你决不会自杀；要是你已经觉着“自杀”的必要，你为什么还不自杀？自杀！自杀！赶快自杀！你真正有自杀的决心，你要真正做到自己杀自己的地步，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你这一念“自杀”，只是一线曙光，还待你渐渐的，好好的去发扬他。你既愿意牺牲一切，杀身绝命；你应该更愿意时时刻刻去牺牲，时时刻刻去自杀。你随时随地的困难给你苦痛受，你因此觉得不得不自杀；从今以后，你就要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仍旧是随时随地困难的苦痛。这要有何等的决心，何等的勇敢，又有了何等的快乐！自由神就是自杀神！

* 本篇及下篇《唉！还不如……》最初均发表于北京《新社会》旬刊第五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随感录”专栏，署名均作秋白。

唉! 还不如……

凄凄的月色,冷冷的秋风,一间水阁凭着细细的河声——
漉漉漉漉的好象要浮到汨罗江里去——纸窗上微微的白色,
衬着黯沉沉的灯光,惨淡淡的人影;岸边的衰柳萧萧瑟瑟的,
花台下的落叶槭槭楂楂的,又象是低低的私语,又象是远远的
哭声,半明不灭的月光,倒象是东方刚刚发白,树头小鸟啁啁
啾啾——母鸟飞出去了,这时候似乎刚惊醒了我的噩梦。唉!
还是夜色沉沉的,何尝天亮呢。一年,两年,三年,足足三年
了,经过了多么艰难,痛苦,谬误,堕落,如今呢,又是何等的沉
寂,恐怖,凄凉,悲惨;还不如……还不如早早的“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双目一瞑,也落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天亮了。
推开了水阁门,正遇着一个熟识的乡下人——撑船的——划
着船过去。——“喂!我们多时不见了,我今雇你的船往镇江
去,好么?”——“对不起。我今天要赶下乡收瓜呢,今年年成
倒还好。”划了一桨又一桨,远远的过去了,剩着一荡一荡的
水浪。站了半天,红霞掩映着水色天光中的残月。唉!还不
如……这是我几年前想……时的感想。

心的声音*

绪 言

心呢?……真如香象渡河^①,毫无迹象可寻;他空空洞洞,也不是春鸟也不是夏雷也不是冬风,更何处来的声音?静悄悄地听一听:隐隐约约,微微细细,一丝一息的声音都是外界的,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间久久暂暂的声音都是外界的,又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千里万里,一寸尺间远远近近的声音,也都是外界的,更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钩辘格磔,殷殷洪洪啾啾唧唧,呼号刁翟,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一丝一息的响动,澎湃訇磕的震动,鸟兽和人底声音,风雨江海底声音几千万年来永永不断,爆竹和发枪底声音一刹那间已经过去,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都是怎样听见的?短衫袋时表的声音,枕上耳鼓里脉搏的声音,大西洋海啸的声音,太阳系外陨石的声音,这都听得清

* 这一组散文和诗连同《绪言》共六篇。其中《绪言》最初发表于北京《新社会》旬刊第十五号(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错误》发表于同刊第十八号(同年四月二十一日);《战争与和平》、《爱夏》、《劳动?》均发表于同刊第十九号(同年五月一日);《远》发表于北京《人道》月刊创刊号(同年八月五日)。

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我不知道，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让我来听者自听，我已经是不能做到，我静悄悄地听着，我安安静静地等着；响！心里响呢，心外响呢？心里响的——不是！心里没有响。心外响的——不是！要是心外响的，又怎样能听见他呢？我心上想着，我的心响着。

我听见的声音不少了！我听不了许多凤箫细细，吴语喁喁底声音。我听不了许多管、弦、丝、竹、披霞那②、繁华令③底声音。我听不了许多呼卢喝雉，清脆的骰声，嘈杂的牌声。我听不了许多炮声，炸弹声，地雷声，水雷声，军鼓，军号，指挥刀、铁锁链底声。我更听不了许多高呼爱国底杀敌声。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我在亚洲初听见欧洲一个妖怪的声音。他这声音我听见已迟了。——真听见了么？——可是还正在发扬呢。再听听呢，以后的声音可多着哪！欧洲，美洲，亚洲，北京，上海，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不用说了。可是，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呢？究竟还是心上底回音呢？还是心的声音呢？

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晚上（庚申正月十五夜），静悄悄地帐子垂下了；月影上窗了，十二点过了，壁上底钟滴嗒滴嗒，床头底表悉杀悉杀，梦里听得枕上隐隐约约耳鼓里一上一下的脉搏声，静沉沉，静沉沉，世界寂灭了么？猛听得砰的一声爆竹，接二连三响了一阵。邻家呼酒了：

“春兰！你又睡着了么？”

“是，着，我没有。”

“胡说！我听着呢。刚才还在里间屋子里呼呼的打鼾呢。还要抵赖！快到厨房里去把酒再温一温好。”

我心上想道：“打鼾声么？我刚才梦里也许有的。他许要来骂我了。”一会儿又听着东边远远地提高着嗓子嚷：“洋……面……饽饽”，接着又有一阵鞭爆声；听着自远而近的三弦声凄凉的音调，冷涩悲亢的声韵渐渐的近了……呜呜的汽车声飒然地过去了……还听得“洋……面……饽饽”叫着，已经渐远了，不大听得清楚了，三弦声更近了，墙壁外的脚步声，竹杖声清清楚楚，一步一敲，三弦忽然停住了。——呼呼一阵风声，月影儿动了两动，窗帘和帐子摇荡了一会儿……好冷呵！静悄悄地再听一听，寂然一丝声息都没有了，世界寂灭了么？

月影儿冷笑：“哼，世界寂灭了！大地上正奏着好音乐，你自己不去听！那洪大的声音，全宇宙都弥漫了，金星人，火星星人、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万年的迷梦了！地球东半个，亚洲的共和国里难道听不见？现在他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经公布了八十几种的音乐谱，乐歌，使他国里的人民仔细去听一听，你也可以随喜随喜，去听听罢。”我不懂他所说的声音。我只知道我所说的声音。我不能回答他。我想，我心响。心响，心上想：“这一切声音，这一切……都也许是心外心里的声音，心上的回音，心底的声音，却的确都是‘心的声音’。你静悄悄地去听，你以后细细地去听。心在那？心呢？……在这里。”

一九二〇，三，六。

一 错 误

暗沉沉的屋子，静悄悄的钟声，揭开帐子，窗纸上已经透着鱼肚色的曙光。看着窗前的桌子，半面黑魆魆，半面黯沉沉的。窗上更亮了。睡在床上，斜着看那桌面又平又滑，映着亮光，显得是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果真是平的。果真是平的么？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么？也许桌面上，有一边高出几毫几忽，有一边低下几忽几秒，微生物看着，真是帕米尔高原和太平洋低岸。也许桌面上，有一丝丝凹纹，有一丝丝凸痕，显微镜照着，好象是高山大川，峰峦溪涧。我起身走近桌子摸一摸，没有什么，好好的平滑桌面。这是张方桌子。方的么？我看着明明是斜方块的。站在洗脸架子旁边，又看看桌子，呀，怎么桌子只有两条腿呢？天色已经大亮，黯沉沉的桌子现在已经是黄澄澄的了。太阳光斜着射进窗子里来，桌面上又忽然有一角亮的，其余呢——黯的，原来如此！他会变的。……唉，都错了！……

洗完脸，收拾收拾屋子，桌子，椅子，笔墨书都摆得整整齐齐。远远的看着树杪上红映着可爱的太阳儿，小鸟啁啾唱着新鲜曲调，满屋子的光明，半院子的清气。这是现在。猛抬头瞧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一角花篱，几盆菊花，花后站着，坐着三个人。我认识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回头看一看，镜子里的我，笑着看着我。这是我么？照片上三个影子引着我的心灵回复到五六年前去。——菊花的清香，映着满地琐琐碎碎的影

子，横斜着半明不灭的星河，照耀着干干净净的月亮。花篱下坐着三个人，地上纵横着不大不小的影子，时时微动，喁喁的低语，微微的叹息，和着秋虫啾啾唧唧，草尖上也沾着露珠儿，亮晶晶的，一些些拂着他们的衣裳。黯沉沉的树荫里飕飕的响，地上参差的树影密密私语。一阵阵凉风吹着，忽听得远远的笛声奏着《梅花三弄》^④，一个人从篱边站起来，双手插插腰，和那两个人说道：“今天月亮真好。”……这就是我。这是在六年以前，这是过去。那又平又滑的桌面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秋白明天同到三贝子花园^⑤去。呵！明天到三贝子花园去的，不也是我么？这个我还在未来；如何又有六年，如何又有一夜现在，过去未来又怎样计算的呢？这果真是现在，那果真是过去和未来么？那时，这时，果真都是我么？……唉！都错了！……

我记得，四年前，住在一间水阁里，天天开窗，就看着那清澄澄的小河，听着那咿咿哑哑船上小孩子谈谈说说的声音。远远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江阴的山，有时青隐隐的，有时黑沉沉的，有时模模糊糊的，有时朦朦胧胧的，有时有，有时没有。那天晚上，凭着水阁的窗沿，看看天上水里的月亮。对岸一星两星的灯光，月亮儿照着，似乎有几个小孩子牵着手走来走去，口里唱着山歌呢。忽然听着一个小孩子说道：

“二哥哥，你们看水里一个太阳，太……”又一个道：

“不是，是月亮，在天上呢，不在水里。”转身又向着那一个小孩子说道：

“大哥哥，怎么今天月亮儿不圆呢？昨天不是圆的么？”听

着回答道：

“怎么能天天都是圆的呢？过两天还要没有月亮呢？”

“大哥骗我，月亮不是天生圆的么？不是天天有的么？”

“我们去问姊姊。姊姊，姊姊。我刚才和阿二说，月亮会没有的，他不信，他说我说错了。”姊姊说道：

“妈妈的衣服还没有缝好呢，你们又来和我吵，管他错不错呢……”

一九二〇，三，二十。

二 战争与和平

小花厅里碧纱窗静悄悄的，微微度出低低的歌声。院子里零零落落散了一地的桃花，绿荫沉沉两株杨柳，微风荡漾着。一个玲珑剔透六七岁的小孩子坐在花厅窗口，口里低低的唱着：

姊姊妹妹携手去踏青。

垂垂杨柳，啾啾莺声，

春风拂衣襟，春已深。

郊前芳草地，正好放风筝……

桌子上放着一个泥人，是一个渔婆，手里提着一只鱼篮，背上搁着很长很长一竿钓鱼竿，丝线做的钓丝，笑嘻嘻的脸。小孩子一面唱一面用手抚着那钓丝，把许多桃花片，一片一片

往钓丝上穿，又抓些榆钱放在那鱼篮里。又一个小孩子走来了。说道：“哥哥，我找你半天了，爸爸给我一个皮球。”那哥哥道：“我不爱皮球。弟弟，你来瞧，渔婆请客了，你瞧他体面不体面？篮子里还装着许多菜呢。”弟弟瞧一瞧说道：“真好玩，我们两个人来玩罢。”说着，转身回去拿来许许多多纸盒、画片、小玻璃缸，两只小手都握不了。一忽儿又拿些洋囡囡、小泥人来了。两个小孩子摆摆弄弄都已摆齐了，喜欢得了不得，握握手对着面笑起来。弟弟一举手碰歪了一只小泥牛，哥哥连忙摆好了说道：“都已齐了，我们请姊姊来看，好不好呢？”弟弟说：“我去请。”说着兴头头的三脚两步跑进去了。一忽儿又跑出来气喘喘的说道：“姊姊不来，他在那儿给渔婆做衣服呢。”

哥哥道：“他不来么？”说着，又把一张画片放在渔婆面前说道：“弟弟，你瞧，渔婆又笑了。”弟兄两个人拍着手大笑。一忽儿，哥哥弟弟都从椅子上下来，一面踏步走，一面同声唱着，嚷着很高的喉咙，满花厅的走来走去，只听得唱道：

……战袍滴滴胡儿血。

自问生平……头颅一掷轻。

一面唱一面走出花厅，绕着院子里两株杨柳，跑了两三匝。哥哥忽然说道：“渔婆要哭了，进去罢。”弟兄两个又走进花厅，两个人都跑得喘吁吁的。哥哥在桌子上一翻，看见一张画片，诧异道：“谁给你的？我昨天怎么没有看见他？”弟弟道：“爸爸昨天晚上给我的。”哥哥道：“送给我罢。”弟弟道：“不，为什么呢？爸爸给我的。”弟弟说着，把那张画片抢着就跑。哥哥生

气道：“这些我都不要了，……”说着，两只小手往桌子上乱扑乱打了一阵。渔婆，小泥人，玻璃缸打得个稀烂。弟弟听着打的声音又跑回来，看一看，哭道：“你把我洋囡囡底头打歪了，我告诉爸爸去！”说着往里就跑，哥哥追上去，弟兄俩扭做一堆，连扭带推，跑过院子，往里面上房里去了。

只听花厅背后，弟弟嚷着的声音：“姊姊！姊姊！哥哥打我……”

院子里绿荫底下，落花铺着的地上，却掉着一张画片——原来是法国福煦元帅^⑥底彩色画像，带着军帽穿着军衣的……。

一九二〇，三，二十八。

三 爱

“爱”不是上帝，是上帝心识底一部现象。

——托尔斯泰

“唔唔……妈呢？……”

“好孩子。妈在城外赶着张大人丧事，讨些剩饭剩菜我们吃呢。闭着眼静静儿罢。陆毛腿去弄药草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孩子，你饿吗？难受得厉害吗？吃什么不要？”

“我……唔唔……我……我我……不……我不……”

模模糊糊的呻吟声，发着，断断续续的……轻微声浪隐隐

的震着，沉静的空气里荡漾着……唉！

嫩芽婀娜的几株垂杨底下，一家车门旁边，台阶上躺着十二三岁的孩子，仰面躺着，那如血的斜阳黯沉沉的映着他姜黄色的脸，只见他鼻孔一扇一扇，透不出气似的，时时呻吟着。旁边跪着一个老头儿，满脸沙尘，乱茅茅的胡须，蓬蓬松松的头发，苍白色的脸，远看着也分不出口鼻眼睛，只见乌黑阵阵的一团。他跪在地上，一手拿着许多柳枝替小孩子垫头，一手抚着小孩子底胸，不住的叹气，有时翻着自己褴褛不堪的短衫搔痒。他不住的叹气，不住的叹气！心坎里一阵酸一阵苦。他时时望着西头自言自语：“来了吗？没有！不是；好孩子！”……“你妈……”

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柳梢的新月上来了……呼呼一阵狂风。呼……呼……满口的沙尘。唉！风太大了！……

一个“冥影”颼然一扇，印在我心坎里，身上发颤，心灵震动……震动了。他们……他们那可怕的影子，我不敢看。

“老爷，爷爷！多福多寿的爷爷，赏我们……赏……”

那老头儿在地上碰着头直响，脸上底泥沙更多了。小孩子翻一翻眼，唉！可怕！他眼光青沉沉的，……死……死人似的！可怕！

“老爷，我这小孩子病了。怎好？赏几个钱……”

老头儿又碰着头，我走过他们，过去了，又回头看看，呀！……给他们两个铜元……两个铜元？

老头儿拣着，磕头道谢；又回身抚着小孩子，塞一个铜元在他手里，又道：“妈来了，来了。”小孩睁一睁眼……我又回头

一看，赶快往前就走。我心里，心里跳。怪，鬼，魔鬼！心里微微的颤着，唉！

.....

我事情完了，要回家去。叫洋车。坐上车，一个小孩子跟着车夫。车夫给他一个铜元道：“家去跟着妈罢！”

“爸爸回来吃晚饭？我们等着爸爸……等着您！”

东长安街两边的杨柳、榆树，月亮儿莹洁沉静，沉静的天空。呀！不早了！十点半。车夫拖着车如飞的往前走去。似乎听得：“妈！……好吃……嘻嘻嘻……”

月亮儿莹洁沉静，沉静的天空！

“爱！”……宇宙建筑在你上。

四 劳 动？

青隐隐的远山，一片碧绿的秧田草地，点缀着菜花野花，一湾小溪潺潺流着；荫沉沉的树林背后，露出一两枝梨花，花下有几间茅屋。风吹着白云，慢慢的一朵朵云影展开，绉得似鱼鳞般的浪纹里映着五色锦似的，云呵，水呵，微微的笑着；远山巅隐隐的鸟影闪着，点点头似乎会意了。啁啾啾的小鸟，呢呢喃喃的燕子织梭似的飞来飞去。青澄澄的天，绿茫茫的地，荫沉沉的树荫，静悄悄的流水，好壮美的宇宙呵，好似一只琉璃盒子。

那琉璃盒，琉璃盒里有些什么？却点缀着三三两两的农

夫弓着背曲着腰在田里做活。小溪旁边，田陇西头，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穿着一条红布裤子，一件花布衫，左手臂上补着一大块白布，蓬着头，两条小辫子斜拖着，一只手里拿着一件破衣服，汗渍斑驳的，一只手里提着篮，篮里放着碗筷，慢慢的向着一条板桥走去，口里喃喃的说道：“爸爸今日又把一些菜都吃了，妈又要抱怨呢。”他走到桥上，刚刚两只燕子掠水飞过，燕子嘴边掉下几小块泥，水面上顿时荡着三四匝圆圈儿。他看着有趣，站住了，回头看一看，他父亲又叫他快回家。他走过桥去，一忽儿又转身回来，走向桥坞下，自言自语道：“妈就得到这儿来洗这件衣服，放在这儿罢。”一面说，一面把那件衣服放在桥下石磴上，起身提着篮回去了。

夕阳渐渐的下去了，那小孩子底父亲肩着锄头回家了，走过桥边洗洗脚，草鞋脱下来提在手里，走回家去。远山外还是一片晚霞灿烂，映着他的脸，愈显得紫澄澄的。他走到家里。“刚换下来的衣服洗了没有？”一个女人答道：“洗好了。四月里天气，不信有这么热！一件衬里布衫通通湿透了。”——接着又道：“张家大哥回来了，还在城里带着两包纱来给我，说是一角洋钱纺两支。”那父亲道：“那不好吗，又多几文进项。”

那父亲又道：“我吃过饭到张家去看看他。”小孩子忙着说道：“我跟着爸爸同去，张家姊姊叫我去帮他推磨呢。”父亲道：“好罢，我们就吃饭罢。”大家吃过饭，那女人点着灯去纺纱了，爷儿两个同着过了桥，到对村张家来。

听着狗汪汪的叫了两声，一间茅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说道：“好呀！李大哥来了，我上午还在你家里看你们娘子呢，我刚

从城里回来就去看你，谁知道已经上了忙了，饭都没有工夫回家吃，我去没有碰着你，你倒来了。”接着三个走进屋子，屋子里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摆着几张竹椅子，土壁上挂一张破锤馗，底下就摆一张三脚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老婆婆，手里拈着念佛珠，看见李大哥进来忙着叫他孙女翠儿倒茶。一忽儿翠儿同着李家的小孩子到别间屋子里去了，李大就在靠门一张矮竹椅上坐下，说道：“谢谢你，张大哥，给我带几支纱回来。”那老婆婆说道：“原来你们娘子也纺‘厂纱’吗？那才好呢。多少钱纺一支？”张大道：“半角洋钱。”老婆婆说道：“怪不得他们都要纺纱纺线的。在家里纺着不打紧，隔壁的庞家媳妇不是到上海什么工厂纱厂里去了么？山迢水远的，阿弥陀佛，放着自已儿女在家里不管，赤手赤脚的东摸摸西摸摸，有什么好处！穿吃还不够，镀金戒指却打着二个，后来不知怎么又当了，当票还在我这儿替他收着呢。阿弥陀佛！”

李大问张大道：“庞大现在怎么样了？”老婆婆抢着说道：“他么？阔得很呢！哼！从城里一回来，就摇摇摆摆的，新洋布短褂，新竹布长衫，好做老爷了。一忽儿锄头碰痛了他的手，一忽儿牛鼻子擦脏了他的裤子，什么都不是了；见着叫都不叫一声，眼眶子里还有人吗？我看着他吃奶长大了的，这忽儿乾妈也不用叫一声了，当了什么工头，还是什么婆头呢？阿弥陀佛！算了罢！”

张大道：“妈那儿知道呢？他只好在我们乡下人面前摆摆阔，见他的鬼呢！我亲眼看见他在工厂门口吃外国火腿^⑦呢，屁股上挨着两脚，那外国人还叽叽咕咕骂个不住，他只板着一

张黑黝黝的脸，瞪着眼，只得罢了，还说什么‘也是’‘也是’^⑧。他们那些工厂里的人是人吗？进了工厂出来，一个个乌嘴白眼的，满身是煤灰，到乡下来却又吵什么干净不干净了，我看真象是‘鬼装人相’，洋车夫还不如。”

老婆婆道：“又来了，拉洋车就好吗？你还不心死？拉洋车和做小工的，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有一顿没一顿的。你还想改行拉车么？我说你还是不用到城里罢，水也不用挑了。快到头忙了，自己没有田，帮着人家做做忙工，在家里守着安安稳稳的不好吗？”李大道：“婶婶说得对。现在人工短得很，所以忙工的钱也贵了，比在城里挑水也差不了多少，还吃了人家的现成饭，比我自己种那一二亩田还划算得来呢。”

张大道：“差却不差，我明后天上城和陈家老爷说，我的挑水夫底执照请他替我去销了罢，横竖陈家老爷太太多慈悲，下次再去求他没有不肯的。人家二文钱一担水，他家给三文，现在涨了，人家给四文钱，他家总算七八文，不然我早已不够吃了。”老婆婆叹口气道：“阿弥陀佛，那位老爷太太多子多孙多福多寿。”李大也说声“阿弥陀佛”，说着站起来叫他小孩子道：“我们回去罢，小福，出来罢，请翠姐姐空着就到我们家里去玩。”小福答应着，同着翠儿出来。爷儿二个一同告别要走，翠儿还在后面叫着小福道：“不要忘了，福弟弟，我们明天同去看燕子呀。”说着，祖孙三个都进屋子里去。

月亮儿上来了，树影横斜，零零落落散得满地的梨花，狗汪汪的叫着……。

五 远!

远!

远! 远远的……

……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 滚开去! 哼!”

警察底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底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
远！远远的……

① 香象渡河，佛教用语。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同在佛所闻说一味之法，然所证有浅深。譬如兔马象三兽渡河，兔渡则浮，马渡及半，象彻底截流。”这里喻心灵的深澈。

② 披霞那，英语 piano 的音译，意即钢琴。

③ 繁华令，英语 violin 的音译，意即小提琴。

④ 《梅花三弄》，琴曲名。内容写傲霜雪的梅花；因全曲主调出现三次，故称“三弄”。

⑤ 三贝子花园，清代的一所花园，后与乐善园、广善寺合并为万牲园，即今北京动物园。

⑥ 福煦(F. Foch, 1851—1929)，法国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法军参谋总长及协约国军总司令。

⑦ 吃外国火腿，指遭外国人足踢。

⑧ “也是”，英语 yes 的音译，意即“是”。

“矛盾”的继续*

他梦也似地走下阴暗的扶梯，他哭了！

同事们看到红着眼睛的他走进办公室，都笑笑。

他听着墙头上的钟敲了八点，他想那猪也似的人又要来了。

果然，那人来了，摇摇摆摆的踱进来，他似乎首先向燕樵看了一眼。“首先”看我！那眼光是多么难堪，好象是……——还是不要比方罢！管他呢！横竖我再拿你一个月的三十六元大洋，是中国大洋，还不是美金哩。最后的一次，最后的一次！

燕樵心上这样一想，觉得平安了许多；那买办昨天讲的话，又记起来了。哼！他想禁止我们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我还是写一封辞职信，去……到什么地方去呢，那里去找事做，找饭吃呢？——大概总有法子罢。

燕樵发了这样大的“雄心”之后，身上都觉松快，陡然间从奴隶变成人，从洋奴变成了高等华人，偷偷地伸了一个懒腰，随手拿起几件簿记和公事，开始他每天照例的工作。他身上觉得有些热，抬头看看窗子外边：狂风暴雨，象昨天那样的，虽然

* 本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最初编入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海霞社印行的《乱弹及其他》。

是没有了，可是，天色却是阴沉得更加可怕，想来街上一定还是冷得很呢，也许还在下雪珠——那对过的屋顶上，似乎是点点滴滴的雪珠在那里跳罢。可是，身上的确是觉得燥热。他只是想：为什么天天总是这样？于是他想起家里那个阴暗的扶梯，那间冷凄凄的屋子——朝西的统厢房，窗子缝里板壁缝里呼呼的风，尤其是那后板壁上面半段是空的，只用狭狭的木板搭成了斜方块的栅栏，那多么“寒酸”，多么阴惨惨的，难怪同样穿着这些衣服在家就只是觉着冷，烧着炉子亦是不中用的，热气还不是从那后板壁的上半段空的地方跑到外面去，一直跑到弄堂里墙壁上画着的乌龟身上去，何况今年煤炭这样贵。天天一清早，——要八点钟以前到行里去哩，——在热被窝里真是懒洋洋的，不愿意起床，那房里的空气是多么冷呵。只有到了行里，在烧着热水汀的办公室里，才渐渐觉得四肢舒泰起来。不过因为身上穿着中国衣服，反而会觉得燥热。如果是穿西装，那么，进来就脱掉大衣，多么舒服。看那猪也似的买办，他倒会想法子，狐皮袍子里面，穿着绸夹衫，卸掉了皮袍，好不轻快。只有咱们穷小子倒霉：穿少了在家里中国屋子里面是太冷，穿多了跑到办公室洋房里来又太热。他这样一面想着，一面办着事，心上闷得厉害。看看已经是领薪水的时候了……

“账房告诉我，下个月薪水加两块洋钱了。”他的一个同事笑嘻嘻对他说。

燕樵心上想：奇怪，为什么对我没有说起呢，他不期而然地抬起眼来看了那买办一眼，——买办正在手不停挥的批着

公事，那两只细眼睛紧凑着象没有缝似的，忽然也抬起头来四周围看了一看，仿佛他是已经听见了有人在低低的说话，他咳了一声嗽。燕樵马上把头低下，幸而眼光没有和买办大人的相接触！

照理，我也应当加薪了，为什么账房不通知我。要是家里的老婆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道她要怎样的失望；已经在好几个月之前，她就划算着这两块钱的用度哩。难道是因为我开了一次会。难道中国地方中国人，反而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反而是外国老板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了！岂有此理！

当天晚上，从升降机里面走出来，他的同事约他去吃小馆子，并且说，他是请一个在市党部办事的王先生吃饭。他心上正在气恼不过，就谢绝了，不去做“光荣的”陪客。可是，他想他的同事是比他“活动”多了，居然请王先生吃饭。乘电车回到家里，在弄口又看见那墙壁上画着的乌龟——“中国人就只会画乌龟！”他还只在楼梯上，就听见他老婆“欢迎”他的声音：

“你回来了，《前锋月刊》^①你替我买了没有？今天不是领着薪水回来了吗？”

“什么也没有买！你还是拿两角钱去买一点炭来生炉子罢。”

“又没有买！生炉子！天天生炉子，这点钱怎么够用？成天的服侍，替你当婆妈了。一本新小说都没得看的，不要说电影了。做了人……高尚的娱乐总得有一些。你怎么呢？……”

“我？我没有什么，只有一点头晕……”燕樵说着，顺手把那三十六块薪水塞在他老婆手里。他的心里还在盘算着那封

信——要写给行里的辞职信。

夜饭是马马糊糊吃过了，笔，纸，墨水瓶是放在他的面前。信呢，还没有开始写。“民族主义的自尊心”要他反抗，反抗，再反抗。但是，那天晚上信是始终没有写。

他老婆又在说着那件旗袍是太穿不出去了……

“明天再写，也不算晚。”

明天是很多的。“矛盾”没有解决以前，只有请这一位“明天”先生来暂时安慰一下。

孙总理的演讲集，是他常常读的。现在，是更加要读《民族主义》了。孙总理似乎是在教训他“处世之方”，真正中国国货的“处世之方”，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民族性。是的，孙总理讲的故事也特别动人。香港有一个中国的苦力，靠着一根竹杠挑担过活的，他积聚了几个钱买了一张发财票，就放在竹杠的里面。这位苦力是发财心切，把那发财票上的号码读得滚熟。那天发财票开彩了，他去一看：头彩十万元的号码，正是他那一张发财票。这还了得！十万元！从此不要当苦力了。他拿起那根竹杠，就往海里一扔：啊呀！怎么得了——那发财票还放在竹杠子里面呢。②吃饭家伙的竹杠，怎么可以扔掉呢！不错，吃饭家伙要紧。他自从看到了这个故事——这个“民族固有道德”的教训之后，那外国老板和买办的颜色，似乎也变得和善些，天气似乎也好些，不这么闷人了。

时候过得很快，有一个月了。辞职信还是没有写。薪水却的确没有加。“民族固有道德”和“民族主义的自尊心”在他肚皮里面又打仗起来了。

还是他的老婆提醒了他：叫他去借两本《前锋月刊》《前锋周报》^③来看，他想起了市党部里面的叶先生和陈先生，——至于王先生那样大人物，还没有结识得上呢。常常和叶陈两先生来往之后，他自己觉得大有进步了，首先是“活动”了些。有一天叶先生露了一句口风，使他心上细细的计画了一番。从此之后，这个计画时常想起……总在他的心上盘旋着。

“总理真是伟大！”他突然间象“悟了道”也似的想起来了，“那张发财票得先拿出来，去领到了十万块大洋的头彩，仔仔细细的数清了钞票，然后再扔掉那竹杠也不迟呵。”

.....

醉醺醺的从一家广东菜馆“某某酒家”出来，客气的朋友是早走了，只有叶先生同他两个人了。叶先生在他耳边低低的说了几句，他连忙答应着：

“那自然，那自然！还得请诸位先生多多领导，多多指教呢。”

他一路回家，还把叶先生送到弄堂口，自己再坐黄包车回去。“这乌龟弄堂真是住不得……老婆那件旗袍的确是再也穿不出去了……那买办还凶得到我头上来吗？三十六块，四十块，四十块之外还有……还有不在四十块之内的……”他的确有些醉了。

“快些，快些，多买些炭来生炉子，多买些，多买些！”

“今天已经不大冷了，又生什么炉子？”

“你，女人家懂得什么……么？你懂得民族主义吗？你懂得总理的遗教吗？”

“什么？你说什么？”

.....

几个人围着一张圆桌，有两个坐在沙发上，燕樵坐的是一张椅子；他们面前放着几只酒杯。

“这次日本人算是好说话的。”

“出手也就见得大，究竟日本小鬼吝啬，会打小算盘，那次英美烟……”

“燕樵还是头两次办事，这指导工会的事是很麻烦的，你得给他详细说说以前的经过情形，不要东扯西拉的什么英美，什么南洋。”

“好，是了是了！”

明天过来，燕樵把一条鲜艳的领带换了下来，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到了一个日本纱厂门口。工人聚着的有好几百。他走上去，挑选了两位熟识的工头，把他们拉到旁边说了几句话。然后，他站到一个大木桩上面，对工人演说了：

“工会方面已经替你们办好了，你们明天就先上工，随后，资方已经答应谈判你们提出的条件。只是开除的那两个工人，据党部方面的调查，的确是红匪，不能复工，你们不要上当。……”

工人之中有人吼着，他没有听清吼些什么。可是，一个巡捕已经捉了两个工人带着走，那边又来着一队印度马巡，还有好几个穿着黑布长衫，扎着腿的人踱来踱去，对着他微微的笑了笑。他向他们点点头。那时，工人已经散了一大半。他

也不演讲了，只对那熟识的两个工头说：

“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得劝劝。做人要知足……”

他走了，他只觉得背后有几只眼睛钉住了他的背。那些眼睛不知道比买办的一双猪眼怎么样。神气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些带血的眼睛。

但是，工人是“安静”下去了，罢工是终止了。燕樵的这种功绩一天天的积聚起来，“工人运动大家”的尊号已经传遍了他的新旧朋友的口碑。他身体都比以前强健得多，每天早晨总要喝一杯牛奶，吃过午饭总要在新的沙发躺椅上睡睡中觉。时常读“民族主义的读物”，研究中国的近百年史，谈谈提倡国货，他尤其喜欢读《清朝全史》^④，几十年来中国丧失的领土和主权，据他说，都要从提倡国货运动里面去取回来。那些“打倒帝国主义”的空口号是没有什么用的，徒然带着些红匪的色彩。

前好几天，他还给老婆做了两件——两件！——国货的时装旗袍，去参加国货时装的展览会。

“只是老婆的身材总不大好，不如那几位‘女同志’的曲线美来得那么肉感，这又仿佛太中国气了，在这上头似乎‘中国民族固有的美德’缺欠些，多带些西洋风味，也不妨事，”他想。他现在早已不是洋奴了，而是高等华人了，低级的趣味也渐渐的消失了，“高尚娱乐”更是每天不能少的了。反正“工作”是不大忙，比以前在洋行里差得多了。他也不必每天放了工急急的跑回去，每天总得“活动活动”，看看朋友——民族主义的朋友。那里，有时候可以碰见“女同志”。

的确，工会的“工作”说多是并不多——会费不用去收，厂方的写字间会扣下送来；会员呢——那还不容易，工厂的花名册拿来点点名，那还不都是会员吗。说少可也不少，天天总得接洽接洽，活动活动。那些工人真是没有教育，甚至于没有人性——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时常总要闹些“小事”，他们太缺乏民族主义了，连提倡国货的浅近道理都不懂得，还是几位工头，“包”字号的弟兄们有见识，能干！

“丝厂罢工了，一万多人呢。昨天你没有来，她们一班小姑娘真了不得！警察捉了两个煽动罢工的人，她们就哄哄的聚了好几千人来抢，还动手打呢。结果，那两个女工被她们抢回去了，幸而巡捕房和中国警察帮忙，才又捉住了。今天还有几十家丝厂没有上工……她们要求恢复原有工资。”

“这还了得！”燕樵跺脚说，“快派一批人出去劝她们上工，这里面一定有红匪捣乱，你到‘那边’去招呼一声，请‘他们’多多帮忙，我自己也就去。”

乱哄哄的只见人头，许多女工在那里谈论，看见“工会方面”的人走来，她们就不做声了。跟着，巡警来了好几队。燕樵看见“工会方面”劝工人复工的好几个人，有被打的。他很生气。可是，等到他走近工人的时候，情形已经不同了——她们安静了许多。草场上的绿色已经告诉大家春天来了，杨柳枝边亮晶晶的刺刀照耀着温柔和暖的太阳光，也告诉大家“工会方面”的大人物来了。大家安静了许多。

“工友们，条件是好商量的，大家先上工。要知道丝业是中国的重要产业，丝业不振兴，中国不能和外国……外国……”

就是帝国主义竞争。要国家有自由，个人就要牺牲自由。工友们要能够牺牲自由，提倡国货。中国丝厂很可怜的，生意不好，要劳资合作才好。减低工资是爱国的国民政府批准了的。大家都是国民……国民……”他咳了几声嗽，“国民，女的也是国民，国民都要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现在公布了工厂法，每人只要做十点钟的工作，女工生育的时候，还有休息……”

工人是沉默了好久，她们的头是仰着的，眼光是直直的——那眼光是表现着愚蠢，怨毒，一点儿民族主义也不懂！说这样动听的话，她们也没有一点感动，真是禽兽！她们那种笨眼睛，不是表现她们是禽兽吗？！她们表面上仿佛是静静的听讲，不知道她们肚皮里面转着什么鬼念头。燕樵一面讲着，一面这样想。他似乎听见人堆里有人叽哩咕噜的说：

“十点钟工作！我们现在做的还不止十二点钟呢！”

“希罕你们的‘十点钟’，中国现在有地方只做八点钟了。”

“那地方就没你们这种‘工会’，那里是我们的工会。”

“生小孩子有休息！工资呢？？”

这话都说得很低，不大听得见，燕樵还是讲他自己的：

“你们先上工，不要听红匪的煽动。”

“没有饭吃呢？！”人堆里忽然大声的说了这句话，那声音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大。他本能的——民族主义的本能的，回过眼光去看了一看几个穿着灰布长袍的“人物”和那亮晶晶的刺刀。

“不要听红匪的煽动，”他特别着重的重复了这一句话，是怕自己的思路被人堆里的声音打断了，“没有什么苏维矮，苏

维高，没有什么工农兵会议，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他们只是些杀人放火的土匪。你们不要受利用，快快上工。国民政府现在就要肃清这些红匪了；国民会议快要开会了。你们快快上工。国民会议上，全体工人的要求都要讨论的。”

“有人说国民会议是地主资本家的会议？……”人堆里又来这么一个“问题”。

“那是他们造谣，杀人放火的红匪造谣！”他很轻巧的回答了这么一句，眼光又向“那边”转了一转。

“造谣！你呢？”突然间人堆里居然敢于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居然！

“混蛋！！你问的什么？！什么！什么！……”

……

他一路回家来，春天的夕阳更加使他陶醉了。他看着黄包车夫向他哀求添些车钱的神气，真是又好笑又好气。这班人真是没有脑筋的：黄包车夫因为外国人多给几个铜板，就宁可去拍外国人的马屁，工人为着多要几个工钱，就宁可破坏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有这几百万几万万甘心做洋奴的人，那得不亡国！要人人都要象我这样有志气才好……那班不要脸的女工居然说我造谣，岂有此理，洋奴，洋奴！想想真要生气，我亦宁可……他摇摇摆摆的摸进了家门。

“怎么？这样晚又是喝醉了回来？”

他不做声。过了不久，他的鼾声已经呼呼的透出那静悄悄的屋子。屋子里是绿沉沉的——桌子上一盏雅致的绿枱灯，旁边还煮着莲子，潺潺的沸水声和他的鼾声相应。桌子上那

绿色枱灯的圆圈之下，一本《清朝全史》展开着，露出一行字：“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他老婆忽然听着他哼，他磨着牙齿，他说：

“你你你你你你你呢?!”(NIIIIINE?!)

一九三一，四，四。

① 《前鋒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〇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② 这个故事见于《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

③ 《前鋒周报》，“民族主义文学”的综合性刊物。前鋒社编辑，一九三〇年六月在上海创刊。

④ 《清朝全史》，日本稻叶君山著，大正三年(1914)出版。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中华书局曾出版但焘译订，姚汉章、张相纂校的中译本。

青年的九月*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这是青年的纪念日。

这当然不是黄金少年的纪念日，他们已在歌颂着战争，赞美着“马鹿^①爱国主义”。他们说：平常时候，欧洲的德国法国英国奥国意大利……一切种种国的工人说什么国际主义，一切种种国的青年，当然是下等人的青年，说什么反军国主义，可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欧洲大战爆发了，炮声响了，号鼓动了，这些人的阶级意识，始终敌不住民族意识，都慷慨激昂的背起枪来，往沙场上去了，去杀他们同阶级的劳动同胞了，他们虽然同阶级，始终互相残杀了；这证明民族意识是至高无上的。这证明帝国主义始终是尚武精神所寄托的。法国巴比塞的“Le Feu”《火线下》^②——这最早一部反对战争的小说——不久就出世了，在这班人眼光里面应当是卖国文学，而若莱斯^③果真在这种黄金少年的铁蹄之下，当做卖国贼而践踏死了。中国的黄金少年——五皮少年^④，要是果真有勇气的话，应当拍拍胸膛承认自己万分同情于杀死若莱斯等类的凶手，自己承认衷心私淑的是“克列曼梭是吾师”^⑤，自己承认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学导报》第四期（一九三一年九月），署名史铁儿。

确恨不得杀尽一切种种的若莱斯，的确认为巴比塞的《火线
下》是卖国文学。为什么不呢！

不然，不然！他们有点儿害羞，他们一方面翻译着，谈论
着，称颂着雷马克^⑥，别方面写着战争小说，刚刚和雷马克绝
对相反的战争小说。雷马克等的非战文学出着风头，他们的
主战文学就想借这风头混到人丛里来。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
丑态。中国有个特别名词，叫做奸商，其实中国的富商很少不
是奸商。他们的本事是在善于蒙混，巧于影射。中国的黄金
少年就是这些奸商的嫡亲骨肉，所以他们的蒙混影射的手段，
出之于生物学的遗传，真正是狗有狗种！

青年的国际纪念日当然不是这些狗种的纪念了！青年的
国际纪念日是世界上劳动青年的纪念。

一九一五年，炮声，枪声，飞机象鹰鸟似的，坦克象穿山甲
似的，轰轰轰隆，嘘嘘嘘，搭搭搭搭……象毒龙，象虺蛇，象豺
狼，象一切种种穷凶极恶的野兽，正在张牙舞爪的吞噬几万，
几十万人的生命。正在这种时候，德国的青年——李卜克内
西^⑦等等首先敢于起来叫醒自己的弟兄们：我们，劳动者的子
弟，为什么帮着资本家来使用这些毒蛇猛兽，互相的残杀，为
什么不叫他们去杀资本家；资本家并没有祖国，他们是“有奶
便是娘”。那里有钱那里就是故乡，不是故乡，也要叫它变成
故乡，所以要打仗；我们工人在这里替他们当炮灰，这是为的
什么？我们德国的劳动青年快些伸手给法国的弟兄们，握手，
握手罢！这样，少年共产国际^⑧的基础建立起来。列宁写信
给他们，和他们谈话。“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变成国内战争！”

这个伟大的，推动历史的，开辟一个新天地的口号，从此渐渐的，固然不是一下子，可是，不停止的，坚决的，刻苦的，象高山上的泉流似的，始终流到了大海，到了欧美各国，以至于古旧的亚洲的劳动群众的心灵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光芒射着整个太阳系，贯穿着上下五千年的黑暗世界。俄国的工人阶级解放了。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共产国际^⑨。少年共产国际。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呼声，成了几百万人的觉悟，还要前进，前进，征取几千万人的心。这个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就是纪念着这个，纪念着反对军国主义的第一炮，纪念着少年共产国际的源头。

现在，欧战之后的第十四年了。世界的资本主义毒龙又在张牙舞爪的跃跃欲试的筹备着战争，尤其是他们象小偷一样的贼眼，都射在世界第一个劳动国家身上，想刺一刀，放一枪，中伤它。资本主义的“文明”正在日落西山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⑩了。所谓黄金的美国，这次坐了经济恐慌的首席。失业的全世界三千万，没有统计的中国苦力，印度穷人……不算在内。但是，六分之一的地球上，那劳动国家里面，热烈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已经快要完成他的五年计划。他们——劳动国家的主人，固然十分辛苦，忍受着牺牲，可是“将来”的光荣照耀着他们。只有劳动国家是繁荣的。世界上其余一切的国家都是恐慌的。这劳动国家，就是十四年前首先脱离帝国主义的战争，首先实行扫荡地主资本家的国内战争的国家呵。所以，现在那些资本主义的毒龙，恨极，妒极，要想消灭它。他们准备战争。不但互相吞噬，而且最要

紧的是吞噬这个眼中钉的苏联！

总之，现在又是资本家要叫劳动青年去当炮灰的时候了，又是无耻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所谓劳动党，替资本家宣传“保护祖国”的时候了，又是他们出卖劳动群众，指使他们去自相残杀的时候了，所以，现在的九月第一星期日的纪念，格外惊心动魄的震荡全世界劳动者，全世界劳动青年的心！

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黄金少年要出来弄个什么民族主义文艺的把戏。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的狗种——黄金少年，黄埔少年，五皮主义的少年——自然要汪汪汪的大咬起来，替他们的主人做“战鼓”，鼓吹战争了。这些狗种，居然这样不要脸，公开的称赞德法劳动者的自相残杀，拿来“证明”民族意识的至高无上（见胡秋原做的民族主义文艺论文——《民族主义文艺论文集》）。这个自相残杀使欧美资本主义延长了一二十年的寿命，使帝国主义巩固了对于印度……中国的统治。中国黄金少年称颂这种自相残杀，就是称颂帝国主义的统治，露出他们的狗相。

是的。中国的绅商，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所谓“民族”，做完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要打劳动国家，中国的绅商不是马上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当他们的马弁，去冲一个头锋，演了一次所谓“国门之战”^①的滑稽把戏吗（中东路事件）？帝国主义的列强要互相争夺地盘，中国的绅商不是马上分成蒋派冯派阎派等等替他们互争在华势力范围，打了好几年的恶

仗，^⑫ 什么《陇海线上》^⑬ 什么……之战……之战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就高唱吃人肉喝人血的诗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⑭；马上念着符咒似的二十世纪的《书经》：“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咨尔多士，为民前锋”^⑮，歌颂这些残杀劳动民众的战争，歌颂着这些企图侵略劳动国家的战争！中国的绅商，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固然，中国的绅商已经发了好些四六电报，哀悼着张辉瓒^⑯，等等等等，已经选了好些《文选》^⑰ 体的诗，赞，吟，赋，歌咏着“剿赤”。但是，黄金少年不能够满足的。他们的狗鼻子，闻得到革命青年心灵之中的火药气，觉得到劳动群众的震怒的神经，他们知道：这些四六诗赞迷惑不了人心，鼓舞不起杀人的精神。他们要弄新文学来卖弄，想这才可以麻醉民众，鼓动起自相残杀的浊气，消弭得阶级斗争的勇敢，在血汗榨尽的干涸的心灵上建筑起“民族的神明”！

但是，这始终只是梦想罢了。中国的战争，已经象世界大战的流影一样，比世界大战的本身，先行爆发了。这里有军阀的混战——帝国主义的互相战争，这里有侵略劳动国家的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里已经有进攻红军的战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企图镇压革命的阶级的国内战争。战争已经是这样巨大的事变，它教育着群众，它锻炼着阶级意识。中国的革命青年，中国的劳动青年，中国的一般劳动群

众，早已开始知道应当为着什么而战，应当为着劳动的解放而战，应当而且必须经过阶级战争而去解救中国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纪念九月第一星期日，已经不仅仅用笔，用舌头，用抗议，用示威，而且用着枪弹，用着梭枪。中国的革命的劳动青年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对进攻革命而实行战争了。原来，“军”也有“民族性”的。资本主义的欧美“军”国；而封建残余统治的中国是“军”阀。中国的黄金少年企图变军阀为军国，这是枉然的。中国的劳动群众不但反对军阀，并且反对军国，不但反对军国，并且要求“军”劳动，“军”阶级！你们想用“民族的神明”的牌位，要劳动青年朝它跪拜，想念着吃人肉喝人血的符咒，受人家疯狂似的浊气一冲往炮口里送，想……用一切种种花言巧语鼓舞人家去替你们当炮灰，去侵略劳动国家，去残杀劳动群众，去摧残革命，现在没有这样容易的了！

不过中国的九月纪念里，记清着这件“新鲜”的事实，倒也不是无益的：就是中国现在也发见了一种狗把戏，虽然他们玩着这些蒙混影射的手段，可是，老老实实的狗相已经露出，——文艺上的所谓民族主义，只是企图圆化异同的国族主义，只是绅商阶级的国家主义，只是马鹿爱国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表现，企图制造捍卫帝国主义统治的所谓“民族”的“无上命令”，企图制造服从绅商的奴才性的“潜意识”，企图制造甘心替阶级仇敌当炮灰的“情绪”——劳动者安心自相残杀的杀气腾腾的“情绪”。这件事记清楚了，的确是有些益处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看清楚敌人的行动，是战斗胜利的必要条件。

问题是在于：他们——民族主义的黄金少年，正在号召着

“投笔从戎”，正在勉励“新朝遗少”去当“少爷兵”，为的是不但去亲手砍动起来的奴隶的头颅，并且要去握紧“牛马”嘴上的勒口，监视白军之中的“丘八”。“布施”许许多多新式的蒙汗药，而劳动青年的“九月”，国际无产阶级的“九月”，就是要惊醒中了蒙汗药的人们，它用惊天动地巨人的声音，象洪钟似的，叫出震动全世界的口令：

“向后……转，掉枪……头!!!”

蒙汗药是多得很，现在在《施公案》，《彭公案》，《说岳》^⑧……等等之外，鼓吹精忠保主，鼓吹讨“逆”锄“奸”，鼓吹挖心剖腹祭大帅的“英雄”文学又新加了《陇海线上》，《国门之战》，……“丘八”以前当定了炮灰的；许多，许多，数不清的劳动青年，以前在升官发财的梦想和讨“逆”剿“匪”的号令之下，变成了枯骨。他们的父母妻儿的血泪都已经流满了东西的长江大河。但是，现在呢？自从国际的“九月”到了中国，中国的“丘八”是在醒过来，中国的痛苦民众，中国的工人已经屡次举起这面列宁树起的“九月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红旗。现在，我们已经有许多鲜红的旗帜插满的地方，那地方早已就把“向后转，掉枪头”的口令变成了行动。他们现在真是在“袭击着高天”。斗争的艰苦，绅商白军的残酷……一切一切锻炼着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反对战争，不是什么雷马克式的哼哼哈哈的和平主义。他们渴望着：“国际的九月”所发出的口令正深切的再传播，再广泛的传播到“丘八”群众之中去。没有疑问的，他们有这权利责问我们！在这“少爷兵”企图玩耍新把戏的呼声中，在敌人后方的你们，暂时不拿枪杆儿而还拿着

笔杆儿的你们，正在做什么??你们的代替《彭公案》《施公案》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丘八”之中去，——在这《陇海线上》《国门之战》正在黄金少年之中出风头的年头? 啊?

说到这里，似乎“青年的九月”给予革命文学的任务是很清楚的了，不用多说了，啊?

一九三一年九月第一星期日。Str.

① “马鹿”，日语。“愚蠢”的意思。

② 巴比塞(H. Barbusse, 1873—1935)，法国作家。《火线下》，现译《火线》，是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罪恶的长篇小说。

③ 若莱斯(J. Jaurès, 1859—1914)，现译饶勒斯，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数日遇刺。

④ 五皮少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军官和政工人员，大抵手执皮鞭，肩挂皮带，肘挟皮包，腿护皮套，脚踏皮鞋，故被称为“五皮”。

⑤ “克列曼梭是吾师”，这是国家主义者、青年党头目曾琦的一句诗。克列曼梭，现译克里孟梭，一九一七年一月至一九二〇年一月间任法国内阁总理，人称“老虎总理”。

⑥ 雷马克(E. M. Remarque, 1898—1970)，德国作家，著有反战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等。

⑦ 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 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写了题为《主要的敌人自己国内!》的传单，指出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德国帝国主义。

⑧ 少年共产国际，即“青年共产国际”，是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革命青年的国际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成立于柏林，一九四三年解散。

⑨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于莫斯科，一九四三年六月解散。

⑩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代诗人李商隐《乐游原》中的诗句。

⑪ “国门之战”，原为万国安作短篇小说名，刊于《前锋月刊》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三月）。这里指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权益而引起的长期争端，一九二九年激化为军事冲突，在中国领土满洲里、札兰诺尔、密山、室韦、汪清等地曾发生战争。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双方签订协定后结束争端。

⑫ 打了好几年的恶仗，这里应指国民党内各派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所进行的战争。如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的战争；一九三〇年四月起，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进行的战争。

⑬ 《陇海线上》，黄震遐作短篇小说，刊于《前锋月刊》第五期（一九三一年二月）。

⑭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见于岳飞《满江红·写怀》。

⑮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咨尔多士，为民前锋”，这是国民党党歌里的几句歌词。

⑯ 张辉瓒，湖南长沙人，国民党军官。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国民党进攻江西中央苏区时任前线总指挥，后被红军处决。

⑰ 《文选》，即《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501—531）编选。选录自秦至梁的诗文辞赋等共三十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

⑱ 《施公案》，一名《百断奇观》，清代公案小说，共九十七回，作者不详。《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共一百回，署贪梦道人作。《说岳》，即《说岳全传》，清代讲史小说，共八十回，钱彩作。

美国的真正悲剧*

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① 现在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文坛所公认的大文学家了。但是,德莱赛的成名是很晚的。美国的资产阶级一向自以为“荣华富贵”,了不得的文明国家。对于德莱赛这类揭穿他们的黑幕的文学家,老实说是有点讨厌。但是,德莱赛自己虽然从不去追求什么声望,然而他的天才,象太白金星似的放射着无穷的光彩,始终不是美国式的市侩手段所淹没得了的了。现在,大家都不能不承认德莱赛是描写美国生活的极伟大的作家。他的一部伟大的著作《美国悲剧》新近已经摄制了电影片子,甚至于中国的上海都已经开演过。自然,美国的资产阶级的电影界会把这种作品糟蹋得不成样子,以至于德莱赛不能不提出抗议。可是,美国资产阶级对付德莱赛的手段,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今年七月间光景,他到美国的煤矿区里去了一趟,他在那里所遇到的事情,所看见的情形,简直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他去的煤矿区是美国宾息尔法尼亚省(Pennsylvania)和沃海欧省(Ohio)②。那地方四万多矿工宣布了罢工,已经有几

*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斗》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署名陈笑峰。后编入《乱弹及其他》。

个月了。美国的几个煤业公司联合了起来反对罢工工人，斗争正在紧张的时候。在这煤炭大王的王国里，德莱赛住了几个礼拜，住在那种山谷中间的小房子里，亲眼看见矿工的痛苦生活，听见了许多矿工和他们的老婆儿女的诉苦；和工头，警察，兵士，审判官谈过许多次话。他回来的时候，有新闻记者去问他，他的手都发着抖写了几句话：

“我观察了美国几十年，我自己以为很知道美国。可是，我错了——我并不知道美国！……”

这是多么惨痛的愤怒的呼声！中国的留美博士，象胡适之，罗隆基，梁实秋^③之类的人物在《新月》上常常的写什么美国差不多人人都有汽车，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比不上英美的家畜猫狗。他们自以为很知道美国了！可是，现在美国生活描写的极伟大的作家德莱赛告诉我们，他尚且错了。自然，宁可做英美家畜的人，是不会象德莱赛这样认错的。

德莱赛还没有把他在宾息尔法尼亚煤矿区看见的听见的写出来。他正在写着。他已经对美国资产阶级严厉的申明：“我不能够不做声。”他现在要写的正是第二部的《美国悲剧》，真正的美国悲剧。德莱赛始终看见了懂得了这个美国的真正悲剧。德莱赛亲眼看见所谓不偏袒的美国式的民权主义的官厅，他们的宪兵的铁蹄是怎样蹂躏面黄肌瘦的一群群的女人，他看见这些女人手里抱着的小孩是多么畸形，多么瘦得可怕。德莱赛对一个新闻记者诺尔茨说：

“要看见这样的情形，方才能够写第二部的《美国悲剧》。”

德莱赛看见了很多的事情。他看见了那些对着没有武装

的工人群众扫射的机关枪，他看见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他看见了穿得破破烂烂的工人纠察队防备那些破坏罢工的人闯进矿坑去开工；这些破坏罢工的人，是资本家到别的地方去招来的。他还亲自受到所谓不偏袒的宪兵的威吓和教训。

在亚列克森州^④的一个小城市，叫做霍尔宁的地方，德莱赛去问一个宪兵：全国矿工总会的领袖菲列普史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忽然失踪，为什么一点儿消息也打听不出来。——这个菲列普史是工人群众很敬重的一个领袖。那个宪兵足足有六尺高，腰里带着很大的一枝手枪，他看都没有看德莱赛，只当不听见。德莱赛又问了一遍。

那宪兵吐了一口口沫，眼睛朝着天就骂起来了：

“滚你的蛋。你要知道他干什么?!”

“看看你们这些专制魔王的蠢相！还是矿工的经费养活这班东西呢。”

那宪兵没有懂得德莱赛的话，可是，他大概觉得这总是讥笑他的，他就大声的嚷着：

“你再不闭起你的鸟嘴，我立刻送你到铁笼子里去。”

那枝很大的手枪已经对准了德莱赛的鼻头。

“把我送进铁笼子里去？为什么？为了我问了你一句？”

那宪兵把德莱赛仔细的看了一下。他的眼界倒也不小，到处都去过，什么都见过。虽然德莱赛穿的衣服普通到极点，而且满身是煤屑和灰尘，可是德莱赛的外表始终有点儿和“灰色畜生”的矿工不同，所以那个宪兵觉得这一次不大对劲。要是普通的矿工，那就可以随便的逮捕，拷打，践踏。那个

宪兵大概想了一下：“知道这家伙是谁！也许是官厅或是公司里派来的。”

“你是什么人？”他已经比较的客气一点的问了一句。

德莱赛就说了自己的姓名。那宪兵的脸上，一点儿也没什么别的表示，他只是很高兴的说了一句：“也许那个昏蛋菲列普史坐在亚列克森的监狱里呢。”

德莱赛又碰见了亚列克森的典狱官詹姆士·康。这位康先生是欧战时候的军官。他听见大文学家德莱赛到他办公室来见他，简直发慌得不得了，表示许多假意的殷勤。

殷勤的康先生露着两个门牙，象狗似的嘻着嘴，油光满面的笑着。他否认矿工的一切痛苦和艰难。他否认警察的一切暴行。他一切都否认。

“德莱赛先生，你相信我的话，这都是没有的事。我自己也是个矿工的儿子，我知道他们的脾气。他们总是唉声叹气的。他们这样惯了。现在更加放纵了。德莱赛先生，法律总是法律。法律是要尊重的。他们这里的人可不肯尊重法律。这样，就有的时候要出一点儿小事情。……你说起矿工有组织纠察队的权利……让他们在矿坑边逛好了。可是，德莱赛先生，等到他们要破坏私有财产的时候，那就只能够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没有办法。他们自己不好。”

那个典狱官的秘书，很起劲的要想帮助康先生说服这个危险的文学家，证明警察没有什么暴行，他拿了一枝旧枪放在德莱赛的面前。

“德莱赛先生，你看：我们只不过用这种没有用处的枪朝

天放放罢了！”

“可是，用这种‘没有危险的枪’，居然打死了那个矿工齐迦里克，”德莱赛反驳他们。

典狱官在自己的脸上装出一副真挚的生气的神经：

“这是访员造谣。”他很坚决的声明：“我们方面的人，谁也没有打死齐迦里克。也许是他的同志之中有人把他打死的。”

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做作，太虚伪了，所以他的秘书马上加了一句：

“我们特别检查了一次，先生，我们方面的人，谁也没有罪过。他们都是很正直很直爽的人，先生。”

德莱赛只有向他们鞠躬告辞了。

典狱官还特别加了几句话：

“你在你的将来的小说里面，一定要描写我了。你相信我的话，我不但是一个保卫法律的人，而且很喜欢艺术和书籍。你看这幅画，”他用手指着墙壁上挂的一幅很大的画。

那幅画据典狱官说，是画的基督劝告一个有钱的青年把自己的财产舍施给穷人。

“我每个礼拜天都到学校里去给小学生讲《圣经》。这是我买了要送给他们的礼物。”

德莱赛给他们说：所有这些事情，他都记在心上。我们大概可以在德莱赛的将来的小说里，看见这一位典狱官的尊容。他真是一只假道学的野兽，煤炭大王的走狗，他手里掌握着几万工人的性命。这几万工人的血汗差不多已经榨尽了，穷苦绝望到极点了。

德莱赛看见了这些工人。他住在他们的家里，吃了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的面包，不知道是用什么草掺在面里做的，一半是面，一半是草屑。他亲自看见警察对着工人群众开枪。工人是去阻挡破坏罢工的人到矿坑里去。警察开枪的时候，打死了两个工人，十九个工人受了重伤躺在路上。还有警察放着流眼泪的毒气炸弹。他亲眼看见宪兵的马队践踏女人和小孩。他在一个矿坑的口子边，看见女人身上的马蹄的印子。

工人都被公司里的人赶了出来，不准再住公司的工房，他们住在山窠里的洋铁篷里，住在马厩里，住在木棚里。他们留德莱赛住在他们家里，给他讲他们的生活。

德莱赛问一个工人：

“你在矿里做了几年了？”

“二十三年。我是美国矿工工人联合会的会员。”

“这是黄色工会呀，你知道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别种工会在这个区域里又没有。”

“你赚的工钱也有时候可以够用吗？”

“从来也没有这种时候！我有四个小孩子。我总是不够的。”

“罢工以前，你的工钱是多少？”

“二十四块美金一礼拜。可是一分现洋也拿不到手的。十三元七角扣了做房钱，自来水和电灯的钱。其实工房并没有电灯。其余的钱，都是发的一种票子，只能够到公司办的商店里去买东西。”

“这种票子是不是和现钱一样价钱呢？”

“没有这么一回事。把这些票子打了八折卖出去，换了现钱到别的店里去买东西，还可以比煤矿公司商店里多买得多呢。”

“你们组织纠察队的权利，常常被破坏吗？”

“警察差不多天天开枪打我们，用马冲散我们，还要放毒气炸弹。”

“你们罢工已经有多少时候了？”

“两个半月。”

“还有多少时候可以支持呢？”

“如果外面有帮助来，准备坚持到底，坚持到胜利。”

德莱赛自己说这一类的谈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对于他的小说可以有极大的帮助。这部小说将要是美国整个资产阶级的罪状。

德莱赛已经和资产阶级的美国决裂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他这样的艺术家，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文学家。

但德莱赛，却象一只老象，它在树林里走着，“一直向前，踏倒它路上的一切东西，随便什么也不能够引诱它走到旁边去”（辛克莱^⑤说的）。现在的德莱赛是个六十岁的婴儿，他的斗争已经不是孤立的了，已经是在一个新的立场上了，他的勇往直前的勇气应当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世界上有许多人等着要看他的第二部的真正的美国悲剧，当然，也就有些人听见这个消息头痛呢。

一九三一，十一，二十五。

① 德莱赛(1871—1945),美国作家。下文的《美国悲剧》,是他于一九二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② 宾夕法尼亚省,现译宾夕法尼亚州,位于美国东部,系美国第一个采煤—冶金区。沃海欧省,现译俄亥俄州,位于美国中部平原的东北部。矿业以煤、石灰石著称。

③ 胡适之(1891—1962),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主要成员。

④ 亚列克森州,现译阿肯色州,位于美国中部平原的南部。

⑤ 辛克莱(U. Sinclair, 1878—1968),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

王道诗话*

“人权论”^①是从鸚鵡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鸚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水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栢园书影》^②，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鸚鵡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讲演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③。价钱不算小。这大概就叫做“实验主义”^④。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署名于。

本篇及以下的《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关于女人》、《真假董吉河德》、《人才易得》及《中国文与中国人》十一篇，都是作者于一九三三年避居于鲁迅家或与鲁迅为近邻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曾对这些文章作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还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的笔名发表；后来又把它们分别编入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这里所收的这些文章都根据鲁迅保存的作者手稿；文末的写作日期，则均为鲁迅于发表时所加。

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⑤ 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祖传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⑥，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轲，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鸚鵡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一九三三，三，五。

① “人权论”，指《人权论集》。收有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谈论人权问题的文章，一九三〇年二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② 《栎园书影》，即《因树屋书影》。作者周亮工(1612—1672)，号栎园，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③ 胡适曾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应何键(即文中的“何将军”，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之邀，到长沙作题为《我们应走的路》的讲演。据传那次何曾送胡适“路费”五千元。

④ “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它认为有用就是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要代表有美国的杜威等。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和信徒，一九二一年在他所作《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杜威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

⑤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ry News)，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日报，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创刊，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停刊。

⑥ 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苦闷的答复*

《李顿报告书》^①采用了中国“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②，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忧”，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的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事实上，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乎^③？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发表时由鲁迅改题为《伸冤》，署名干。

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稟请我主管机关代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处死刑。我们中国的劳工，这样一来，就都变成了“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吗？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

所以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和日本打仗，就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不过装做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④。同时，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这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⑤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而悔悟，使得远东永久和平，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它李顿爵士还要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一九三三，三，七。

① 李顿(V. Lytton, 1876—1947)，英国爵士，曾任印度总督。一九三二年二月，他率领国际联盟调查团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发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其中妄说日本在我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和“利益”，甚至提出损害中国主权的“满洲自治”的荒谬主张。

②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主张引进外国技术与资金以开辟中国利源。《李顿报告书》据以提出“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

③ 日内瓦，位于瑞士的西南部，当时是国际联盟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指当时的英、法等帝国主义集团。

④ “缩短阵线”，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前线部队溃退的用语。

一九三三年初开始，日军大举进犯我热河省，三月攻陷省会承德。三月三日《申报》报道：“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源我军缩短阵线。”

⑤ 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

曲的解放*

“词的解放”^①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麻将”。

曲何妨也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白) 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②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

[短柱天净沙]^③

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 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署名何家干。

商量奔向咸阳。

(生白)你你你……低声! 你看咱们这汤儿呀, 他那里无心串演, 我这里有口难分, 一出好戏就此糟糕, 好不麻烦人也!

(旦白)那有什么, 咱们一夫一妇, 一正一副, 再来一出好了。查办④也还够唱的。

(生白)是。(唱)

[颠倒阳春曲]⑤

人前指定可憎张,⑥

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

只不过, 假装腔,

便骂骂, 又何妨?

(丑携包裹奔上, 白)阿呀呀, 吓死我了。

(旦抱丑介白)我的儿呀, 你这么心慌! 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末几挡, 让我们好慢慢收拾。(唱)

[颠倒阳春曲]

背人揆定可怜汤。

骂一声, 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

只不过, 理行装,

便等等, 又何妨?

(丑哭介白)你们倒要理行装! 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

你瞧!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⑦。(生)雷厉风行查办忙。(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

一九三三年,三,九。

① “词的解放”,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该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为“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载有曾今可作的《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② 热汤,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进攻热河时他仓皇逃跑。三月四日,日军仅以百余人即占领当时的省会承德。

③ 短柱天净纱,短柱,词曲中一种调式;《天净纱》,“越调”中的曲牌名。

④ “查办”,热河失陷后,国民党政府为应付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经行政院决议:汤玉麟放弃职守,贻误军机,褫职查办;并于次日下令“严缉究办”。

⑤ 颠倒阳春曲,《阳春曲》一名《喜春来》,“吕调”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阳春曲》前用“颠倒”二字,含有诙谐、讽刺的意味。

⑥ 张,指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日军占领热河后,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迫令张“引咎辞职”。

⑦ 扶桑,《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迎 头 经*

中国的现代圣经^①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②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追，普通是不能够“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当然不会错，况且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说赶上偏偏是迎头，说在后跟着，那就不行。

民国二十二年春×三月某日^③，当局^④谈话曰：“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非军事专家，详细计划，不得而知。”（《申报》三月十二日第三版）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已经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经有之——“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以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租界一步”^⑤。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署名何家干。

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传，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

右传之一章。

传又曰：迎头赶和勿后跟，还有第二种的解释。

民国二十二年春×三月，报载热河实况曰：“义军^⑥皆极勇敢，认扰乱及杀戮日军为兴奋之事……唯张作相^⑦接收义军之消息发表后，张作相既不亲往抚慰，热汤又停止供给义军汽油，运输中断，义军大都失望，甚至有认替张作相立功为无谓者。”“日军既至凌源，其时张作相已不在，吾人闻讯出走，热汤扣车运物已成目击之事实，证以日军从未派飞机轰炸承德……可知承德实为妥协之放弃。”（同上见张慧冲^⑧君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席上所谈）虽然据张慧冲君所说：“享名最盛之义军领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义勇军的兵士却都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抵抗策略。于是小百姓自己，就碰见了迎头的抵抗。——前几天热汤放弃承德之后，北平军委分会就命令“固守古北口，如义军有欲入口者，即开枪迎击之。”这是说，我的“抵抗”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抵抗，我就抵抗你；我的退后是预先约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协，我就不准你“向后跟着”，只能够把你“迎头赶上”梁山了。

右传之二章。

传云：惶惶大军，迎头而奔，“嗤嗤”小民，勿向后跟。赋^⑨也。

一九三三，三，十四。

① 现代圣经，指《三民主义》。下面的引文见于该书《民族主义》第六讲：“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

② 传，这里指阐释经义的文字。

③ “春×三月某日”，这里的“×”，是从《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套来的。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用“×正月”，意在讽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④ 当局，指当时任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这里的谈话指他的“答记者问”。

⑤ “严飭所部切勿越租界一步”，“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向日本侵略者乞降求和，曾同意侵入中国领土的日军暂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并“严飭”中国军队不得越界前进。

⑥ 义军，指“九一八”事变后活动在东北三省及热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

⑦ 张作相(1887—1949)，辽宁义县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⑧ 张慧冲(1898—1962)，广东中山人，魔术、电影演员。这里所引是他去热河前线拍摄义勇军抗日纪录影片回到上海后的谈话，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

⑨ 赋，《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注疏》解释，是“直陈其事”的意思。

出卖灵魂的秘诀*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①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下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见报载最近胡适博士的谈话^②。）

据胡博士所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说，还是有法子的。这就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③。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署名何家干。

秘诀。中国小百姓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中国民族就没有了仇恨，因为没有仇恨心，自然更不抵抗，因为不抵抗，自然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出卖了，中国的心灵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适博士说：“到无可奈何之时，真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

为着要洗刷这个污点，所以胡适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④，再去“忠告”一次他们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方法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魂灵罢！何况这并不难，只要实行李顿的“公平”报告，那就是“彻底停止侵略”——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一九三三，三，二十二。

① “五鬼闹中华”，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〇年四月）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认为危害中国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大仇敌”，而“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② 这是胡适就太平洋学术会议第五次会议的任务问题，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对北平记者发表谈话中的话。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二

十二日《申报》。

③ “以德服人者王”，语出《孟子·公孙丑》：“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④ 太平洋会议，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〇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

最艺术的国家*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而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性。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吗？

譬如说，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①之类。当初说这太不象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同时，老实的民众，想要革掉一切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以便实现反动的民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现在早已回到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又得重新扮过一次^②。草案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③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然后再挑选一下，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就作为被选举人。照文法说，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扮成宪政国家^④的选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署名何家干。

举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正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而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象上海已经实行的民权，是纳税的就有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⑤，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曾赐同进士出身^⑥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是一面并不违背固有文化，一面扮得很象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⑦从这一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⑧而已”。其四，一面是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中国真是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⑩也！

一九三三，三，三十。

① 捐班，指不经科举考试，而用钱财换得官职或做官的资格。清代曾明定价格，实行直接以银钱捐官的制度。

② 重新扮过一次，指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曾开过一次“国民会议”，并公布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所以这里说“重新扮过一次”。

③ 草案，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宪法草案起草

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④ 宪政国家，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国民党政府曾长期利用这些论点，作为剥夺人民自由和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借口。

⑤ 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〇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者；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⑥ 赐同进士出身，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⑦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二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及中日外交问题时曾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⑧ 小贫，见于《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

⑨ “国货年”，上海工商界将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是年元旦曾举行游行大会，成立“国货商场”，出版《国货周刊》，宣扬“国货救国”。

⑩ 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语出《礼记·中庸》。

《子夜》和国货年*

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茅盾的《子夜》^①。

《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固然，国货可以“救国”，公债听说也可以“救国”，——然而这“救国”是怎么样的救法呢？譬如说，《子夜》里的公债大王——银钱业大王老赵就比他厉害。问题原很简单：救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这种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孔夫子就已经说过的了。对于这些种种“大王”，首先要有利润，直接的间接的剥削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的“修身”之用。谁善于“修身”，谁就可以有“救国”的资格。公债等等有这样的功效，自然要钻在公债里去，这显然不在于志愿伟大与否。于是国货就倒霉了。“凡是名目上华洋合办的事业，中国股东骨子里老老实实都是掮客！老赵就厉害煞，终究只是掮客。”其实何止华洋合办的企业呢，就是名目上完全华商的工厂，背地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三日），署名乐雯。

里的主人也会是洋资本家的，例如《子夜》里的周仲伟——火柴厂“老板”。（今年是更新鲜了，有些华商工厂，事实上变成了日货的改装打包工厂了。）国货既然倒霉，国货大王吴荪甫就只有投降，这是他的出路，而且他觉得这“投降的出路，总比没有出路好得多罢！”

好，投降是决定的了。可是，就投降老赵——那个“同美国人打公司的”老赵吗？老赵“勾结了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那他不过是一名掮客罢了；我们有厂出顶，难道不会自己去找原户头，何必借重他这位掮客！”这所谓原户头——“假想中的主顾有两个：英商某洋行，日商某会社。”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投降问题。受降的主顾那么多，又都是世界上的头等恶霸，岂有不互相打得头破血淋的道理。不过这些恶霸也不这么蠢，他们各有各的小狗，先叫小狗之间互相打几场，借此看看风头，比比力量。他们自己直接开火的时机暂时还没有到，却先让中国来做“狗”的战场。形势自然十分的复杂，中国的“人”当然吃尽了苦头。

中国的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已经在奋斗，在抵抗。他们的弱点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意识的影响。例如，明明还只是子夜，而居然以为天已经大亮了，甚至于太阳又要落山了，于是拚命的赶路，唯恐怕夜再来之后，就永久不见天日了。这当然不是个个人都这么想。这只是冲在大众前面的一些人。大众在实践里学习着。大众的斗争

虽然还没有打倒那些洋货的国货的种种大王，然而已经象潮水似的涌上来。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这种浪潮时时刻刻激动着，从这里推到那里，即使有些起落，而冲破一切的前途是明显的。那些狗用尽一切手段来镇压这个浪潮，假装着吉诃德^②老爷式的“国货奋斗”，不过是这些手段之中的一个。无论是吴荪甫，无论是老赵，是周仲伟——这些种种色色的大王，城里的，乡下的，都是很担心的。象冯云卿那样的地主，他不能够不躲到上海来做公债，以至出卖自己的女儿，睁着眼睛看自己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胡闹。而上海虽然比较稳当，也在成天闹着工潮，国货大王在睡梦里也不能够安宁，时常梦见工人的“烧厂”，推翻他的宝座。

这对于他们——互相排挤着的他们——自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他们，连并不留恋顽固的乡村生活的“工业家”也在其内，都要和“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共匪”。他们又要勾心斗角的对付工人，想要“一网打尽那些坏家伙”。他们“身边到处全是地雷！一脚踏下，就轰炸了一个！”……他们的“威权已处处露着败象，成了总崩溃！……身下的钢丝软垫忽然变成了刀山似的”。是的，他们的处境的确是这样，虽然总崩溃还不是目前，虽然刀山的刀尖还没有戳穿他们的咽喉。

在他们的周围盘旋着的，固然也有个把屠维岳，——有点儿小军师的手段，会用一些欺骗的挑拨的把戏，不过连他也始终只能够“加派一班警察来保护工厂”。而屠维岳之外，还有什么人材？空谈的大学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诗人，这只是一些

社会的渣滓。连自以为钢铁似的吴荪甫本人，也逐渐的变成了“色厉内荏”，说不出的颓丧，懦怯，悲观，没落的心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五年前参加五卅运动的智识青年，现在很有些只会“高坐大三元酒家二楼，希图追踪尼禄（Nero）^③皇帝登高观赏火烧罗马城那种雅兴了”。所有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一九三〇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小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④的影响（左拉的“L'argent”——《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⑤主义的蠢话。

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说到《子夜》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外一个机会了。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而到了那时候，这国又不是“大王”们的国了，也不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国了。

①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文学

家。《子夜》，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② 吉诃德，即堂吉诃德。参看本卷第 83 页注②。

③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闻名。公元六四年罗马城的大火，传说他有唆使纵火的嫌疑。

④ 左拉(E. Zola, 1840—1902)，法国作家。《金钱》是他描写资产阶级金融投机家的一部长篇小说。

⑤ 蒲鲁东(P. J. Proudhon, 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内 外*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子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攘。

何香凝^①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要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要瞎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②。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③，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署名何家干。

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一九三三，四，十一。

① 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廖仲恺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队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是她在同年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② “绝对不能言抗日”，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中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③ 心死的应该出洋，指张学良被迫出国。一九三三年初，日军侵犯热河，三月三日攻陷承德。五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就此发表的谈话中，认为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应速辞职，以谢国人”。张学良随即通电下野，并于同年四月十日携眷出国。

透 底*

凡事彻底都好，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却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就象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都漏掉了，原来只剩了通体透明一丝不挂。

反对八股^①是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最初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用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格式；拿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随后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原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 he 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署名何家干。

都象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还奖励你，说是打倒“打倒偶像”者，透底之至。这样，世界上就剩得偶像和打倒“打倒”者。

开口诗云子曰，算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②。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就要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一通物^③。……这自然透底之至。其实，从前说反对卫道文学，原是反对那道，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当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吗？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有下列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僵尸直立着，喉管透出一股气来，仿佛是在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

① 八股，明、清科学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为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

② 祝秀侠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新八股”》一文中，把有人在文章中引用康德、普列汉诺夫的话都算做新八股。

③ 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

④ 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客吴稚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写

的《五致邵飘萍——所谓赤化问题》中曾说：“赤化就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再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成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得救了似的。

其实那不是她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眉毛画得歪歪斜斜，也说是败亡的预兆。其实亡汉的何尝不是女人！总之，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我们就知道高等阶级的地位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当做什么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要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象正人君子骂女人奢侈，板着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拉伯一个古诗人^①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典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署名洛文。

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女人的奢侈是怎么回事？男人是私有主，女人自己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她也许因此而变成了“败家精”。她爱惜家财的心要比较的差些。而现在，卖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总是从长三堂子^②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少奶奶，太太，小姐。这些“人家人”要和娼妓竞争——极大多数是不自觉的，——自然，她们就要竭力的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的代价，还有精神上的代价。

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我们的老婆就要使我们破产，较工人来没收我们的财产要早得多呢，工人他们是来不及的了。”而中国也许是为着要使工人“来不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一九三三，四，十一。

① 阿拉伯一个古诗人，指穆塔纳比 (Mutanabbi, 915—965)。他的一首无题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

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

② 长三堂子,旧时上海称“长三”为头等妓女;“堂子”为妓院。

真假董吉诃德*

西洋中古时期的武士道^①的没落，产生了重百诃德^②那样的蠢大。他其实是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也只觉得他可怜可笑。

然而这是真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③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是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柄赠送前敌将士”^④。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⑤。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变成了节节退却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署名洛文。

或者“诱敌深入”^⑥的注解，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⑦，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变成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⑧变成了征讨当时的革命军的军需。现在这套把戏实在太欠新鲜，谁不知道。——不然的话，还可以算是新发明。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老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什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象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牛马猪狗身上去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是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而小百姓做了牛马猪狗仍旧要负“救国”责任。结果自然应当拚命供给自己身上的肉给假吉诃德们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了（挂出去）示众，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万遍“不仁不义”或是金光明咒^⑩也不会触发日本三岛的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偏要高喊“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朗诵“唤起民众”而杀之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其实“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⑪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笑不出哭不出；你要认真和他辩驳，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一九三三，四，十一。^⑫

① 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时代(1192—1867)武士所遵守的忠君、节义、勇武、坚忍等封建道德。西洋中古时期的武士道，指西欧中世纪封建时代军人的骑士精神；他们标榜忠诚笃实，尚侠义，好冒险，崇尚爱情，艳羨贵妇人。骑士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武器、战术的改进，渐趋没落。

② 董吉诃德，现译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耽于幻想，脱离实际，在现实面前四处碰壁。下文所说“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见于该书第八章。

③ 《儒林外史》，清代吴敬梓作长篇讽刺小说。这里说的几位公子为侠客以猪头所骗的故事，见于该书第十二回。

④ 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上海有个叫作王述的人，曾特别定制大刀九十九把，捐赠给当时防守河北省喜峰口等地的宋哲元部队。

⑤ 飞机捐，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筹款购买飞机办法”，在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⑥ “诱敌深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不断丧失国土，但它的宣传部门却把这说成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国日报》的社论中说：“浸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

⑦ 慈禧太后(1835—1908)，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妃。同治继位后被尊为太后，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光绪十四年(1888)，她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白银八千万两，移用于修建颐和园。

⑧ “反日”爱国储金，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北京、上海等地群众为反日救国发起救国储金，并成立了救国储金团。但因储金团为袁把持，储金存入当时由他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致被挪用为活动帝制的经费。

⑨ “国货运动”，参看本书第 67 页注⑨。

⑩ 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经》，佛经的一种。当时一些国民党“要人”曾纷纷联名发起“金光明道场”之类的“佛法救国”活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发起金光明道场，戴季陶先生之“经咒救国”》为题，报导了这类活动。

⑪ 菲希德(J. G. Fichte, 1762—1814)，现译费希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用科技强化德意志民族，强调民族至上。

⑫ 本文发表时原未署写作日期，此处所记有误：文中曾引用四月十二日《申报》上的材料，写作当在该日之后。

人才易得*

前几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①。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②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经缴械的小百姓，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呵。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一个人才。

现在时世大不同了，手里杀杀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政权”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说“美人”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③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小百姓，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发表时由鲁迅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署名干。

不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④——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⑤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⑥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老鸨婆哭火坑，就没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去的。虽然，这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

一九三三，四，二十四。

① 刘姥姥，《红楼梦》中的人物。骂山门，上海方言，骂街的意思。在小说第七回中，有刘姥姥大骂焦大的情节。这里以“刘姥姥”影射国民党政客吴稚晖（他曾被称作“吴老老”）。

② 裤子后穿，这是章太炎《再复吴敬恒书》（载一九〇八年《民报》二十二号）中斥责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痛；善补而裤，勿令后穿。”

③ 徐娘，《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借指汪

精卫。

④ 鲁迅曾在《集外集·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一文中，将前人嘲笑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叶名琛为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1857）的两广总督。这里借指汪精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⑤ “以天下与人易”，语见《孟子·滕文公》（上）：“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⑥ 入火坑，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踊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读《子夜》*

一

从《子夜》出版后,直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看见一篇比较有系统的批评;我现在也没有那“批评”的野心,只是读过后,感觉到许多话要说,这些话,也许对比我后读到《子夜》的人能得到一些益处罢,我想?

在中国,从文学革命^①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我想在作者落笔的时候,也许就立下几个目标去写的,这目标可说是《子夜》的骨干:

一,帝国主义给与殖民地中国的压迫。

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相互矛盾,主要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矛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华日报·小贡献》(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十四日),署名施蒂而。

三,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冲突,农民与地主的冲突。

二

我现在将这故事叙述个大概:

起初是吴老太爷到上海来就病故,吴荪甫在治丧中,商定企业计划,做公债投机家赵伯韬来联合他,能化钱买得混战的军阀败退,而成功他的投机!于是吴荪甫一方面做公债交易,另一方面又办益中公司盘进八个小厂,新租一个丝厂,他本着企业家的雄心,想将在帝国主义铁爪下的民族工业挣扎出来;可是不久赵伯韬就和他捣蛋,他仗着洋商做后台来对吴荪甫实行经济封锁,而故乡双桥镇又被共匪占领,军阀混战迁延下去使各厂出货无法推销,另一方面工厂中工人又闹罢工;吴荪甫用尽心思和计划想重振旗鼓,但都挽不回这历史的颓运;最后他将盘入的八个厂押给洋商,住宅也押给人来作这公债上的孤注一掷,结果,姑老爷杜竹斋倒戈,他竟遭受这“致命”的惨败;吴荪甫是很自信的人,几月来失败的事实使他怀疑,精神恍惚,同时他在社会上,家庭中统治力已经崩溃,于是他拿起手枪犹疑,最后他和少奶奶去避暑去逃跑。

这故事就此完结,穿插处还很多。

三

在《子夜》中所讨论的问题很多,现在我择要的提出来谈

谈：

一，中国的封建势力，无时不在崩溃中，这不但如曾沧海感受政权缩小，吴老太爷那样人会死，同时就在意识方面，如曾家驹通奸后母，冯云卿叫女儿去做仙人跳，而杜竹斋也可掉阿舅枪花^②，可是另一方面各地封建军阀，官僚，都私设关卡，“税上加税”，“厘外有厘”，使中国呻吟在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民族工业，不能不关厂，出盘。

二，可是封建势力总表现和冲突的军阀混战可一次又一次的爆发，营阵几千里，出兵几百万，这背后当然各个军阀都有后台，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每一次军阀混战的发生，可说就是各个帝国主义冲突的一幕；军阀混战可为买办资产阶级做公债投机的赵伯韬收买，帝国主义也可公然的供给他们军火，供给他们军事顾问！

三，由吴荪甫盘进八个小厂，以及朱吟秋的丝厂，我们看见大资本家并吞小资本家，马克斯的资本集中说，在殖民地的国家也成事实，然而在帝国主义桎梏下的中国资本家，到底也战不胜洋商的资本雄厚；不久朱吟秋恨吴荪甫忍心的事，吴荪甫也不能不悲痛的照演一次，他将八个厂押给洋商了，他这事实说明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抬头。

四，懦弱无能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不但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赵伯韬的掉枪花，同时就是他的内部也含着很大的矛盾，如工人对他罢工威吓，农民的骚动，以及屠维岳与钱葆生，甚至曾家驹李麻子等等，都是吃醋争风，不能一致，使得吴荪甫一向自信的人，也表现出犹疑，急躁，无能。

五，由秋律师，丁医生，范博文，杜新箨，以及张素素，克佐甫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各人都有很大的分野线，律师医生供资本家吴荪甫用的；张素素，吴芝生在阶级上是反对资本家吴荪甫的；范博文，杜新箨，一个诗人，一个留学生，诗人躲在艺术之宫里，要有刺戟，留学生则什么都不在乎，满口里是“外国好”；这都是代表社会里的知识分子。

六，从《子夜》里所出现的几个女性，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如吴少奶奶，杜姑太是代表贤妻良母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老九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虫，她们会搞钱，探消息，媚人，完完全全是资本家的泄精器，可是也是现代都市的产物！然而另一方面有不知死活的林佩珊，有突变的吴四小姐，有游移不定的张素素（被示威吓上酒楼）；特别令人有很深印象的还是何秀妹，张阿新，月大姐，尤其是何秀妹的顽强，月大姐的真诚，可是被背“公式”“术语”的人弄糟了！我们从这许多不同的女性表现上，认出她们的阶级来。

七，至于恋爱问题，也直接间接的讨论到，如吴少奶奶之与雷参谋，是“恋爱逃不了黄金的”；林佩珊与杜新箨，是拿恋爱当顽艺，充分表现着时代病的产儿；而真正的恋爱观，在《子夜》里表示的，却是玛金所说的几句话：“你敢！你和取消派^③一鼻孔出气，你是我敌人了！”这表现出一个女子认恋爱要建筑在同一的政治立场上，不然就打散。

八，从克佐甫以及蔡真的术语里，和他们夸大估量无后方等布置，充分表现着立三路线^④的盲动，忽略月大姐的报告，不替月大姐想出“好办法”，结果使月大姐茫然，这正是十九年

的当时情形！也许有人说作讥讽共产党罢，相反的，作者却正借此来教育群众呢！

四

以吴荪甫那样刚强自信的人，结果都使他的企业失败，这原因当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摧残，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不注意到个人主义的没落和集团主义的兴起，吴荪甫以及周仲伟的失败是环境的逼迫，五卅示威以及闸北罢工的失败也是环境的逼迫，但在同一环境逼迫中却有分野，那就是前者是历史上的必然，后者是战术上的必然，不能同一看法的！

五

在最后我更有很多话要说，这多少是我读过《子夜》后所发的意见：

一，有许多人说《子夜》在社会史上的价值是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这原因是《子夜》大规模的描写中国都市生活，我们看见社会辩证法的发展，同时却回答了唯心论者的论调。

二，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这好比蒋光慈^⑤的《丽莎的哀怨》中的黑

虫，使读者有同样感觉。观作者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我想这也许是书中的主人翁的关系，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的！

三，在全书中的人物牵引到数十个，发生事件也有数十件，篇长近五十万字，但在整个组织上却有许多处可分个短篇，这在读到《子夜》的人都会感觉到的。

四，人家把作者来比美国的辛克来，^⑥这在大规模表现社会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风，拿《子夜》以及《虹》，《蚀》^⑦等来比《石炭王》^⑧，《煤油》，《波士顿》，特别是《屠场》，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截然不同点来，一个是用排山倒海的宣传家的方法，一个却是用娓娓动人叙述者的态度。

五，在《子夜》的收笔，我老是感觉得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

一九三三，七，十六。上海。

① 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初《新青年》杂志首先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文学革命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② 掉枪花，上海方言，意即耍花招。

③ 取消派，原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中的许多人，被反革命的暴力

所吓倒，企图取消党的秘密组织，甚至不惜以放弃党的革命纲领和策略为代价，换取合法地位，故这些人被称为“取消派”。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成为取消主义者。

④ 立三路线，指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总进攻的冒险计划。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路线。

⑤ 蒋光慈(1901—1931)，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作品有诗集《新梦》，小说《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丽莎的哀怨》是他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写一个白俄贵妇沦落中国的遭际。

⑥ 一九三三年四月号《出版消息》所载朱明《读〈子夜〉》一文中说：“《子夜》的大规模的社会描写，……茅盾又可以说是中国的辛克莱。”辛克莱，参看本书第47页注⑤。

⑦ 《虹》，茅盾作长篇小说，一九三〇年三月开明书店出版。《蚀》，茅盾作长篇小说，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组成；一九三〇年五月开明书店出版。

⑧ 《石炭王》(一译《煤炭大王》)及下文的《煤油》等，都是辛克莱作的长篇小说。

“儿时”*

狂牖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儿时心力异：一
灯红接混茫前。

——定盦诗①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的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署名子明。

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

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

一九三三，九，二八。

① 定盒，即龚自珍（1792—1841），字璦之，号定盒，浙江杭州人。晚清思想家、文学家。这里的引诗原题《猛忆》，见《定盒文集》（三）。

中国文与中国人*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①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偪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②——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

*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署名余铭。

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③。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象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象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④——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① 高本汉(1889—1978)，瑞典汉学家，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张士禄。

② 支那，古代梵语对中国的译称。近代日本亦称中国为支那。支那学家，指研究中国情况的专家。

③ “而立”，语出《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后来“而立”就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读书杂记之一

房龙的《世界地理》^①，一本值得读第二遍的书，这样的书现在太少了，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它象一幅浮雕的壁画，把世界的各个区域的地势很生动的显现在你的面前。说这就是文艺的天才，倒不必，因为会了解自己的科目的人，总应当也会把它叙述给别人听，虽则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太少，但是我还是以为这是一种义务。是不是呢？

可惜，房龙也同一切“前期”科学家一样，他虽然忠实于他的科学，但是更忠实于他自己，——说得精确些——是更忠实于他自己的阶级。究竟跳得过“自己”的头的人是少极了。也许是自己不愿意，也许是几百年来因袭，象“马遮眼”似的遮住了他的眼光。

房龙在序言性的第二章里说：“假使日本的居民正是塔斯马尼亚族^②的后裔时，这些海岛恐怕决不会养活六千万人民罢。又如不列颠群岛，如果它们的统治者不是来自北欧的人生战士，而是尼亚波利坦人或柏柏人，它们决不会变成庞大帝国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发表时题为《读房龙的〈地理〉》，署名商霆。

的中心呢，”……假如广漠无垠的俄罗斯平原的“主人不是斯拉夫族，而是日耳曼族或佛郎克族^③时，他们就会带了锋利的犁锄，尽力去开垦，这片平原的情形也就会迥然不同了”。总之，似乎民族性在决定着一切。但是，你读完他的全本书之后，反而觉得瓦德^④的发明汽机，或是美国的建筑铁路，对于英美的发展更有决定的意义，究竟读不到为什么某某民族因为它的民族性，哲学，道德，宗教，而特别落后或是先进。你觉得，这些捞什子自然都在发生着影响，然而有了“犁锄”比没有“犁锄”就强些，有了些汽机，和没有汽机，差别就更大了些，——不管那地方的民族的民族性是怎样，它总因此种种而在变动着。房龙自己的叙述打破了他的哲学。

因此，他不能够自信，他只能存疑：“印度的一切问题都是深奥的道德问题和灵魂问题，”他说，“……它们常给我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一种烦恼的迷惘……但最后，我还得承认他们是对的。他们纵然不是完全对，至少也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绝对的错。这是个很难的功课，但却教训了我一点谦逊。老天知道，我正需要它！”房龙是谦逊的，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学说，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学说”。读者还是帮着他“谦逊”一下为妙：读他所描写的——有时候描写得很活泼的——材料，不用相信他自己也说不圆满的学说。

印度人现在——尤其是最近五百年来——就只有心灵问题吗？有点不象事实。但是，这样的材料，在房龙的“地理”里就不容易找。例如第二十一章，题目是很“夸张”的：“大不列颠——荷兰对岸的海岛，五万万人民的保姆”。这“五万万人

民”之中大概就有那三万万五千万的印度人在内，——不知我们中国的大英顺民是否也在其中？——可是，你在这一章里，一点也找不着“大不列颠”用怎样的奶汁在喂养那三万万五千万只有心灵问题的印度人的情形。还有其他的殖民地，埃及，英埃苏丹^⑤，缅甸，新加坡等等，他们究竟喝着英国绅士的什么奶汁，喝得胖到何等程度？自然，你可以在别几章里找到一点影子——关于印度是连影子也找不到，——然而清楚的回答是没有的。关于这个，还是到上海大马路上去，看看红头阿三的神气好。

关于中国人，房龙说了几句恭维话：“中国人……知道西洋各国对于孔子的书根本没有兴趣，其最注意的只是煤铁和煤油的让与权……如果要使财产安全，必须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否则最好还是将它们沉之海底。总之，中国已知道模仿日本的必要。”而关于中国的苦力呢，他说：“这些痛苦的劳工，无论谁来统治……俄国总会暗中在他们耳朵里咕哝许多鬼话。”完了。不恭维的话，却是他指出孔子孟子老子三个圣人的理论，教训中国人“以公理报怨恨，欠账还钱，遵守信义和条约，纪念死去的祖先”。这都值得读者想想：究竟中国谁在想学日本，谁在“以公理报怨恨”，谁真正在“咕哝”，这是房龙分辨不清的，但是读者可以想想。

不过，照房龙想来，日本的夺取满洲，热河，却有十足的理由：“日本锁住在小岛上，其人民生殖力……极其强盛，所以急需更多的土地。……有许多人似乎很愤怒，他们痛责‘日本的野心’，以为那是一种野蛮的表现。不过我却反把这当作‘日

本的需要’。在国际政策上，一种健全的自私，无宁说是一种需要的美德。”这些话，不但是对着满蒙问题说的，而且也关涉到高丽⑥！

因为房龙迷恋着这样的“哲学化”，所以他对于这一类的地域，连描写地势和山川的兴致也没有了。读者可以读到的，只是一串说得很漂亮的“浪漫故事”和发松的比喻。

讲到他自己的国家——美国罢。不用说，他就在非洲等地，也看见许多白种人的“德政”。而在菲列宾那一章，他当然更要说：美国人“给菲列宾人无数修整的道路，数千所学校，三所大学，医生，医院，看护，人工孵卵器，鱼肉检查所，卫生学，以及一千零一种西班牙人听也没听见过的德政”。可惜，那地方的人民却只知道等待天堂，“在那（天堂）世界中，一切卫生学……学校等，对于人是毫无意味的！”可惜！美国自己呢？它“所享受的这样无限的机会，大自然从不会给过另一个民族……此外，历史再加上一件更重要的礼物：一种民族，一种言语，而没有过去”。固然，美国受过去——封建的束缚——比较少得多。但是，完全否认过去也是不行的。房龙自己也得提起一下“红人”，那是“由主位降到客位的红人”呵。至于说什么“一种民族”，那么，不由得要想起辛克莱的《屠场》，那些拉脱维亚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黑种人，波兰人，那些“屠场”里，矿坑里的牺牲，不知道是否承认美国“只有一种民族”？！

房龙始终只是“百分之一百的美国人”。他没有丧失他的“自己”。

这《世界地理》还是值得读的，而且不必只读一遍。然而

我——读者也庆贺我没有丧失我自己!

附记:《世界地理》的中国文译本不止一种,我读的是陈瘦石和胡澱咸两先生译的。偶然翻着傅东华先生译的一种,看中间的文句似乎深奥些,还发见了这么一句:“再讲到猪,猪是靠橡实繁荣的。这就是在亚得里亚海,多瑙河,马其顿诸山脉间那个三角形中所以极富橡实的缘故,因为那三角形是密密盖着橡树林的。”再查陈胡两先生的译本,这一句却是这样写的:“说到猪,猪须食橡树果始得繁盛。亚得里亚海,多瑙河,与马其顿山脉间三角地带之所以多猪,就是因为那边密布着橡树林的缘故。”这里,傅先生是译做:因为猪繁荣,所以那地方富于橡实,又仿佛橡实的丰富是因为密密盖着橡树林。本来,因为鸡多所以鸡蛋多,因为鸡蛋多所以鸡多,——说来说去似乎都说得通。而陈胡两先生译的是:因为橡树多,所以猪多。这道理浅显些,没有那么重的哲学气味。究竟不知道房龙先生的原文是怎样的。过几时,倒要找本英文原本来读读。

一九三三,十一,十二。

① 房龙(H. W. Vanloon, 1882—1944),荷兰人,历史学家。《世界地理》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中文本由陈瘦石、胡澱咸合译,一九三三年八月上海世界出版合作社印行。

② 塔斯马尼亚族,澳大利亚东南塔斯马尼亚岛的原土著居民,自一八〇三年英国殖民者入侵后,他们在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多次惨遭屠杀,至一八七六年时全族被灭绝。

③ 佛郎克族,现译法兰克族。三世纪时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和中游一带的古日耳曼部族群,后来解体。

④ 瓦德(J. Watt, 1736—1819),现译瓦特,英国人,蒸汽机的发明者。

⑤ 英埃苏丹，一八九九年苏丹沦为英国和埃及共管的殖民地，故称英埃苏丹；一九五六年独立。

⑥ 高丽，朝鲜的旧称。

关于高尔基的书*

——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

……想着，也许这是——一本好书，诚心诚意地写了的，不少人读着它而感动了，争论了，学习了思想；也许，它用新的思想使得一些人丰富起来，用自己的温暖使得许多人在冷酷的孤独时间暖和起来。（高尔基：《书》，《高尔基文集》卷八，二三八页）

邹韬奋先生编译的这本《革命文豪高尔基》^①的确是这样一本书。虽然这书的原文——美国康恩教授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Maxim Gorky and His Russia）——就已经包含着一些模糊的偏颇的见解，然而它没有疑问的感动着读者，引起读者的许多新的思想，教训读者许多生活的经验。书是要会读的。一切书都不会告诉你现成的公式或是什么秘诀——例如成名秘诀，学成文豪的秘诀。一切书都是为着帮助你思想，而不是为着代替你思想而写的。

《革命文豪高尔基》叙述着二十世纪的一个巨人的生活。他从社会的“底层”冲破农奴宗法社会的罗网，燃烧着真正人类的光芒——新的文化的灯塔；挣脱着私有主义和市侩主义

* 本篇及下篇《“非政治化”的高尔基》最初同发表于《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署名商廷发。

的羈勒，而歌颂着洗刷这污浊世界的暴风雨。这高尔基的生活在这里相当的反映出来，虽然不免有些模糊的烟雾，然而这巨人的生活过程始终明显的在读者的眼前经过。美国大学教授的偏见还不至于淹没新世纪文学的巨大形象。

最近有人说起“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然而他所说的上代是“《庄子》和《文选》”（施蛰存^②先生，见《申报·自由谈》）。德国的农民战争^③，法国的大革命^④，俄国的十月……对于中国人是否也算得“上代”呢？象高尔基那样的“文学者”，他的“上代”又是什么呢？

“高尔基紧靠着外祖母的身边，静听她的温柔的话，关于她对于人生，对于贫的和富的，关于她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此时高尔基脑际充满了新的印象，靠着外祖母的温暖的身体，沉沉的睡去。”（邹编《高尔基》，四五页）外祖母的故事，歌谣，神话……以及俄国和世界的“上代”文学对于高尔基决不是一张白纸。但是，这文学也决不是“《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意思，这至少是对于“贫的和富的”等等人生经验的意义。固然，俄皇政府审查合格的小学教科书里，也同中国一样，不会对于“贫的和富的”等等有什么象人话的解释，那里是充满着虚伪和伪善的。然而从民间的故事和歌谣里，高尔基却会吸取一些现代还有生命的东西，也因为这一类的上代文学里的确包含着一些现代的种籽。自然，不仅是民间文学。人类文化的成绩，一代代的积累起来，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伟大的反对“思想上的僵尸化”的战斗，都含孕着新的文化和文艺的胚胎。问题是在于怎样在难产的过程里争得新的生命的权利。

没有一个新的生命不是经过“产生”的痛苦过程的。看高尔基的青年时代，他的所谓“大学”——流浪的劳动的生活，再看现代这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以至整个新的社会，是怎样产生的？高尔基对于智识的渴望，他对于书的爱好，那么勇猛精进的态度，其实代表着新兴的整个“社会力量”。在文化艺术方面，他可以算是这个“力量”的象征。

“高尔基在河边的时候，有时候看见易索特也在他的身边，易索特在这种万籁俱寂冷气沁人的夜里，常常诉说他的梦想……他这样说：‘老弟，分你的心灵给别人共享，这是多么一件好事！’”（同上，一六二页）分出心灵来给大众共享！文化的生活，理智的，不驯服的，不妥协的斗争，智识，科学，技术……的胜利，克服自然，克服人造的黑暗，愚昧，剥削，偏见，迷信，统治阶级的一切卑劣和欺罔，这是大众的事业，这是先进分子领导大众的责任。高尔基的一生，高尔基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目的，不会不是这种事业的完成。高尔基现在已经能够亲眼看见这方面的伟大的成绩，新的文学——普洛文学也在高尔基的周围放着万丈的光焰了。

说起来，文化和智识的传播似乎是“智识阶级”的使命。然而，请看高尔基一生的“际遇”罢。亲切的了解大众的生活，对于他们——“智识阶级”，始终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当时高尔基所来往的智识阶级，对于他的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淡漠的态度……这班知识分子都把高尔基看作‘尚须加以同化的原料’，无怪唤不起高尔基对于他们的同情，也鼓动不起他们对于他们的信任心。”（同上，一三五页）然而高尔基同他所代表的

“社会力量”一样，对于一切有希望的知识分子，都竭力扶助着，鼓励着他们“为人类的文化”做点事情。俄国后来的许多文学家，除开极少的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高尔基所赞助的。直到现在，他还不断的担任着无数文化方面的工作，帮助新兴文学者的学习……（参看同上，四三二——四三四页的例子）

高尔基对于“智识阶级”的信任心其实也许太大了。“……邱科夫斯基还这样接着说道：‘我们不得不明确地承认，我们在当时那样缺乏面包，伤寒症蔓延的数年间，幸而还得保全生命的，大部分不得不归功于我们都做了高尔基的“亲属”，……我还常常看见高尔基替那些著作家说情，他们在革命以前却曾经卑劣地窘迫过他。’邱科夫斯基还忘记提起的，是那些受过高尔基救济的著作家里面，有许多一跨出苏联的边境，就比以前更加卑劣地糟蹋他！”（同上，三九四页）

总之，这本书里，读者——譬如我罢——可以得到文学，社会，以至政治上的许多智识，引起我的许多感想：那陈旧腐败的俄皇政府，那卑劣残酷的市侩主义社会，用尽了一切力量和手段来反对高尔基，压迫高尔基，——现在到那里去了呢？

一九三三，一一。

①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革命文豪高尔基》是他根据美国康恩教授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② 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一九三三年九月

二十九日他曾在《大晚报》上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及《颜氏家训》等书，认为这是青年“文学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根基”。

③ 德国的农民战争，指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闵采尔领导的德意志农民和城市平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

④ 法国的大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法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

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①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并且说“这个报停办之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

关于《新生活报》的问题，值得说一说。因为邹先生——也许是美国教授康恩先生——没有清楚的叙述高尔基的改变政治态度和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非政治性质”这句话很可以引起误会。其实，“十月”之后的高尔基虽然经过一些时间的动摇，可是不久就坚决的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难道他的编辑许多种文化杂志，丛书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吗？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之后，他的参加“Com.International”^②杂志的编辑，他的团结和组织许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新的社会的产生，克服着难产之中的一切痛苦，不会不战胜高尔基的怀疑。高尔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报》上，的确，曾经表示些对于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间，他在《新生活》的论文里的情绪，已经表现着相当的转变。那

年五月十七日，他写道：“龌龊和垃圾，在太阳好的日子，总要格外显露些；时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太紧张的注意着那些敌对我们对于‘更好的’渴望的事实，我们就反而不再看见太阳的光线，仿佛不感觉到它的活跃的力量……现在，俄国民众整个儿的参加了自己的历史——这是有极大意义的事变，应当从这里出发，来估计一切好的和坏的，一切使得我们痛苦和愉快的。”《新生活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才停办的；而六月间，高尔基就已经停止了自已在这报上发表文章，感觉到《新生活报》以前的态度，事实上违背了他的目的：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这在后来，高尔基屡次坦白的承认过的。例如白俄侨民的文学家 A. 列文松在巴黎“Temps”（《时报》）上攻击高尔基的时候，有一个左倾的杂志“Europe”（《欧洲》）给高尔基一封信，诚恳的请求他答复。高尔基的回答是：“列文松的文章对于我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侮辱……我想，用不着说什么魔鬼，因为人们想出了，并且拥护着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可耻的结构。我同布尔塞维克一块儿走，他们是否认自由的？是的，我同他们一块儿走，因为我拥护一切忠实的劳动的人的自由，而反对寄生虫和空谈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我同布尔塞维克争论过，敌对过，当时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而农民被战争所无政府主义化的了，而且布尔塞维克同农民的冲突，会使工人政党灭亡。后来，我相信了，这是我的错误，而现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欧洲各国政府的敌视，以及因为这种敌视而发生经济上的困难，俄国的民众

已经走进自己的复兴时代。”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一直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一九〇五年，反动期间，欧战，“十月”，经济恢复和五年计划……那末，我们可以看见高尔基的天才总在反应着当时的事变，回答历史所提出来的新的问题。他自己在斗争，在群众里学习着，他给群众极宝贵的“精神粮食”——伟大的艺术作品。他在斗争和工作的过程里改正自己的错误，磨砺自己的武器。

他说：“当然，在极卑劣的许多次害虫政策的事实之后，这固然是一部分专家的反动手段，可是，我必须重新审定——而且已经重新审定了我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的态度。”他的重新审定的态度，正是他的新的创作的渊源。一九二五年初他对人说过：“……我在写着一部大作品。写的是‘空想出来的’人。我们这里‘空想出来的’人实在多。有人把他们‘空想出来’，而他们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来’……”这就是《四十年——克里漠·萨漠京》^③。这部大小说是说的一九〇五年之后俄国智识分子的离开革命。这是“中等智识分子”的写真。这种分子是占了革命者职位的市侩，是抄袭和盲从别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书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无才的聪明人。结果，他们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拥护那“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的变迁，譬如上面所举的一个例子，可惜在邹先生编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见解，不管关于文艺生活的缺

少——这本书对于读者还是一件宝贵的赠品。尤其在中国现在——介绍和学习世界文学的参考书如此之少的时候。读者真正要学习的时候，他自然会深刻的思索，勤恳的找寻材料，用批判的态度去读一切书；那么，象邹编《高尔基》对于他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我在读完之后，指出这本书的几个缺点，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这里，帮助别的读者的判断。而且表示希望关于高尔基，尤其是高尔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邹编的这本同样认真的译本出现。

一九三三，一一。

① 《新生活报》，具有孟什维克倾向的报纸，一九一七年四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九一八年七月停刊。高尔基曾参预创办此报。

② “Com.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

③ 《四十年——克里漠·萨漠京》，现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副标题为《四十年》，高尔基作长篇小说。

择 吉*

中国的算命先生最善于替人家“看日子”。讨老婆，出殡，安葬，开工等等都要挑选吉日。这叫做择吉。中国的什么纪念日，大概也是用了择吉的法子挑选出来的。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所以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就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辱国条约”。于是乎就为难了，纪念“五七”呢还是“五九”？挑选的结果，北方是纪念“五七”，这是说日本不顾“国际公理”；而南方纪念“五九”，这是说袁世凯卖国，勾结日本。当时是北方代表反动，南方代表革命，北方的吉日是“五七”，因为这似乎可以开脱一些袁世凯的罪名；而南方的吉日是“五九”，因为要着重指出卖国贼的罪状。现在“南北统一”了，究竟那一个是吉日呢？今年索性都不准纪念了，而日本正在用枪炮实行二十一条，而且超过了十倍还不止。大概就因为二十一条反正已经实现了罢，所以只有“华租

* 本篇及以下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鬼脸的辩护》、《慈善家的妈妈》和《“美”》，都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并都据手稿编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二卷。本篇及《“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手稿署名为陈逸，《鬼脸的辩护》署名为陶吉，《慈善家的妈妈》署名为狄康。

两界加紧防范反动分子利用‘五七’‘五九’，施行捣乱，故宣布特别戒严”云云。这样，似乎“五七”“五九”都不是吉日了。虽然“国耻”的官样文章还在做着。

现在新的择吉问题却是“五五”。“五五”是“犹太秽种”马克思的生日，又是去年上海停战协定^①签字的日期，又是十二年前（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究竟纪念什么呢？最近的纪念自然是去年的上海协定，但是现在只能纪念“一二八”日本向闸北开炮的日子，不能够纪念“五五”签订缓冲区协定的盛典。这理由很明显，就是这“并非辱国条约”！至于马克思生日，那不用说，中国比马克思自己的祖国还“先进”：我们这里早就禁止纪念了，而德国直到今年才由法西斯蒂政府宣布禁阅马克思的书籍。最后，当然是非常大总统就任的“五五”是值得纪念的吉日了。然而我们觉得很怀疑，最近一位“在野的”要人说：“民众无政治知识，致政权为少数人所操纵，以前之选举，即其明证，故必须……训政。”十二年前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当然还没有经过训政，那时的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的，不是由“无政治知识的民众”选出来的吗？当时的选举不是“为少数人所操纵”的吗？少数人所操纵的无政治知识的民众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日期，似乎不见得“吉”。那真是为难极了。幸而好，“五五”除开上述三个纪念之外，还有第四个纪念，这就是一九三一年南京召集的国民会议开幕日，那次国民会议议决了“训政约法”，选举了国民政府主席，宣布了中国的“完完全全的统一”，“建设时期”的开始，大举剿匪的誓师……懿欤盛哉！虽然那年就有了“不凑

巧”的“九一八”，似乎有点“不祥”，但是，其实也在“建国”纲领之内的，要知道“九一八”是大亚细亚主义实现的开始呵。

一九三三年。

① 上海停战协定，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三月，中日两国代表谈判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五月五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曾经通行过几年，当时甚至于将军和绅士都为着要变成忠实同志或是“革命军人”起见，也高喊过的。可是这个口号的历史十分曲折。

最初，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有一个“过激派”的杂志上提出了这个口号，没有什么“人”注意。可是，不久这口号就渐渐的传播了出去，一些革命的“学生子”开始研究什么是帝国主义，懂得五四革命运动其实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虽然还不彻底。这风气一起来，胡适博士就大起恐慌。一九二二年间，胡博士用什么“实验主义”证明“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他说反帝国主义就是反对西洋文化，有些义和拳的气味。然而胡博士的“权威”并没有多大力量。这口号还是在流行出去，而且越流越广，甚至于什么矿坑里也看见这一类的标语。

一九二三年就出了这么一段故事：一位前参议院议长某先生说：过激派提出这个口号，目的是在挑拨“友邦”的恶感，陷害中国的老牌革命党，使它在外交上孤立。另外一些人就说：原先的“富国强兵”，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本来也都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那些旧口号是民众容易懂得的，现在何必又提出这种新鲜的口号。仿佛嫌它太欧化，“比天书还

难懂”。

然而不久，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衙堂口会发见画在那里的乌龟底下有小孩子写的“帝国主义”的字样，马路上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的五更调。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其实这是因为民众并不嫌它难懂了，而且懂得“太厉害了”，所以必须照准，以便加以曲解和利用。“五卅”是这样过去的。

后来，民众有点倒霉了；于是可以重新公开的欢迎洋大人，广州市上用黄土铺道恭迎香港总督金文泰的时候，特派三百名伙役洗刷墙壁上的“打倒帝国主义”。这样准备着“五三”的来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那天，日本帝国主义把“代表中国国家的”交涉员^①捉去，割掉了鼻子和耳朵，挖掉了眼睛，后来听说连尸首也没有找着。然而“打倒帝国主义”却叫不得，相反的，中国的“国家”不但不生气，还和日本订立了“最惠的”关税协定。足见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又从奉旨照准变成了“反动的”了。

所以今年纪念“五卅”，“五三”，“五四”等等的时候，就有一位要人出来说：“标语口号的时代早已过去的了……越是沉默越是坚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应当“没落”，沉默主义“万岁”！

可是，你不要以为这口号完全没有用了。相当的用处还是有的，譬如仅只在屋子里喊喊之类。今年“五一”的时候，要人们所指挥的“工会”发表了“告工友书”，是说中国工人要打

倒帝国主义的，因为“中国工人只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侵略”。还有人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这仿佛很义气地替外国工人打“抱不平”，象要打倒帝国主义似的。然而谁都知这些话是“话中有话”的，意思倒是着重在中国工人不应当反抗本国资本家的“有理的”压迫。这种奸滑的运用口号和纪念的手段，倒是十分巧妙的“艺术”。

中国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如果是一个活人，它的古典和历史倒象一部很有趣的小说。《水浒》上有真假李逵打架的故事^②，中国的“打倒帝国主义”也是假的和真的在这里相打。真正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只有劳动的民众。

① 交涉员 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后，与日本侵略军方面进行交涉的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当时尚有国民党外交人员十七人同遭杀害。

② 真假李逵打架，见于《水浒》第四十三回。

鬼脸的辩护

——对于首甲等的批评

去年年底，芸生^①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②“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胡秋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不想在此地来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关重要。问题倒发生于鲁迅给《文学月报》一封信^③，说“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而署名首甲等^④，方荫，郭冰若，丘东平的四个人就出来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⑤（《现代文化》杂志第二期）。

首甲等对于恐吓和辱骂的辩护是：

（一）“革命的工农确实没有吓人的鬼脸”，然而“这是对某一阶级同情者说的，对别一阶级即使你再斯文些，在他看来，无论如何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恐吓“有什么不可以？！”

（二）“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而且也无‘笑骂’与‘辱骂’的分别。只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并不是‘丢那妈’就是辱骂，‘叭儿狗’就是笑骂。……”

这是说恐吓和辱骂也算战斗，而且不这样就会变成“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就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

革命当然要流血的，然而嘴里喊一声“斫你的脑袋”还并不就是真正革命的流血。何况文化斗争之中，就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也要在“流血”的过程里同时打碎他们的“理论”的阵地。当你只会喊几声“切西瓜”的时候，就要被敌人看做没有能力在理论上来答辩了，而一般广大的群众并不能够明白敌人“理论家”的欺骗。国际的革命思想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没有一次是用“切你的西瓜”那样的恐吓来战胜反动思想和欺骗的理论的！这种恐吓其实是等于放弃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剥削阶级明明知道革命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并不是吓人的鬼脸；而他们为着要吓退正在剧烈地革命化的群众，故意要造谣，污蔑，诬陷。敌人所造作的那些“放火杀人”之类的谣言，正是要把这种鬼脸硬套在先进的工农头上，——敌人的可恶就在于他们故意把只对于自己有害的革命说得象魔鬼似的，仿佛要吃尽一切活人。现在有人出来多喊几声“斫”和“切”，那就很象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首甲等的说法是：对于剥削阶级，革命反正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多扮些吓人的鬼脸，有“什么不可以！”这对于革命的队伍是极有害的空谈。革命的工农不能够不宣布首甲等的意见决不是他们的意见。

所以说“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而自·己·愿·意·戴·上·鬼·脸·的·首·甲·等·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至于“丢那妈”之类的辱骂，那更是明显的无聊的口吻。首甲等把胡秋原认为革命的贩卖手，但是他们却喜欢和胡秋

原较量骂人的本领。胡秋原骂什么“人首畜鸣”，“人类以下的存在”，而首甲等就说骂“丢那妈”“并不比胡秋原……更为无聊”。何以胡秋原无聊，而首甲等就拥护同等无聊的回骂呢！？他们说，“伊里奇在许多理论著作上，尚且骂考茨基为叛徒”^⑥。然而“叛徒”和“丢那妈”是绝对不同的。“叛徒”有确定的政治上的意义，而且考茨基的的确确是叛徒。而芸生的“丢那妈”，却不会损害着胡秋原错误理论的分毫。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我们分析某种论调，说它客观上替剥削阶级服务，或是削弱革命的力量，把这些“理论家”比做“走狗”，“叭儿狗”，——这都有确定的意义的，虽然是笑骂的字句，而表现着批判的暴露的意义。至于“丢那妈”，以及祖宗三代牵缠着辱骂，却只是承受些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弱点，表示些无能的“气急”。

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群众自己用社会的舆论的制裁克服这类的恶习惯，认为这是文化革命的一种任务；而首甲等，自命为负起文化革命责任的人们，却以为必须这样辱骂才不右倾！而且还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在理论的斗争之中，无论对于什么人，无论是保皇党，是法西斯蒂，这种辱骂都不会是“适当”的。这固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暂时，在下层民众受着统治阶级的文化上的束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顺口的把这种辱骂当做口头禅，——然而“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愤恨的内

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 除非是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

首甲等自己说：要“以尖锐的词锋揭破穿着漂亮外衣的奸细”。然而他们在自己所拥护的芸生的诗篇里，却只举出“丢那妈”作为尖锐的词锋。他们说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不应当降低，说“我们的诗人”应当与斗争的实践联系。但是，他们所谓诗和斗争之间的联系却只是写几句“切西瓜”之类的句子。这种恐吓和辱骂显然不能够揭穿什么奸细的漂亮外衣，显然反而降低了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他们拥护这样的立场，也就不会有“健全的阶级意识”。的确，他们的立场是离开真正的战斗，而用一些空洞的词句，阿Q式的咒骂和自欺，来代替战斗了。

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值得我们的研究；我们希望首甲等不单在口头上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能够正确的了解和纠正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① 芸生，原名丘九如，浙江宁波人。下文所说的“一篇诗”，指《汉奸的供状》，发表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诗中有“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等句。

② 胡秋原，湖北黄陂人，三十年代初自称所谓“自由人”。他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的《阿狗文艺论》及一九三二年四月同刊第四期发表的《勿侵略文艺》等文中，在马克思主义诗句的掩盖下，宣扬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③ 鲁迅的这封信发表时题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④ 首甲，祝秀侠的化名。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一度加入“左联”，不久离开革命文艺队伍。

⑤ “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见于首甲等人所写《对鲁迅先生的〈恐吓与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载《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二月）。

⑥ 伊里奇，即列宁。考茨基(K. Kaulsky, 1854—1938)，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曾对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叛徒立场作过彻底的批判。

慈善家的妈妈

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不用说，这是一位伪善的人道主义者。他周济着一班穷光蛋，有机会就叫他们做工，拔草呀，车水呀，扫除马粪呀，修理屋顶呀。穷光蛋们只知道感激他，向来没有想到问他算工钱。其实，要是算起来的话，决不止一件破棉袄，几碗稀粥的。他倒沾着便宜，还得了善士的名声。后来，这西洋景有点儿拆穿了。

但是，这时候来了一位侠客，雄赳赳的，手里仗着一把宝剑，据他自己说，这是“切西瓜”用的。他说他看透了那位慈善家的虚伪。他愤恨极了，就跑上慈善家的大门，破口大骂了一通，还拔出宝剑来说：“我要切你的西瓜！”一些穷光蛋反而弄糊涂了：为什么慈善家的头应当拿来当西瓜切。问问侠客，侠客说：

“嘿，嘿，嘿，……他，他，我丢他的妈，他妈跟我睡觉！”

“他妈跟你睡觉，他又该当何罪？”

“他，他，他昏蛋极了……我，我□他的祖宗！……该杀的东西！”

侠客实在愤激得说不清白什么理由。侠客以为只要话说得“粗鲁”些，穷光蛋就会懂得。然而他们不会了解慈善家的“妈跟人睡觉”，慈善家自己就立刻该杀；他们更不明白“该杀”就等于伪善的“凭据”。侠客自己的糊涂，要害得穷光蛋们更加糊涂，甚至于更加同情那位伪善家。

慈善家的虚伪，和他妈的不贞节或者恰好跟那位侠客睡了觉，是完全不相干的。穷光蛋们自己里面的明白人，应该详细的说明慈善家虚伪的事实，说明这世界里的种种假面具。

对于这样的慈善家，象侠客那样的手段是不行的，何况对于比慈善家更细腻的人物呢。

“美”

普洛廷^①，新柏拉图派^②的哲学家说：

“美”的观念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它不能够在真实世界里找着自己的表现和满足，就使人造出艺术来，在艺术里它——“美的观念”——就找到了自己的完全的实现。

对于那些轻视艺术而认为艺术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过在模仿自然界的人，首先可以这样反驳他们：自然界产物的本身也是模仿，而且，艺术并不满足于现象的简单模仿，而在使得现象高升到那些产生自然界的理想，最后，艺术使得许多东西联结着自己，因为它本身占有着“美”，所以它在补充着自然界的缺陷。

康德^③说：“艺术家从自然界里取得了材料，他的想象在改造着它，这是为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的，这东西已经站在自然界之上（比自然界更高尚了）。”黑格尔^④说：美“属于精神界，但是它并不同经验以及最终精神的行为有什么关涉，‘美术’的世界是绝对精神的世界”。

这是“美”的“最后的”（？）宗教式的唯心论的解释。

然而所谓“美”——“理想”对于各种各式的人是很不同的，非常之不同的。

对于施蛰存，“美”——是丰富的字汇，《文选》式的修养，

以及《颜氏家训》^⑤式的道德，这最后一位是用佛家报应之说补充孔孟之不足的。

对于文素臣(《野叟曝言》)^⑥，“美的理想”是：上马杀贼，下马万言，房中耍奇“术”，房外讲理学……以至于麟凤龟龙咸来呈瑞，万邦夷狄莫不归朝。

对于西门庆^⑦，“美的理想”只有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对于“三笑”，是状元和美婢的团圆，以及其他一切种种福祿寿。

对于……

究竟“美”是什么，啊？

照上面的说来，仿佛这是“一厢情愿”，补充一下自然界的缺陷。乡下姑娘为的要吃饱几顿麻花油条，她就设想自己做了皇后，在“正宫”里，摆着“那么那么大的柜子，满柜子都是麻花油条呵！”这其实也是艺术。

然而“现实生活，劳工对于 drama (戏剧) 是太 dramatic (戏剧化) 了，对于 poetry (诗) 是太 poetic (诗化) 了。”“艺术是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的再现。”艺术的范围不止是“美”，“高尚”和“comic” (喜剧)，这是人生和自然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一切。不要神学，上帝，“绝对精神”的“补充”，而要改造现实的现实。

欧洲人的“绝对精神”，理想之中的“美”——以及中国的 caricature (讽刺画)：“潘驴邓小闲”之类，或是隐逸山林之类，都是艺术的桎梏。可叹的是欧洲还有“宗教的，神秘的”理想

和它的艺术，而中国的韩退之^⑧和文素臣，袁子才^⑨和“礼拜六”似乎已经尽了文人之能事了。

“如果很多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意义——再现人生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现象，那么，很多其他的作品，除此之外，除开这基本意义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就是解释那再现的现象。最后，如果艺术家是个有思想的人，那么，他不会没有对于那再现的现象的意见——这种意见，不由自主的，明显的或是暗藏的，有意的或是无意的，要反映在作品里，这就使得作品得到第三种的意义：对于所再现的现象的思想上的判决……”

这“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抄袭。

“在这方面，艺术对于科学有非常之大的帮助——非常能够传播科学所求得的概念到极大的群众之中去，因为读艺术作品比科学的公式和分析要容易得多，有趣得多。”(Tchernyshevsky: *Polnoe Cobranie Sotcheneniy*, X, 2, 157—158.)

① 普洛廷 (Plotinus, 207—270)，亚历山大利亚城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生于埃及的 Lycopolis；他在罗马讲学，反对当时的统治思想：Scepticism(怀疑派)。——作者原注。

② 新柏拉图派，公元三到六世纪流行于古罗马帝国的神秘主义哲学。它引导人们向往神秘境界，脱离现实生活。

③ 康德 (I. Kant, 1724—180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④ 黑格尔 (G. W. F. Hegel, 1770—183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

⑤ 《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 (531—约590后) 撰，内容以讲述立身

治家之道为主，兼及考订典故，评论文艺。

⑥ 《野叟曝言》，清代夏敬渠(1705—1787)作长篇小说，书中极力宣扬功名富贵、妻财子禄的思想。文素臣是书中的主角，官至丞相。

⑦ 西门庆，《水浒》和《金瓶梅》里的人物。下文的“潘驴邓小闲”，见于金圣叹删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第二十四回王婆和西门庆的一段对话。

⑧ 韩退之，即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代文学家。著有《昌黎先生集》。

⑨ 袁子才，即袁枚(1716—1798)，浙江钱塘人，清代诗人。著有《随园诗话》等。下文的“礼拜六”，指鸳鸯蝴蝶派，一九一四年六月曾创办文艺周刊《礼拜六》，故亦称礼拜六派。

缺 页

俄国文学史

此稿系作者于旅俄期间(1921—1922)所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光慈出版其所著《俄罗斯文学》时，经蒋删改并改题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为该书下卷，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因原稿已佚，编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时，即据创造社版《俄罗斯文学》；现恢复作者所题《俄国文学史》原名。

蒋光慈在《俄罗斯文学·书前》中曾作如下说明：“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下卷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者以为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比较重要而且对于读者有兴趣些，故将它列在前面。关于本书的下卷，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朋友屈维它君，因为这是他的原稿，得着他的同意，经我删改而成的。……一九二七，十，三十于上海。”

一 民间文学

俄罗斯伟大的民族，成就他千百年来的文化，正因为他跨欧亚两洲，融合黄白两种人种，陶化无数小民族，——大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民族和芬族的合流，——而且经过几百年的磨难，几次三番的摧折，——鞑靼蒙古人的蹂躏，波兰日耳曼人的倾轧，发展上受巨大的障碍，可是民族性却得有深刻的锻炼；——此种文化的过程，难怪他光芒万丈。文学是这文化之光的一面，最足以显示俄罗斯民族的经过的。然而民族的伟力不就是他的文学，——他的文学仅仅是民族性的文字的表现而已。没有文字以前，俄罗斯民族已经生存发展，那时社会生活的菁华已经凝聚而成民间口传的谣谚，——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已经树立于此。

最初的俄罗斯民族是多神教的；他与东欧残酷的自然相斗，也当然先堕入霜雪冰风日月雷电的神秘世界。那时俄罗斯民族的原人生活，要和自然相斗，更要自己组织，就必须对自然有所解释，对自己有以自律，——于是因为要记忆并传授这些神话的智识和道德的格言，就发生有韵的谣谚歌曲，——所谓“民间文学”。一定要到社会生活复杂，一切必需的智识，已非口传耳受所能记忆，那时方有文字的记载。所以口头的

文学先于书面的。——固然，文字发生以后，俄罗斯的民间口头文学仍旧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中俄某一县的民间“急调”尚且可以订成厚厚的一本，——然而文学的重要位置始终已经为文字的作品所占，而发展的途径也就不同了。

古代俄罗斯的民间文学，大约可以分几种：礼歌，故事，祝辞，格言，及情歌。

“礼歌”里保存着不少古俄“异教”仪式的陈迹；基督教输入之后，至今也还没有能完全占领俄人的“心灵”，所以民间宗教便成所谓“二元信仰”，而礼歌之中就有混合基督及多神二教的痕迹：如“圣神节长成在基督圣诞节的前一天呀”，这类异教佳节的礼歌，往往叙述当时祭祀日月等神的仪式很详，如迎春歌，圣神歌等类；至今还有保存着圣节卜运，新年撒谷等风俗的地方，仍旧唱这些歌，作为一种娱乐。礼歌之中，有一种是“婚歌”；古代俄国婚礼的仪式很繁重，各种礼节举行时都有歌；大概这类婚歌所唱的，是新妇嫁前嫁后的光景心绪，以后的家庭生活，当然亦有团圆富贵的吉利话，以及服从公婆夫婿的教训话。再则，还有一种是“丧歌”；俄国古葬礼里亦有所谓“哭丧的”，——孝子孝孙所雇来的代哭人；这种哭丧的一面哭一面唱的歌词里，往往说死神是老妇或美女，说阴间路怎样险阻，死者怎样跨云拨雾的到东方去就日月。丧歌之中显然可见古代多神教对于死的概念；然而哀吊死者的深情，也往往描写得非常之有诗意。

“故事”大致是初民之思想的具体化；一切思念还不能表

示于抽象的推理，所以往往以具体形象比拟说明，借此记忆种种对于自然的解释，或是对于人生的想象。俄国古代故事之中，每每可以发见许多东方民族的影响，——邻居的传述所致。故事有三种：一，神话的，叙说日月风雨冰霜怎样布施行善或是残暴贼杀。二，禽兽的，描写狐熊兔狼等的行动，大致总是说狐狸是奸猾的，熊是蠢笨的，——传述下来的故事，往往表显初民对于禽兽的观念，愈古则愈神秘，甚至于以为禽兽是高出于人的神物。三，人事的，述说人事的关系，如公道与不义，后母与继女；幼弟是傻子，而长兄自私自利；——其中的伦常关系往往以禽兽相比拟，如狼父狐女，狼兄狐妹等；此外，还有说及初民之残酷的复仇式的刑罚的，如磔死，活埋，缚人于马尾之类。

“祝辞”是多神教时代的祈祷文；不过祝辞的作用却象符咒，能指使人或兽的行动。念祝辞时有一定的仪式，所以大致祝辞总有几段：一，祝者自述行动；二，呼召日月等神于基督教的圣徒（保罗等）；三，表示希望；四，比喻所希望的事于自然界的事物；五，发誓。

“民谚”在俄国格外的丰富。有神话的，如“那个天神弄湿的，仍旧是他来弄干”；有历史的，如“真象马昧打仗，一味空缠”；有人事的，如“家里面好好的，也就用不着掘窖”。

“情歌”所包括的民间生活很广，可是他的发生也较晚。大致情歌叙及女人的居多，说她们在娘家时的自由，在婆家时的苦恼；可是亦有许多讲男子的失败的恋爱，义侠的事迹，或不白的冤屈等；——近代这种口头文学就是“浪漫诗”或者所

谓“急调”，——是民间文学中艺术上的价值最大的。

可是由历史的观点看来，古代民间文学能表显当时的社会生活，——价值就已经很大；况且较晚的时代，还能够流传下来许多关于史实的歌曲，当然更有意思了。

俄国民族的古代生活有许多反映于所谓“旧话”之中。此等“旧话”，大致历叙列朝的史实，是编就的韵语，可以歌唱；固然口头的传述，加以俄国古代战役太多，往往年月混淆，史事讹误，——然而文学上的兴味至今还是很浓厚。——每当佳节，大家环坐，请说书的来唱“旧话”，也是一件韵事，普通平民之间直到现在还有这种风俗。“旧话”中专述古代英雄的事迹，将军勇士的传略的——称为“战士歌”。后来叙述史实的诗歌，往往有专纪一事或专述一代的，——大半都是历史上最大的变故，如鞑靼时代，伊凡第四^①时代，伊凡第四大婚，征西北利亚纪等。这种又特别叫做“史歌”。

“旧话”最重要的有两集：一，《基辅旧话集》——基辅是古俄的京师，此集中的主要人物是红日王符腊狄美尔，古俄万国的先王天子。二，《新城（诺夫郭洛德）旧话集》——新城是斯拉夫民族的古共和国，有“民会制度”，此集中的主要人物是蒲斯拉叶夫，镇压农民的贵族，和塞德夸，商业阶级的代表。

^① 伊凡第四(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озный, 1530—1584), 即伊凡雷帝, 莫斯科和全罗斯大公(1533—1584)。一五四七年加冕称沙皇。

二 古代文学

民间文学都是口传的，直到十八世纪方有学者整理旧时的记载；不但如此，民间文学大概是当时普通平民所朝夕歌唱的，或者礼拜举仪的时候和着巫祝同唱。及至后来，如“旧话”中之所谓南俄“念词”——亦是史歌，——方才由专职的“琴师”说唱。所以“念词”的韵脚格外严格，其他民间文学往往只有音节，便于记诵而已。总之，此等作品都是不知作者，不著文字的。要说古代的文字的文学，应当先说俄国的文字。

基督纪元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基督教方才传入俄国；那时，教会圣经等都要求有文字的辅佐宣传，俄国的文字才开始创立。俄国字母是希腊教士吉黎勒和美复狄两人所造的。俄国的基督教从维赞斯^①（即今日之君士但丁堡）教会传来；一切文化典籍都从那里输入，俄国人眼光里认为文化之源泉，直到十五世纪方才别有变动。

那时代的古文学应当分为翻译的和自著的两种；然而大致都很不普遍的，仅仅限于贵族及教会。平民无从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只得仍旧享用口传的民间文学，——而教会方面对于民间文学却多方压制。其结果，所谓文字的作品，大半都是神学方面的，万不及民间文学；虽是“异教”文化，却亲切真

挚，不失其为“艺术的真实”；只有极少的例外。直到十二世纪末，政治上大有变动，古天子城基辅改到符腊狄美尔^②，文化运动亦有统一的倾向。那时方才发现比较好的翻译及作品，——然而这文化的兴起，又突然为鞑靼西侵所打断。至十四世纪，是所谓文学之垂死期；可是十四世纪已经发露新思想，宗教之中有所谓“邪说”发现，俄国人思想的渐趋独立，已经可见。等到十五世纪时，文学思想才开始发展，——倾向于爱国，独立，统一，——基辅的俄国毁灭于鞑靼，诸王又复争夺，文化凋敝不堪，至此乃见符腊狄美尔-苏慈达儿^③的俄国之复兴思想。

十五世纪，俄国中兴，定都在莫斯科，莫斯科王伊凡第四统一全俄，——更进而驱除鞑靼，到十六世纪而大业告成。于是文化事业和宗教事业亦就统一。伊凡第四的“法典”统一了司法；“家制”统一了风俗。最当注意的，就是那时的文学思想，都认规范诰诫为第一要义，承认古时“先王之制”是最理想的，所以复古思潮却成了新运动的南针。不但国内统一，力求秩序之确立及农奴生产的底定，那比较类似于共和制度的沿波罗的海诸国（如新城），已为莫斯科的“君主文化”所镇定肃清；甚至于对外还求伸张：“俄国现在是宇宙间唯一的正教国家”。东罗马帝国亡后，莫斯科的政治家便倡所谓第三罗马论：“第一罗马是古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城（亦即君士但丁堡）；第三罗马是莫斯科；而第四罗马永久不会有。古罗马曾经有统治全天下的威权，君城亦是如此，所以莫斯科便应当如此……”希腊教的正统现在迁入俄罗斯。重仪式而忽教义的

思想，使文学中亦反映不少夸大拘泥专制的色彩，如此，直到十七世纪希腊教新旧派再演分裂之时。

可是，这一期内的文学思想，随着经济组织之重新破裂（农奴制度确定后之“哥萨克运动”——弃田远遁而为匪），且加以政治上及社会上的压迫亦就含着不少矛盾冲突。自从十五六世纪“邪说派”发生以来，有所谓“否认神甫派”“犹太化派”等等大致反对仪式非常激烈，以至于主张纯粹以理智解释宗教。因此，政府有时也因旧教徒残酷，危及现存社会的根本，禁止极端的保守派。此外，还有一派激而走于虚无：摈弃一切仪式，凭借一心，行善长乐，便能得神圣的光荣，遽领神悟——这却和维赞斯的神秘派一样，说这种神悟，只有根基深的人才能领会到。正教派，邪说派，神秘派三方面的斗争，以十六世纪为最甚，——政府领袖的正教当然能用极残酷的手段和温情的政策双方并进地克服其他两派。至今典籍之中，还可以看见这些宗教斗争的陈迹。

古代的俄国文学大致而论，差不多完全没有艺术性，至多只讲求字句的排列，章法的先后，这只算是修辞的功夫；其实这些功夫也很少，因为书籍都是神圣的，出乎道德和信仰的范围便是离经叛道。因此，当时社会生活的停滞可见，至少可以说“读书人”的社会确是如此，所以一本书，过了一百二三百四百年还在翻来覆去的读，又可以说绝对没有时代性。

① 维赞斯，现译拜占庭，古希腊城市，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三三〇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于此，改名君士坦丁堡。公

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大帝于此召开尼西亚会议,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工具。一四五三年更名伊斯坦布尔。

② 符腊狄美尔,现译弗拉基米尔,苏联俄罗斯联邦西部城市。

③ 符腊狄美尔-苏兹达儿,现译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东北罗斯最大的公国,以弗拉基米尔城为中心。

三 俄国文学之中世纪

在这种时代的文学(自十一至十六世纪)充满着黑暗龌龊腐朽死寂,可以称之为“中世纪性的”。虽然,这一期的作品,经过严密的考据,对于史实亦有绝大的贡献,——发现那牺牲克己忍耐坚决的俄国民族性之社会的来源。天下那有再沉闷过于世界史上的所谓“中世纪”?然而中世纪给文学不少诗境。俄国这一期的文学,正当中世纪之时,他的性质又正是如此!我们且略述这时期的重要作品。

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的作品可以分几种:一,杜罗夫斯基等神甫之“垂训”;二,圣徒传;三,“行程”,纪圣徒旅行圣地;四,“纪年”,古史记载。十二世纪十三世纪初的古文,最确实而且完全可读的,要算《纪依鄂尔之杖》^①一碑,记一一八五年依鄂尔征波洛夫族之役。著者大约是当时的侍卫,不但有美文的手笔,并且论述出征失败的原因,而对于王侯有所箴谏。

十三世纪的碑志有:一,《古义》,是反对犹太教^②的论文;二,教甫谢拉皮昂之《塾训》;三,《纪叙文碑》,其中有翻译有原著;四,萨托池尼克之《祈求文》,是萨氏对王上的种种祷求,其中亦每论述事理;五,《纪俄土灭亡》,亦有与那《纪依鄂尔之杖》一样的诗才。

十四五六世纪时的文字传下来的很少。关于统一事业的有：一，《家制》；二，《斯托葛拉夫碑》^③，叙鞑靼时代后一五五一年希腊正教^④统一大会的事迹；三，《等第书》，叙帝王的家禁系统；四，《圣读志》，是正统教的书目。关于反对“邪说”的书籍，最重要的是《光明使者》。神秘派的，便有《莎尔斯基集》及《老者亚尔铁美集》等等，——所谓“老者”，便是“受衣钵”的神悟圣师。就是所谓“邪说”的犹太化派，亦有少许著作遗留下来：《逻辑学》，《宇宙学》，《六翼》及《秘密之秘密》。最后，当说苦尔勃斯基的著述，其中最好的是：一，《莫斯科大王的历史》，专述伊凡第四朝的事迹；二，《上伊凡第四书》^⑤，这是一部信札集，双方往来的信都有，尤其是互相辩驳的政治问题最有趣味。伊凡第四自夸不受贵族武士的意见，说是王权；而苦尔勃斯基却有向王上争公权的倾向；他在他那时代，可以算得很博学很新进的思想家了。

① 《纪依鄂尔之杖》，现译《伊戈尔远征记》，描写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公伊戈尔于一一八五年孤军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被俘的一部史诗，作者不详。

② 犹太教，犹太人的宗教，信奉耶和华。以《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为主要经典。

③ 《斯托葛拉夫碑》，现译《百条决议》。伊凡四世一五五一年一月至五月在莫斯科举行宗教会议的决议案，共一百条。一八六二年首次出版。

④ 希腊正教，即正教。最初盛行于地中海东部沿岸希腊语地区。因宗教仪式中使用希腊语，故名。

⑤ 《上伊凡第四书》，现译《可怕的伊凡与库尔勃斯基通信集》。

四 俄国文学与西欧文明

俄国文学的“真”，还滥觞于古代的民间文学；文学中的“教训主义”，也早植根于文字发现之初的教会文化里；独有他的“美”之初步不得不借重于西欧的城市文明。俄国接近西欧的倾向，在十五世纪末就已经发现；十六世纪一百年之间有不少事实，足以证明俄国迎受西欧文明的趋势。虽然有波兰瑞士的阻梗，然而莫斯科政府仍旧能聘请许多外国艺术家，建筑家，医生，艺师，巧匠；而在莫斯科旁划出“哑人自理区”做外国人居留地，——向来俄国称外国人做“哑子”，现今“哑子”已成德国人的专名了。再则，十六七世纪时，莫斯科诸王侯渐渐豢养外国兵士，宗教运动中的学者又往往和西欧宗教改革的思想相影响；甚至于复活祭的仪式反而模仿罗马；——凡此一切不能不令文学思想里发生倾向西欧的趋势，这种文化的吸引力，不期然而然的成就了俄国文学的复生。于是发生不少翻译的书籍杂志：宇宙学，医学，历史，地理，辩论术等，——大半都是从拉丁文里译出的，亦有是从德文，荷兰文，波兰文里来的。小说居然也有翻译，最有影响的便是《罗马事》和《大镜》两集；《罗马事》纯是小说，极有趣味，《大镜》固然是小说体裁，但已寓道德规律于俚谈俗说之中。此种小说，还有许多是武士的

叙传，有几种通行遍于俄国平民群众之间，至今还有。

十七世纪末，因模仿西欧而有俄文原著的小说。那时文学思想方见一大转机：已经完全叙述世俗的事物而不限于教会。再则，原著小说已经能显出很有趣很亲切的民间习俗。尤其是男女爱情，如《符罗勒与安娜》，还有家庭关系，如《安娜与双亲》，以及《洛夫赤夸夫与符罗勒》，——描写贵族武士与臣民下人之间的关系。

从前俄国受维赞斯东罗马式的教化，向来认戏剧是侮圣犯上的；到十七世纪方才发现戏剧。——固然，戏剧的内容还仅仅取材于《新旧约》以及历史，然而有戏剧发现已经是俄国文化史里的大变故。戏剧的发现正在亚列克谢衣^①王朝，那时有一派武士和南俄学者，算是当时的“西欧通”，如波洛慈基，美德维乾夫等，得王上的欢心，以输入西欧文明自任。因此，初设立希腊和拉丁语两学校，随后更创办学院。可是结果不是这一派人当学院的领袖，就是所谓“希腊派”，——十七世纪末同西欧文明势盛而引起反动，这种反动派便标榜希腊教。

希腊派和拉丁派（西欧文明派）之争，一直延长到彼得大帝^②时，拉丁派得了最终的胜利，方才终了。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拉丁派领袖美德维乾夫被斩，至今形式上还保留希腊正教，——其实真义方面，结果是窃取路德新教^③，在社会政治方面更完全是采取拉丁派的文艺科学观。俄国民族的经济斗争促起如此之紧迫的需要，竟引起政治上，社会上，人生上，文艺上的剧变，——彼得大帝乃不得不用快刀斩麻的手段执行这种使命。

俄国文学思想除上述的以外，还有宗教分裂的影响；当时的宗教受社会生活中——由自然经济进于交易经济的急流，改革派的势力不期而大增。于是发生修正《圣经》的事，因此引起教徒的分裂。新派自己有拥护改革主张的书籍，如《亚华苦摩集》之类。分裂派或旧仪派就以为“宇宙间唯一的正教国”里尚且发生修改经文之事，想必世界末日定要到了，于是也发现好些著作，论末日裁判和天堂生活。

到彼得时代，这种斗争已经稳定，而各方面就开始“大改革维新”，振兴工商业，——文学方面亦是如此。彼得自己不但选择各种学术书籍，令人翻译，而且往往亲自指点译法：“好好的去改，不要文绉绉的斯拉夫字，而要简简单单的俄国字！”当时遣派留学西欧或是调查的人很多，于是有许多游记。其中最有意思的，却不是正式的报告，而是私人的杂记。黑暗的俄国人骤然堕入光明的西欧，只见“各处唱歌跳舞，却又没有醉人”，“维纳细亚的女人又强壮又美丽，常常喜欢消遣游戏，而不爱女红，却又不堕入恶欲”，更看见家庭生活里夫妇的互敬，国家城市生活的繁盛。此种新的接触，自然使俄国自己的诗歌戏曲也因之大发展起来。

十八世纪初，俄国的新文学之中康德美尔^④之滑稽文确当首先占一位置。这种滑稽，刚刚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现实生活之中无限的畸形现象，——审判官在书记朗读文件的时候，靠着椅背睡觉，算是他的天职；教甫硬要否认科学；世家大族妄自尊大，却忘了“德行为先不问身世”。总之，一方面守旧派盲目的保守，别方面维新派只学皮毛。所以康德美尔的滑

稽文学可以算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社会的自觉。此后随着就是古典主义^⑤，固然在文学的形式方面，利用旧古典及西欧文学，得以大加整顿，制造新模型，建立新系统，然而在社会意识方面，比较的便少所表现。

俄国文学的伪古典主义盛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尚且还有余势；他的特征在于：一，模仿西欧诗文的派调；二，注意外表形式的典丽。西欧的伪古典主义，不但题材大致取于历史古典，而且文学形式方面亦有一定的规范（如三一律^⑥之类）；他对于社会的精神需要，往往不能满足，——因为本来不注重文学的内容。俄国的伪古典主义自然也相仿佛。那时的洛莫诺莎夫，狄尔遐文，苏马罗夸夫，^⑦都是这一个主义的代表。然而洛莫诺莎夫倡国语的文学，订定俄国文法；于形式方面，伪古典主义派已经开始扫除死板的教会斯拉夫文而锻炼出新的文言——文学的言语，实在是伟大的功绩。而且，因社会生活受西欧的影响而流得格外急促，大多数俄国的伪古典派（除苏马罗夸夫以外）都不得不于形式之外兼顾及内容，指斥当代的积弊，——比较西欧的伪古典主义略有不同。

十八世纪之末，当女皇加德邻第二^⑧朝，西欧的文化已经渗入俄国上流社会很深；国内经济因受西欧市场的影响而大有变动，促起文学界对于社会生活里各种问题的兴味。腊第师赤夫^⑨的《旅行》里仅仅描写从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途程，已经彻底暴露农奴制度的残酷。就是伪古典派凤委晴（1744—1792）^⑩，为“赏美罚恶”的原则所束缚，尚且对于当代社会的弱点能极力揭出：如俄国上流社会的“法国迷”，俄国人性情的

粗蠢，地主对农奴的暴虐，审判制度的不公道等等。加德邻第二时代的讽刺杂志大致都是如此的倾向。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思想：尊重人格，人道主义，个性的权利等也随之而传入俄国，——俄国的“经济的自强”已经不容农奴制度再加阻遏，非要求自由发财不可了。

文学思想的渐切于现实生活，当然因此而已经辟了一条大道，——以前的“读书人”式的文学已经不能生存，于是俄国文学的伟大性：“引文化的理想入现实生活，令现实生活反映于文学形式”的一原理，就在此时下了种子。再则，十八世纪末文学界的事迹里，还有一事不可不注意及的，——就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波波夫、马嘉罗夫等）。因此，文士的思想得受平民的教训；现实与文学的接触联结融洽得以更进一步。文学的所以不死，正因为他和活的现实相陶融，说得出“人话”——平民群众所要说而不会说的话，表现得当代社会的情绪。

① 亚列克谢衣，即阿列克塞·米海洛维奇（А. Михайловч, 1629—1676），一六四五年至一六七六年的沙皇，彼得大帝之父。

② 彼得大帝（А. Пётр I, 1672—1725），即彼得一世，一六八二年至一七二五年的沙皇，第一个全俄皇帝。

③ 路德新教，公元十六世纪，德国人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反对教会腐败。他所倡导的基督教被称为路德新教。

④ 康德美尔（А. Д. Кантемир, 1708—1744），现译康捷米尔，俄国

讽刺作家。别林斯基称他的讽刺诗是“朴素然而不朽的作品”。

⑤ 古典主义，欧洲文艺复兴后产生的一种文艺思潮。主张用民族规范语言，按照规定的创作原则进行创作，崇尚理性和“自然”，以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为典范。

⑥ 三一律，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的创作规则。规定剧本动作、地点、时间三者必须完整一致，即每剧限于单一的故事情节，事件发生在一个地点并于一天之内完成。

⑦ 洛莫诺莎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现译罗蒙诺索夫，俄国学者、诗人。第一本《俄语语法》的作者。狄尔遐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现译杰尔查文，俄国诗人。著有《费里察》、《密且尔斯基公爵之死》等。苏马罗夸夫(А. П. Сумароков, 1717? —1777)，现译苏马罗柯夫，俄国诗人、剧作家。著有《伪皇德米特里》、《受贿》等。

⑧ 加德邻第二(А.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现译叶卡特琳娜二世，一七六二年至一七九六年的俄国沙皇。

⑨ 腊第师赤夫(А. Н. Радищев, 1749—1802)，现译拉季舍夫，俄国作家。所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对俄国的思想和文学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⑩ 凤委晴(Д. И. Фонвизин)，现译冯维辛，俄国剧作家。著有讽刺喜剧《纨绔少年》等。

五 俄国文学之黎明

十九世纪开始，俄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便是十二月党的革命^①，——俄国的社会生活大受其震荡；革命前后十余年的社会情绪大致都回绕着这所谓根本问题。十二月党诗人蠢列叶夫(1795—1826)^②的著作《公民的勇气》，单他这部书名已足以开文学中的新时代，——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第一箭，——是当时俄国现实政治的艺术上的表现。

虽然，俄国的政治变革，共和民主的要求亦是受西欧外来的影响；文学思想尤其是外铄的居多；所以模仿而来的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③等往往在最初期不大切于俄国的现实，因而色彩不浓，势力也不久。只因实际社会动象的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初期的文学乃能扫除这些“荆棘”，而大踏步地走上十二月党所开辟的道路。所谓情感主义其实已是接近现实，摆脱古典主义之读书人式的文学的第一步。伪古典主义的题材往往偏于英雄贵族，而情感主义便表现下层阶级普通的人性，亦因困苦艰难而大有以自见；俄国的情感派特善于描写农民，那也是自然的。可是情感主义还只见抽象的人，而没有丝毫民族性及时代性，——很笼统概括的。

嘉腊摩金(Karamzin, 1766—1826)^④是俄国情感主义文

学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旅行的俄国人的信》，表现俄国人对于西欧的感想。著者处处叙述自己的情感，——仁爱悯恻的深意，自己心灵上的经受，对于自然景物的感慨，——那种细腻的情绪，有时不免于忧伤。《可怜的丽沙》里，更形容普通人的忧患心绪，——虽是庸庸碌碌，却很有纯洁高尚的性情，能发深情挚意。嘉腊摩金的情感主义得着这派西欧文学的优点和弱点，虽然不能表现俄国社会的亲切的需要，却处处警觉人道正义的动机。他还有一部《俄国史》寄托他爱国的深意，不但做了不少考据旧籍的工夫，并且锻炼出记叙的美术文词。他尽力证明俄国国家统一的必要，说明非此不足以促进政治文化的昌盛。他以为历史应当是道德的训教典籍，——对于丰功伟绩的人物加以褒奖，对于奸邪僻佞的就应当口诛笔伐。其实，俄国的农奴经济崩败，亟亟要求与当时的列强并驾齐驱，况且那时社会生活日益复杂，急需新的精神力量来维系社会间的新秩序，——那种爱国的热忱，细腻的情绪，难道只是嘉腊摩金一人的创见么？

浪漫主义(Romanticism)亦是那时从西欧输入的文学思想。俄国的浪漫主义比情感主义的色彩更淡。西欧浪漫文学的兴起，为着是攻击伪古典主义的形式桎梏，要求简单自然，——文学不但表现情感，而且还要格外描画人类高尚的愤发奇伟的情绪，应当注意到平民生活里的诗境、研究民间的创作，——浪漫派以为这是民族精神之所寄。浪漫主义的发现正与拿破仑^⑤时代的西欧社会运动同时；拿破仑战争的结果更使浪漫主义广泛地流传，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德国最

盛：社会之中，发现渴望独立性的倾向，而浪漫主义恰能适应这种需要。

茹可夫斯基(1783—1852)^⑥是俄国浪漫派的先声。茹可夫斯基早年的著作，大都涵着忧伤的情绪。他的诗，在俄国是首先抒发情感的，使俄国人不但深悉他的个性，而且开始领会人生情绪的细处。悲歌的情绪或者发于个人的身世，或者感喟世间生活的恶浊；他的诗感叹人与自然之间的隔离，愤嫉阶级的不平等。他高呼情爱和忠恕，想象天堂的生活和永久的幸福。茹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晚》，《安慰》等都是如此，甚至于他选译的外国文学都是偏于这一类的。他是俄国翻译外国文学最著名的第一人；译品之中以德国诗人名著为最多，其次，他曾经译希腊荷谟的《沃第赛》，印度古诗《马迦勃哈腊达》，波斯古诗《鲁斯登和莎腊白》。茹可夫斯基的译笔清晰明瞭准确，所译诗歌尤其合于音律；所谓“诗的言语”在俄国到茹可夫斯基才完成，而文学的范围和意义也到他才扩大深入，所以俄国文学史往往说“没有茹可夫斯基就没有普希金”。

然而普希金之前还有两位文学家应当提及的：一，克雷洛夫，二，葛黎白叶笃夫^⑦。

克雷洛夫(Krylov,1768—1844)是俄国最著名的寓言家；“寓言”的体裁简短而又通俗，可以讽刺世人，托之于禽兽乡农。他往往取材于平民之间的谣谚，讥笑当时俄国社会的畸态，——对于西欧文明的误解，贵族的倨傲残暴等。他的寓言虽有许多是译东方诸国或是希腊罗马的，但是他自己的天才绝不淹没。寓言文学发现于俄国，确乎是文学的平民化之

最早的表现，——文学方才和平民接近。所以克雷洛夫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是很高的：他连系加德邻时代“留意平民生活”的文学思潮，和普希金后“文学之平民化”的趋势；——他介乎两者之间，是一座“金桥”。他综合十八十九两世纪文学的总倾向，——“为平民服务”，而且开始俄国文学离西欧而独立的伟业。

葛黎白叶笃夫(Griboedov, 1795—1829)的道路亦和克雷洛夫是相同的。他的著名剧本《聪明苦》描写当时的上流社会穷形极相。著者叙一少年人茶茨基游历西欧归国，得着了较正确的人生观，对于公民的责任和教化的观念也大不同。回到旧社会之后，他不由得处处遇见矛盾冲突，他和官僚辩论官吏的责任，那时大家以为做官是为发财的，他凭良心说：“服务就是深愿的，——钻营却太恶心了。”他那“为事业而服务，不服侍上司大人”的意见，当时一般社会却引为怪僻不堪，掩耳却走；他想宣传论述，而人家不听；一般社会的惰性如此之强烈，使他觉得自己一个清醒白醒的人掉在茫茫的醉海里，弄得不知所措。社会以为茶茨基是痴子，甚至在他出国以前的情人苏菲亚也是如此想；她现在已经不爱他了。茶茨基失望灰心至于极点，只得远遁，去寻那“冤屈的心所能安顿的所在”。葛黎白叶笃夫不惜淋漓尽致地描画当时社会中新旧的冲突，旧人物的官僚热，法国迷，上流妇女的尘俗迂谬，当时社会里的种种派调无不毕现。同时，隐隐之中葛黎白叶笃夫亦就指示出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他这一本滑稽戏，实在可以算得俄国的“社会的自觉”之碑志：证实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里已

经养成了高尚的理想。

① 十二月党的革命，十九世纪初，俄国进步的贵族军官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开始组织革命团体，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代以君主立宪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俄历）他们曾发动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后遭镇压。

② 蠡列叶夫(К. Ф. Рылеев)，现译雷列耶夫，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文学杰出的代表者。著有《致宠臣》、《伊凡·苏萨宁》等。

③ 情感主义，现译感伤主义，十八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文艺思潮。提倡内心感受、感情抒发，强调个性和个人精神生活，不满当时社会。

④ 嘉腊摩金(Н. М. Карамзин)，现译卡拉姆辛，俄国作家、历史学家。

⑤ 拿破仑，指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和百日王朝(1815)皇帝。曾不断进行对外战争，多次粉碎反法同盟，打击了欧洲封建反动势力；但后来的对外战争逐渐变为侵略战争。一八一二年对俄战争的失败，加速了帝国的崩溃。

⑥ 茹可夫斯基(В.А.Жуковский)，俄国诗人。曾翻译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和印度古诗《玛哈帕腊达》等。

⑦ 葛黎白叶笃夫(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1795—1829)，现译格里鲍耶陀夫，俄国剧作家。下文的《聪明苦》即他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一译《聪明误》)。

六 普 希 金

普希金(A. S. Pushkin, 1799—1837)是“俄国诗的太阳”。他的天才处于当时俄国社会的环境里，尤其显出光彩。十八世纪是俄国文学模仿西欧的时期。那时好象是俄国文学的学生时代。可是当时已经觉得模仿的弱点，觉得非接近活的现实不可。嘉腊摩金和茹可夫斯基大致偏重于锻炼出“文学的言语”；然而无意之中已经倾向于文学的适应时代性。克雷洛夫和葛黎白叶笃夫则更进一步，到普希金方告大成。文学与现实的融铸就成了俄国文学进化的南针。

普希金的初期也曾经模仿西欧文学。他少年时求学于皇村的贵胄学校，是俄国当时的最高学府，虽然有许多缺点，而文学的教授却都是很渊博的。当时贵族少年的奢侈生活，普希金亦不免沾染；可是他从小就有诗才，——少年时的试作大概取材于爱情，饮酒和一切乐事；然而不久就可以看得出诗人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那时这种警觉的情绪，使少年渐渐发生秘密结社之风，十二月党的来源亦在于此。普希金和革命组织也很有些关系。那时他的著作，大半还是模仿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一切派别；而对于政治自由的理想他亦非常之热烈。一八一九年他有一首有名的诗《农村》里说：“我

看得见那不受压制的平民，看得见皇恩扫荡那奴隶制度吗？那华美的朝露，能临照我祖国的自由教化吗？”不久，他就因讽刺得罪，流到南俄，又曾禁锢原籍；他一生遭遇很奇，恋爱的情史又往往失败，结果忧伤不堪；初则因此而爱英诗人拜伦，随后又研求莎士比亚。他又因流戍却反能多住乡间，与平民生活接触；于是天才日益发露，最后亦曾着手研究历史，曾经试作彼得大帝传，对于革命运动尤其留意，如《甲必丹之女》^①里描写蒲迦赤夫之乱等。普希金一人的文学生涯，正和俄国文学相似，从模仿而独立，从书籍而生活。

普希金的抒情诗，是他空前的创造，他的个性完全呈露在诗里。普希金虽有忧伤，却绝不悲观，对于生活总有无限的“光明之将来”的希望；生活的希望维持他的情绪，——乐生的无畏的人生观；生活于他是“思想和苦难”的过程。他并不忘记现实生活的黑暗，往往自觉精神上的孤寂，他忏悔他的绮年。无论怎样黑暗，怎样困苦，我们的诗人决不颓丧。“光明的将来”维持着他的创造力。抒情诗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对于诗的观念。他论诗和诗人——以为诗人是天之骄子，天赋的才华才能使“诗声热燃人心”；诗人呼吸天地之精华，正是异于庸人之处。诗人“自己是最高的裁判者”，——裁判者决不是庸众。然而他以为诗人的天责正在于对庸众有精神上的贡献，以“光华警觉善意”。当时急切的时代问题（农奴制度）亦时时反映于普希金的诗里。普希金的诗不但思想转入超绝的个性主义，足以自异于前辈；就是词句形式方面，他那“美术的言语”细腻精致，光怪陆丽，又有铿锵的韵律。难怪茹可夫斯

基称他是“胜过他先生自己的学生”。

普希金的“歌辞”有写情叙传的，亦有历史的。写情叙传的歌辞，如《高加索的囚人》描写囚人亚列夸骤然进了文化的社会，处处发生心灵上的冲突，不能得到自己的幻想和愿望，结果这种个性深受失望和不满于生活之苦。——文意很象拜伦。人与人的理想关系，要很简单很自然；然而“文明”人回响自然，却是一件大难的难事。可是拜伦的“英雄”往往是天才，而普希金的却比较类似平常人，西欧的浪漫主义到俄国来，仅是昙花一现，而且在新的形式中，急转直下已经倾向于现实主义(Realism)。至于历史的歌辞，如《青铜骑士》记述彼得大帝的迁都，歌为国家的福利，与窃笑个人的私意偷安而写的；其中歌咏彼得堡的美，尤其是普希金集里的精采。

传奇小说《欧仁沃聂琴》^②是普希金最有名的著作，俄国文学能表显当代的派调的，亦从这一部著作起。书中的英雄沃聂琴，是俄国文学里所谓“多余的人”的始祖。沃聂琴之变成“多余的”有种种社会的原因。沃聂琴是上流社会中人，然而所受教育却很浅薄，能知道些礼貌，会说几句法国话，偶然道听涂说地知道些常识。他对于认真的事业是无兴味的，——他本来可以白白的享受农奴的劳动。沃聂琴父亲死后，债主把他的邸墅尽数抵偿积债；他却幸运真好，——叔叔正要他承继。他仍旧有很富裕的生活；于是专意讲究酬应妇女，做其纨绔子弟的惯技。他偶然厌烦而读书，但心猿意马的再也不能得到书中的益处。空泛的生活和俗欲的耽求，使他不能有丝毫诚挚的真情，只有利己主义的心性。这样的生涯真教他自

已觉得绝对是个“多余的人”，社会所用不着的人。生活的乏味，无以复加。小说中其他的人物象沃聂琴的朋友林斯基，是一个青年的诗人浪漫家，幻想着知音，幻想着神秘邃远的深情；而他的情人沃勒嘉却不过一个“乡下小姐”，只有庸庸碌碌的智识和性情，她那乡村的环境里，只有“秋忙酿酒，乡间风物”的谈话。沃聂琴因林斯基而得认识沃勒嘉的姊姊塔溪雅纳。普希金叙塔溪雅纳的教育，从她幼时起，就看得出这明慧的女郎，自小读那些情感主义的文学，怎样自己幻想着理想上的英雄，可以做她的知心，引她跳出庸俗的陷阱。她不幸遇着沃聂琴，当他是知音，她给他的信上说：“就在这里是一个孤独的人，——谁也不能了解我，我的理智疲惫不堪了……”。沃聂琴丝毫不以为意，只当是过分的应酬话；反而故意为着沃勒嘉而和林斯基决斗，打杀了自己的挚友。塔溪雅纳第一次受着这种打击：她回肠九转地想念，细细地咀嚼人生的意味。等到沃聂琴回来，第二次遇见她时，她已经别是一人，对于道德有一定的见解，对于生活另有看法了。塔溪雅纳这一类的人还可说是内部的心理的想象；至于沃聂琴那却是人人承认的，当时社会里确有这一种派调的人，是农奴制度崩败中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每当旧社会崩坏新社会未成的青黄不接的时代，“无用的好人”没有不是多余的，“欧仁沃聂琴”的不朽，正在于他警觉社会的意识，使社会自认他的肖影。俄国社会进程中的“多余的人”还多着呢，沃聂琴不过开个场而已。

普希金的记叙小说：《甲必丹之女》、《杜勃罗夫斯基》等，虽然没有什么深意，往往急就而没有成熟，然而平民性非常之

显露，是前辈的作家所没有的。平民的“英雄”，俄国的性情——诚挚忠实，果决而勇敢。普希金能写极平凡的人；要用历史的背景时，他又能化作“美术的布景”，史实跃跃欲现。

戏剧的著作最重要的有：《白黎斯哥杜诺夫》和《吝啬的武士》等。戏剧之中没有当代的社会现象，著者都是取之于历史的；然而运用题材的方法却很新颖。他得莎士比亚的文风；“自由而且广泛的描画”，所以已经扫净古文派的谬见，朴实的形容，丝毫不加讳饰。譬如悲剧《白黎斯哥杜诺夫》里，切实的“复现”十六七世纪时的习俗，剧中引用古时的言语，写宫廷的谗媚，僧侣的专横，平民的屈伏，都很注意。普希金晚年的历史研究，对于他的戏剧作品显然是很有影响的。

普希金文学的特征约有四点：一，自然和正确，所谓现实主义，写实有的生活。二，文学内容的平民性，描写俄国的现实生活，取材于平民的环境，适应当时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普希金文学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此。三，纯洁的美术的言语；普希金使文言接近白话，绝对不用艰涩的斯拉夫文调；其次，他所用的词句，总能和书中人的身分恰切相称；他能自由的运用语言文学，不象普通的文人，“强使小姐说太太的话”。四，普希金的天才，更在于他的“自性”，他初登文学舞台的时候，俄国文学还在依傍西欧的门户；俄国文学要成真正俄罗斯人的反映俄罗斯的现实生活里的需要，而且对于广泛的俄罗斯民众有所贡献，普希金的功绩就在于此。

① 《甲必丹之女》，现译《上尉的女儿》，描写普加乔夫（约1742—

1775)领导的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下文的蒲迦赤夫,即普加乔夫。

② 《欧仁沃聂琴》,现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七 歌歌里和列尔芒托夫

普希金的创造力，他的方法和俄国的“自性”主义，在文学中造成所谓普希金派。当然，文学家各人有各人的个性，然而同在社会里呼吸当代的民气，——那文学的事业本是社会的，所以继续增长发扬光大的责任，便在后起的作家中，也必定会有共同的倾向。普希金派最著名的作家就是歌歌里和列尔芒托夫^①。

歌歌里(Gogol, 1809—1852)的“滑稽”天才，在他最早的几篇记叙小说里，就已经显露；俄国的文学评论家倍林斯基(Belinsky)^②说他的小说“意思很浅显而平民化，有真实的生活理性，自性非常充分，而且滑稽的作风非常活泼，可是永久透出忧伤郁抑的情感”。歌歌里用“火一般的舌头”描画小俄罗斯^③的风物人情。——他自己是小俄罗斯人。他亦是亲切地感觉现实生活，去深思考察，所以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真切到万分，这是和普希金一样的。歌歌里的作风却在于他的活泼的滑稽。滑稽的性质其实是哭不出的笑，或者所谓“泪里的笑”。他头几篇小说还没有多么深刻，到后来，譬如《旧世界的地主》^④，或者《记伊凡伊凡诺维池怎样和伊凡尼契复罗维池相骂起来的！》^⑤等小说里，便不同了。著者对于自己小说中

的人物，千方百计的开顽笑；老地主的迂阔，爱请客爱到肉麻……然而最终却来了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那些小说里的“英雄”为什么这样庸碌，为什么这样自以为“得劲”，实际上他们一概是只知道今天，只知道平庸的日常琐事，究竟为什么活着？还有一篇小说《大衣》^⑥描写个虽平庸而忠实的人，自己想勤勤恳恳地做事，而不能得适用的地方，使读者对这种“英雄”起无限的怜惜。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剧本《巡按》和《死灵》^⑦（俄国称人口为灵魂，称奴隶几名为奴隶几“灵”）。那时的歌歌里，也已经是完全“苦的”了。歌歌里讽刺世人，是要将这类的“英雄”置之于“万目昭彰之地”，歌歌里的笑，实在是堕落者的冤。

俄国文学里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到歌歌里才完成；他比普希金更进了一程。普希金是“文学接近生活”的第一人，而歌歌里的描写更侧重于现实生活中之消极的恶的方面。然而普希金书里的恶人往往还有些“甚言之也”，歌歌里却还他善的方面。歌歌里的“英雄”，善和恶结合起来，——实际生活也确是如此；歌歌里对于现实主义之深入，便在于此。歌歌里文学的特长既在于滑稽和现实主义，那么，作者在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英雄”的心灵里，究竟看见些什么呢？不管他现实生活里怎样庸碌恶浊，歌歌里深信人人心灵之深处，总有“人性”，至少一星两星的火总是有的。一个记录机器的小官僚，居然亦有“新大衣”的理想，那时他的生活就已经不是无目的的了。有时歌歌里抱憾无穷地看着：人心里的稍稍超越高尚的倾向，生生地被我们自己抑遏摧折。他不禁要痛定思痛地呼冤：“一个

人可以堕落到如此的低微无价值，如此的猥琐鄙浊？能够这样变的？这象真的吗？一切都是象真的，一切都会轮到人身上来的……”

歌歌里既然细察人心，便使俄国文学里发现“心理分析”的方法。他既然能够如此，便可以打开“英雄”的心箱给读者瞧，社会上某种派调的人何以有他那种脾气。人的心理现象如习惯气量等等，怎样发生，怎样向一方面开展出去，成为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凡此一切歌歌里能以文学的心理分析表现出来。譬如《死灵》，描写农奴时代的衰落，经济生活受自由贸易的激发，农奴已经无用，反成地主企业家的赘疣；于是就有人利用贩卖农奴为生，甚至于因为国家抽田税带着征收农奴税，农奴都是附于田地的，一亩田必定附有若干奴隶，买则同买，抽税则同抽，可是国家每十年方调查奴隶数一次，十年之内农奴虽死而税却仍旧要收；于是有一少年竟贩卖死奴隶的名籍，田主当然欢迎，他却只把这些死奴的契纸和田单到银行去押钱。书中写他走遍各地，如此的买空卖空，奸诈的心理，分析至于极微。就是地主的吝啬，心狠，也单就地主所住房屋，所穿服饰，和他会客的谈话里，描写得非常透彻。然而读者不但能看见这些心理的恶浊；著者本来就写着那人的心病历史，使读者觉得那人却曾有过光明的心理，而不情的环境逼他上这条路；读者不期然而然觉着他的可怜，而并不是只显得一味的可笑可恶，——那是尘俗的黑幕小说，而不是歌歌里的文学。文学的心理分析所以有社会的意义，亦就因此。

歌歌里的社会的意义还不止此。歌歌里初上文学舞台，

便以文学为服务社会的工具。社会里的一切罪恶，他都指摘出来；地主，官僚，妇女沉溺在旧社会的陷阱里，歌歌里描写他们的罪恶，便是指示社会复生的道路。《巡按》一剧，指摘官吏的贿赂公行，何尝不是使俄国社会自己认识认识自己的鬼脸；所以剧终时，戏台上的人对着台下说道：“笑什么！笑你们自己！”然而歌歌里的文学觉得有一种深切的信仰，信仰那平民的伟力。著者见着高等阶级的堕落，不得不向平民说：“俄罗斯呵，你亦是这样么？那走得这么快的，赶都赶不上的车子一直地往前，你亦能这样么？你的道路底下放着烟，你的桥底下轧轧的响动；还是这么落后，一切都赶不上人家……俄罗斯呵，你往那里去？”譬如，一个平庸的哥萨克女人，倒不比交际社会里的太太，她那“母亲的爱”超越一般的上等人。《死灵》里不但有奸诈的绅士，还有诚朴的平民，——那平民是歌歌里心目中的“全俄”，是他心目中的复生俄罗斯的天使呵。歌歌里的价值在于：一，现实主义的深入；二，心理分析方法的创始；三，人道思想的警觉；四，对于社会的服务，即指示当代的罪恶而号召道德的复生。

列尔芒托夫(Lermontov, 1814—1841)和普希金同时，他死的时候，普希金只死了四年。列尔芒托夫虽早死，而已经能大展他的诗才。他是普希金派，然而他也有自己的个性，特别的天才。——普希金派的言语都是普通有教育的社会里的活的言语；描写的方法都是自然的，正确的，列尔芒托夫的文辞亦有这种风格；列尔芒托夫所描写的人物比较地总是“特别的”而不是普通的，这都因为列尔芒托夫所注意的方向和普希

金不同。至于他的爱平民和爱俄国正和其他普希金派相同。他的为人和环境却有值得记载的：他早年失母，外祖母和父亲之间意见横生；他从小跟着外祖母，虽有外国教师，有富裕的生活，而幼年所受家庭间不和的刺激很甚，教师亦不能给他真正的精神上的教育，足以安慰他的心灵。少年时同辈之间也没有至好；他生得不漂亮，往往受女友的讥笑。他陆军学校里的同学，或者可以和他做个泛泛之交，然而他们的放荡生涯又足以使他一意孤往，厌恶侪辈；谁也不能做他的知音分受他的忧乐。他生性忧郁，小时很愿意和他的爱父同居，而身体却在外祖家里，那里虽然供应得很好，可是谁也不能给他深情厚意的抚慰。因此他从小就是沉默多愁；对于四围的环境，只看见它的黑暗方面。到少年时代，他更证实了，巩固了这种人生观；于是列尔芒托夫不期而成为忧时愤世的诗人，对于人心的失望，比他幼年时代更甚。列尔芒托夫对英诗人拜伦的同情，因此也就无足怪了；拜伦著作里的“英雄”实在是列尔芒托夫的同病相怜的知音。那种“英雄”，大半没有坚强的意志，然而忠恕待人，理想的道德生活太高；等到现实生活里暴露了人类的险恶卑劣，自然感受无限的失望，鄙视一切，而自己觉得是孤寂高亢，驾凌宇宙的畸人了。列尔芒托夫自己说他和拜伦一样，“是腐朽的世界里的畸零之人，不过是我有我的俄罗斯的心罢了”。然而列尔芒托夫和拜伦同样的想望那“强烈的自由的个性”。这是列尔芒托夫所以和歌歌里不同的地方，歌歌里在卑污尘俗的人心里，看见他那“人性”的根苗，列尔芒托夫，却自觉超越凡俗。列尔芒托夫的为人是如此，他著作里的

“英雄”亦是如此。

《当代的英雄》便是列尔芒托夫表现这种人物的最大的著作。——那书的主人翁柏雀林看着世俗的猥琐鄙浊而失望悲观，以致于玩世绝俗至于极点。其实柏雀林的性格有不少弱点，——他非常之高倨，利己，冷酷，甚至于对他极真挚的朋友亦是如此。然而柏雀林始终高出庸俗的环境万丈，因为他确是真实诚挚，决不讳造饰非；他恨极一切矫揉做作卑污鄙恶的行为；列尔芒托夫的描写，使读者感觉他那些矫激的愤世嫉俗的狂狷行为，确是为环境所压迫，不得不发的。再则，柏雀林学术渊博，思想深刻，于现实生活里确能透彻地看见自己和别人的过失，而对于人和事的评判亦的确真能够得到他的真相。柏雀林自己说：——他实在是“两重人格”，一个自发的行动，而别一个分析的观察；他这内部生活里的“观察者的人格”正能养成他那深刻强烈的情感。柏雀林始则用强力毅志，求得一高加索边境乔治亚^⑧民族的女子的爱情，然而不久便厌倦；那女子后来终被他的仇人杀死，——（那杀人的乔治亚人本来受柏雀林的骗而失心爱的马，又曾爱那女子；）——女子死后，柏雀林也就绝口不再提前事了。后来他又在高加索某镇遇见梅丽女郎，他并不爱她，然而他对于以尘俗恶劣的手段取得梅丽欢心的少年，却竭力破坏；少年恨他而造作谣言，毁谤梅丽和他的名誉；他于是和少年决斗，少年被杀，弄得梅丽有不得不嫁柏雀林之势，女郎的母亲亲自和他说；他却毅然拒绝而去。列尔芒托夫的戏剧《假面具》和歌辞《魔鬼》^⑨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柏雀林的种种化身。强盛的个性对于庸俗的抗议

声，——正是当时俄国社会欧化后的必然的现象。列尔芒托夫的抒情诗里，亦时时可以发见这种情绪。

列尔芒托夫的抒情诗在他著作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文辞的美不让普希金；而列尔芒托夫简短的“铁”诗更能镌入读者的心灵，使人感受他深切沉痛的情感；诗人的情感细腻而且繁复，他的诗境当然亦是如此。列尔芒托夫寄托他那高尚的理想于他的诗歌里，人心的映射只有这理想是最良善的；自然的景物感人，正是他能震动心灵生活的伟力；当然，如此之不满于现实环境，难怪诗人的想像里涌现出不可企及的将来，大多数的诗，都在于对人心的失望，厌弃现实社会的猥琐鄙污，而渴望光明。诗人不看见丝毫美善：——世俗已无高尚的人类理想，不能见到高贵的事业而有所愤发；甚至于连疾恶复仇的强烈的动象都没有；社会生活真正是污水一池，滞着不满，无善无恶的庸俗生涯！“诗境的幻想，艺术的创造，”离人们太远！预言家的诗人，苦心殚力地宣传“道德之复生”，反而遇有庸众的仇视；庸众对于诗，好似一柄锈蚀的宝剑，不过玩具而已。诗人高出于庸俗，他的忧乐既不能得丝毫的同情，自然觉得精神上孤寂不堪了！

因此，列尔芒托夫的诗，实在可以说是主观派的。他的诗思，一大半是研究他自己个性的好材料，而不是震动当代社会的思想。虽然，不但外表的文辞足以使列尔芒托夫成为普希金派中最突出的天才；就是仅仅他的个性已经是普希金时代俄国社会动象中的一个象征呵。

① 歌歌里(Н. В. Гоголь), 现译果戈理, 俄国作家。列尔芒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现译莱蒙托夫, 俄国诗人。

② 倍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 现译别林斯基, 俄国文学批评家、政论家。

③ 小俄罗斯, 即乌克兰。

④ 《旧世界的地主》, 现译《旧式地主》。

⑤ 《记伊凡伊凡诺维池怎样和伊凡尼契复罗维池相骂起来的!》, 现译《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一译《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

⑥ 《大衣》, 现译《外套》。

⑦ 《巡按》, 现译《钦差大臣》。《死灵》, 现译《死魂灵》。

⑧ 乔治亚, 现译格鲁吉亚。

⑨ 《假面具》, 现译《假面舞会》。《魔鬼》, 现译《恶魔》。

八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

尼古拉第一^①时代(1825—1855)俄国社会里对于自己的历史和将来,发生几派不同的观点。争论的出发点,就是彼得大帝维新政策的真意义。这种流派各自影响到文学上去,——因为那本是社会意识的自觉。当时总共有三派:一,政府的民族性论;二,斯拉夫派;三,西欧派^②。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同时却是和政府所主张的民族性论相反对的;后两派的功绩正在于警觉社会,提起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后来这些问题之中能解决的愈多,俄国社会的自觉也就愈深。

政府的民族性论以为俄国民族自有特性,比一切民族都好:——俄国民族有基督正教,有礼教的宗法社会;因此国家制度当然不能与西欧相同。俄国的正教,君制,民族性是伟大的力量,非此不能有荣誉的(?)过去,非此也无从得光明的将来。西欧的制度风俗与俄国却不适宜;一切维新政策都有些危险。这一派的见解简直自命俄国是文明礼教最盛的国家,更不用向西欧学步。当时此派见解是政府所赞助的,因此一切俄国式的野蛮状态:法庭里肉刑的残酷,言论的禁锢,贿赂的公行等等,都保存着文风不动;——那歌歌里的《巡按》,幸而有尼古拉第一亲笔批谕才准开演。虽然,当时的青年,往往因

研究哲学，渐渐结社集会相讨论，造成民间的理论努力：——一派成为斯拉夫派，一派成为西欧派。

斯拉夫派以为西欧正在崩坏之中，西欧文化的根底便是异教的；西方的教会要问世俗的政事（罗马），便抛弃了宗教的真正职务，仅仅有理智的劝谕。俄国受基督正教于维赞斯，向来不问世俗的政事，所以能尽力于热烈的信心的激发，信仰的情感普及于平民的意识，——决不单是理智方面的教义。俄罗斯的国家亦是所谓“根据于信任心的平民与政府之间和土地与国家之间的联合”。西欧有贵族，——出身便不平等；俄国只有勇士阶级，——是以个人的功勋取得尊贵的地位的，而不是靠出身的。平民之间有农村公社（所谓“密尔”，Mir）的组织，是俄国国家的基础；公社之中人人平等，皇帝仅仅是全国大公社的代表；向来平民有表示意见的权利（？），所谓“舆论的力量归平民，政权的力量归皇上”。斯拉夫派既然有如此的意见，所以对于彼得大帝的维新很表示怀疑。他们以为彼得以前，俄国自己本乎“俄国精神”而自然发展；彼得大帝强纳俄国历史于新轨。——然而平民之间总算还保存着俄国精神的高尚理想：平民的正统信仰（希腊教），密尔的农村公社，宽恕伟大的精神；——所以俄国之光荣的将来，正要恶化的上流社会融入平民，——那时，平民的理想便可得以复生。

斯拉夫派之间的意见，虽然各有短长，而大致如上所述。这派的代表便是霍蔑夸夫，亚克萨夸夫、吉联叶夫斯基兄弟。亚克萨夸夫极注意研究古代俄国历史；他很不赞成“彼得时代”的政策；注意大多数平民的利益，和深信平民的伟力，——

这是亚克萨夸夫的特点。吉联叶夫斯基兄弟却注意于宗教上哲学上的问题：希腊正教和西欧各派基督教的比较，正教则真正基督教精神。他们以为堕落的西欧文化只有正教足以救它。霍蔑夸夫亦很赞同他们的意见，而且他还是一个有天才的诗人，思想家兼历史家。还有华陆叶夫更想创造俄国的科学，以与西欧的相对峙，并且超过西欧。

斯拉夫派的事业确有伟大的意义：——他们提出许多历史上哲学上的问题，而想解决；那种解决方法，不期而引起真正科学态度的研究俄国问题；再则，他们指摘当时社会的缺点：反对一切非正义不人道的行为，攻击农奴制度；他们也居然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而且求它实现；他们是死寂的俄国社会的劲敌。虽然，他们理论之中含有无限的矛盾。——文学评论家安德联叶维池 (E. Soloviev-Andreevich)③说：“斯拉夫派的确是阶级的理论。斯拉夫派的最好的分子，都是可敬爱的旧时贵族阶级的代表……”

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刚刚相反：他们以为西欧文明对于俄国的历史，文学，教化，确有很大的意义。谁能否认西欧文化史中人类精神劳动的结果：对于个性，法律的尊崇；义务权利的观念；风俗习惯的文明；进步的倾向。彼得大帝的维新当然是俄国历史上的功绩而不是罪恶，是俄国文化接近全人类的文化的伟大的开始。西欧派代表茶亚达叶夫 (Chaadaev)④说：“应当说实话，彼得大帝的事业是很伟大的。他说的话真有深意：你们看不看见那样的文明，几许精力的结果；你们看不看见那些科学艺术，几世纪积蓄而来的？可是这些都可以

是你们自己的，只要你很少夸张自己的野蛮性……”

倍林斯基是西欧派的健将，他是俄国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个性的权利对于他是高出于历史，社会，甚至于人类。然而他同样尊崇社会的要求，“个性无社会便不成立。”歌歌里晚年反动，倾向于“俄国文化”派；倍林斯基便有一信给他，说他的《书札选录》^⑤里，那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见，很违反文化和人道的思想。倍林斯基极重视文学，他说：“文学是社会的自觉之文字的表现。”当时赫尔岑(Herzen, 1812—1870)，俄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家，社会主义家，正在海外(伦敦)办一杂志名《钟》^⑥，和倍林斯基相呼应。倍林斯基主持的杂志《现代者》和《祖国杂记》^⑦，亦竭力引起当时社会对于西欧生活的兴趣：有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的讨论，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界的新消息，以及社会改造理想(如圣西蒙，傅立叶等^⑧)。西欧派从事于翻译科学和文学的著作很多，更注意于美文作品之有社会的意义的(如让德，许俄，迭更斯^⑨)。

总之，斯拉夫派于历史研究方面，多所贡献；而西欧派除讨论历史社会问题以外，更注意于美术，文学，科学的通俗化。西欧思想表现于小说诗歌里，大足以辅佐俄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西欧派的文学家指摘现代的缺点，往往能引社会的注意于未来的高尚理想中的社会。

① 尼古拉第一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在位期 1825—1855)。

② 斯拉夫派，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哲学和社会思

想的派别。代表保守的贵族地主阶级利益。反对彼得一世的改革，把彼得一世以前的制度理想化，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幻想在农民同贵族、君主政体、正教教会之间维持一种封建宗法关系。西欧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俄国贵族地主阶级中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派别。认为俄国与西欧的历史道路是相同的，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

③ 安德联叶维池 (С. Е. Андреевич, 1866—1905)，现译安德列耶维奇，俄国批评家、文学史家。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纲》等。

④ 茶亚达叶夫 (П. Я. Чаадаев, 1794—1856)，现译恰达耶夫，俄国启蒙运动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⑤ 《书札选录》，现译《与友人书简选》。因内容系宣扬君主制度、宗教神秘主义和超阶级的博爱，并为农奴制的俄国辩护，所以别林斯基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严肃批判了果戈理的思想错误。

⑥ 《钟》，现译《钟声》。赫尔岑与奥加辽夫合办的报纸。一八五七年在伦敦出版，后移至日内瓦，一八六七年停刊。

⑦ 《现代者》，现译《同时代人》，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六六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祖国杂记》，现译《祖国纪事》，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八四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月刊。

⑧ 圣西蒙 (St. Simon, 1760—1825)，现译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 (C. Fourier,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⑨ 让德 (J. W. von Goethe, 1749—1832)，现译歌德，德国诗人、剧作家。著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许俄 (V. Hugo, 1802—1885)，现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迭更斯 (C. Dickens, 1812—1870)，现译狄更斯，英国作家。著有《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

九 农奴解放与文学

倍林斯基的个性主义其实已经与列尔芒托夫的个性主义大不相同了：——列氏的时代只有孤寂的高尚的个性，倍氏的动机，却已经有平民个性化的势力增长，求旧制度的改造了。前者是个性对社会的愤慨声，后者却是个性对社会的进攻，——资产文化的结果自然如此。倍林斯基《致歌歌里论书札选录》的信里说：“俄国现时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农奴制的废除，肉刑的停止，至少要求现有法律的发生效力。”俄国当时的环境往往使社会问题不得不用文学的语调，比较隐藏的词锋来讨论；所以农奴问题在俄国文学里映射得格外明显。其实在十八世纪，文学里已经涉及这一个问题。到歌歌里的《死灵》尤其显然；然而歌歌里只描写到地主的生活，而且还是穷乡僻县的所谓旧式的地主；读者只能笼统地感觉俄国农村生活的愁惨。——那还不是农奴阶级要求解放，或者农民阶级要求自由的经济之呼声。

尼古拉第一时代之末，社会意识却成熟了；即使还不能在出版界发表这种新思想，而在各种秘密结社里却已经很热烈讨论倍林斯基所提出来的问题。当时（一八四七年）亦就发现杜格涅夫（Turgnev, 1818—1883）和葛黎歌罗维池（Grigoro-

vich, 1822—1899)①的著作,与农奴制度大有关系:——如杜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小说《安东·歌联美嘉》,葛黎歌罗维池的《农村》。杜格涅夫的著作,描尽农民之间的各派人物;最初还只是对农奴的怜惜,后来竟就表彰农民里很有深思毅力的人,道德的本能非常之纯正而且敏捷,——他们却真能与自然融洽,宗教信仰很确定,忍耐刻苦的精神很高尚,而且往往有诗意,有平淡素朴中的艺术的天才(《歌者》);杜格涅夫更能解释这种农民人生观养成的原因,——细细地描写他们的环境。农民之间当然亦有不少堕落的分子;那却大半都是已经有较富裕的生活的,——俄国人所谓“怪骨的乡农”。至于地主的为人,杜格涅夫却描得庸凡暴戾,只有很少数是有人性的,杜格涅夫这些杂谈小说,对于农奴制度的内容,可以说揭开了几十重黑幕;农民的蠢笨愁苦和忠实诚朴——显然地证实农奴制度的不可不废。

杜格涅夫的传奇长篇小说更能进而描绘农奴解放时代的俄国社会,——那贵族,地主,青年等的“时代情绪”。如:《鲁定》,《贵族之巢》,《前夜》,《父与子》,《烟》,《新地》②。贵族之间当时亦有一种运动;所谓“识时机者”的杜格涅夫,他每一部小说出来必定能写出当时这种运动里的一派人物。杜格涅夫的天才在于客观性的严格,——他向来对于无论那一派调的人都不知褒贬,而只是写生的描画。俄国当时社会的自觉,在杜格涅夫的文学里,确有圆满的映影。

龚察罗夫(Goncharov, 1812—1891)③亦和杜格涅夫一样,是农奴解放前的俄国社会之写生家。他的传奇小说《平常

的故事》，《阿蒲洛莫夫》，《悬崖》描画当日的俄国农村，和这种农村制度里的旧派人物。然而龚察罗夫所描写的青年却不得劲。不过他的才亦在于客观的形容，而且非常细腻精致。

从杜格涅夫和龚察罗夫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俄国智识界的通病，就是所谓“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的现象。

当时贵族青年的教育往往是二重的。一方面，照着旧式的“老法子”：——一群奴仆捧着，保姆，师傅，同年伴围着；在这种环境之中，他从小便觉得是个“人上人”，怠惰而骄傲。父母只知道叫他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劳苦着。幼年时看着父兄的模样，自己早已认享福是当然的，利己主义深入骨髓。譬如阿蒲洛莫夫长大了，听见他当差的把他比别人，就要生气，“他不是‘别人’，‘别人’是要做工的……他长到这么大，却从没有自己穿过袜子。”别一方面，譬如《贵族之巢》里的菲独尔却偏偏受极严厉的教育；科学呢，只研究些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等。甚至于学铜匠；这种教育，又是一种极端，“使小孩子的头脑里弄得乱七八糟，勉强而且矫揉做作的很！”总之，当时的教育是没有系统的；所以阿蒲洛莫夫进了大学之后，渴望着智识，梦想着为社会服务，而始终出不了寂静的家庭生活；菲独尔亦是如此；而鲁定更竭尽心血地组织学生自修会，赶紧出国留学。青年时代过去后，进了社会，他们这种人能做什么呢？最有用的智识还只是大学里勉强研究到的（哲学，历史，美

学)。然而大多数只能做合于逻辑的深奥的辩论；实行的时候，却仍旧是手忙足乱，——简简单单的请客条子也写不成。那些辩论大半是抽象的；而当代社会思想就只停滞在抽象的题目。——这已经是跳出凡庸黯澹的灰色生活之第一步了。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阿蒲洛莫夫虽然有几千几万的改良农民生活的计划，而到头来还是一场甜梦；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菲独尔鼓着十二分的勇气，一遇着爱妻的变心，便心灰志堕。鲁定当他爱人娜塔勒雅毅然决然地问他“偕遁”办法的时候，他却弄得手足无所措，只有劝她遵从母命的一法。阿蒲洛莫夫也是遇着他的沃勒嘉而显得犹豫迟疑，始终不能听她那些“激将”的话。鲁定可以一面谈论风生，一面绝不注意他的谈风能影响到听者的心灵；菲独尔承认他记忆着自己的时候多，而很不注意别人；他遇见他的爱人丽沙，方才受很大的感动，而竭力改良他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再有实行。——他们心灵内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代的人呵。前辈和后辈的思想界限，往往如此之深刻，好象是面面相反的，——实际上呢，如《父与子》里的

“英雄”巴札罗夫等，虽然也是些“多余的人”，却是社会的意识之流里的两段而已。

然而，杜格涅夫和龚察罗夫的小说里，也不仅见这些消极的情绪。譬如《前夜》里的海仑和殷沙罗夫，《阿蒲洛莫夫》里的沃勒嘉，《贵族之巢》尾声里的菲独尔，便是著者的理想和热望的表示。假使在农奴时代这派人物还不过是一个空愿望，那么，农奴解放之后，俄国社会里起了大大的变化，那些实行家也就渐渐成为事实了。

① 杜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现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葛黎歌罗维池(Д. В. Григорович)，现译格里戈罗维奇，俄国作家。

② 《鲁定》，现译《罗亭》。《贵族之巢》，现译《贵族之家》。《新地》，现译《处女地》。

③ 龚察罗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现译冈察洛夫，俄国作家。下文的《阿蒲洛莫夫》，现译《奥勃洛莫夫》。

一〇 六十年代

俄国社会思想里的六十年代，大致从克莱摩战役^①（一八五三-五五年）算起，到一八六六-七〇年为止。其间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农奴解放诏书公布之日）是一个“蜂腰”。克莱摩战役之前俄国政府派的思想，所谓“民族性论”，以为俄国政制非常之好，沉迷不悟。这次俄土之战暴露了不少“俄国精神”：——贿赂公行，盗窃国库；对于法律没有正确观念，无所谓义务心，无所谓社会事业。于是政府不得已而改弦易辙，预备大行维新政策；民间杂志舆论也都要求解放农奴。农民解放了；一八六一年之后，破坏的思想完成了自己的事业，社会上又要想到此后的建设。

当时杂志界大放光华；对于俄国生活里的一切弱点攻击得不遗余力，——滑稽杂志尤其多，因为可笑的材料实在不少：——法庭，官僚，警察等等。大杂志如《现代者》和《俄国话》^②，更有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详尽讨论。赤尔纳塞夫斯基^③等的事业正在这一个时代。

六十年代的思想，大致在于否认以前的俄国式文化，而进于社会事业。社会和家庭之中，向来个性受着无数重的压迫：必须解放个性。个性压抑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一切宗教的

宗法的谬见；所以首先便要尊崇理智和思想的自由。于是对于一切怀了疑窦，对于一切加以批评。社会里对于自然科学的兴味不期而大增：一则要讨求人及自然的关系而定出新的人生观；二则自然科学增进考察分析的能力，可以渐渐免除武断，而得真正的智识。对于社会的病态，六十年代的人当然亦不能不研究。病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官僚的堕落，别方面也在于平民不能认清自己公民的责任。于是所谓共同的幸福，便成六十年的理想；必须造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个个分子都不受苦而且能享共同的福利。那时所谓贵族的观念，因有此种社会思想当然渐渐消灭，而发现所谓“平等职业者”——就是做社会事业的人，“各种身分的人”都是平等的。艺术科学一概只承认于社会是有益的；道德观念也应当完全根据于理智，而不应当偏于感情；——于社会有利的行为便是道德的。为着这些社会福利，所以争农奴的解放，男女的平权……假使说，六十年代的人有时过于偏激（如绝对否认纯艺术等），那么，这也是为反对旧派的斗争所激发的，并不是拿来作非笑六十年的话柄。虽然六十年代的人各有所注意，譬如赤尔纳塞夫斯基（Chernyshevsky）决定艺术对于现实生活的责任，描画理想社会，杜薄罗留白夫（Dobrolyubov）^④则以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正确与否为观点。皮沙联夫（Pisarev）^⑤就指示现实生活对于科学艺术的要求。然而大家同是要求社会的独立性之增加。

六十年代运动的代表在文学的著作里，要算赤尔纳塞夫斯基，柏蔑洛夫斯基（Pomyalovsky）和席勒-美海洛夫（Sheller

Mikhaylov)⑥。然而同时代的文学家也能表现一部份的六十年代。譬如龚察罗夫的《悬崖》和杜格涅夫的《父与子》。固然不错,他们两人往往不能得青年的真相,可是艺术家是诗人,——他们所反映的现实是已经滤过的。杜格涅夫的巴札罗夫只是六十年代中之一派(虚无主义者 Nihilists),而且是消极方面的;巴札罗夫以为凡是前辈所尊崇所创立的东西,一概都应当否认;对于艺术的爱戴,家庭生活,自然景物的赏鉴,社会的形式,宗教的感情——一切都是非科学的。然而他在实际生活里往往发出很深切的感情;足见他心灵内部的矛盾:——理论上这些事对于他都是“浪漫主义”。杜格涅夫看巴札罗夫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社会的人生观突变的时候所不能免的。然而巴札罗夫之严正的科学态度,性情的直爽而没有做作,实际事业方面的努力,——都是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

赤尔纳塞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呢?》——虽然在艺术方面并无很大的价值,然而作者指示个性与社会的冲突的解决方法。个性的幸福,决不是与社会的幸福相对立的,——个性的快乐,个性的生意,正在社会的幸福里。人看着四围环境的齷齪难受,难道心上能够舒服,难道便能安于私人的福利?他那小说里的英雄为着改善环境(社会)而自己牺牲呢。

柏蔑洛夫斯基的《市侩的福气和莫洛托夫》⑦,描写莫洛托夫一心只知道个人的福利,费尽心力,历受艰苦,居然得到了。——然而读者觉得那福气实在没味,就是莫洛托夫自己在目的完全达到之后,也只仍旧落得个“唉!多么气闷!”的结果。

席勒-美海洛夫有许多小说：《烂池》，《老巢》，《别人的罪过》等。大概他的作品能连结社论和美文为一。他的思想亦以为共同的幸福必定是可能的，理智的功能应当驾乎一切之上。批评家说，他的著作艺术方面太差，其实他自己说：“著作家不以描画为贵，而在乎有思想。有描画而没有内容，那算什么？只有艺术的形式而实在没有向俄国社会说出什么，那又有什么用处？”

六十年代还有沃斯德罗夫斯基(Astrovsky)①的戏剧；他的作品揣摩那旧式的和新式的官僚，理想家的官僚（《苦日子》），内地的演剧家（《树林》，《天才和崇拜者》），作恶的惯家（《狼与羊》）等。——大致是写十九世纪中叶和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生活。他第一个想到商界的题目，并且写及俄国内地（《贫非罪》，《雷雨》）。俄国当时的商人都是黑暗愚蠢而又凶暴；他们的威权之下：——妻子，亲戚，伙计，奴婢，一大堆巨属；这里竟看不见丝毫光明的朕兆：反抗的表示不是说谎和秘密作弊，便是自杀；商人对于智识道德没有丝毫见解和倾向，——对于有志者的一举一动反而引为笑谈。沃斯德罗夫斯基的著作大足以引起社会的注意；何况正在六十年代，那社会的新活力高涨的时候。俄国文学家没有不反对“市侩主义”的；而沃斯德罗夫斯基更是一员健将；而且他的著作仿佛预言着那七八十年代理想派的社会运动陷入市侩主义里的失败呢。

① 克萊摩战役，即克里米亚战争，亦称“东方战争”。一八五三年

至一八五六年，俄国和土耳其、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最后以俄国失败告终。

② 《俄国话》，现译《俄国言论》，月刊。主要刊载文论和政论。一八五九年创刊，一八六六年被查封。

③ 赤尔纳塞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现译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批评家。著有《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怎么办?》等。

④ 杜薄罗留白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861)，现译杜勃罗留波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著有《黑暗王国》等。

⑤ 皮沙联夫(Д. И. Писарев, 1840—1868)，现译皮萨列夫，俄国政论家、文学批评家。著有《十九世纪的经院哲学》、《亨利希·海涅》等。

⑥ 席勒-美海洛夫(А. К. Шеллер-Михайлов, 1838—1900)，现译舍勒-米哈依洛夫，俄国作家。著有《腐臭的泥沼》等。

⑦ 柏蔑洛夫斯基(Н. Г. Помяловский, 1835—1863)，现译波米亚洛夫斯基，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市侩的福气和莫洛托夫》，实为两部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和《莫洛托夫》，书中的主人公都是莫洛托夫。

⑧ 沃斯德罗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现译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剧作家。下文的《雷雨》，现译《大雷雨》。

—— 七 十 年 代

六十年代社会力高涨之后，就有七十年代的反动：一部分人以为维新政策不能满意，改造事业没有彻底；一部分反以为农奴解放及一切新政是“俄国”衰弱的原因。政府的镇压政策渐渐引起社会里积极派的抑郁的情绪。当时就又有新派的人物出来——社会里是如此，文学里亦是如此；这时的时代精神便是所谓“忏悔的贵族”，因为六十年代以来大家承认祖先苛刻农奴是罪恶，所以智识阶级自己觉得所受的教育，衣食都是欠农民的债。极愿意走近些看看农民，帮助帮助他们，自己牺牲家庭的幸福，上等人的特权；对于农民的劳动忍耐刻苦都认为是神圣的。那解放农奴不过是还债的第一步；连智识阶级自己的“复生”也得赖神圣的劳动。“往民间去”^① 一则自己安安良心，二则学习学习“农民世界”里的原理（密尔的农村公社，劳作协社，家庭手工业），——那时理想中的社会关系。

于是所谓“民粹派”^② 就发现：他们以为俄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有另一途程，超越资本主义而立达社会主义。固然，民粹派的所谓“平民”，大半是抽象的理想，常常把富裕的怪骨乡农当做平民。然而往民间去的运动确是亲切知道平民需要的方法，而且可以宣传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思想。其实“亲切知

道”平民的文学，在六十年代已经开始，譬如列维托夫，联塞德尼夸夫，纳乌莫夫，当时农民的社会已经为此等著作家描写得很透彻：农奴制度虽然已经废除，而农民受乡村官吏，富农，商人的欺侮压榨，所处地位，实在艰苦；即使读者看见农民酗酒游荡的恶现象，也不禁表同情而发怜惜的情感。他们几个人开始的文学事业到七十年代便成时代的总流。

七十年代最出众的文学作品便是 乌斯屏斯基 (Uspensky)③的《苦工》，《小孩子》，《地之威权》，《没有自己的意志》等等。乌斯屏斯基游历俄国内地，看见各地乡村里的情形，而所得感想非常之难受。他的意思以为智识阶级和农民离得很远，好象说的两种言语，你不懂我，我不懂你，——两者之间的人生观不相同，精神上的需要不相同；智识阶级接近农民的尝试始终失败了！乌斯屏斯基描写农民的“密尔”，并无丝毫理想化：“大家赞颂的公社（密尔）制度既不能免孤老鳏寡的劳动，又酿成作恶的棍徒，甚至于偷盗放火，而农村公社随意的乌合之众实行审判这些罪犯；——这种制度真在崩坏了……农民的‘自治’里原来没有丝毫社会力。农民第一件心事便是要钱。”那些慳骨的乡农专门重利盘剥贫苦的农民，仍旧使他们堕入经济的奴隶制度。乌斯屏斯基的深意在于那民粹派所以为理想社会的基础的“密尔”公社，——其实是很平常的生存竞争的工具，譬如蚁蜂的群君；到现在经济发展的社会里实在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农民生活的作家还有兹拉托夫腊德基 (Zlatovratsky)④，他的思想和乌斯屏斯基差不多。他亦是不恭维高等阶

级，仅只看重智识界的能俯就民众者，而对于俄国的农村却并不存什么理想。他固然没有乌斯屏斯基那样悲观；然而他亦觉得农民之中传染城市市侩生活的份子确实是公社崩坏的象征。

萨勒斗夸夫-史赤德邻 (Sartykoiv-Schedrin)^⑤ 亦是这时代的明星。他是所谓“社论学的美文家”——他的作品之间最注意的是社会问题；此等作风是七十年代的特征；小说里已经不写整个的一种“派调”，象四十年代的似的；而只写一个一个的问题。社论家的美文家往往先有一种理想，而后用文学的描写从侧面衬托出来。史赤德邻的著作很多（《内地通信》，《一个城的历史》等等）；他的著作都是当代社会生活里最紧迫的问题。大致他的文调是滑稽派的，对于黑暗的社会拚命的嘲笑，嘲笑之中却还带着哭声。尤其是七十年代的作品，描写那农奴解放后地主（《塔什干的老爷》）靠着国库赎地的钱，荒淫恣乐，那种堕落的神态真是俄国社会的疽痍。

迦尔洵 (Garshin)^⑥ 在七十年代更占一个特别位置，实在说来，他的作品适应当时问题的很少，然而全人类的总理想是他的文学创作的特征，——那是七十年代道德思想的结晶。当时正是自我牺牲、仁义、人道，共同福利等思潮高涨的关头，——迦尔洵便取这种倾向，可是他自己更加以反抗恶念的道德精神。他的作品《四天》和《胆怯的人》经过爱国教育与人道精神的剧战，心灵里才放得稳一个新人生观；而《红花》里的“英雄”费尽心血，方才摘去那万恶凝化的《红花》。然而迦尔洵的拒恶非战并没有光明的遥远将来理想做背景。所以他一

篇《说那未曾有的事》的小说里，写着人蹂躏死许多和和平平谈着话的蚂蚁，——他不禁堕入悲观，深信世界的事都是偶然的。这种情绪确也可以代表一部分的《七十年代的人》。

七十年代思想的科学渊源，出于六十年代的腊符洛夫(Lavrov)，而继腊符洛夫的便是美海洛夫斯基(Mikhaylovsky)^⑦。美海洛夫斯基是民粹派的社会学家，他的思想最足代表七十年代的社会情绪：“我们明白了，认识人类的正义和人类的理想全靠着平民几百年来所受的苦难。我们并不负这些苦难的责任；亦不因为靠着他们的受苦而我们能享受教育，便是我们的罪过；——譬如鲜红的花，吸尽了植物的精华，并不因此便算是花的罪过。虽然我们譬如这花，偶然的命运如此，使我们多所取于过去，我们却不愿意再取之于将来……我们已经觉得我们是平民的债户。也许平民的真理里并没有这一条债据，然而我们的事业和生活里首先便记着这件事，有时并且是无意之中的。我们可以来争辩债的多少和还债的方法，然而‘债’总已经搁在我们良心上，我们愿意还这个债。”这番话便是七十年代的精神，不过应当说明，美海洛夫斯基的所谓“平民”，不仅限于农民；他亦有一篇小说《转变中》，写忏悔的贵族“感觉着自己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负着重任”。其实忏悔不是个人的，而是当时的社会自觉。

① “往民间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提出的口号，它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

② “民粹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

小资产阶级派别。他们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但无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③ 乌斯屏斯基(Г. И. Успенский, 1843—1902), 俄国作家。

④ 兹拉托夫腊德基(Н. Н. Златовратский, 1845—1911), 现译兹拉托夫拉茨基, 俄国作家。著有《农民陪审员》等。

⑤ 萨勒斗夸夫-史赤德邻(М. Е. Салтыков Шедрин, 1826—1889), 现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俄国讽刺作家。

⑥ 迦尔洵(В. М. Гаршин, 1855—1888), 俄国作家。

⑦ 美海洛夫斯基(Н. 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1842—1904), 俄国社会学家、民粹派理论家、文学批评家。著有《什么是进步》、《英雄与群氓》等。

一二 平民运动与六七十年代的文学

十九世纪后的下半期，俄国文学大盛；文学的作品非常多，内容亦非常之丰富，读者社会也就大大的开展。这兴盛的原因却并不在于文学派别的多，变化的速。从歌歌里以来现实主义的道路大辟，直到二十世纪的初年并没有十分大的变化。现实主义有时稍加变更而成所谓“自然主义”，——不是文学的创作而仅仅描写模仿环境，文学成为摄影。这一派仅仅略盛于六十年代，此后稍有天才的作家必不愿单纯的模写。所以原因不在于此。文学的兴盛却在于它能表现生活。赤尔纳塞夫斯基说，艺术应当为生活服务，为现实指针，那时文学才有“社会的意义”。六十年代俄国社会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对于唯物哲学的倾向大半亦反映于文学；只有很少几个作家取题材于较远的对象。读者，亦往往忘掉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只要他能谈着当代之问题而中肯。譬如小说《怎么办呢？》以及席勒-美海洛夫的作品都是如此。因此，可以问一问，文学所能贡献于社会的多少？他反映十九世纪俄国的社会思想到多大的范围？

俄国六十年代开始的平民运动一方面受文学思想的促进，别方面却超越前一辈的文学思想而更进一步。——农奴

解放运动实在于经济现象里的客观的必然，社会意识随之而激变；旧时代的贵族青年“往民间去”是无意之中执行起那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使命。稳健的四十年代的文学家如杜格涅夫，龚察洛夫等早已落后；他们的著作所描写的青年往往引起误会，——有好几部小说很受当时革命青年的批评。虽然，杜格涅夫等的文学里至少也有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的大概的映射，并且是很沉痛的社会的自觉。

当时的著作家确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扩大文学的范围，发见“平等职业者”，——就是各种身份的人对于贵族文化的抗议声。当然，那四五十年代的文学家不能领悟到这等人的心灵的需要，不能体贴到这等人所经受的苦痛。新时代的文学显然反映各种新阶级的心理。六十年代的文学大致表现城市里的智识阶级生活；七十年代的，——却注意于农村平民及其与别的阶级的关系，除上两节所述的文学家外还有小名家：如沃摩列夫斯基，萨莎第摩斯基，罗仁，赫复施岑斯嘉女士等，都是这一个时代的精华。他们虽各有特长，而实在同是六七十年代思想的前驱。

六十年代的思想，最主要的便是实行建设新生活，——新生活的进攻旧制度，真是一场恶斗，而这种斗争恰好在文学里得有圆满的反映。文学里和现实里的英雄都奋发勇猛的向着旧思想进攻，——当时社会上养成一种特别的所谓新派青年，否认一切旧宗教，旧宗法社会的谬见，只承认纯正的科学，唯物论的精神非常彻底。妇女问题到此亦有新的解决；四十年代俄国初得文明社会的妇女观，以为“她”是神圣；如今却明明

白白地答复“她既不是奴隶，亦不是神明”；——那妇女神圣观，实在说来，是封建时代武士道的剩迹。于是关于妇女解放和家庭问题，同时翻四十年代的旧案，那时以为家庭是神圣的天职，双方的贞操非常之着重；六十年代的人却不能容受。婚姻仅仅是“知心”的结合，不但“有计算的”婚姻不合真理，就是心理变更之后的勉强结合，都是不应当的。所以小说里往往着意描写自然的爱，每有故意解除旧婚姻去成就新恋爱的。宁可公开的解约，不要弄到私奔。至于亲子关系的问题亦更进一程：儿女的自由当然要更加扩大，父母应当放任子女自由选择职业；可是同时子女完全依赖父母养育也引为可耻的事，应当自食其力。文学里关于这些问题，很注意地描写；那时代的小说里的“英雄”，往往都是和旧社会奋斗的青年。——不论是成功是失败，无不深切感动读者，暗示社会问题解决的趋势。俄国那时经济动象里的激变，竟假手于文学而转变那社会的思想和关系。

平民和智识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便从实际运动中显露到文学思想里来。平民生活映射在乌斯屏斯基等的小说里显得非常惨淡。七十年代时描写平民生活的作家便更进而解释困苦的原因和民众心理的背景。民粹派的“密尔”于是渐渐脱去理想中的幻影，而显露崩败的朕兆；赤裸裸的表现实在情形，引起批评的态度。——平民的黑暗，要求智识阶级的指导。那“忏悔的贵族”往民间去还债，惊醒平民，要求社会改良，或者简直预备改造社会。所以从“民族的”民粹派到“平民革命”的民粹派，——就表现那时社

会情绪的激发程度,可以分出不少等级,这些运动在文学里的反映,如杜格涅夫的《新》(郭沫若译为《新时代》^①)以及乌斯屏斯基和兹拉托夫腊德基的作品,都很明显。可是社会自觉的猛进又急转直下而另有一个方向去发展了。

^① 《新时代》,现译《处女地》。郭沫若译的《新时代》,一九二五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署郭升堂译。

一三 托尔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

俄国社会思想从七十年代起，已经发露反动的潮流，——那是西欧派大胜后的尾声，却亦是俄国社会进化急速的复影；资产阶级文化战胜贵族阶级文化的过程里，突然添入无产阶级文化的热血，那时徘徊中途的小资产阶级，心慌意乱激而退走，“遁入古俄浑朴之乡”，这一派的代表便是托尔斯泰(L. Tolstoy, 1828—1910)和朵斯托也夫斯基(Dostoevsky, 1821—1881)①。

托尔斯泰是有名的两重人格：一方面他是艺术家，别一方面他又是哲学家道德家。他的著作几乎显然把他的人格分成两截，转弯的开头便在七十年代末。然而实际上考察起来，他第二期的思想在第一期里已经伏流：实在并没有转弯，——不过第一期是用的艺术的言语，第二期——却是抽象的哲学术语而已。

他的《儿时》②，《少年》，《青年》里的“英雄”已经有分析考察的伟力；还没有经受实生活的痛苦，他就竭力增进自己的精神力量：幻想着，可是一遇见现实，那幻想便失所依据。他的根本思想却始终在“人应当向着至善，这种倾向是可能的，容易的，并且是永久的”。《地主之晨》③及《哥萨克》里，更加明

显地表示不满意于现生活，不满意于普通人所谓幸福，所谓生活的目的。《哥萨克》小说里的“英雄”，住在哥萨克之间，差不多只知道自然景物；“这与鹿豕游”的生涯，使他断定：“幸福——就是这个！——就是能为别人而生活，这是很明显的。人生来便有幸福的需要，当然这种需要是合理的。可是要想利己的满足幸福的需要：去求富贵，名誉，生活的舒服，恋爱的快活，那却亦许为环境所限，永永不能尽如所愿。可见是这些奢望不合理，而并不是幸福的需要不合理。怎样的愿望，便可以不论环境如何都能圆满呢？怎样的？博爱牺牲！”

托尔斯泰有四篇论战争的小说，比迦尔洵的尤其深切：——向来战争在小说里是描写英雄功绩的布景；到托尔斯泰便不同了：——“野花繁茂的平原上满堆着死尸；可是那光华的太阳却照着蔚蓝的海面，闪烁着金色的阳光。几千万人聚在一块，看着说着，大家微笑着相见。这些人，这些基督教徒，宣传着博爱和牺牲的正道，如今看见自己做出来的这等好事，难道对着那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畏死，并且爱善和美的人（上帝），不要突的跪倒，垂着乐生欣幸的热泪，互相拥抱，象兄弟似的么？”

一八五七年他出国游历，堕入西欧的市侩主义，更使他的人生观巩固，而觉得文明的可耻。他曾经有一次看见几百人住的华丽旅馆前，有“乞丐的歌者”，不但这些富人一个钱没有给他，甚至于还要戏弄嘲笑；他以为“这决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社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恶象”，所谓文化，决不应当扑灭人心里的爱火。

托尔斯泰的大著作，第一便是《战争与和平》，描写十九世纪初年的政象和当时反抗拿破仑的“祖国战争”。历史上的真英雄之外，还可以看见许多俄国旧式的地主……然而最可以注意的便是这小说里的“幻想的哲学家”彼埃尔。彼埃尔的幸运不佳，精神力量确是很伟大的，可惜不能运用，不能对于自己和亲人有所成就或补助。基督教义和现实的恶象之间的矛盾，使他不得不厌恶生活，愤世嫉俗。他遇见平民的人生观（农民扑拉东），就不由得他不顶礼膜拜；他因此深信个性的微小，——那命运的恒轨和理智的伟大到如今方才发见。《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上的价值非常之高贵，——所描写的人物又多又精细，托尔斯泰的文才，正因此而能在俄国独树一帜。

《安娜·嘉联妮娜》^④里的列文亦和彼埃尔一样，——他觉得小心灵上的“内斗”，只有平民的人生观足以救济。虽然《安娜·嘉联妮娜》的题目很广泛：著者要借此解决当时许多社会问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之中的地位（安娜的变节），个人幸福的权利等等，——然而重要的是“寻求人生的意义”；不但列文一人，就是安娜，安娜的情夫符龙斯基，都在经过心灵的内斗。尤其看得出是著者自己人生观的激荡：必定要“浑朴健全，恬静心安”，方得稳定，——妇女们当然要解放，可是纵欲放恣……

托尔斯泰的《忏悔》^⑤发表在一八八一年。他说对于西欧文明早已怀疑，到如今方才决定：人生的真意义只能到普通的平民跟前学，——他们有特别的内心的正义。此后他便做了不少论哲学和道德的文章而自己建立新的哲学系统。托尔

斯泰的基督教只有道德的一方面，其余一切仪式文句完全否认。他以为基督教义应当改革人心，首先便应当使人人行简单的生活，有宽恕的精神，不参与生存竞争，不抵抗恶。

哲学的研究使他渐渐放弃艺术的创作，而且他已经以为文学是奢侈品，不应当做的。然而始终“艺术欲战胜”，——他晚年还有天才突显的作品：如《伊凡之死》^⑥，《黑暗之势力》，《教育之果》，《主人与工人》，《复活》。这些作品里亦处处发露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念：以为现代社会里的生活无意义并且无目的，深信道德的内力，号召生活的简单化，提倡劳动的生活，爱自己的亲人，真正的自由，——脱离文明世界一切礼教的束缚。

然而托尔斯泰的晚年始终已经成一新宗教的教主，而不是文学家了。他的“生活简单化”的学说不能行，他的独断式的“俄国文化”论就引起批评的“俄国文化”论。托尔斯泰的独立的民粹派，却有朵斯托也夫斯基的神奇的斯拉夫派与他并行。

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里是独立的；朵斯托也夫斯基亦是独立的。朵斯托也夫斯基并且亦不满意于西欧的文明，亦寻求人生意义的“究竟”于内心。可是托尔斯泰只涉及个人道德，他却不轻视一切社会政策，每每有意论及。朵斯托也夫斯基的著作亦可以分做两截，前一期是在社会主义的秘密结社里的时候，后一期在他流戍西伯利亚之后。

前一期的作品大致是模仿歌歌里的；譬如《穷人》里不但人物与歌歌里的相似，就是文调作风都有些相同。此等小说

的“英雄”大致是“胥吏的无产阶级”，——彼得堡的小官僚，——穷窘，堕落，孤寂，无他保证，他们的命运一任上司的喜怒，以致于有病态的心理。他在这些“恶人”里看得见人性的爱火。此等“各种身分的人(职业平等者)”的生活，朵斯托也夫斯基非常之熟悉；而他的艺术创作便是个性反对畸形社会的抗议声。心病的人是他创作的题材，他的描写，——一直到他的长篇传奇小说里都是如此，——确实能胜任，而且深刻邃远，好象灵犀澈照，能洞见现代社会的底蕴。

他流戍西伯利亚，当兵做苦工，得与平民生活切实接触，——一方面锻炼他的真性，别方面也就引起他自己的心病状态。

他的大著作(《罪与罚》，《魔鬼》，《白痴》，《少年人》，《嘉腊马莎夫兄弟》^⑦)有大致相同的艺术方法，并且可以看得出他的动机。外表上这些小说都不容易读，文字艰涩，冗长，挟着不少长篇的议论；小说中人的议论见解都互相仿佛，显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然而心理的分析细察毫毛，这种伟力可以掩过他艺术方面的缺点。他的哲学问题亦很广泛，——小说中人和著者自己都想解决“上帝”和“人的个性”的问题。

朵斯托也夫斯基的上帝问题处处都可以遇见：《嘉腊马莎夫兄弟》里的伊凡想调和现在的恶与创世主，——以为总有幸福的“大智”在；《魔鬼》里的吉黎洛夫又想把上帝的意志，和个人的意志相同。——“我即上帝”；上帝问题确与道德问题相联结，所以朵思托也夫斯基往往用深刻的文学言语描尽道德律的矛盾冲突。问题是提出来了，可是不能解决：——朵斯托

也夫斯基寻求上帝，而不能证实。个性意志自由的问题和上帝问题同等地难解决。《罪与罚》里的腊斯夸勒尼夸夫却解决了：——他把人分做两类：一种是平常人，应当守普通的道德规律的，还有一种是威权者可以蔑视那些规律的。然而他犯罪之后，自己觉得是“簌簌抖的浊物”，也一样是个平常人；他的爱人，一个娼妓，苏涅劝他“受苦自赎”罢！这里意志自由问题的意思，绝对和普通哲学里不同，他深入几丈呢。

小说《魔鬼》是对当时（七十年代）极端的革命青年的警告。朵斯托也夫斯基梦想光明，而对于反抗黑暗的革命运动指摘出不少不可免的污点，他亦不赞成革命青年的政见。他晚年的政见偏于斯拉夫派：——平民之间隐藏着伟大的道德力，俄国的平民是“上帝的负担者”；智识阶级应当融化入平民队里，——不用学那朽腐的西欧文化。朵斯托也夫斯基以为俄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传布基督教真义于全世界，便能担负重新宇宙的大事业。现代的智识阶级离平民太远，必须克制自己的“我”，为平民去服务。他的思想的根据和托尔斯泰相仿佛，而他的表现方法却大不同，——他有神秘的宗教主义，反个性主义，同时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没有“叛乱的个性”。

总之，托尔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的伟大开人类文学史的奇彩，决不是俄国所能专有的；可是他们的伟大，正在于艺术的真实，反映当代俄国社会之“沉痛的心灵”：——清高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一天一天的崩坏，成了普通的雇员，如何受得了那酒肉熏天的市侩气，农村制度日益受城市商业的恶影响，更

须要求精神上的维系；——然而一盘散沙的，小农小工，那里有去恶的伟力，只能认识认识自己的“善”，当做安慰，当做抗议罢了。

① 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即列夫·托尔斯泰，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现译陀思妥也夫斯基，俄国作家。

② 《儿时》，现译《童年》。

③ 《地主之晨》，现译《一个地主的早晨》。

④ 《安娜·嘉联妮娜》，现译《安娜·卡列尼娜》。

⑤ 《忏悔》，现译《忏悔录》。

⑥ 《伊凡之死》，现译《伊凡·伊里奇之死》。

⑦ 《魔鬼》，现译《群魔》。《少年人》，现译《少年》。《嘉腊马莎夫兄弟》，现译《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四 八九十年代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的革命情绪经托尔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而渐就沉闷，——正因社会生活已经渐渐形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所谓“俄国文化”，无论怎样歌颂，始终一天一天的消灭，只剩得爝火微光了。所以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绪”刚刚和前二十年的相反：——七十年代末，就已经觉得以前的社会力的兴奋渐就衰颓，而来了一种说不出的烦闷。原因不仅在于政府压制一切社会运动，并且亦在于革命界对于前几年的社会运动的失望。切实些说，六七十年代的兴奋和牺牲精神，与实际生活相接触，其结果竟不能满当时理想家的意：——平民并没有“爱平民者”所理想的那么高尚。理想家不由得觉着黑暗的势力非常浓厚，他们对于平民的观念亦不准确，——反抗黑暗不是一辈人所能胜任的。史赤德邻和乌斯屏斯基的著作里就已经有所谓“浊物”来了！什么浊物？就是俗不堪耐不肯动弹的市侩，他们无所谓理想，无所谓道德，无所谓事业，无所谓新，——只知道赚钱，赚钱，赚钱！农民里又何尝不是这等人居多？如何不失望呢！所以八九十年代的俄国社会情绪，随着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而堕入市侩主义，文学里便亦有所反映。

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能继承五十年来的伟大精神的，有白白缕金(Boborykin, 1836—)，郭罗林科(Korolenko, 1853—1921) 柴霍夫(Chekhov, 1860—1904)，哥尔基(M. Gorky, 1868—)①。

白白缕金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六十年代；然而他天才的发展正在这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是所谓“无时”的时代——一切都是灰色的，一概都是瞞眈的，一天过了又一天，何尝有什么不同，还有什么时间可言！他善于表现这种社会情绪，他亦是“识时机者”。他却比杜格涅夫还敏捷，那时社会生活里的纤毫变化都反映出来，可是只有外表的形式，而没有里面的意义，这是因为他的时代使然；他的个性亦倾向于自然主义。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半路》，《晚上的牺牲》，《办事家》，《中国城》等等。他的文学确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退落：——贵族社会里文化的衰败，贵族式的农业的破坏；农民商人间的新闻人物，——新的社会力量现在已经在资本家，专求“市侩的福气”，而且进而有征服全社会的气概。他亦不放过过去时代的余迹：那幻想家的贵族青年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相较，简直是生活之流所刷上岸堆的浮草了！

郭罗林科是当时最博学，最高超的美文家，他的人生观，他的眼界都在当代社会的文化程度的最高点。他的特征在于：——他竟能从七十年代承受人道主义的思想，不论环境怎样变更，社会生活怎样流动，他竟能使小说中的人物适应已变的环境表现这种“广爱”。一则著者能在“人”里发见人性，二则著者对于寻求公道的人表热烈的同情，不但正义的公道，而

且还是真理的公道，——人生的目的。“在坏人的社会里”，只有小孩子还能得着诚心的抚爱，可是也渐渐地想着那极端的矛盾：——那些“失意的”人群里而偏偏有理智健全性情真挚的人！最感动人的小说《盲音乐家》里描写从小就瞎的“失意人”，既有音乐的天才，又有高尚的道德，——读者不由得觉着所居的社会怎样的冷酷无情，怎样的沉闷。其余的小说如《林响》^②，《旧灯》等，亦是如此。郭罗林科可以算是平民心灵的表现者，譬如在《马嘉尔的梦》^③里，读者可以知道半野蛮人尚且有如此高尚的人性，如此要求公道的热忱。平民受着万重的压迫：极亲近的邻居，稍稍有几个大钱便能欺侮人，——他们当然奋激要求公道，即使不知道怎样去求，他们却无论如何不能信公道没有。郭罗林科的小说大半描写平民，只有两三篇小说，说着智识阶级，——他的作风已经和七十年代不同，他的平民是抽象的，不是俄国的农民。他最后的巨著《现代人》^④尤其证实他这“广爱”的倾向，——可惜到一九二二年还没有完全出版。

柴霍夫亦是八九十年代文学界的花冠。他真是自己时代的代表，那市侩主义的时代！——白白缕金只有外表的描写，柴霍夫却弹出当代的“心曲”。读者遇着他的文境，总要沉着地细想方才觉得“时代的缺憾”，——他的作品和现实生活膈合，然而能使读者想起：“是这样，是这样！那又怎样办呢？”柴霍夫是“无时”时代的诗人，是“情绪的作家”，正因为当时的情绪普及于人人：——大家都觉着现实生活的尘俗，没有高尚的理想，还自以为尘俗生涯是当然的。柴霍夫象歌歌里，可是亦有

很大的区别：歌歌里嘲笑，而柴霍夫使人家嘲笑，他不过写生罢了；然而读者也笑不出来，那“柴霍夫式的情绪”传染着人，只觉得沉闷，沉闷，要求个结论；再则歌歌里的文体是完全的，有起有收的，柴霍夫却是画龙点睛地从现实生活中截来一段。这是柴霍夫文学的特点。他的文学生涯分成三期：

第一期，他正在穷苦的时候，替各杂志做滑稽的短篇，写实的天才就已经特出，然而厌恶尘俗的情绪还没有充分发露。第二期，他独立地预备正经的文学创作，那时是他文中最开展的时期：——现实生活的黯澹渐渐显露，所描写的题材也渐渐开广；觉着著者所得的难堪的感想：“看看这种生活：强者的纵恣逍遥，弱者的愚蠢勤劳，四围都是不堪的穷乏，窄隘，死亡，酗酒，作伪，说谎……我们看见那些人到市场上去买东西，日里吃，夜里睡，说些废话，娶亲，老病，死，好好的葬进土里去；然而我们不看见也不听见，受苦的人，可怕的事，不知道在那幕后怎样的发生，怎样的消灭呢。”这“无时”时代的理想，正象那《伊凡诺夫》里所说的：“挑这么一件事，不触目的，黯沉沉的，没有鲜艳的色彩，没有震耳的声音；不要一个人和几千万人去恶斗，缩在你的蟹壳里，做你那上帝给的小事”。然而《伊凡诺夫》并不足以表示作者的意见，作者决不能满足伊凡诺夫的“小”福气。第三时期，柴霍夫的作品（《第六号舍》，《三姊妹》，《华涅叔叔》^⑤等）渐渐显明新幸福，好生活的理想，——不但是几个人的，并且是全人类的幸福！现实生活里没有根据可以希望好的将来，然而应当自己动手做去，那好的生活总是要来的：“好时代总是要来的，新生活的晓霞总是要放光彩

的，公道总有伸张的一天，——我们街市上总有这一个佳节！我等不到了，我快要干枯了，然而总有些人的重孙重重孙等得到这一天。诚心诚意的恭祝他们，替他们欢喜！”（《第六号舍》）这一种信仰人类进步的思想是第三期的柴霍夫的特征。可是那新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究竟怎样便能得到新生活，——柴霍夫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所以有一个文学评论家说，柴霍夫晚年作品里的英雄，——并不是真正能勇敢地号召人类为将来而劳动；而是渴望幸福，又处于恶浊的现生活里，只有劳动可以自慰，可以暂时舍弃沉闷的思虑。

哥尔基的真姓是彼施夸夫(A. M. Peshkov)，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年。在最短的期间他便引起了读者社会的注意，而模仿他的人就很多，——特立的自成一派；这是因为他在艺术里说出了“新话”，——一变文学的风气，从农民生活转入城市劳工生活。八九十年代社会里觉着一般的空泛沉滞，正在急急乎要新生活，——圆满些，有内容些。哥尔基的小说里发现了新的“派调”，新派的人物，——社会地位很低的，贫民栖流所里的人，“出脚汉”^⑥，“过去的人”，他们正是当时社会的对症药。社会恶浊尘俗，拘束在繁文缛节里，——哥尔基的英雄恰好是不顾一切繁文缛节的，要什么便做什么，社会里没有强盛的气性，——哥尔基的“英雄”正是强盛的气性，有力量，虽然还并不能做实际事业，可是对社会的抗议声便是他们力量的表现；社会里已定的秩序很“宝贵”的，一部分为琐琐屑屑的经济关系所束缚，——哥尔基的英雄却洒脱一切物质生活的锁链，甚至于轻视那“啃面包的农民”的市侩主义，——

心心念念只记得饱暖，有什么事业可做！总之，哥尔基是反对市侩主义的健将，——他不仅止于显示平民的人性，求高等阶级的怜惜，更且进而指出平民的威力，足以颠覆高等阶级的恶浊社会。他的平民是“游民的无产阶级”，他的文学是所谓“出脚汉”的文学。哥尔基的作风，书卷气重而艺术性刚直，他的写实天才决不愿为现实所束缚。他的“出脚汉”或许是现实生活里所不能有的，他亦并不愿现代社会都成“出脚汉”，然而他的抗议声却只有借那出脚汉之口高呼出来，——已经稳定的资产阶级文化早已完全丧失当年反抗贵族制度的精神，“将来的世运在无产阶级手里了！”所以哥尔基的反对市侩主义比柴霍夫激烈得多。他早年的著作，凭着这种艺术史上的“新话”大得胜利，几乎成为时髦。后来他的大著作：《歌尔狄叶夫》，《底里》，《三个》^①，《母亲》等，渐渐为读者所厌；其实他的文学精采却在此不在彼。哥尔基根本的意想并没有变，所变换的是描写的背景和题材；譬如《歌尔狄叶夫》里写商人，《野蛮人》里写智识阶级，《三个》，《母亲》和剧本《底里》写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可是他最后渐渐想望“新的智识阶级”，以为个性应当超越庸众，超越现实：“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信什么，自然有什么”（《底里》），他以为新的智识阶级应当为个性自由，为社会幸福的信仰而斗争。他于是渐渐离开“出脚汉”而走进智识阶级。

① 白白缕金(П. Д. Боборыкин, 1836—1921), 现译波波雷金, 俄国作家。郭罗林科(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现译柯罗连科, 俄国作家。柴霍

夫(А. П. Чехов), 现译契诃夫, 俄国作家。哥尔基(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 现译高尔基, 苏联作家。

② 《林响》, 现译《林啸》。

③ 《马嘉尔的梦》, 现译《马卡尔的梦》。

④ 《现代人》, 现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⑤ 《第六号舍》, 现译《第六病室》。《华涅叔叔》, 现译《万尼亚舅舅》。

⑥ “出脚汉”, 即“赤脚汉”, 指社会底层的人物。

⑦ 《歌尔狄叶夫》, 现译《福玛·高尔杰耶夫》。《底里》, 现译《底层》。《三个》, 现译《三人》。

一五 社会运动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

智识阶级的问题还好久不能解决呢。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本来结合两种智识阶级：一，“平等职业者”，二，“忏悔的贵族”。忏悔的贵族的动机是道德的，——还平民的债，这是平等职业者所很表同情的；可是平民生活的改善，在平等职业者却是权利的动机。虽然，他们有共同政纲，就是社会改良，——“仅仅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于是个性的能力能否改良社会，便成了当代的问题，——美海洛夫斯基和臘符洛夫等的“历史中的个性功能论”居然成了当时社会运动的南针。可是自平民运动进于社会运动却还太早呢，——七十年代之后，小资产阶级式的平民运动，暗杀，暴乱，往民间去等，客观上促进资产阶级文化的稳定过程，逃不了反动潮流，——“社会性”的沉滞。那时不但市侩，就是农民也有些讨厌这些“学生”了，——稍能饱暖的，已无农奴制度的束缚，正要赚钱，赚钱，赚钱，那里容得你来捣乱！于是七十年代的答案：“历史是个人造成的，‘时代精神’是思想家的情绪所结合；政局时势为政治家的行动所左右，”——到现在八十年代却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七十年代的英雄（个人）挥不得“鲁阳之戈”^①，他们的目标在于社会改良，而所得只有政治的形式。并且新兴的资产

阶级已成社会活力，他们却刚刚与民粹派的精神相反，——道德的动机，爱平民的良心，他们丝毫都没有。个性的威权于是只能在文学里表示抗议，——尚且只有愤慨，只有指斥八九十年代的恶浊沉滞，——英雄式的功绩在小说里都消灭了。

可是资产阶级永久带着他的“影子”(无产阶级)走。一八九一年突然起一波澜：俄国大饥荒惊起社会的沉梦，八十年代的“渐进论”势力衰败下去，而进化派的声浪又高涨起来。劳工运动的自然生长分裂当时的智识阶级成两派，——又是一次“伟大的分裂”：一派是民粹派，一派是马克思派。于是社会思想里重新发生不少问题。——如个性的功能，“密尔”公社的意义，俄国的农民阶级与“密尔”公社，俄国经济发展是否经过资本主义，智识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等等。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进化的实况：经济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要因素，——生产力的状态，逐步进展，使阶级的划分和斗争演化而成历史。个性的功能只有融化在群众里方才显现，——个性为现实生活所涌出而不是个性的自由意志能左右历史。个性若能现实化，群众化，——适于现实环境的经济动象，——能“捉住历史的枢纽”而不空想斡旋天地，那时他的功能便成为阶级的，那时他方能在客观的历史行程里促进社会的发展。民粹派和马克思派的争论，——虽然在当时大多数智识阶级倾向于民粹派，——实际上是马克思派胜利的：——劳工运动的秘密进行，使社会生活里发见不少新现象；一方面警觉当时沉滞的社会意识，复现不宁的情绪；别方面又有这许多事实，使民粹派不得不承认俄国资本主义之不可免。

九十年代的文学正受着这些问题的影响，依阶级的心理可以反映出种种畸形的空前的新象，——可是还没有发动，那都在“地底下”！“文学界”里只落得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旧时代的余迹和着八十年代的沉滞空气以及革命前的惶恐或愤发的心绪，都安安稳稳地凑在一起。

当时的小名家如马明-西伯利克^②，亚勒白夫等，还保存着六十年代的理想，描写中下阶级的生活，即所谓“平等职业者”；可是只觉得“公民的冤气”出不得，高尚理想的最终胜利已经只在梦幻里隐隐地引着人生。郭罗林科独得七十年代的广爱主义，和个性权利的歌颂，也就孤寂得很。再则还有波塔屏科，斯美尔诺华女士等作家，也只努力于心理的描写，索性离恶浊的生活远远地站着。这都是“无时”时代的精神，和着旧时代的余迹。

托尔斯泰在当时是独立的鲁殿灵光^③，然而他亦受社会潮流的激荡，趁着那八十年代黯澹的“时代情绪”，领袖新式的宗教运动，——专论道德问题，人生意义，自省功夫，——恰好是这“社会的隐居”的旧世界的代表。现世界是无望的，未来世界又看不见，只有回响，回响旧世界！这是当代的消极情绪：厌谈阶级斗争和政治改革等问题，因为那旧世界本来没有这样魄力；可是现世烦闷得很，——且说说内心的“体贴话”再好没有。

最进，便有伏流中的新力量，可是亦笼罩在阴沉的雾里，譬如白白缕金，柴霍夫，哥尔基等作品里的英雄。白白缕金的“市侩”只知道物质生活，资本积累，享福……所以要做“人上

人”的兽欲却很强。柴霍夫的“市侩”大抵出于智识阶级，从事于黯澹的琐屑生活，不再见高尚的理想，力量已经用尽了。哥尔基的“市侩”却更精细奸狡，是吸人血的猛兽毒蛇。反对市侩主义，反对市侩主义！“文化生活……已经是一件做得非常之坏的衣服，不称好好的人的身……市侩揉弄它，弄得它窄狭不堪了。”（哥尔基）。智识阶级的文化使命，原来如此而已！

可是新的力量之外，还有更新的。那却有些可怕：它或者能救俄国社会，或者简直扫荡一切，连那“新力量”一起刷个乾淨。

① “鲁阳之戈”，鲁阳是战国时楚国的县公，传说他曾挥戈使太阳返回。《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扞（挥）之，日为之反三舍。”

② 马明-西伯利克（Д. Н.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1852—1912），现译马明-西比利亚克，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等。

③ 鲁殿灵光，灵光，汉代宫殿。东汉王延寿有《鲁灵光殿赋》，序云：“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之所立也……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后因借称硕果仅存的人为“鲁殿灵光”。

一六 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与旧文学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①了，那年十月的总同盟罢工显示了那所谓“更新的”力量。其实惶恐的和祈求的神态早已遍于各阶级，不宁的情绪正激荡着社会，因此，这第一次的十月革命前后十余年，文学界里的思潮一时伏流，一时显现，——特别有一辈人代表那时种种色色的情感。这可以说是从哥尔基起。

“时代之末”只有科布林(Buprin, 1870—)^②梦想着乌托邦，只有薄宁(Bunin, 1870—)^③还爱着“好心肠的俄国乡下人”，——那快要来到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资产阶级不敢自信：与其革命，还是乌托邦好。然而社会思想已经渐出深渊而发现突起起伏的大波澜了。

九十年代中间，已经开始有所谓“颓废派”(Decadents)。就形式方面而论，从杜格涅夫以来的清丽明晰的俄国话，到颓废派便一变而成晦涩的辞藻，——这种“近代主义”(Modernism)本在于寻求文学的新形式：歇后语，转弯语，比喻，寓言，——象征主义(Symbolism)。市侩主义的末流，初期的平稳行程已过，——社会里觉着政治经济的大发展，求达资本主义的雄心，确又需要强烈的个性，可是已经不是民粹派的个

性，而是资产阶级的个性。所以那近代主义的内容就有许多求保证现存制度的“新”人生观，——主观上却以反对现政治现社会做第一步。资产阶级的文化发展，在俄国一开始便是尾声：——反对政治，反对道德，或是非政治主义，非道德主义，实际上不是反对而是不问政治和道德，——纯艺术主义；那就比乌托邦更进一步，至于“俄国的乡下人”当然没人过问了。第一期的近代主义的内容是如此。

俄国社会的颓废，由于资产阶级发展的受障碍受限制，——只急于向外拓展，那俄、日之战的准备，吏治的整顿等，正是病急乱投医的政策。可是俄皇政府的半农奴制度决不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使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又日增无已，社会情绪渐渐紧张起来。诗人尚且歌咏：

各地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我们的威权，我们的意志和力量。

在这最后的斗争，是我们的佳节，打仗！

谁不同我们，便是我们的仇敌，应当死亡。

明斯基(Minsky,1855—)当年断定“将来的宗教”一定判决社会民主党是魔鬼；现在他的歌声却比“布尔塞维克”的还要激烈。近代主义的第二期，那西欧的新形式又和俄国的旧内容相融合：成就这为平民服务的象征主义。为什么？——俄国社会发展里的两种新力量膨胀不堪，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恨不得要无产阶级立刻兴起，替他扫荡障碍；无产阶级亦勇猛前进，催促着市侩，高举着赤帜，——且颠覆俄皇政治的束缚：

“自由是你们要的，我们难道还客气！”——文学思想的新潮，便是这种呼声所引起的。

然而一起一伏的波澜正是从八九十年代沉闷的浓雾里渐渐显现的。我们要从安德列叶夫(A. Andreev, 1841—1919)^④说起。安德列叶夫是纯纯粹粹的近代主义者，他的作品当时称为“文学的梦魇”，愁惨，黯澹，沉闷；他的小说和剧本里的人物的动作，好象是阴影，——那阴影还大半在浓雾里呢。他的题材实在是人类互相的不了解，不亲热，——残酷的孤寂(《窗前》，《默》，《黑暗的远处》)。死神的呼吸充满了宇宙；尼采的《萨腊图斯德腊》^⑤的名言：“假使你的生活不幸，假使毒虫侵蚀蒙蔽你的心，你可知道：死总死得成的，”——安德列叶夫的文学便深入这种哲理。然而安德列叶夫的文心比西欧象征主义更加孤寂：易卜生和梅德林克^⑥的人物还有凌驾尘俗的个性；安德列叶夫的却都只是抑遏不舒的气息。

那时是俄国城市文明的初起；近代派的文学家渐渐脱离“无谓的孤寂”而觉察现实。于是有布留梭夫(Brysov, 1873—)^⑦咏叹城市生活；他的“石匠”造着监狱，似乎预先觉得自己的儿子要进这监狱呢；他每每能运用工人随口歌唱的“急调”入诗；城市文明在布留梭夫的诗里显得怎样的可厌，然而那里面伏着很大的伟力。布留梭夫并且能在近代派所最心爱的“性交问题”里取出“母的秘密”，显示那乐生的意义。亚列克谢宜·托尔斯泰(A. N. Tolstoy, 1882—)^⑧和布留梭夫有同等的天才，可是在诗的形式方面却各不相同，——布留梭夫自己有特别的诗的技术。巴尔芒德(Balmont, 1867—)^⑨呢，他虽亦是

积极的近代派，可是他往往可以只咏抽象的：“无涯”，“永久”，“高”，绝口不提现实生活，他是汎神论^⑩的诗人；然而他亦说：

工人呵只有你是
全俄国的希望呵。

梭罗古布(Sologub, 1863—)^⑪却不同了，他只有受苦的呻吟；那是“魔的文学”；固然亦是对现社会的抗议声，但是他的抗议没有丝毫“爆发愤恨的魔气”，只是奄奄的奄奄的。对社会的抗议，本来亦可以“和平”的，然而结果始终是用“剑”。——米里慈可夫斯基(Merezhkovsky, 1865—)^⑫，他最初恨不得是君主派，而后来竟成了宗教的无治派；他的《不是和平而是剑》里说：“那些孤独太早的无治主义派，象巴苦宁，史谛纳，^⑬托尔斯泰，尼采，——不过是山巅，日光所照的；山下，还正是漫漫长夜呢，——无量数的穷无所归的兄弟们，全世界的劳工平民，是将来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军营。我们相信，早晚俄国革命的巨声总要惊醒他们的，……”当年绝端的个性主义者女诗人黑普斯(Hippius, 1870—)^⑭曾经说过：“爱你自己象爱上帝一样，”现在也和米里慈可夫斯基取同样的态度了。革命的力量多伟大呵！

“近代派”的第二期，综合以前惶恐不宁怨叹抗议的情绪，——要求一种高亢辽远的理想，“以个性非个性的”“似革命非革命的”布洛克(Blok, 1880—1921)^⑮的《美妇人之诗》简直想重新立一信仰，那信仰是否革命就不得而知了。他亦是

“城市诗人”，然而他的描写极活，创造之中还可以见浑朴天真的诗意。只有白内宜(Andrey Bely, 1880—)^{①⑥}，他那“诗人的心灵”愈觉得现实，愈觉得革命的潮势，就愈不能了解宇宙，他说是“文字之穷”，——其实是前进，后退，踟蹰不决的神态；因此，他的文意格外羞涩懦怯。伊凡诺夫(Berey Vyacheslav Ivanov, 1866—)亦是如此，他很懦怯地只管歌颂辽远的“真美”，以为远远的理想比切实的理智容易安慰得多。至于萨遗切夫(Zaytsev, 1881—)更把当代的生活描画成象征的总体；他真是汎神论派，消灭一切差别：生死，老少，人兽都是善的目标。他能在十几页里描画出人生的真谛；然而幻想……幻想！……

总之，以上的诗人文学家都还不过是旁观革命，吸着革命空气的；他们既不能比五十年来光荣的文学，隐隐地引着革命青年；他们更不比身与其事的革命文学家，甚至于反革命的。譬如阿志巴绥夫(Artsybashev, 1878—)^{①⑦}就不同了。他的革命文学，——是无政府的个性主义融化在群众之中，——他的《沙宁》的言论趋向于极端的非道德主义，固然是剧烈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反动；然而，他写《朗德之死》，那朗德却是朵斯托也夫斯基的《白痴》之后的唯一的利他主义者。就是萨文夸夫-路卜询(Savinkov-Ropshin, 1880—)^{①⑧}的《灰色马》，虽说含着反革命的意义，始终沉浸在革命运动里，——能表现当时革命者的畸形的心绪，确有“艺术的真实”。至于维联萨叶夫(Veresaev)^{①⑨}一九〇一年发表的《转弯角上》，那就已经是第一次十月革命前劳农阶级内部显然划分两翼(社会革命党

和社会民主党^①)的写照；那时革命军营里的空气十分紧张，一部分人惊惶失措，——都是极亲切的“时代问题”。然而除这几人外，二十世纪的文学差不多完全卷入象征主义的虚无飘渺之乡。只有当时的潜势力，——劳工阶级的诗人柏塞勒夸(Bessalko, 1887—1920)真正认识那第一次的十月革命之意义。他自己亲身经过革命，流亡逃亡，转辗而到巴黎；方才着手著作一部小说：分《古兹基的儿时》，《无意之中的方法》，《突变》，《生活》，描写无产阶级儿童经过千辛万苦，自己觉悟而投入革命运动。他的文才虽还没有十分发展，然而这部著作的结构极有意思，用的是极简单美丽的俄国话，没有丝毫所谓“近代主义”的雕刻气；深入，沉着而且真挚……他后来的著作《东方的金刚石》更表现他幻想的天才，他从写实到象征，——可是处处都有无产阶级的情绪，——那不是资产阶级式的颓废的象征主义，而是显示无产阶级的“宇宙感觉”的象征主义。

从第一次的十月革命到第二次的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二三十年之间，诗文界的“象征”是很明显的：——幻想的乌托邦；孤寂的梦魔；任性者的狂呼；预觉者的啜嚅；受伤者的忏悔(反动)；奋斗者的回忆——“无产文化”的基础；——无非是革命潮里的反映。可是俄罗斯旧文学的时代也就随之而终了了。我们要看光华灿烂的俄罗斯文学之复兴吗？可以！第二次十月革命会给俄罗斯文学以复兴的机会……

①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历)，沙皇政

府枪杀彼得堡请愿工人的事件，激起全国各地工人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十月，爆发全俄政治大罢工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同年十二月，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莫斯科等许多城市爆发武装起义。由于缺乏统一行动，起义遭到失败。

② 科布林 (А. И. Куприн, 1870—1938)，现译库普林，俄国作家。著有《决斗》、《陷阱》等。

③ 薄宁 (И. А. Бунин, 1870—1953)，现译蒲宁，俄国作家。著有《兄弟》、《乡村》等。

④ 安德列叶夫 (Л. Н. Андреев)，现译安德烈夫，俄国作家。

⑤ 尼采 (F.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萨腊图斯德腊》，现译《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哲学著作。书中借古代波斯的“圣者”扎拉图斯特拉宣扬“超人”学说。

⑥ 易卜生 (H. J. Ibsen, 1828—1906)，挪威剧作家。著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社会问题剧。梅德林克 (M. Maeterlinck, 1862—1949)，现译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著有《青鸟》等。

⑦ 布留梭夫 (В. Я. Брюсов, 1873—1924)，现译勃留索夫，苏联诗人。著有《石匠》、《第三个秋天》等。

⑧ 亚列克谢宜·托尔斯泰 (А. Н. Толстой, 1883—1945)，现译阿·托尔斯泰，苏联作家。著有《苦难的历程》、《粮食》等。

⑨ 巴尔芒德 (К. Д.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现译巴尔蒙特，俄国诗人。

⑩ 汎神论，一种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的哲学观点。宣称神即自然界。曾流行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西欧，代表人物有斯宾诺莎等。

⑪ 梭罗古布 (Ф. К. Сологуб, 1863—1927)，现译梭罗古勃，俄国作家。著有《小鬼》、《死人的魔力》等。

⑫ 米里慈可夫斯基 (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6—1941)，现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哲学家、批评家。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等。

⑬ 巴苦宁 (М. А. Бакунин, 1814—1876)，现译巴枯宁，俄国无政

府主义者。史蒂纳 (M. Stirner, 1806—1856), 现译施蒂纳, 卡斯巴·施米特的笔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著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

⑭ 黑普斯 (З.Н. Гиппиус, 1869—1945), 现译吉皮乌斯, 俄国女作家、诗人。

⑮ 布洛克 (А. А. Блок, 1880—1921), 现译勃洛克, 苏联诗人。下文的《美妇人之诗》, 现译《美女诗草》。

⑯ 白内宜 (А. Белый, 1880—1934), 现译别雷, 苏联作家。

⑰ 阿志巴绥夫 (М. П. Арцыбашев, 1878—1927), 现译阿尔志跋绥夫, 俄国作家。

⑱ 萨文夸夫-路卜询, 即波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文柯夫 (Б.В. Савинков, 1879—1925), 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下文的《灰色马》, 现译《瘦弱的马》, 是他以维·罗普申为笔名写的小说。

⑲ 维联萨叶夫 (В. В. Вересаев, 1867—1945), 现译魏烈萨耶夫, 苏联作家。著有《医生笔记》、《绝路》等。下文的《转弯角上》, 现译《在转变中》。

⑳ 社会革命党, 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一九〇二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他们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 主张保留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其左翼曾组成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 承认苏维埃政权并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 不久后因进行反苏活动被粉碎。社会民主党, 又称社会民主工党。这里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成立于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三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始建成领导机构。一九一二年第六次党代会驱逐孟什维克出党后形成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一九一八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五年后改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简称“联共(布)”。

一七 俄国的诗(一)

“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是赤俄新时代文学的灯塔。然而新艺术观的创造，正和政治的变革一样，要经不少磨难，无限斗争，方能得到。俄国自来就有“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争。文学评论里的辩论尤其注重于诗，——因为诗是文学作品中纯艺术性最浓的。我们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和俄国的文学评论，就不得不先专述诗，尤其是抒情诗；假使抒情诗是纯粹的艺术，尚且不能不涉及人生，那么，艺术的意义就自然决定了。固然，以上所述俄国文学里的“小说”“歌辞”“戏剧”，以至于最近新时代的“诗”，已经足以证明这一个争端的结果；然而纯粹艺术和人生艺术的问题，——以这问题的发生到这问题的消灭，——很有特别论述的必要。

为艺术的艺术，俄国的文学评论界里往往称为“纯粹艺术”；而为人生的艺术，——“公民的怨”，“人生的歌者”，其实这种分派，很不明晰。譬如六十年代是社会活力蠢动最甚的时代，那时就是所谓“纯粹艺术派”的诗人也不能不涉及当代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人生的实际，强使诗人的心灵有所反响。同时，人生艺术派的诗人，也常常厌弃生活的淡薄，于自然之中寻求真美，寻求人心兴感的奋发。所以只能依诗人情

绪的偏向，约略划分人生派和纯美派。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的诗人很多，亦就是因为一则普希金之后“诗境”与“实境”相融洽，二则因为社会生活，如瀑流喷溅，实在丰富。当那平民的运动激厉猛进的时候，差不多“大家不喜欢诗，可是独独宽容一个涅克拉梭夫”，——这就显然是因为他最能鸣“公民的怨”。

涅克拉梭夫(Nekrasov, 1820—1877)①是“民间苦的歌者”。他一生坎坷困顿的时候也不少，正因此而他能格外亲切地感受到平民的痛苦。当四五十年代，农奴制度还没有废除，涅克拉梭夫所经受的痛楚，——不但是诗人的，而且还是公民的。那时他说，“那真不是写述的时候：实在空无所有；”然而他实际上已经表示伟大的同情，发无限的愤慨：“报答那平民的压迫，俄国的思想只剩了呻吟的半声”。尼古拉第二解放农奴②的时候，俄国社会隐隐有了希望，涅克拉梭夫的声音便更勇猛了：

歌颂那给自由的人呵，平民！
平民的命运——首先是幸福，
是光明，是自由……

诗人明明知道，农奴的解放还不足以尽免平民的不幸，——因为“又想出了不少别的锁链，代替农奴制度了”！他虽然极端地表同情于农奴，然而却也不遗忘地主。并非地主的物质生活要他关心；他亦是六十年代思想的代表，崇尚理智，——所以专注意的，却在于贵族的有思想的青年。他理智的评判，以

为这些青年智识阶级可惜都是“多余的人”，“当代的英雄”，只会啃着书本，周游列国，而实际上找不到切实实行的机缘，其实他们放着能做的不做……那虽是为后一辈积蓄创造力的人，然而他们自身：或者，无意之中只顾得个人的安宁（《大门口的思想》）；或者努力勤劳只做得琐琐屑屑的小事，譬如社交的模仿，时髦的追求（《马沙》）；或者又是幻想的改造社会的英雄，——可亦和“十二月党”的命运相差无几。他只信仰真正的平民农夫里，有新的力量突现，才能切切实实地为平民事业而牺牲：

那天性不是无才的，
那半边还没有死掉；
看平民里有多少
可爱的人便可以知道……

平民的将来固然如此，然而现在正是“泪少苦多，无底之河”；“农村的苦正在崩坠的大劫之中”。——农人农妇诚朴的勤恳的劳动和力量，枉然消磨在久已“忘了的乡村”里，——那正是涅克拉梭夫愤慨，高歌，不能自己的。

朴列史赤叶夫（Plescheev, 1825—1893）^③的诗和涅克拉梭夫很相象：同等的社会理想，人道主义；不过他的情绪不仅是悲悯，而且还愤发勇猛。他少年时的诗就说：

俄国里多生些高尚纯洁的
寝馈于社会幸福的人罢……
奇伟的故乡之上再不要黯澹了

理性和智慧之日，——那神圣的
真理之日呵……

农民的自由，值得他歌颂，可是他号召俄国的文化军勇猛继进，“扫除一切恶鄙和黑暗”。那卑琐的“市侩的福气”当然要受他的呵斥，他真是人道和光明的诗人。他虽是人生艺术派的诗人，其实他爱自然间的诗境不弱于纯美派；不过他总以为诗的责任决不限于纯美，而应当成为社会力，满足当代的精神需要。

纳德松(Nadson, 1862—1887)^④亦是“人生之歌者”，然而他的情绪是一味的深切的伤感，而并不刚健壮勇。他和迦尔洵一样，觉得世界上的恶鄙尘俗苦痛，实在容忍不下，可是他自认当时一辈的文化使者实在没有能力扫除万恶。所以他的诗里充满了嫉恶而又柔弱的人的悻怨的意境：

我的声浪这样微弱；我的心却准备着斗争，
可是没有青年的新力。胸中——苦闷的悲叹；
口中——殉道的壮骂；而心上总痛得不堪：
我是奴隶，而不是预言家。……

纳德松对于横受苦难的人不能奋勇地呼号，只能低声的安慰：

你信总有一天，恶神华亚儿要灭亡的，
那时世界之上，重新有爱情来呀！……

可是应当知道：纳德松本来就绝对不知道乐观，对于正义胜利

的希望在他也是很模糊的；所以大致他的诗都是“怨声”。

其次，还有尼吉金(Nikitin, 1824—1861)^⑤，从小穷乏，——他的诗里便有穷愁的叹声；他自然成为人生派的诗人，——歌吟农民生活的苦痛，正是他自己所身受的，所以尤其显得亲切：

你，这运命的恶力，
穷愁的琐屑，可怕！
你好象雷声，不一下
便打死人；你进来呢——
地板且先微颤，
渐渐的渐渐的震压，
那牺牲呼号宛转咨嗟……

尼吉金是农家诗人，和自然常相陶冶，可是他处处“人化”那景物，而且死于痲瘵的成衣匠，苦于重利的农家，也老不容他专心咏叹那自然的美，逍遥自在。

塞夫陈科(Shevchenko, 1814—1861)^⑥却是一乌克兰(小俄)的诗人，然而他的文学可以通行大俄。他与平民非常接近，他自己是农奴；所以他的诗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几十年来的“可恨问题”还禁得起他的呼号！他的巨著《加德璘》之外，抒情诗里亦可以看得见诗人的故乡小俄怎样的美丽，又怎样的受苦。大致他的诗才在于活泼而又忧伤的情感，特别鲜艳的美丽，——是人生派与纯美派之间的诗人。

① 涅克拉梭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7), 现译涅克拉索夫, 俄国诗人。

② 这里应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俄历)被迫签署“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 废除农奴制一事。

③ 朴列史赤叶夫(А. Н. Плещёв), 现译普列晓耶夫, 俄国诗人。

④ 纳德松(С. Я. Надсон), 俄国诗人。

⑤ 尼吉金(И. С. Никитин), 现译尼基丁, 俄国诗人。

⑥ 塞夫陈科(Т. Г. Шевченко), 现译谢甫琴科。下文的《加德璘》, 现译《卡泰林娜》, 谢甫琴科的代表作之一。

一八 俄国的诗(二)

纯粹艺术的观念,虽说貌似所谓“希腊式的异教文明”,而在俄国却反有偏于东方文化派的;譬如邱采夫(Tutchev, 1803—1873)①。他的诗恬静到极点,“一切哲理玄言——都是谎话”。纯任自然,歌咏自然,——他的人生观亦偏于斯拉夫派。

亚嘉·托尔斯泰(A. K. Tolstoy, 1817—1875)②就是纯美派的健将。他的诗离着现实生活的瀑流很远,静悄悄地美丽天真。然而亚嘉·托尔斯泰有时亦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而对于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有热烈的诚挚的歌叹声。他固然能领会:

那溪流之上的柳丝私语,
那美女流盼的倾倒吾人,
那星光闪烁,那宇宙的一切美……

他却亦深感豪杰的伟业,不是为着“声华垂誉”,而是“为那穷愁的渔夫群众”;他以为诗人能“奋起抗拒一切不正义和虚妄”,便当受天帝的奇赏。可是他在虚无主义的“季世”,否认一切真美的潮流里,实在努力为艺术,为永久的美而奋斗:

……我们快到岸上，是战胜波澜的凯旋者，
居然抱着我们的神圣，走出那千回万漩！
无尽的始终胜于有尽的，
信仰我们神圣的义务，
我们就激起逆流，反抗
那顺流而忘返的！

亚嘉·托尔斯泰本着这种态度反对虚无主义，拥护“纯美”；他在政治上介乎守旧与自由之间的进步派；对于宗教，亦反抗那独断论，而赞成容忍主义，宣传人道和内省；于民族问题却高张国粹文化的旗帜，同时爱和平……总之，他虽是纯美派的诗人，对于政治社会，却是不能漠然的，他的情绪，正足以表现他那唯心的高洁的贵族胸襟。

马依夸夫(Myakov, 1821—1897)却比亚嘉·托尔斯泰的纯美派的色彩更浓厚了。他既是诗人，便远远地离开骚乱烦杂的生活，而从自然界里采取天赐的诗料：

天地间神秘的和谐，你不用想，从圣贤的书卷里去
猜度：

梦里烟波立岸旁，独自徘徊，偶然间心云深处试听
那芦苇萧瑟的低语；那声音好不寻常，
你须感受须了解……自然的同声相应，
不期然脱口吟哦，诗声和着芦声，恰好似天乐相激
荡……

自然和生活的美念都受诗人的陶融；他呼吸宇宙间的奇气来

助艺术家的创造。马依夸夫的作品，亦有间涉到史实的，那就诗人笔下的英雄，真是包涵万象，尽情地倾出作者对于理想人格的深意。

波龙斯基(Polonsky, 1820—1898)的著作大半是倾向于纯美派的；然而亦有些诗咏叹“那人生的公怨”，而且诗才纵横，不见得弱于人生派诗人。再则波龙斯基能运用极自然的极简朴的诗料，取之于民间文学；——因为他曾经困苦颠连，一则能和平民相近，二则经受心灵上的千锤百炼，所以“美”的纯洁确有不可及之处，——他能对于人和生活都保持那漠然无动于中的态度。

善洵(A. Shenshin, 1820—1892)是最纯粹的纯美派。他不顾一切人生的“尘俗”问题，“烦苦扰攘”的社会问题；而只咏叹爱情和自然之美：

我谨谨慎慎地保持你的自由，
不是神圣的，总不听他近前，……

善洵对于“自然”纯粹只取他的艺术方面；对于爱情描写得恬静温柔。他的诗料似乎只限于这一点。那生活的黑暗方面，他好象闭着眼不曾看见。殊不知，几千万万人生长在这黑暗里，何况正是那黑暗，正是反抗那黑暗的斗争里，有的是诗境！可是善洵曾经译西欧的大名家的诗（如哥德的《浮士德》等），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这亦是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功绩。

二十世纪以来，这一个问题已经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消

灭了，——他没有解决，亦不用解决。如今谁也不是纯粹艺术派，谁也不是人生艺术派。人生和艺术能分得开么？——若是人生可厌，却实在丰富得很，诗境万千；若是艺术无用，几千年来的人却赖它而生存，所谓“精神的宝藏”还不过为人而设，而人生的究竟目的除艺术而外还有什么！那时社会运动在初起的时候，急进的用艺术夺他的青年，反动的藉艺术保障心灵的安宁罢了。如今呢，“时代已非，歌曲的音调也就不同了。”

① 邱采夫(Ф. И. Тютчев), 现译丘特切夫, 俄国诗人。

② 亚嘉·托尔斯泰(А. К. Толстой), 现译阿历克塞·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 俄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一九 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对象是批评美术文的作品以至于普通的文学著作。文学评论有很大的用处：一则可以使读者知道文学家所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二则可以使作者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所选的题材究竟适宜不适宜，他的作品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俄国文学评论的观点很有变更，有时只以艺术方面着眼，有时却更求文学的“社会的意义”。——本来文学评论的要着，就应当先问批评者的观点。

十八世纪的文学评论家，如德联期雅夸夫斯基，洛莫诺莎夫等，——只讲究文字的优美简要，或者峭洁平易；在内容上必须能令读者愉快，要是能实行文学的教训主义那就更好。固然有史华尔茨教授输入德国美学原理的评论法，要求文学家模仿自然风景或是掇取自然界的真美，对于人生应当取高尚道德的美意……可是这在那时不过是大学讲义而已，不但一般的读者社会不能了解，就是文学评论家亦不能应用。

十九世纪初有文学评论家美尔兹略夸夫。他首先反对当时俄国文学家模仿法国人，模仿古代的文学典籍。他以为真正的诗人应当有纯洁的心，——那才能赤裸裸脱去一切依傍，采用自然与人生里的诗料去感动读者社会。他仿佛能预觉浪

漫主义的兴起而反对古典主义。

十九世纪文学评论的进化起于嘉腊摩金的情感主义，——因为情感主义的发现惹起新旧文体之争。旧派如塞史夸夫以为嘉腊摩金的新文体只是“轻意”而已。可是，毕竟新派胜了。普希金的作品出现之后，更有评论家波列复衣等，渐渐地以“民族性”为标准来评论文学，而赞美普希金的《白黎斯·哥杜诺夫》。当时已经实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大争辩，浪漫派如纳狄慈藤等，便根本上对于诗的内容重新估价。——诗必须有民族性的内容，自然简单而且不受规律的束缚，向高尚理想的倾向，诗人的超越的天才当能将一切高远的思想达于读者，——这是德国菲希德^①的哲学和普希金等新派诗人的创作相综合而得的文学观。然而文学评论还没有完全形成。

倍林斯基方是俄国真正的文学评论的鼻祖，他不但注意于文体，而且还注意及文学的思想，正正经经从事于文学评论的事业，那时正是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社会思想最初活动的时期。他的观点屡有变迁，然而最终的决定，可以约略综合如下：一，他第一个确定“诗”的真意义，——诗应当复现宇宙间自然的生活，统一地永久地充满着物质精神种种式的现象的生活，并且要能反映社会生活，假手于描写一种派调的式样；二，文学不但是个人的创造，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因为文学本是争自由幸福的工具；三，他初断定现实主义——歌歌里派的价值，文学最好要能答复“时代问题”，至少也要达那不可解的悱怨之情；四，再则，他第一个确定文学评

论的功能，——解释文学，指导社会舆论，而使文学能客观地有所贡献于社会意识。倍林斯基对于俄国文学的功绩，实在不在普希金之下。五十年代，俄国文学界稍稍寂寞，然而六十年代立刻又思社会活力之大发展，而文学评论亦就大盛：赤尔纳塞夫斯基，杜薄罗留白夫，葛黎歌尔叶夫，皮沙联夫。

赤尔纳塞夫斯基(Chernyshevsky, 1828—1889)有一部著作：《论艺术对于现实之美学关系》，很能代表当时的思想。他以为“美便是生活，有生活的都美，有生意的物亦美”。因此，一切能代表生活或警觉生活的便是好艺术。于是主观的创造力无大重要；而且应当注意及于读者社会的了解程度，——艺术的美要人能领会，若尽作者一人的心得，不在一定的水平线下，便是枉费精力。这种观点比倍林斯基更进一步，可是文学评论的意义少而社论的成分多了。

杜薄罗留白夫(Dobrolyubov, 1836—1861)却比较地近于倍林斯基。他的意见，以为文学始终应当出于著作家的自感，——预有成意的作品不能有丝毫艺术的价值，因为如此反而丧失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可是，他因时代关系，所做的评论文，大致都以社会的意义做观察的，譬如《什么是阿蒲洛莫夫主义？》等等。此种评论他自己称为现实的评论。

葛黎歌尔叶夫(Grigoriev, 1822—1869)，是斯拉夫派的评论家。他的主张，是艺术应当表显民族性，——民族精神；艺术的产生，必有根据(民族)。所以应当和这根据相表彰切合，所谓血脉相关。这种评论法，可以称为“有机体的评论”，以自别于美学的(古典派)，历史的(倍林斯基)，及社论的(赤

尔纳塞夫斯基)。

皮沙联夫(Pisarev, 1841—1868)呢, 却和葛黎歌尔叶夫绝对相反, 各走极端。他只承认科学和理智, 而以为艺术仅仅是消闲的, 但亦“可以使我们深思, 帮助我们思想”而已。

皮沙联夫之后, 文学评论更为进步, ——从艺术的, 社会的, 心理的, 三方面着眼。评论家也就多起来; 而争辩的问题便在于所谓“纯美的还是人生的艺术”? 譬如美海洛夫斯基, 便注重于人生的意义, 而安德联叶维池就注重于情而轻智。——这已经是十九世纪末的评论家了。当时还有斯嘉昆采来夫斯基, 他的评论著作能集大成, ——著有《俄国最近文学史》等。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评论的著作和方法, 已俨然自成一个系统。于是有伊凡诺夫·腊朱摩尼克(Ivanov Razumnik), 他自己有他那自成其为一种的“文艺哲学”, 以个性主义为中心, 凡是反对市侩主义, 歌颂趋向进化的个性能力的, 能深切表现高尚的“新人”反抗庸俗的, 便是艺术的极致。文葛尔诺夫(Vengernov)却又注意俄国文学的“英雄性”——利他主义; 他说西欧文学的标语是“我, 我, 我!”——俄国文学的标语却是“非我, 非我, 非我!”

十月革命后的文学评论, 便渐渐地脱离这些唯心派和个性主义。譬如波良斯基(Poliansky), 以无产文化为观点, 而且要求文学的动性及现代性。现时的郭冈(Kogan)^②也是求文学里社会的现代性; 可是他能运用他的综合主义: 时代的, 阶级的, 社会的, 艺术的观点都综合而分析, ——得文学的总概

念；——而且，他解决了一切“人生”和“纯美”等的争端，指示文学艺术的新道路。瓦浪斯基(Voronsky)^③则以文学为生活的认识，若认识生活不真切的作品，则非高尚的艺术。总之，俄国文学的伟大产生这文学评论的伟大，——引导着人类的文化进程，和人生的目的。

于是可见，俄罗斯文学对于世界文化的价值了。

① 菲希德(J. G. Fichte, 1762—1814)，现译费希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自我”是认识的主体，是意志的或活动的主体。著有《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

② 郭冈(П. С. Коган, 1872—1932)，现译戈庚，苏联文学史家。

③ 瓦浪斯基(А. К. Воронский, 1884—1943)，现译沃朗斯基，苏联文艺批评家。

俄罗斯和
苏联文学论辑

本辑收入作者作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有关
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文七篇。题名系编者所加。

托尔斯泰的妇女观*

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完全是从道德上着想，他对于妇女问题有一个根本观念，这个根本观念是根据于他的哲学——他的宗教——而有的。他的哲学，他的人生观，就是说为“爱之福音”。他说：“爱”示人以人生的目的；而“理性”示人以达到目的（爱）的方法——劳动。所以他的妇女观根据“爱”而有一个根本观念，他于《告妇女书》^①上说：男子之道——劳动工作，女子之道——生育儿女。

他为什么以这个观念为他对于妇女的根本观念呢？就是根据于他所谓“神圣的爱”而说的，他以为“爱”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本，所以对于他非常注意；又以为母爱子女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因此有如此的根本观念。这是可以以后再说的。我现在先译几段他论妇女的话。

他说：

男子和女子的定职是一样的：服务于上帝。不过两性间的区别是在于服务的方法，而且是确定不易的。所以男子和女子都应

* 本篇最初发表于苏州《妇女评论》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〇年十月）。

当以自己的一定的方法服务于上帝。最紧要的，女子的绝对的事业——他对于生命，对于人类的天职，只有一件预定的必要的事业——就是儿女的生育和儿女的初步教育。所以女子应当尽心竭力的对于这件事，对于与这件事相关的事。女子能做一切男子所做的事，而男子不能做女子所做的事(生育儿女和初步教育)。所以女子应当尽全力于她独一能做的事(生育儿女和初步教育，抚养)，使这件事做得好好的。

女子，是家庭之母，在家里不能有幸福的女子，无论到什么地方永不能有幸福。

他引马德志尼(Joseph Madsinie)的话，说：

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

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

男女的道德是一样的：“廉节”，“正直”，“善行”。而于女子的道德得有特别的“美妙”(Charme)。

一切世界和世界里的东西真是“美观”，而世界里“最美的”——就是有德行的女子(谟罕默德②)。

人类的职务分为二部：(一)增进现存人类的幸福；(二)延续人类。第一件专为男子而设，第二件专为女子而设。

“生育儿女”是女子(学习)“自我否认”的学校。女子于此习于“自我否认”的方法，就能于别的生活情状中很容易的显出“自我否认”的方法来。

说是纺织，缝纫，洗刷，抚育，这些事绝对的是女子的事，而以为男子做了这些事，直是可羞可耻；这真正是根本上的错误。况且真正可羞的事却正相反：当粗俗的女子，又疲乏又孱弱，尽力纺织，洗刷或抚育儿女的时候，男子却没有职业，尽以浪荡虚度光阴，或

者一件事都不做，这才可羞呢。

女子竭力去学男子，和学女子的男子一样可丑。

女子做得很大的事业：生育儿女。而男子培植发明智识。现在女子尽随着男子堕落，这种风气已经传播的很广，还正在传播出去呢。男子是只能教育儿女而不能生儿女的。

你不嫁，你有意避去生育，那么，你就去做男子所做的事。可是要知道，女子的事有一件——生育儿女及初步教育——无论什么都不能代替他的。

以上引的都在他的读书一周纪里，已经可以大略窥见他对于妇女的意见。他对于妇女的根本观念是很明瞭的。就是：男子之道——劳动工作；女子之道——生育儿女。男子的职务是增进人类的幸福，女子的职务是延续人类的后嗣。因此又根据于他的汎劳动主义，对于妇女职业问题另有一种意见。所以他对于妇女的意见最重要的就是妇女职业问题，其次，就是妇女贞操问题，再其次就是婚姻问题。现在就我所知道的略略说一说。

(一) 妇女职业问题 他对于妇女职业问题，主张女子不应当做男子所做的事。然而他并不是主张女子不应当解放，应当永久受男子的压迫。也并不是主张女子不应当做别的生产的劳动。他另外有几层思想：(1)关于劳动的问题。他说，女子明说是做男子的工作，其实女子并不愿意去做劳苦的，男子的工作——矿窑，田地里的的工作。女子所愿意的，是参与男子坐享他人劳动而做的工作——银行，学校，公署里的工作。所谓坐享他人劳动的工作，不是能因女子参与男子的

工作而减少的，而且因女子参与男子的工作而格外显得出。就是所谓“现在女子随着男子而堕落了！”他在《克联谢洛槐曲》^③ (Krei Cero Baya Sonata) 一篇小说里(这篇小说我的朋友耿济之君已经译出来了，登在《新中国》^④ 上，更名《旅客夜谈》，是一篇专论妇女问题的小说。)曾说过：“请看一看所有的工厂，一大部分的出品都是女人所用的，那些没有益处的首饰，高车器具和玩物。好几百万人都象奴隶似的，在专为女人充足情欲的工厂里，因为艰苦的劳力就毁坏了自己的身体。女子个个全使出那女皇的尊严，竟把十分之九的男子都当做她们的奴隶。这全是因为男子凌辱了女人，不使她们和男子有同等的权利，所以她们才借着男子情欲的力量把我们全数捕在网子里去了。”这不过是反面的话罢了。(2)关于母职的问题。他以为母职(生育儿女和初步的教育，抚养)是女子专长的事，男子所不能做的。除以上已经引过的话以外，他的奇霍甫(Anton Tchehoff)^⑤ 的《小说〈可爱的人〉(Douchetchka)的后序》里也说过。他的《答人驳告妇女书》^⑥里也曾说过。他对于这一层意思仍旧是根据于他的根本观念。就是说：女子能做男子所做的一切事件或者比男子做得更好些，所苦是，男子不但不能做女子所做的事，而且那些类似的事也不能做。这本来是男女生理上的异点。科学家也承认，科学虽然万能，不能变男为女，也不能使男子能生育儿女。而且奈尔英(Nearing)也曾说过，母职是妇女的天职。就是奇霍甫和连史夸甫(N. S. Lieskoff)^⑦也有过这样论调。(3)关于“爱”的——宗教的，哲学的——问题。托尔斯泰的学说以为“爱”(Amour)

和“克己性”(Abnegation)是人类进化的最大枢纽。所以他对于妇女的意见,以为妇女尽他的天职去生育儿女,抚育儿女,即使历尽千辛万苦也绝不指望人家感谢他,称赞他,正是“克己性”和“自我否认”——无抵抗主义,无我主义的——表显。再则呢,母亲“爱”她的子女,纯出于天性,不可以理论争的,正合着那“伟大的爱”——所谓“爱之福音”。假使女子违背了她的天职——不生育儿女,不抚育儿女而参与男子的工作,去享受他人的劳动,——那么,(1)犯了不劳而食的信条,因而穷奢极欲;(2)自己丧失理性的人生意义——“爱”,——以致于绝灭人类;(3)即使只有少数女子如此,已足以丧失人的“爱性”,使家庭,社会里发生许多不和,不爱的乖戾现象,这一层他在《告妇女书》里论到堕胎的事情已经说及。

他有这三层意思,所以反对妇女参与男子的虚伪假善的劳动——工作,然而他于物质的经济的现象似乎没有大注意,假使时势所逼女子因要求经济的独立,而不得不参与男子的工作,又没有能力完全做生产的工作,那又当怎样办呢?这一层他没有什么解释。(也许是我没有读到,或者虽读到而不能领会,也未可知。)托尔斯泰死了不到五年,欧战就起,假使他多活几年看看现在欧洲妇女职业的状况,还不知道要怎样惋惜呢?

(二) 妇女贞操问题 托尔斯泰常时也推崇禁欲派的学说,而对于妇女贞操问题,却绝不以宗教,以法律为标准,也绝不是以家族,以国家,以夫权来苛责妇女的贞节。而完全从侧面着想——归罪于社会制度。其实这也是根据于上述的各种

意见而来的。他虽说那淫荡媚人的女子决不是能尽天职的，能统御男子的，正直的女子，然而他却也说，那些淫荡妖媚的女子，因为要淫荡，要纵欲，却用科学的方法来堕胎。那科学——能研究物质现象而不能解释人生意义的科学——真是贻害匪浅。他又说：政府监察那妓院的正当营业……许多医生去检查她们的身体，这好象他们明明的说淫欲是一件有益卫生的事，卖淫是一件正当的营业。他对于贞操问题常常是用这样严刻的，冷峭的眼光去批评他。我们只看一看他做的小说象《克连谢洛槐曲》和《复活节》(Ressurecton)，剧本《黑暗之势力》等就可以知道了。《克连谢洛槐曲》里有一节，很可以显出他对于社会制度持那种严厉的态度，和对于妇女贞操有一种宽恕的口气，我把他抄在下面：

……那些强制手段（医治梅毒的强制手段）却不用在消除淫欲上，反去用在奖励淫欲上，要来保证那淫欲的没有危险，这算什么事呢？那件可怕的事，差不多没有人不遇着的，青年人不用说了，恐怕有十分之九都受这个苦，连乡下的农夫都免不了的。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妇人生就了蛊惑人的手段——妇人决不会媚人的，却是因为有些人，看着淫欲是法定的和有益于卫生的事情，还有些人却看它当作一种少年人最自然并且没有罪的游戏……

（三）婚·姻·问·题 他对婚姻问题也是以如此严刻的，冷峭的眼光去批评婚姻制度。他有句话说：“求婚这件事……这边（男子）权利和希望是平等的，妇女那边可如同市场上贩卖的奴隶，猎网下的饵食。你不信，问问那做母亲的或她女儿自己，她那一天不忙着要捕着一个未婚夫呢？这正是可耻的事

情。这是她们妇女们所做的，只有这种事情，别的她们全不会做。……这不是可怕么？”他简直说，清白身体的女儿卖给浮荡子弟，那个代价只不过是繁缛的礼节罢了。他谨告妇女，能尽天职的妇女，给她女儿选女婿，决不以手腕的白净，体态的温柔，常是以有没有真正的劳动——工作，去估量男子的身价。不能尽天职的妇女，给她女儿选女婿，才不以男子自身的价值，而以男子的地位，财产，才干，能不能享受他人的劳动定去取呢。这也是根据于他的汎劳动主义的。总之，我们明白了他的根本观念，由此推出那三种意义——妇女职业问题里所举的三层意义——至于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的主旨也可以一隅三反了。

我再说一说理想上的女子。他理想上的女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

女子能有当代高尚的宇宙观，确是尽她女子的，一定不易的天职的——依于自己的宇宙观而去生育哺乳，教育培植成最多数宜于为着人类去工作的小孩子。⑧

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所以他的妇女观也是如此。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或研究一种主义都不能缺少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因为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愈丰富，那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也愈丰富；这不过是一种对象的两方面，是相对的同时而起的。现在中国讨论妇女问题的多极了，我特地就我所知道的介绍了这一篇，虽然是

一鳞一爪，也未始不可做参考的材料；不知道读者对于这一篇有什么感想没有？

一九二〇，二，十二。晨五时。

① 瞿秋白所译的托尔斯泰《告妇女》一文刊于《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下文所引的话，瞿秋白译为：“《圣经》上说，男女各省其天职：男子的天职——工作。女子的天职——生育。”

② 谟罕默德（约570—632），现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

③ 《克联谢洛槐曲》，现译《克莱采奏鸣曲》。

④ 《新中国》，综合性杂志，一九一九年创刊于北京，一九二〇年八月停刊。《旅客夜谈》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五号（一九一九年五月）。

⑤ 奇霍甫（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现译契诃夫，俄国作家。

⑥ 《答人驳告妇女书》，曾由作者节译后题作《答论驳告妇女书》，发表于《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⑦ 连史夸甫（Н. С. Лесков, 1831—1895），现译列斯科夫，俄国作家。著有《主教生活琐事》、《理发师》等。

⑧ 这一段话见于托尔斯泰《答论驳告妇女书》。

序沈颖译《驿站监察吏》*

这一篇是普希金托名弁尔金(Belkin)所做的小说集里的一篇,普希金既伪托弁尔金的名,又在小说集前做了一封假信,说是弁尔金的知己朋友写给他的。信中借弁尔金朋友的口吻,描写弁尔金的为人,说他日夜忧郁,很抱悲观,父母死后,就因为少不更事,而且慈悲心重,不久家产都已荡尽,他的性情,又很有女性,不过羞怯之情,却丝毫没有,后来更自谨慎,绝无世俗的行为。普希金所以要假托弁尔金的名义,据伊思霍慈(Ishos)说,是因为普希金著这部小说集的时候,他刚从高加索回圣彼得堡没有几年,住在波尔亭(Boldin)。当时文网森严,又要极力避开当时人的批评。“蒲尔加尼(Bulganin)当时反对普希金,也说这不很象普希金做的。”再则呢,因为这部《弁尔金小说集》^①里五篇之中,倒有两篇(《射击》〔《决斗》〕,《驿站监察吏》)是以弁尔金作主观的,……所以不得不在弁尔金朋友的信里注重描写弁尔金的为人,……假使以主观移于不确切的人身上去,就足以使文章的“意境”与“形式”

* 本篇系作者为收入《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中沈颖译《驿站监察吏》(《驿站长》)所作的序。《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沈颖、耿济之等译,一九二〇年七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

不相融洽。而且如《鄂楼思村之历史》^②一篇里，简直是以弁尔金自己做主人翁的。还有许多当代文学家，对于《弁尔金小说集》的批评，因为限于篇幅，不能多引。唯塞夫(G. V. Alexandre)还有一句话，却也很可注意，他说这部小说集的艺术上，体裁上的创作，却无意之中，为后来的文学家，歌鄂黎，屠格涅夫，陀思妥亦夫思奇，托尔斯泰开一先河。《弁尔金小说集》里，《驿站监察吏》一篇为最好。情节非常简单，而作者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不但如此，而且读此类俄国的小说，还可以知道当日俄国国情，却和中国差不多，“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歌鄂黎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齷齪，都是如此，这一篇还不大显明深切。”因此可以推及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沈君既然把这一篇译好，我极力劝他，再慎重修改一遍之后再发表。或者也足与当代研究文学的人，做一种参考材料。

歌鄂黎曾经说过：“我国现在人，提及普希金的名字，就立刻联想及俄国的民族文学家。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

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见歌鄂黎所著《亚拉伯人语丛著》〔Arabesque〕^③里的《论普希金》一文）。

歌鄂黎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象杜少陵^④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当注意他所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我于文学本来只一知半解，还希望读者指正。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晚十二时。 瞿秋白志

① 《弁尔金小说集》，现译《别尔金小说集》，普希金所著的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射击》、《风雪》、《棺材匠》、《驿站长》、《村姑》五篇，一八三一年出版。

② 《鄂楼思村之历史》，现译《戈留兴诺村的历史》。

③ 《亚拉伯人语丛著》，现译《小品集》。下文的《论普希金》，现译《略谈普希金》。

④ 杜少陵，即杜甫（712—770），唐代诗人。王、杨、卢、骆，初唐时期的四个诗人：王勃（650—676）、杨炯（650—693后）、卢照邻（约635—约689）、骆宾王（约640—？）。杜甫对他们的评价，见于《戏为六绝句》。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俄国国民性本来是极端的，不妥协的，前几十年，国内思想变化的剧烈更是厉害。各国改革运动之前，思想的变化确也都有，可是从没有象俄国这样剧烈，所以俄国能从君主政体的国家一跃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可以在俄国文学里看得出来的。然而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

* 本篇最初载于《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

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因为社会的不安,人生的痛苦而有悲观的文学,譬如人因为伤感而哭泣,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处。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俄国的文学,只不过如吴季札的观诗^①,可以知道他国内社会改革的所由来,断不敢说,模仿着去制造新文学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社会的目的。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那么,我们创造新文学的材料本来不一定取之于俄国文学,然而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不过我们决不愿意空标一个写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新理想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读者看我们所译的小说自然可以明白。

瞿秋白序,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① 吴季札的观诗,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又称公子札,吴国的贵族。他到鲁国报聘时欣赏了周乐,从各国的音乐和诗歌中,分析推论各国的文化特色和治乱兴衰的原因。

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

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欧洲中世纪末的教会文化，受十八世纪启蒙派的颠覆，随后又有浪漫派的诗人的狂飏，已经完全摧败无余，让出位置给所谓“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现时这一近代文化真正登峰绝顶，甚至于是“鼠疫时的高宴”了，他亦应当让位了，——难怪国际一切第一流的文学家至少也表同情于无产阶级。那时高唱凯旋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渐渐显出实际上确是空泛；那时标榜权利的所谓“平民”，已经显出实际上确太含混。真正的平民只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虽然，政治上的“开明君主”学说实际上仍是贵族阶级的思想，不过垂死时求勉强适应现实运动罢了；文艺上的一切“贫民同情”派实际上仍不失其为资产阶级的“诗境”，不过站在上流社会的观点上说句公平话罢了。这是一样的。所以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真正无产阶级文化至多只能有些萌蘖。其次，褴褛的苦力比不上幸运的市侩：——资产阶级在诸侯堡垒

*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六号（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

还很巩固的时候，已经有自己的市场，城市，经纪人，做广告的人，画商标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斗争过程里已经很能间接有所造于文艺，不用说封建阶级完全颠覆之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却完全和敌人同生长在一个经济机体之内，至多只能有工会的组织和宣传等经验，那里能够得一根据地来安安稳稳栽培将来人类文化的基础呢？——除非是……所以直到十月革命成功，欧洲和俄国无产阶级文化的程度及范围还是很低很狭；往往只偏于社会科学的某一部分。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卢骚^①，可没有自己的莎士比亚^②。

俄国俗话说得好：“一燕不成春。”虽然，春来第一燕，至少是天地回和的朕兆。何况惊蛰之后雷声震发，百花齐放，那第一燕，正是此后第二第三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先锋。俄国革命的文化事业，从此更无限量，是世界人类生活之艺术化的先河。

我们且谈一谈这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燕”——两位死于其天职的劳工诗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创始者：——菲独·嘉里宁(Ф. И. Калинин)和柏塞勒夸(Л. К. Бессалъко)^③。

几十年以后，历史家若要叙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他必定非常之注意到菲独·嘉里宁；俄国革命将要建筑新文化的基础，而菲独·嘉里宁是实行上的创始人。

我们现在这种斗争时代固然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所谓“领袖”，——资产阶级思想界往往有这种“领袖”的观念；然而“领

袖”的面目，因为个性主义时代渐渐过去，也就大有改变了。菲独·嘉里宁不是那种“领袖”，他是新时代之黎明时的共产主义宇宙观的产儿。

他的面目，他的事业，完全和劳工阶级的倾向及责任相结合融洽，看来简直不是他个人有所创造，而是群众自己假手于他而思想，而言语，而行动。菲独·嘉里宁的个性里，无意之中就能很明显的表现那一切劳工伙伴所热诚愿意表现的。菲独·嘉里宁所创办的无产阶级文化会(Пролеткульт)④——真是现代新兴阶级的精神和创造。

菲独·嘉里宁是无产阶级出身，生于一八八二年。从小就受着极惨酷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他和劳工群众同样处于受人鄙视的无权无势的地位；不但普通政治上的权利没有，而且最低的国民教育都受不到。小小一些智识，好比中国境内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贫民学校，那时俄国的“社会”也曾“顾怜”到这些穷人而有所施舍；然而那已经是大面情，要着实报恩戴德的！难道靠这种东西便能得到必要的普通智识，预备再求高深学问吗？当然不能，何况更要创造整个儿的新文化呢？没有心灵的机器之奴隶应当默受人家的支配，使自己的一生完全去适应资本家大王的生计划。菲独·嘉里宁的几万万伙伴受着这种无兴味无创造的生活，暂时只当他是不可避免的罪恶。其中少数人倾向于积极的反抗，以求破坏资产阶级世界的牢笼。只有很少的人，而菲独·嘉里宁就是此中之一，能够注意到：新兴阶级在创造自己的过程里，在争取自己统治的恶战时期，已经带出新的真理，新的原则，经济组织方

面固然如此，而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道德，亦是如此。菲独·嘉里宁的所以能得此人生观，正在于阶级的斗争过程里，——社会主义政党和职工联合会的文化机关。

现今斗争的时代，正在进行无情的崩坏，革命时机中最显豁明了的色彩便是否认的精神，颠覆肃清强暴的伟力，——工人之中这种人才是有的。这是多数。至于革命斗争之创造的面目，新兴阶级内部所有的潜在力，却大半还隐藏不显，对于贫民自己仅有无意之中的发露，而很少理智的综合应用。

菲独·嘉里宁就不是如此。他的才能在批评的分析的方面少，而在创造的集合的方面多。他的健全的感觉早已觉得劳工阶级不但有破坏的责任，而且有伟大的建筑力，——那特别的创造使命正潜长于劳动之技术综合的制度里。譬如工场之中有计划的分工，使几百几千人同做一种建设的工作，工厂劳动的制度，甚至于工人休息时间的相同，可以隐藏着伟大的集合精神的原则，这是新文化创造的基础。要开辟这种创造的道路，应当解放无产阶级的意志，而且给他完全发展；菲独·嘉里宁正是从这一方面走上革命文化的舞台。他的志向不仅在于最近便能实现的具体成绩，不仅在于改善劳动者目前的生活状况，而且在于无产阶级之伟大的历史使命，以艰难困苦汗血的代价，经过无限牺牲的斗争而开始人类发展的新阶段。脱离资本之压迫而得自由，正是为着今天的机器之奴隶能够在历史的明天，以集合的意志和集合的思想，征服自然而支配“物质”。

菲独·嘉里宁的眼光看到很远的将来。他专任解决自己

阶级远大的责任。他的性情不大近于“政治”；他有哲学的兴味和文学的天才。假使菲独·嘉里宁不生在我们现在的破坏时期，那他也许至少能成一极伟大的批评家，甚至于能建设更严整完备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然而他生在现代，正是斗争开始剧烈的时期；他从小就努力工作，一直到死，纯是为新兴阶级的文化，为集体主义的新精神而牺牲，而奋斗。我们这位无产阶级的哲学家向来不善于敷衍琐屑繁碎的小事；他往往带着极和蔼的笑容指出“同阶级的伙伴”种种弱点，无意之中引导伟大的斗争。他向来不爱“位置”，亦从没有找过。他只要有工作可做，从没有轻信的自负心。

他对于学术文艺的需要愈高尚愈深刻，他就愈不能满意自己的成绩。往往因群众智识方面预备的不足，妨碍他传布自由思想的迅速进行。因此他在终身事业的无产阶级文化会之外，还尽力于普通平民教育事业。

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和无偏见的思想，只有巩固的科学基础成就之后，方才可能；要达这个目的第一件必要的事，便是引起群众对于科学智识及精神工作的兴味。

革命之后，他这种志愿得以进行。他在思想方面不用某种死原则自称“信仰”，而用健全的智识在这宇宙的社会的实验室里放胆的研究，不怕“出人意外”的新结论。他在教育方面亦否认所谓教育专家的“天经地义”，以及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鲜”学说，——那本是不能无条件的移植于劳动共和国的。

“智识——给广泛的群众。”——这就是他的教育方针；他在革命后的教育平民委员会(Наркодирос)里，便能切实执行这种方针。

菲独·嘉里宁还有第三种责任，——就是于现实生活的实践中教育群众，以植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菲独·嘉里宁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要巩固刚刚解放的资本奴隶的创造意志，只有一条路：群众自动独立的精神之大表现。只有这独立自动的精神里，才能发见无产阶级的创造力；只有以实际建设的过程矫正自己，方才能造成共产主义的新人类。让无产阶级不倦不息的创造；亦许经过种种错误，然而创造，寻觅，永永不懈，必定能够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文化会里所研究实行的种种事业，诗文小说，集合的歌唱，演剧，音乐，图画，无一不以群众自动做原则，往往可以使演说者和听众，演剧家和观客混而为一，融洽无间。

可惜！菲独·嘉里宁已经于一九二〇年死了。然而他的理想总有一天可以完全实现，或者更高出无量数倍呢。

菲独·嘉里宁的全集已经快可以出全了，——在莫斯科无产文化书馆。

二

柏塞勒夸生于一八八七年，在南俄的嘉德琳斯拉夫城。他在教会区立的小学里毕业之后，便跟着父亲做搬运夫。十六岁时他方进嘉德琳斯拉夫铁路工厂当铜匠学徒；不久，在一九

○三年，便参与总罢工。一年之后，他已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秘密办事，那时他是少数派。一九〇七年时他被捕；第一次在二月间，是和秘密组织的领袖同时被捕的，可是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不久就放出来了，——到十月间又重新被捕。这一次，他在嘉德琳斯拉夫监狱里坐了两年；经过审判之后，充发到西伯利亚的叶尼谢省。他就从那个地方逃到外国。他在维也纳住了几时，在那儿当磨印机工人。一九一一年到巴黎，就进飞机汽机厂做工，一直住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

柏塞勒夸在这一时期中，政治见解和人生观大有进化。

他对于少数派的社会主义始终有些怀疑，于是拚命的研究西欧及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派别：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至对所谓“马哈依主义”^⑤。他亲身参与并且研究西方的工人运动，实在觉得这种运动带着不少市侩主义的倾向；于是他就发生一种意思：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还不足以给劳工群众以完全的解放；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科学，自己的艺术，自己的道德习俗，并且要有一整个的人生观，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综合一切，方足以抵抗资本主义文化的恶影响。

从此之后，柏塞勒夸就成了一个非常之热烈的宣传家，——宣传无产阶级创造独立的文化之必要。

柏塞勒夸的文学生涯在法国已经开始。那时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后，文学界非常沉寂，所以触起他这种动机。第一篇小说是叙西伯利亚的流刑的。郭里奇(М. Горький)^⑥看了他的小说回答他道：“可惜，你自己的题目还不是你现在所能胜任的。可是这本工人写的小说，智识阶级却可以读一

读，很有益处。你再写罢，再学罢……”柏塞勒夸于是把这篇小说分成好几篇短篇小说，写给《志愿》杂志。杂志主任美洛刘薄夫(Миролюбов)看着很赞赏的；可是并没有登出来，因为美洛刘薄夫自己不久就离开那个杂志了。

这几篇小说之后，柏塞勒夸就着手做一部很大的文学书，一直到欧战之前。柏塞勒夸从他个人在西伯利亚亲身经过的感想，更进而求综合全体无产阶级不安的情绪。他觉得：“我的个性是有创造伟力的“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是一切种种个性创造力的总和——阶级的集体。

他在这部新著作里，想描写整个儿的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的总斗争，无产阶级之精神文化的增高和减落。这部著作分成好几部分，已经出版的是：《古兹基的儿时》，《无意之中的方法》，《突变》，《生活》。这四部分之外还有一段，应当在《突变》与《生活》之间，总起来便是柏塞勒夸意想之中的巨著。

凡是读他著作的人，都能断言他有惊人的天才；——虽然在这著作中，他的文才还没有能尽量地发展。然而确是极有意思的结构，极美丽简单的俄国话，没有丝毫所谓“摩丹(近代)派”^⑦的雕刻气；深入，沉着，诚挚，既能显出深沉的“心灵经受”，却又非常之浅显。最好的就是他那《无意之中的方法》；其中描写古兹基小孩子时候怎样做木匠徒弟，怎样参加警察办的工会，怎样成一真正觉悟的工人。《突变》却是描写南俄暴动镇压之后，嘉德琳斯拉夫监狱里拷打政治犯的惨状，——社会之中凡是有心的人都要为着这种拷打而震颤呢。

欧战一起，国际间旧派的社会主义都沉溺于日本人所谓

“马鹿爱国主义”，个人的力量当时竟不能有所作为；于是柏塞勒夸的文学家心灵急急于要深入历史的远处，求得情势的均势。奇异的疑谜的东方，使他起许多幻想；所以他虽从没有到过东方，——柏塞勒夸呵！你幸而没有到过东方！——然而他却写《东方的金刚石》。他不给人以证据确实的东方史实；然而他有许多诗境的梦和象征，意想中的印度，波斯等等，他有许多伟大的幻想，而并不害及作品中艺术的和谐。这是无产阶级的美文界中之极有趣的故实。他从写实而进于象征，——可是处处都有无产阶级的情绪。那不是资产阶级式的颓伤的象征主义，而是显示无产阶级的“宇宙觉”（Микроощущение）的象征主义，所以柏塞勒夸是无产阶级文学家中的第一人，能扩充自己的题目，不以革命，工厂，铁炉，烟突，机器等等自取。

革命的时期，柏塞勒夸回到俄国，到他的故乡嘉德琳斯拉夫，仍旧在铁路上做工。那时他就进多数党，并且不久便以代表资格到彼得城，出席全俄铁路会议。于是又会见菲独·嘉里宁，——他和菲独·嘉里宁在巴黎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他因此被无产阶级文化会留在彼得城办《将来》杂志。

《将来》杂志里，他登了不少篇很有价值的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及无产阶级文学，他很笑那些喧闹的未来派，未来派的

脑筋里空得很，空得象火柴盒子在那喧哗扰攘的小酒馆里，在那半夜十二点钟的时候。（诗人塞尔塞纳维池〔Шершеневич〕语）

他对于叶谢宁（С.Есенин）^⑧等农民派的诗人却表示相当的敬意。这些文章和菲独·嘉里宁的几篇集合在一起，成一

本书，题作《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Проблем дпролемарекои кулемуры”）。

最后几年，他很注意无产阶级的戏剧，自己也曾编过一篇剧本《石匠》，——是无产阶级的创造力及勇气的象征。

一九一九年秋天，田尼庚^①反革命军攻势正甚，柏塞勒夸因党中决议，便到南俄战线当军队报纸的主笔。南俄战线的反革命军肃清之后，他暂时到哈尔夸夫（Харьков）去，谁知道传染了室扶斯病，竟就死了（一九二〇年）。

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往往对于苏维埃政府过分的要求优待，却又“怀才自重”，不肯轻易为平民服务；工人的著作家力竭声嘶的开展一些才能，不幸乃竟为新文化和新生活而死于战场。假使人类将来始终得见圆满的和平的无阶级的社会，新文化的确立，那时他必定深深致谢于此。

“漏泄春光的第一燕”呵。

一九二三年，十月，四日。

① 卢骚（J.J.Rousseau,1712—1778），现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② 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戏剧家。

③ 菲独·嘉里宁（1882—1920），现译费多尔·加里宁。柏塞勒夸（1887—1920），现译别萨尔科。

④ 无产阶级文化会，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一九一七年成立的苏俄早期文化团体。鼓吹建立“纯无产阶级文化”，否定民族文化遗产；曾受到列宁的批判。一九三二年解散。

⑤ 马哈依,俄国工人。“马哈依主义”,指他的一种只要工人秘密团体及罢工,不要理论和知识阶级的革命主张。

⑥ 郭里奇,即高尔基。

⑦ 摩丹,英语 modern 的音译。“摩丹派”,即现代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出现的文学流派。

⑧ 叶谢宁(1895—1925),现译叶赛宁,苏联诗人。

⑨ 田尼庚(А.И.Деникин, 1872—1947),现译邓尼金。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叛军首领之一。一九一九年曾率白军从南方进犯莫斯科,被红军击溃。

斯大林和文学*

今年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第三年。苏联无产阶级为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虽然还碰见许多国内的国外的困难，可是，已经得到了极伟大的胜利——“走进了社会主义的时期”（斯大林）。八月间，苏俄普洛作家联盟（RAPP）^①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演说，在自己的机关报《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普洛文学当前的任务。斯大林的演说是“论经济建设的新任务”的，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普洛文学，可是，这篇演说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战线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建设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文学自然提出新的要求，而苏联的普洛文学的现状，比起这种新的要求来，还是落后的；取消这种落后状态——就是斯大林同志的演说对于普洛文学所指出来的总任务：这就是说苏联普洛文学还要更进一步的改造，普洛作家还要更加深切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生活，然后才能够使取消落后状态的斗争过程更加迅速的进行。

普联（苏俄普洛作家联盟的简称）认为苏联现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里面有许多现象，象斯大林同志所指出来的，可以

* 本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曾收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

并且应当做文学的新的题材。例如：（一）新的关于劳动力的问题——以前城市工业吸收极大部分的劳动后备军，现在，农村的电气化机器化集产化要求许多工人，所以一部分脱离私产的农民就在乡下变成工人，不一定跑到城里去；（二）苏联机器工业的发展自然要消灭手工业，可是，这种过程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完全不同；（三）苏联的工人，现在是在变更自己的性质，资本主义时期留下来那种对于工厂的态度和心理要完全消灭了，而纯粹社会主义的对于劳动的态度和心理正在产生出来；（四）反对“敷衍主义”和“笼统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那种小资产阶级的随声附和而实际上不肯切实工作，反对那些笼统的不负责任的埋没个性的工作方法，反对那些躲在“群众”背后自己逃避责任的态度；（五）斯大林同志所特别指出的关于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生产技术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新的情形要求新的指导方法……这就要一切企业的领导机关不只是‘一般的’领导，而是具体的，每一件事务的领导，要对于每一问题都很切实的去解决，而不是说几句笼统的空话。”普联认为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于普联自己的领导方法也是很有关系的。普联现在正在改造：正在转变自己的工作到思想的创作的方面来；可是这种转变的过程太迟缓了，速度太慢了。例如普联自己的决议要努力创作“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的作品，而事实上对于这种决议的执行，监督得还不十分充分；关于创作问题的讨论也发展得太慢。普联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这些缺点，而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尤其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口号：“脸向着技术”，对于普联应当特别发生很大的影响。普联应当更加注意纠正那种忽视文艺组织的特殊任务的倾向，纠正那种抄袭非文艺组织的工作的办法，要更加注意普联是思想教育的组织的特性，而加紧注意自己工作的特殊形式和方法。普联要加紧注意自己的技术——文字学，言语学，以及艺术方面的一切切实的技术，而避免那种笼统的空洞的重复着辩证法唯物论的一般理论的习气。认真的刻苦的有系统的学习！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使普联更加感觉到深刻的自我批评的必要，要开始一个新的自我批评运动。更加加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倾向，反对各种各式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集中火力打击右倾危险——就是普联改造的速度的迟缓，没有反对知识分子的老爷脾气的必须的斗争，轻视“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的任务，沃龙斯基主义和彼列维尔藉夫主义等等的残余。同时，也要加紧反对“左倾”的空谈。

反对笼统主义的斗争对于普联有特殊的意义。固然，普联已经开始了这个斗争。例如普联最近一次的全体会议的议决案，例如普联最近公布了许多论文，主张要有具体的批评。可是，普联反对笼统主义的斗争的本身还没有充分的具体化。什么是笼统主义？这就是没有每一个人具体的对于每一种工作负责，没有分别的清楚的研究，没有具体的对于某一种作品某一篇文章的具体的批评，而只是一般的原则上的推论，决议等等。今年俄国的普联曾经发起了一种运动，叫做文学突击队运动——征收了许多工厂里的普联的盟员（以前普联盟员只

有一千八百人，现在增加了八千多工厂里的盟员，总共将近有一万人了)。这些文学的突击队员需要教育，需要学习，他们的幼稚的作品需要批评和指导。而暂时，普联的领导机关对于这种重要的领导工作，也还免不了笼统主义的弊病。所以对于“无秩序的紊乱的，完全不负责任的笼统主义的现象”，普联正要加紧作坚决的斗争。

同时，反对笼统主义是文学的题材。这并且也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这就是要艺术家极端的注意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事实，具体的人物，注意到各种各式的工厂，机关，集产农场。这就要反对那种空口的宣言和一般的歌颂。一般的歌颂着“工人阶级”，而事实上抹杀无产阶级内部的先进分子，掩蔽了落后的尾巴主义的分子；这样，就成为一种畸形的艺术上的敷衍主义。

普联认为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一切经济建设上的问题，都和普洛文学的建设很有关系，都可以应用到文学的战线上来。这是伟大的为着文学上的列宁主义方法的斗争。

用艺术的形象来表现那些新的工人加入生产之后怎样受着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任务。可是，谁能够担负这种任务呢？只有真正列宁主义的艺术家的，他将要表现活的人物，具体的社会的个性，而不用那种假革命的“一般的”赞叹和兴感来搪塞和敷衍。同样，要造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艺术的形象，也必须真正能够用辩证法去观察现实，观察一切运动之中的生长之中的现象，这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来实行文艺上的战斗。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社会

主义建设和苏联一切实际生活之中的弱点，都要有文学上的反映，都要用强有力的艺术的言语来暴露，揭穿，鞭笞。例如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之中的分化，他们的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为着新的劳动方式而斗争，为着正确的劳动组织方法而斗争……所有这些现象的表现，一切种种阶级斗争方式的表现，都必须要有艺术家会“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阶级的敌人正在用这些假面具掩盖事实的真相，去安慰和欺骗机会主义的分子。艺术家是个战士，而不是旁观者，他是个“列宁派”，他要会抓住发展的倾向，而不是消极的照相机；他要会理解社会现象，而把它溶化到艺术的形象里去。

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估量是说他能够“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这个公式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有极大的意义。这是根本反对那种小资产阶级不信任无产阶级的心理；小资产阶级艺术家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也需要他们来粉饰一下，装点一下！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独裁制上面，决不戴起任何的假面具。所以无产阶级的文学也要努力去揭穿敌人的假面具，揭穿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动摇分子的假面具。

无产阶级的文学和以前的一切种种文学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能够各方面的最深刻的最充分的最高限度的去认识社会的现实，真正深入改造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有的一切矛盾和困难。

这样，斯大林同志的演说对于苏联普洛文学的意义，就是不但在题材上要挑选新的对象，这样去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也要特别注意“揭穿一切种

种的假面具”的任务，题材和创作方法对于普洛文学家永久是宇宙观的问题。

“要会用新的方法来工作，——不要以为从前恢复时期可以够用的方法现在还可以满足，这是斯大林同志演说里的话。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斗争，为着普洛文学的新的列宁时期而斗争。”这就是《文学报》社论的结论。

中国的普洛文学运动还在很幼稚的时期，它的许多弱点和错误正需要坚决的斗争和勇敢的自我批评来纠正。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队伍——苏联无产阶级的文学斗争应当是我们的模范。读者对于苏联普洛文学运动之中的新的任务，应当深刻的去了解，应当会应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原则到中国的普洛文学方面来。

一九三一，一二，六。

① 苏俄普洛作家联盟，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一九二五年成立，一九三二年根据联共(布)中央决议解散。斯大林的演说，指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题为《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论弗理契*

文艺是社会科学之中“最细腻”的一种，也是唯心论的方法根深蒂固的地方。文艺不比政治经济学或者一般的历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都有过现代互辩法唯物论^①的学者的详细的研究，而文艺方面只有一般的指示。因此，唯物论的文艺理论，还需要专门的细致的研究，文艺方面的各种科学都需要彻底的重新估价。这是二十世纪的伟大的工作。开始这个伟大的工作的，就是弗理契^②。

弗理契是专门研究文艺科学的第一个人。固然，在他之前已经有过普列哈诺夫……，然而应用互辩法的唯物论来专门研究文艺的，而且留下了真正有专门科学价值的著作的，始终要算弗理契。普列哈诺夫只给了些一般的理论上的论文，而弗理契方才开始用这种理论研究了具体的文艺现象。

正因为弗理契是唯物论的文艺科学的开创的人，所以他还不免做了好些理论上的错误。现在，不比弗理契开始工作的时候了，现在在地球上已经有了六分之一的地方，那里是争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学月报》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署名宋阳。曾编入《乱弹及其他》。

得了真正的科学的自由，那里的普洛阶级可以有充分的可能在文艺方面也更加深刻的研究下去，他们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建设真正研究科学的伟大机关。这个机关就是公谟学院(Ko-makademie)^③。公谟学院之下特别设立了文学言语部。最近公谟学院的文学言语部对于弗理契的遗著加以详细的整顿和研究。这种研究，一方面发现弗理契的观点之中的矛盾和错误，别方面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科学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

弗理契在文艺方面的功绩，当然是非常之伟大的。“估量历史上的功绩，自然不能够把历史上的人物和现代的要求来比较，说他们没有见到什么什么，而要把他们和以前的人物去比较，看他们给了什么新的。”弗理契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在俄皇的专制制度之下，他的理论上的出发点，大半还是普列哈诺夫的学说，虽然他后来已经开始批评普列哈诺夫。弗理契自己的学问也在逐渐的进步之中；从他在俄皇时代的《剧场新闻》杂志上的文艺评论的论文起，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没有写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原理》为止，显然可以看得出这种进步的过程。他在晚年，显然已经开始脱离普列哈诺夫的影响；在艺术理论的新的发展过程之中，他曾经参加了反对各种错误的倾向的斗争。可是，普列哈诺夫对于他的影响是太大了，因此，他常常自己和自己矛盾，他的几部极有价值的大著作，例如《艺术社会学》，《欧洲文学史大纲》等等，也不免包含

着机械论的错误。

首先要说的是艺术的定义的问题。

最近十几年来，唯物论的艺术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之中发现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被资产阶级的意识笼罩着，而对于艺术的意义发生错误的了解。

第一，例如彼列维尔藉夫(Pereverzeff)，他说哲学上的意识和实质是同一样的东西，因此，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是平行的，一般的说来，上层建筑是消极的，不能够影响经济基础的。他这种文艺消极论甚至于否认文学之中的阶级斗争。还有别斯帕洛夫(Bespaloff)，他说艺术是一种有特别内容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等等都不相同的，所以这里阶级斗争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当然是文艺之中的孟塞维克主义——机会主义。

第二，例如沃龙斯基(Voronsky)，他说“艺术是对于生活的认识”；波龙斯基(Polonsky)也说：“艺术是阶级的自我认识的工具。”这一种说法同样是孟塞维克主义的表现。

弗理契在他最后的一篇文章《艺术是什么》里，对于这个艺术定义的问题，却给了正确的答案(这篇论文在他死了之后才印出来的)。他反对彼列维尔藉夫主义，他也反对沃龙斯基主义。他说：

意识反映实质，然而意识反映着实质，同时还在影响实质。因此，那些从“认识”方面出发的对于艺术的定义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自然，一个阶级有着上层建筑，可以去认识自己阶级的某些方面，可以去认识的阶级的阶级的“我”，然而，这仅仅是一种附带的作用；——阶级在社会之中行动着，首先就在为着自己的生

存和政权而斗争，而不是在做旁观者，只处于认识的状态之中。

他以前也曾经说过：沃龙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学说。

然而在一九二八——二九年以前，弗理契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好些错误。他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弗洛伊特主义和艺术》；他在这篇文章里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从社会心理上去组织社会实质的工具。”一九二六年他还说过：“艺术是组织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手段。”（弗理契：《空间艺术的社会学问题》）这里，可以发现弗理契接受了波格达诺夫（Bogdanoff）^④ 的错误理论。

文艺上的波格达诺夫主义——波格达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基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冲突的。波格达诺夫的哲学，经济学上的见解都是唯心论的变相。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艺术的观点，还是乌梁诺夫^⑤ 的。乌梁诺夫认为艺术反映实质，艺术是一种特别的上层建筑，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实质而且影响实质：意识是实质的“镜子里的形象”，实质并不受意识的“组织”，而是实质自己在“组织”意识；然而意识并不是消极的，它的确会有影响到实质方面去；阶级是在改变着世界而认识世界。弗理契的这种错误——波格达诺夫式的错误，是由于他所受的普列哈诺夫的影响而来的。

二

照普列哈诺夫的学说，人的意识是和实质相符合的。因

此，他就有一种所谓“象形论”，说艺术的作用等于中国埃及的象形文字。他的学说是：人的意识仅仅只和实质相符合；所以即使用象征，用符号，用象形来表示这个世界，也还是和实质“相符合的”。所谓符号——和“镜子里的形象”是不同的；符号只要是一种相当的记号，足以表示实际生活里的形象就够了。这样说法，意识就变了并不是实质的反映，而只是一种别致的“象征”，符号，象形，——没有现实世界那种丰富的内容，当然更不能够去影响现实世界，不能够包括现实世界的多方面。弗理契在普列哈诺夫的这种影响之下，也常常把文学上的形象叫做“象征”。

弗理契对于普列哈诺夫的态度是渐渐的改变的。

一九二二年弗理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普列哈诺夫和科学的美学》，当时他完全承认普列哈诺夫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接受普列哈诺夫的“生物学主义”。他不过说，研究艺术的时候，“生物学的方法应当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补充一下，就是研究原始社会的最早几期的文明也应当这样。”这可见他并不反对生物学的方法，不过要补充一下罢了。同时，他对于普列哈诺夫的“地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加以批评。而这种“地理的马克思主义”是普列哈诺夫的很大的错误，他实际上否认了每一个国家的阶级关系是主要的基础，而只用地理上的特点去解释艺术。

同时，弗理契在那个时候无意之中就已经开始批评普列哈诺夫。例如他解释普列哈诺夫的著名的“五段论”，他说：“经济——阶级——阶级心理——艺术，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

艺术的一元论的概念。”然而普列哈诺夫的“五段论”之中，恰好把阶级忘掉了，（普列哈诺夫的五段论是：一、生产力的状态；二、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关系；三、这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四、经济政治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的意识形态。）所以弗理契对于普列哈诺夫学说的解释，就变成了对于他的补充，修改和批评。但是，弗理契始终还没有认识到普列哈诺夫的错误，始终还只是无意之中的和普列哈诺夫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弗理契虽然比普列哈诺夫进了一步，更彻底的了解了文艺和阶级的关系，可是，他在文艺评论方面仍旧脱离不了普列哈诺夫的客观主义。不过一九二二年的文章里，弗理契已经指出：普列哈诺夫有的时候对于艺术的观点是没有阶级的，抽象的；他指出普列哈诺夫说俄国文学上的颓废主义“没有社会学上的基础”是不对的。

一九二八年，普列哈诺夫逝世的十周年纪念会的时候，彼列维尔藉夫派完全不提起普列哈诺夫的修正主义，甚至于不提起他在政治上的孟塞维克主义。他们认为普列哈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是完完全全的唯物论互辩法家。弗理契就和他们不同。他指出普列哈诺夫在政治上是孟塞维克，他说：“普列哈诺夫的历史概念，在俄国历史方面是所谓正式的孟塞维克的历史哲学。”然而弗理契在纪念普列哈诺夫的文章里拥护普列哈诺夫的“科学的文艺批评”论，而反对卢那察尔斯基^⑥对于普列哈诺夫的批评。这是弗理契的错误。普列哈诺夫的所谓“科学的文艺批评”，正是他的客观主义的结晶。因此，弗理契也就跟着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弗理契说马克思主

义的文学理论家的任务，研究过去历史的——只是“社会生长”方面的研究就够了，只要客观的暴露那些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或者艺术现象的社会根源。至于研究现代的当时的文学艺术，据他的意思，这种方法就不够的了。他这种论调，虽然已经修改了一些普列哈诺夫的意见，可是仍旧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够用两种根本上不相同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一种用来研究历史上的现象，一种用来研究现代的现象！普列哈诺夫的意见，本来是用所谓“科学的文艺批评”来对付“党派的文艺批评”的：照他的说法，“党派的文艺批评”是一种纯粹的主观主义的立场。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是一种阶级的立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一切科学不能够不是阶级的立场。资产阶级的学说所以不合于科学，也就不合于事实的缘故在什么地方呢？难道他只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是阶级的？不是的。这是因为他们阶级的立场不许他们接近事实，这是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需要他们说谎话。无产阶级的立场是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党派的立场是最觉悟的了解到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立场，这是合于客观事实的立场。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离开社会现实的现象，就是离开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这样，还要去凌空想出什么抽象的无阶级的或者超阶级的科学真理和客观事实，那实际上就要走到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方面去。而弗理契在这一点上面拥护普列哈诺夫的客观主义的科学的文艺批评，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弗理契虽然有的时候也主张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应该有

战斗的精神，主张文艺研究家应当同时是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他自己的工作也表示他能够有这种战斗的精神，但是，他始终还没有完全脱离普列哈诺夫的影响。他的著作里面，时常表现他对于“党派的文艺批评”的不了解。

三

然而，弗理契在一九二八年已经开始怀疑到普列哈诺夫的文艺理论的正统地位。他说普列哈诺夫不能够充分的估量到“文学艺术现象的第亚力克谛^⑦的性质”。他还具体的指出来：普列哈诺夫对于托尔斯泰，对于民粹派，对于十八世纪的法国戏剧的估量，都是普列哈诺夫违反第亚力克谛的例子。照现在的普洛文艺理论发展的程度来看弗理契的这种批评已经是不够的。然而在一九三一年之前，普洛文艺之中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反对彼列维尔藉夫主义的斗争，一般的都还是拥护着普列哈诺夫的。而当时的彼列维尔藉夫派，也是在普列哈诺夫的旗帜之下，完全肯定普列哈诺夫的正统的立场，来发展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所以照时间的先后来说，还是弗理契第一个开始怀疑普列哈诺夫的正统地位呢。

弗理契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他的“逻辑主义”。乌梁诺夫对于普列哈诺夫的这种“逻辑主义”，曾经给过极严厉的批评。这种主义是“要想在一般真理的简单的逻辑的发展之中去找到对于具体问题的答复”。弗理契研究文艺现象的时候也犯着这种毛病：他没有充分的估计艺术发展的历史的具体

性，而只想要找出最一般的发展公律。弗理契有许多地方表现他总在想找出“一般的真理”，而忽略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条件。例如他以为有什么一种“社会学——规定社会的发展和实质的一般公律的”。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这种科学。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的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企图找出这种一般的公律；事实上从原始社会的艺术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历史的具体事实和条件经过了极大的变迁，而且最古的原始社会和现在还保存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剥削之下的原始社会，它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所以这种“一般公律”是不会有。弗理契却说：“艺术的功用实际上永久是一样的。”其实，这种所谓艺术功用的内容是随着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的。再则，弗理契说有一种所谓“工业技术的社会形式”，他这是指大工业时代而说的。事实上，这种大工业时代已经走进了帝国主义的时代，他却完全没有了解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因此他把这种时代的殖民地问题完全忽略了（他的《欧洲文学史大纲》）。他的《艺术社会学问题》（论文）以及《艺术社会学》里面，这种抽象的“社会学主义”和机械主义表演得最厉害。自然，这部书里面，第一次收集了最丰富的艺术发展的材料。

弗理契对于普洛文学的见解，固然是一般的反对沃龙斯基主义的，可是，他的见解里面还部分的接受了沃龙斯基的说法；他在一篇《关于普洛文学的叙述体裁的问题》里，也说：“普洛文学家要学着去表现那巨大的人的精神界里面隐藏着一种眼光所看不见的强有力的生活。”这显然是错误的见解。弗理

契还主张对于人的描写应当是“合理主义”的。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他受着普列哈诺夫的影响太大，因为他不能够完全肃清普列哈诺夫观点之中的孟塞维克主义的成分。

自然，弗理契的功绩是很大的。弗理契说：“没有什么时代艺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社会集体的艺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艺术。”（他这句话也就否认了他自己的所谓“生活的风格”。）他还反对彼列维尔藉夫的说法。彼列维尔藉夫也说阶级艺术，但是，照彼列维尔藉夫的说法，所谓“阶级”是在阶级斗争之前发展着的，自然，也就是在社会经济形式之外发展着的，这是笼统的抽象的阶级。弗理契反对这样的主张，他一般的能够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研究艺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的基础。

一九三二，一，九。

① 互辩证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

② 弗理契(В. М. Фриче, 1870—1929)，苏联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

③ 公漠学院，即共产主义科学院，苏联科学院的前身，成立于一九一八年。

④ 波格达诺夫(А.А.Богданов, 1873—1928)，现译波格丹诺夫，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十月革命后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要理论家。

⑤ 乌梁诺夫，即列宁。

⑥ 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苏联政治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十月革命后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

⑦ 第亚力克谛，英语 dialectic 的音译，即辩证法。

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

苏联在一九三一年，经济的改造已经走进了新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时期。苏联之中的各种民族的文艺运动，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的文艺运动，也走进了新的阶段。我们这里只预备说一说俄罗斯的普洛文学，因为其他民族的文艺运动的材料，我们得到的太少了，所以不能够有什么论述。①

自然，俄罗斯的普洛文学是其他民族的普洛文学的领导队伍。俄罗斯无产阶级现在正在领导着许多以前的落后的民族，开辟灿烂光辉的文化的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这些落后民族之中大多数是亚洲的回教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字革命和文学革命，已经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才开始的，这种革命运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运动，象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欧那样，而是国际的和国内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了。这些民族的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是很有趣味的先例，将来找到材料之后，我们一定要来详细的介绍。暂时，我们且先说一说苏俄的普洛文学的新的阶段。

普洛文艺运动，在苏俄大概已经经过三个时期。第一，可

* 本篇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曾收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

以说是波格达诺夫时期，当时的所谓“普洛文化”(Proletkult)只是很狭隘的小团体，差不多完全是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化的几个工人的个人。这时期正当“战时共产主义”的战·斗·时·期，普洛文化社之中产生出来的普洛文学的嫩芽还很幼稚，对·于·一·般·的·文·学·界·还·不·能·够·有·多·大·的·影·响。第二，可以说是普列哈诺夫时期，当时的文艺论战打击了托洛茨基和沃龙斯基等的否认普洛文学的理论。跟着就开始了广大的工农通信员运动。这时期正当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的恢·复·时·期。普洛作家联盟已经形成，许多新的工人作家产生出来。文学界之中虽然还是“革命同路人”占着统治地位，可是普洛文学已经能够和他们竞争，而且开·始·在·文·学·界·之·中·的·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第三，可以说是乌梁诺夫时期，在文艺理论方面更·加·精·确·更·加·深·刻的揭破普列哈诺夫文艺理论之中的孟塞维克的成分。文艺组织方面，那也开始了群众的发展；不但在一般的工农通信员运动之中去吸收工人和农民的新作家，而且开辟了新的道路，——极·广·大·的·文·学·突·击·队·的·运·动发动了一两万的工人群众，他们大半一面在工厂里做着工，一面研究着文学，学习创作。“革命同路人”在文学界之中开始丧失统治的地位，而普·洛·文·学·的·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得·到·很·大·的·胜·利。这时期，正当苏联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改·造·时·期之中进到了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

普洛文学在苏俄的新阶段，就是这个第三时期的高度的发展。世界的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也正在这个时期开始新的发展——一九三〇年成立了世界革命作家联盟（世革联

——MORP)。中国的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也直到这个时候（一九三〇）方才形成自己的组织上的联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所以中国的革命文学界应当特别深刻的了解苏俄普洛文学的新的阶段。

苏俄普洛文学的新的阶段，提出了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具体表现，这个阶段的新的内容，主要的是一，苏俄普洛文学领导权的斗争的前进，已经使苏俄“革命同路人”的文学之中，分化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文学；二，已经提出表现五年计划英雄的任务；三，文学突击队运动的开展。俄普联的总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九三一年九月），对于这三个问题都有详细的议决案。我们在这里，可以简括的介绍给中国的文学界。

同路人和同盟军

苏联无产阶级的五年计划，开展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的进攻，阶级斗争进到了新的阶段。这使文学之中的同路人，必须明显的决定自己的地位。经济恢复时期之中的同路人文学，本来就有那种社会上的二元性和历史上的短期性。现在，经济改造时期的一切政治经济现象，自然就使同路人文学更加暴露这种真面目。

经济改造时期，是革命胜利完全巩固之后进一步的肃清资本主义根源的时期。旧时代的技术知识分子的主要干部，正在坚决的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抛弃对于“富农阶级复活

资本主义”的幻想。而文学之中的同路人，也大部分实行这个转变，或者开始转变。普洛文学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方法一切力量去保障这种转变的巩固和加强。现在普洛文学之中，有些人对于这种转变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以为同路人的转变就等于文学之中的阶级斗争的消灭。这是新沃龙斯基主义。

文学同路人之中的一部分转变成为文学同盟军，这是和一般技术智识分子的转变不完全相同的。新沃龙斯基主义却不了解这里的区别，而机械的把这两方面比较起来，说文学的智识分子也已经完全成了工人阶级的服务者。这是错误的。必须估计到文学同路人之中有各种不同阶层，他们的改造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种改造有更深刻的阶级意义。

文学同路人的主要干部的转变，经过长期的动摇。“前一时期的同路人文学，表现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开始肃清资本主义根源的时候的一种想和革命合作的倾向。”经济改造时期阶级斗争的剧烈，就引起了大部分的同路人的动摇。这种动摇的表现，就是前几年各种各式资产阶级富农的倾向，反动的倾向的加强。这些倾向之中最可注意的是：逃避现代政治，歌颂革命以前的过去时代，认为技术智识分子应当是社会上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式的实事求是主义，资产阶级式的人道主义，“革命之中的多余的人”的题材成为主要的题材，对于社会现象的庸俗的生物学的解释，理想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强有力的个人”等等。这种资产阶级意识的压迫，当然是阶级斗争剧烈的结果，不但表现在同路人文学

的右翼，使他们之中的有些文学家完全跑到了资产阶级的营垒里去，而且影响到同路人文学的左翼，——这些左翼同路人主观上固然很诚恳的梦想和无产阶级合作，可是不会正确的找到这种合作的道路。甚至于普洛文学的一部分也受着这种资产阶级意识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使同路人文学之中发生资产阶级的，孟塞维克的，唯心论的理论，例如沃龙斯基主义，彼列维尔藉夫主义，形式主义等等。

当初经济恢复时期的文学界里，同路人还占着统治的地位。例如一九二四年初，有一些同路人作家写了一封信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普洛文学运动，在这封信上面签名的人有皮利涅克(Pilnyak)，有克勒池柯夫(Klychkoff)，有亚历赛·托尔斯泰(A. Tolstoy)，还有史洛尼摩斯基(M. Slonimsky)，沙吉娘(M. Shaginyan)②。可是，现在就不同了。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社会主义进攻，使同路人文学丧失了以前的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文学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得到了很大的胜利。这种形势之中，自然发生一部分恢复时期的同路人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一部分同路人的右倾。

同时，这也就引起同路人之中的更深刻的分化，而在另外一方面形成同路人之中的真正革命的左翼。左翼同路人的文学上的将来，已经显然是加入普洛文学的问题了。他们正在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要取得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这样，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同盟军，成为普洛文学的后备军之中的一个队伍。这种分化的情形，在最近尤其明显。例如最近的创作：史洛尼摩斯基的《复马·克列史纳夫》(Foma Klesh-

neff), 列翁诺夫 (L. Leonoff) 的《莎替河》(Sot) 和《小蝗虫》(Sarantchuki), 沙吉娘的《水电中心》(Hidrocentral), 马勒史京 (A. Malshkin) 的《谢瓦史托泊尔城》(Sevastopol), 狄霍诺夫 (H. Tikhonoff) 的《游牧的人》(Kotchevniki) 等等——都已经是同盟军的作品。

可以说, 现在创作上最有价值的同路人作家, 大多数已经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或者已经接近这种立场。同时, 事实上的表现是: 凡是离开无产阶级, 离开共产主义的思想的作家, 不论他以前的天才和文学技术是怎样, 都在衰落下去, 都在艺术上也退步下去。资产阶级的作家, 以及倾向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作家都是如此。例如最近布唐切夫 (S. Buduntseff), 史克洛夫斯基 (V. Shklovsky) 等的作品, 就完全表现这种情形。

此外, 必须还要说起: 苏俄最近的农民作家已经完全变更了以前的面目, 经过了分化, 形成了“普洛的集产农民的文学” (proletarsko-kolkhoznaya literature)。这是普洛文学的经常的同盟军。

自然, 知识分子的同盟军文学还不是普洛文学; 同盟军的文学家还有好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以前的同路人文学的遗传, 对于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的了解不清楚, 对于知识分子的估量还有过分的地方等等)。因此, 普洛文学要认清同盟军文学是苏俄苏维埃作家协会之内的领导队伍, 同时还要对于他们给一种同志态度的批评, 帮助他们完全转变到无产阶级意识的方面来。

同盟军文学的发现并不就等于同路人文学的立刻死灭。第一，同路人之中有各种各式的阶层和集团，一部分还有许多动摇和犹豫，另外许多部分虽然都在改造着，可是改造的速度各不相同，还有许多作家只不过宣言申明自己的转变，而在创作方面还没有实现这种转变。第二，同路人的干部并不限于“恢复时期”加入文学界的作家；现在还有好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作家发生，这些新作家之中往往也会有很坏的右倾分子。这些新作家虽然已经是最后一批的同路人文学家，可是，他们在文学界里还会有一时期的影响呢。第三，同路人的变成同盟军，这是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取得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批评并且认识自己以前的创作道路的错误，转变到无产阶级意识的立场。这是一种新式的文学家的创造过程。

同路人之中，甚至于普洛文学家之中，对于这种改造过程还有些人不深刻的了解。例如，简单的变换一些题材，描写一些当前紧迫的问题，就以为实现了“转变”，而事实上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一种适应主义，是一种庸俗的“红色时髦”，客观上反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的。

现在苏俄的苏维埃作家（同路人的作家）事实上已经站在一个歧路上：或者跟着资产阶级和富农，或者跟着无产阶级。现在还企图站在以前的同路人的立场，那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压迫而投降，始终要完全走到资产阶级的营垒里去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恢复时期，小资产阶级还可以说：我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但是不一定赞成肃

清资本主义的根源，消灭富农阶级。现在到了经济改造时期——进到了社会主义的时期，这种立场客观上就等于赞助富农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了。

文学同路人的分化，很明显的表现在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的苏俄苏维埃作家协会的创作讨论之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从创作方法移到艺术的命运问题。

一派主张艺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工作之中的一部分，这是根据对于客观事实的认识的艺术，艺术是要有理想的。另外一派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这是由主观上的自由幻想创造出来的艺术，艺术只是一种手段。前一派是接近无产阶级的，后一派是衰落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论。

资产阶级的艺术，到了衰落腐化的时期——它的一般的倾向本来就是灵感主义，极浓厚的主观主义，丧失信仰，丧失一切理想的状态。社会主义的艺术可和资产阶级的艺术绝对相反，它将要从无产阶级的艺术里生长出来，它的特点就是理想的高尚日益增加，消灭科学和艺术之间原则上的对立，同时保存着“形象式的”思想的特性。一部分同路人（甚至于也有些接近同盟军立场的文学家）客观上还不能够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艺术是不能够并存的；他们认为“逻辑式的”思想科学和“形象式的”思想（艺术）之间的对抗是原则上的问题；他们又认为同路人文学的改造是形式上的问题。这种见解自然发展到“左倾的”取消主义：说社会主义之下只要科学，用不着艺术，说同路人的阶级性使他们不能够改造，根本上就没有改造的可能。这当然也是错误的。这

种见解的结论虽然和“纯艺术论”的资产阶级派不同，其实，它的理论基础和那种“纯艺术论”相同的。所以这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自然，最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的投降主义：说艺术的内容在社会主义之下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一样的，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分别”是永久的，说同路人文学用不着什么改造等等。

此外，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对于技术的拜物教：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是技术上的进步，忽视阶级关系之中的突变，因此，这种文学的作品之中，只有盲目崇拜技术上的改造，而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没有对于社会关系上的改造的认识。这不但是创作方法上的错误，而也是宇宙观的不正确。

同路人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分化过程，并不是题材和体裁来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宇宙观和创作方法。苏俄苏维埃作家协会之中的同盟军的文学家，他们的文艺理论和实际创作证明他们的发展是进步的，是接近普洛文学的主义的。

同盟军的文学将要发展下去，将要加入普洛文学的队伍。但是，为着这个目的，还必须实现底下的几个主要口号：赞助那包含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文学，——能够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具的文学，站在更高的艺术程度上面的文学，而反对那些在社会主义之下消灭艺术的一切种种企图，并且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是资产阶级文学的直接的继续的意见，以及认为应当保存资产阶级艺术所具有的“艺术创作的特殊主义”。

苏俄普洛作家联盟总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路人和同

盟军文学的问题,议决了许多具体的任务:(一)认为普洛作家在苏俄苏维埃作家协会的内部去工作是最重要的第一等的工作;(二)普洛批评家应当加紧的帮助同路人和同盟军,更加具体的批评他们的作品;(三)加强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斗争(普洛批评家之中,例如波龙斯基等等,对于文学之中的阶级敌人,有一种调和主义的态度,对于同盟军的作家没有积极的赞助,对于同路人和同盟军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没有正确的批评……这是右倾;而对于同路人和同盟军批评得过火,只会官僚式的不负责的叫喊,无理的攻击,夸大他们的个别错误,就说他们是阶级敌人等等……这是“左倾”);(四)帮助同路人变成同盟军,帮助同盟军转变到普洛文学的基本队伍,此外,还要加强反对文学之中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五)吸引同盟军的作家参加普洛文学团体的各种工作;(六)认为苏俄苏维埃作家联合总同盟仍旧可以保存联邦式的组织形式,而加强改造的工作,变成积极赞助同盟军,教育同路人,反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战斗团体;(七)对于苏联之内的各民族共和国以及苏俄之内的各自治区的普洛作家联盟提议:请他们按照当地的特殊情形更加加强自己在同路人之中的工作,提出同盟军问题来研究。

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

世界革命作家联盟去年对于苏俄普洛作家联盟提出一个要求,说“世界的无产阶级应当知道五年计划的英雄”。苏俄

的工人阶级自己也提出这个问题。俄普联就动员文学界去实现这个任务。俄普联总会第四次全会的时候，高尔基还特别提出“创造许多工厂的历史”的口号。

高尔基说，苏联革命的国内战争已经产生了伟大的作品（《铁流》，《毁灭》等等），而且已经开始有系统的搜集材料，预备出“国内战争的历史”，已经有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俄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也应当有文学上的反映：

要叙述每一种特别的工厂对于周围区域的影响，还要注意到风俗习惯的问题，还有这个工厂和农村的关系，厂里工人和技师的关系。结果，我们应当得到许多部书籍，简直是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百科丛书……我们要详细的知道：旧时代留下来的是些什么，现在在这些工厂作坊矿坑里做些什么。要知道国内战争之中每一种工厂起了什么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

普联全会大家赞成高尔基的提议，决定了进行这个工作。而关于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的问题，另外有一个议决案，检查已经有的成绩，规定以后的工作方针。

普联全会认为已经有的成绩还很小，只能算刚刚开始。苏俄各地方的普洛作家和苏维埃作家，还没有完全动员。普联的批评家还没有开始估量这些作品。

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的工作，意义是很大的。这种工作是要普洛作家去描写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工人群众，描写工人之中的新式的人物……这可以促进各地方的普联的改造，加强普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的联系，使一切普洛作家

密切的参加工厂的日常生活。这是要理解“普洛文学的总题材——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表现社会主义竞赛之中的英雄，深刻的综合和理解他们斗争的经验，他们改造世界的实际工作以及他们改造自己的实际工作”（“Pravda”报^③，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一）。

关于这个问题，也发生许多错误的意见。有些人说，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是“临时的任务”，是“应时的工作”，而普洛文学另外有自己的总任务呢。他们说，报纸上的报告文学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这种意见是右倾的机会主义。另外有些人说，“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的斗争是极严重的任务，而这种表现劳动的英雄的文学仿佛是另外一种不关重要的事情。他们说，这种描写时事的文学要写得快，所以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作品。他们说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只能够用轻巧的体裁，例如报告文学，游记等等，而不能够用重大的体裁，象长篇小说，严重的歌剧^④等等。他们机械的把题材和宇宙观分开，仿佛只要题材是工厂里的生产问题就够了，用不着问这种作品的宇宙观是不是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还有些人，认为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只是搜集些零碎的时事，来写些小品文章，说这是“废物利用”的文学。这种意见，结果是否认艺术上有价值的普洛文学有造成的可能，这是托洛茨基的孟塞维克的文学观。

苏俄普洛作家联盟总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却认为：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是“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的斗争的一部分，这是为着第亚力克谛唯物论的方法而斗争，这是检查普洛文学

运动的基本口号的正确，这可以使俄普联的创作纲领更加丰富，创作方法更加进步。所以更加要开展创作问题的讨论，对于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要自由的发表意见。

现在已经有的表现五年计划英雄的作品，质量上是不大好的（只有很少的例外）。所以更加要加强经常的坚决的斗争，去争取马列主义的宇宙观，争取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的创作方法。

有几篇报告和游记，还有些官样文章，时髦标语的毛病，不会表现活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队里的活人；或者把先进分子的突击队员描写得成个完全孤立的个人，完全和群众的集体隔离的；或者相反的，只会笼统的描写集体，描写群众，描写得没有面目的，没有个性的。于是乎有些报告之中，把实际上很复杂的“人的改造”写得非常之简单，变成了一种死板的公式。还有些报告之中发现一种“技术主义”——技术的过程把人的阶级斗争遮盖住了，不会在艺术上着重的描写这种技术改造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一部分也是由于普洛作家对于技术的研究太不充分。这些种种错误的根源，却是创作方法上没有充分的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的训练，没有充分的马列主义的宇宙观。

普联四全会关于这个问题，决定了些具体的任务：（一）立刻实行日常的检查，检查表现五年计划英雄的工作成绩，实行各地方普联之间的竞赛，实行各地方普联之间的互相调查；（二）俄普联的各种杂志和苏俄苏维埃作家联合总同盟的机关报《文学报》要经常的登载这些作品的批评，严厉的暴露一切

错误，以及那种适应主义的“红色时髦”的作品；（三）普洛批评家应当严重的注意这些作品的具体的个别的批评，深刻的研究许多新的创作问题；（四）表现五年计划英雄的全部工作，应当和高尔基同志所提出来创造“工厂历史”的工作联系起来；（五）苏俄的一切地方的普联都要立刻开始执行这个工作；——“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给国际无产阶级看！”

文学突击队运动

一九三一年，苏俄普洛作家联盟和苏联工会中央总会共同发起了工人文学突击队的运动，号召在工厂之中的工人，对于文学有兴趣的，自己在工厂里组织文学突击队，组织文艺研究会，加入普联。八九月间，这些文学突击队队员的数目已经有八九千人。原来俄普联的会员只有一千八百人光景，这些工人加入之后，就有了一万多人了。

这种运动的发展，表示社会主义进攻的力量真正普遍的发动了广大的群众，真正是在一切种种战线上的进攻。

文学突击队的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革命的成绩。苏俄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它的发展趋势是要消灭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的。文学突击队的工人新进作家的出现，就指出这种趋势的前途。而且，文学突击队运动证明了普联的真正改造已经开始：普洛文学运动比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速度的落后，因此可以纠正，普联的干部因此可以工人化，布尔塞维克化，普联的组织方才真正的群众化，而且

使世界上第一次发生完全新式的文学家。资产阶级的社会里，至多只有变成文学家的工人，这种工人做了文学家之后，就不能够仍旧是工人了。而现在是发生了真正的做着工人的文学家。

文学突击队运动发起了不上一一年，普联本身的组织完全改换了一个样子：普联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团体，普联会员之中百分之八十是工人，普联的下层支部大大的积极起来，工厂作坊里的普联组织也成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团体，而普联的领导机关里有更多的工人参加——最好的文学突击队队员加入了领导机关。

同时，必须指出现在的突击队运动还有多少缺点。有些地方，没有充分的估量到工人群众对于文学艺术的热心和文化程度的增高，以为只有很少数的工人来参加。而结果，事实上表现出来：工人群众之中有很多对于文艺非常之有兴趣，有很多文学的天才。因此，格外显得这种地方的工会和青年团的机关没有出力的参加这个运动。有些地方，进行这种运动的方法又太笼统了，太不具体了；没有去切实的挑选普联的经常会员，使他们固定在文艺研究会里面，使他们认真的开始研究文字的技术，研究专门的文艺理论。结果，只开了几次群众的会议，宣传了些一般的普洛文学的原则。还有些地方，因为普联的领导机关看轻这种重要的任务，所以没有认真的在突击队员之中去工作。结果，开始加入突击队的许多工人，无形之中和普联的组织脱离了关系。自然，这种运动的初期，会有些偶然的分子加入，他们仅仅对于文艺有些兴趣，未必一定

能够经常的做文学工作。这种分子的退出是当然的现象。然而退出的人太多的地方，却一定是当地的普联机关没有去切实的工作。

新进的文学突击队的工人作家，已经有了好些作品发表。他们的创作，都表现他们是在努力执行阶级的任务，替自己的阶级服务，竭力要想创造战斗的行动的文学；要想描写普洛文学的总题材，——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表现工人的集体，表现对于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形成和生长，表现社会主义企业之中劳动的积极性等等。大多数的作品，都是描写当前紧要的政治经济问题，描写自己工厂里具体的任务。

自然，这些作品大半都还是幼稚的作品。他们在现时的新的基础上，重复着普洛文学的初期的缺点，暴露出现在这一辈工人作家的通病：文化程度的不充分，宇宙观的不清楚。这些缺点是：题材的狭隘，公式主义，行会主义，旁观的消极态度，盲目的模仿。甚至于有几篇作品表示了很大的弱点：受着了阶级敌人的文学理论和倾向的影响。所有这些情形更加加重了教育突击队的任务：要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要为着取得马列主义的宇宙观而斗争。

普联的成名的作家，普洛文学的旧干部的经验，将要帮助这些群众的新作家的学习和进步。普联十年来的理论和创作的成绩，以前所决定的，以前所研究出来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将要对于这些新作家有极大的推动力。而且文学突击队的运动，以及这些工人新作家的创作，都更加证明了以前的口号的

正确。

因此，普洛文学的新工人干部的训练，以及普联组织的切实改造，都是现在的最重要的任务。普洛文学的旧干部必须完全担负起这种责任来。

文学突击队运动的现在阶段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加入文艺研究会的突击队员的创作进步起来，使他们作品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程度增高起来，使他们能够取得第亚力克谛唯物论的方法。文学突击队之中的工作方式，主要的是“个别的教育，个别的批评”，总之，是要对于每一个新作家给他个别的指导，对于他的创作要有个别的观察。普联的组织应当设立各级的创作顾问会，文艺理论顾问会。这种顾问会(Consultation)应当是有威权的。还要组织各种小的创作社，突击队员的个人创作研究……。这样就可以经常的留意新作家的创作方面的发展。

同时，继续经过突击队的运动，去吸引新的工人分子加入普洛文艺运动。现在普洛作家参加“国内战争历史”和“工厂历史”的文艺丛书的编著，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吸引老辈的工人：各种工厂之中资格最老的工人，以及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工人。最近第一批的文学突击队之中的大多数，还只是工人青年呢。

总之，普洛文学发展的前途，“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的创造，都先要实现一个决定一切的条件：这就是苏俄普联的整个组织积极的来注意文学突击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普联的批评家和一切杂志的编辑委员会，都要注意这个工作，经常的有

系统的批评和研究突击队员的创作。

关于文学突击队的运动，苏俄普联的四全会决定了底下的几种具体任务：（一）开办许多文学夜校，使工人的普通教育和文学教育联系起来；（二）重新规定文艺研究会的教育纲领，分别各种不同的程度编辑各种文艺常识的小丛书；（三）在莫斯科设立中央文艺顾问会，检查各地方文艺顾问会的工作，并且在各地方的普联之下特别设立突击队问题研究室；（四）设立文艺函授学校；（五）各地方的普联都要经常的检查各种文艺研究会的成分，防止阶级敌人的奸细。

苏俄普洛作家联盟总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确是普洛文学运动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普洛文艺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现在不是几个个别的工人作家走进了“艺术之宫”；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造创造了新的文艺，新式的文艺家，向着艺术的真正群众化方面发展。现在不是简单的描写工农生活的文艺就可以自称普洛文学，和贵族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对抗，而是普洛文艺开辟了完全克服贵族资产阶级文艺的前途。现在已经不是研究讨论普洛文学理论的初期，还容忍着很多方面的错误，而是已经肯定了马列主义文艺的总路线，反对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反动动摇模糊的倾向，而展开文艺之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这就是苏俄普联的“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大艺术”的总口号的意义。

一九三二，一，一六。

① 苏联文学界的组织是按照民族的言语的区分而组织的：苏维埃俄罗斯有苏俄普洛作家联盟（俄普联——RAPP），其中最大的团体当然是莫斯科普洛作家联盟（莫普联——MAPP）和列宁城普洛作家联盟（列普联——LAPP）。苏维埃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后高加索等也同样有这种作家联盟。这些各种民族的普洛作家联盟联合起来，方才是苏联普洛作家总联盟（苏普联——VOAPP）。此外，各地方的农民作家也有自己的团体，例如俄罗斯的各地方农民作家的联合团体，就叫做俄罗斯普洛集产农民作家联盟（俄集联——ROPKP）。非普洛的作家另外有自己的联合会，组织上不大相同，这叫做苏俄苏维埃作家协会（俄苏协——VSSP）。这些普洛作家，农民作家以及苏维埃作家的团体，根据联邦式的原则而组织了一个全苏俄的文学总联合会，叫做苏俄苏维埃作家联合总同盟（俄苏总——FOSP）。红色海陆军文学会（LOKAF）也加入这个总联合会的。——作者原注。

② 皮利涅克（Б. А. Пильняк, 1894—1937），现译皮利尼亚克。克勒池柯夫（С. Клычков），现译克雷奇科夫。亚历赛·托尔斯泰，即阿历克塞·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史洛尼摩斯基（М. Л. Слонимский; 1897—?），现译斯洛尼姆斯基。沙吉娘（М. С. Шатинян, 1888—1982），苏联女作家。

③ “Pravda”报，即《真理报》。

④ 严重的歌剧，即古典正统歌剧，有别于轻歌剧。

缺 页

萧伯纳在上海

(部分)

一九三三年二月，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来华游历，十七日到达上海。当时上海的各式人等在中外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萧伯纳来华的形形色色的文章；在鲁迅的提议和协助下，作者将这些文章辑为《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后收入《南腔北调集》），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书屋出版。本辑收入该书中作者所写的引言、按语、补白以及杂文小品等十八篇。

写在前面*

——他并非西洋唐伯虎

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功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①似的。他说真话，一定要传做笑话。他正正经经的回答你的问题，却又说他“只会讽刺而已”。中国的低能儿们连笑话都不会自己说，定要装点^②在唐伯虎徐文长^②之类的名人身上。而萧的不幸，就是几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这么一个“戏台上的老头儿”^③。

但是，真正欢迎他的，不是这些低能儿。事前的“欢迎者”，各自怀着鬼胎，大家都想他说几句于自己有益而刺着别人的话。而事后一些“欢送者”，就大半瘟头瘟脑——大失所望。“和平老翁”，变成了“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④了。

可是，又舍不得他这个“老头儿”，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当做凹凸镜，在他之中，看一看自己的“伟大”而粗壮，歪曲而圆转的影子；而事实上，各人自己做

* 本篇曾以《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为题，收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二卷。

了凹凸镜，把萧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拗掇得象一副脸谱似的：村的俏的样样俱备。

然而萧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反对那些干文字游戏的虚伪“作家”，他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的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奋斗。他战胜着自己身上的旧社会的玷辱和污点。他并不吊住在自己的迷误的“主义”和“思想”上，而昧着良心来诅咒新社会的产生。他只见到过“改良”，而事实却是“革命”，他没有因此就恼羞成怒；相反的，他立刻向着“革命”开步走。^⑤于是乎那些卖人头的，都嘘嘘的“欢送”他。

所以真正欢迎他的，只有中国的民众，以及站在民众方面的文艺界。中国的民众并不当他是什么“革命的领袖”，“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更不会当他是偶像。他们认识他现在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

我们收集“萧伯纳在上海”的文件，并不要代表什么全中国来对他“致敬”——“代表”全中国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⑥洋文的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我们只不过要把萧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萧伯虎”的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① 唐伯虎(1470—1523),名寅,字伯虎,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

② 徐文长(1521—1593),名渭,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

③ “戏台上的老头儿”,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大晚报》发表张若谷《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一文,记述了世界笔会中国支会召开会议欢迎萧伯纳,并向他赠送京剧人物脸谱的情况。萧当时曾问:“这是不是中国的老爷?”张答:“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老头儿。”

④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报》曾刊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二月十七日该报发表社论《萧伯纳究竟不凡》,攻击萧伯纳“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

⑤ 萧伯纳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政治组织“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三一年还访问了苏联。

⑥ 九四老人,指马相伯(1840—1939)。马为清代举人,近代教育家。当时他年九十四,自称“九四老人”。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大晚报》刊载他的答问中,曾记述他的话:“老迈如余,请代表‘老大中国’一言。”白俄公主,同年二月十九日《上海霞报》(白俄报纸)曾发表的署名“Mery Devid”的《我们和萧》一文。此文收入《萧伯纳在上海》时,编者曾加附言:“这里的署名写着‘Mery’,是一位‘女作家’,当然更是公主了。”

Welcome*

Welcome 伯纳萧! 欢迎伯纳萧!

但是，上海欢迎萧伯纳，以及关于萧伯纳的文章太多了，挤在一起似乎不大舒畅。因此，我们决定把这一栏再分成上下两半截。一时想不出适当的两个标题。可巧《申报》的《春秋》上有这么一段话：在此“不顾生命，只求幽默”的潮流中，世界第一流幽默文学家萧伯纳老先生，居然抱着“温和的傲态”，光临“渠以为殊有兴趣的中国政府”^①治下的中国。中国是否有什么“不顾生命，只求幽默”的潮流，倒还并未查考出来；不过这却便宜了编者——我们就机械地把这个“潮流”的尊号截成两段：上半截叫做“不顾生命”，下半截叫做“只求幽默”。

这种“割裂”完全是机械的，别无其他用意——特此申明。

* 本篇为《萧伯纳在上海》第一部分的引语。“Welcome”，英语“欢迎”的意思。

① 这里的引文，均见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春秋》所载署名“百合”的《萧伯纳游华》一文。

《一半儿恨他一半儿爱》按语*

许啸天先生也注意到了“萧的这一次转变”，要把“移转在民众手里”。许啸天先生说：“萧先生，快来归我们！”这“我们”是谁？是民众？许啸天和民众——倒是一个新题目。这当然很好，也许许先生也要“转变”了。

但是“接受诺贝尔的奖金”^①是可恨，而“参与所谓社会主义运动”是可爱，这是什么道理，我们不懂。这里的逻辑，似乎和《大晚报》骂的“坐在安乐椅里又要谈共产主义”是一样的。对于左倾作家的这种责备或者谩骂，都是跳不出一种市侩逻辑。不管是好意或者恶意，这种论调其实有点儿滑稽。

萧接到诺贝尔奖金归他所得的消息的时候，他说，他们把这奖金给我，是奖励我这一年没写什么东西——没有开口。他拒绝了接受这笔款子，而把这八千金镑捐给了瑞典的穷苦作家。他还说过：“进益不平均，社会就永远得不到安静”，假使有一位千万的富翁，把资产分送尽了，那么，社会还是一样，并且更多了一个穷人。他觉得不是根本的改革，浮面的救济是

* 本篇原载《萧伯纳在上海》第一部分中许啸天《一半儿恨他一半儿爱》一文之后。标题为编者所加。

无用的。

如果许啸天先生所了解的“快来归我们”的意思，只是要使社会上“多一个穷人”，那么，从他的“吃屁中之屁”起，直到“快来归我们”而止——这全篇文章都只是滑稽或者“幽默”，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廉价的“幽默”和糊涂的推论，似乎也是一种病症。

〔附〕

一半儿恨他一半儿爱

许啸天

……我们红叶会同志……也是“矮子吃屁”式的跟在人家尊臀后面赶着印出一张专号来，而我的写这几句，更是吃屁中之屁。

提起伯纳萧，叫我一半儿恨他又一半儿爱他！这位宝贝，在戏剧上的态度，我可以在他自己写的一个剧本《鳏夫的家庭》里特仑池^②所说的一段道白为代表。特仑池一方面反对残酷的资本家，而一方面又舍不得其资本家女儿迷人的劲儿；他迷糊了！他徬徨了？便说出一句不彻底的话来道：“我愿娶你的女儿；可不要你从不道德攫夺得来的财产，一丝一毫也不要！”要女儿不要财产，行吗？……果然他终于不彻底的娶了资本家的女儿，又接受了他的财产。

如今我们这位萧先生，他一方面也参与所谓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又去接受诺贝尔的奖金，这还不象那特仑池的一句话吗？

“你的女儿，我是要的；你的钱，我可不要。”

如今我们的萧先生听说是转变过来了！我实在爱萧先生！我同时又实在恨萧先生！萧先生天才的伟大，以及他理想的清晰，纵横驰骋，无所不利。他是戏剧家，是政治家，是社会学家；同时又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剑。我希望萧先生这一次的转变，把他的剑柄移

转过来，移转在民众手里，——萧先生！快来归我们！

——《红叶》，第一二二期。

① “接受诺贝尔奖金”，萧伯纳曾于一九二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金，以瑞典化学家诺贝尔（A. B. Nobel, 1833—1896）的遗产为基金设立的奖金，分物理、化学、生理及医学、文学、和平事业、经济学六种。自一九〇一年开始，每年发放一次。

② 《鳏夫的家庭》，现译《鳏夫的房产》。萧伯纳于一八九二年创作的剧本。特仑池，现译屈兰奇，该剧中的一个青年医生。

儒林最新史——倡优苦*

第零回 断发文氓枉操夷语 满堂花脸难识人心

话说当天下午三点多钟，萧伯纳等就离了世界学院，回到孙夫人家去了，按下不表。却说世界学院的小客厅里，只留下几个当差的在收拾屋子；其中有一个叫做王七，从前当过西崽，会说几句洋泾浜^①，他指手画脚的把萧伯纳说的什么，讲给大家听，扫帚都丢在旁边，地也不扫了。碰巧一个小职员，绰号叫做老大的走了过来。这老大的英国话自然说得比王七好些。他听王七乱说，就驳了他几句，这样，两个人就争论起来。王七说，他明明听见萧伯纳指着老生的脸谱问是不是中国的老爷。老大说不是这么一回事。王七就说，“那还要争，当时那位朱如洞先生^②，头发剪得齐齐的，刷得雪亮，一身好洋装，比你老大漂亮多了，人家是留学生，强似你这个土老头儿；他就回答了萧伯纳说：——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老头儿。”老大说，“嘿，那朱先生我知道，他就听不全，他讲的洋泾

* 本篇原载《萧伯纳在上海》第一部分中张若谷《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一文之后。

浜，只有你懂得，你看见萧先生理他没有？”王七说，“那白头发老先生自己就不懂自己的大英话！我服侍过不少洋大人，也没有见过他那么大模大样的。他配当老爷？老爷只有象朱先生那样的人，才当得。他就算懂得，听人家说，那个象他自己的老生脸不是老爷，他也要恼羞成怒，气得不理人罢了。”老大道，“好，你和你的朱先生只会这样使小心眼儿。告诉你罢，那萧老先生说的是：中国戏台上的脸，一看就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谁是文官，谁是武官，谁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清清楚楚；我们世界上的人，倒难对付得多，搽脂抹粉，装腔做势，明明是洋奴，偏要充英雄，这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王七瞪着两只眼，一时说不出话来。

早知后事如何，不必下回分解。

〔附〕

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 张若谷

我们的汽车，才停在莫利爱路故孙总理住宅的门前，看见一个穿灰色大衣的外国老头儿，白发，白须，高鼻子，粗眉毛，小眼睛，从门口踱出来。预先候在门外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们顿时把他包围起来。洪深充作临时翻译，对记者们说：“三点钟请诸位派代表再来，伯纳萧先生预备接见新闻记者，以六人为限。”

伯纳萧钻到宋子文的私人汽车里，我们的汽车，紧紧跟在后面，在霞飞路上疾驰，一直向福开森路世界学院开去。我看时表，是两点三十五分。

在世界学院一间精致的小厅里，已经有十几位男女在那里恭

候。大半都是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会员，有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团圆面孔静如好女子般的梅兰芳，胡鬚象刺猬般的鲁迅，还有叶公绰，杨杏佛，林语堂，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以及其他与政治文艺都有关系的名媛与要人。

洪深真是一个热心的导演，他忙着要把这一群的男女临时支配成一个舞台场面，他请萧老头儿坐下来，但是这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不知是要学习中国礼貌呢还是要表现他的不老的精神，仍旧象一尊石像般兀立在中间，大衣也不脱卸，便和来宾一一握手行接见礼。

不懂中国话的伯纳萧先生，和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彼此相见了。萧老头儿辟头第一句，并不说久仰岂敢一类的客套，他在白胡鬚下露着笑容说：

“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物吓！”

他这一句话，无非是说梅兰芳是一个做戏的，他是编戏的，彼此都是舞台的人物。但是此老颇有矜夸他和梅兰芳都是所谓世界名人的意味。梅兰芳，自然极客气地说了许多景仰和不胜荣幸一类的答词。

常被人家用许多问题诘问的萧老头儿，他乘梅兰芳还没有提出请教一类的话前，先下手为强，他便问道：

“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若使叫英国的小孩子听了，一定会发惊疯的。”

梅兰芳很和婉地回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

萧老头儿被强迫坐了下来，大家都静穆地围着要求他讲演，他

仍旧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突然从皮椅子上站了起来，照例说了一声：

“小姐和君子们请了……”

他接着用演说者应有的声调说了一大套表示他不愿意也不预备在上海作什么演讲。他说“我到这里来，好象是动物园中的一件陈列品，你们既已经都看见了，我想也不须再多说话了。”他最后表示很愿意受座间任何人很随便的质问，只要不是严肃而非沉闷的，他都愿意答复。

不知道是那一位先生，叶公绰呢还是林语堂，问道：

“先生为什么理由，不吃肉？”

“我不喜欢吃，便不吃，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主义。”

若使别人说了这一句没礼貌的回答，也许要使人生气，但是萧老头儿是一个著名爱说俏皮话的，大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地大笑起来。

现在是轮到送纪念礼物的时候了。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装了十几个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萧老头儿装出似乎很有兴味的样子，指着一个长白胡须和他有些相象的脸谱，微笑着问道：

“这是不是中国的老爷？”

“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老头儿。”我对他说。

他好象没有听见，仍旧笑嘻嘻地指着一个花旦的脸谱说：

“她不是老爷的女儿吧？”

当许多人围着萧老头儿在争看那个小玩意儿，鲁迅一个人，似乎听不懂英国话，很无聊地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一忽儿他安步踱出

到外面另一间里去了。

十分钟后，我们的汽车跟着宋子文的自备汽车，我们又在宋庆龄女士的住宅前了。

最初是由充任临时翻译的洪深，林语堂传达道：“请新闻记者们公举代表六人进去。”

但是可爱的萧老头儿，不要叫人失望，他征得了房东太太宋庆龄女士的同意，把所有中外新闻记者们，都请到草地上去了。

雪白胡须的老头儿，先立在一只鸽棚前：想去抚摸一只无知小白鸽，那小东西扑的一声飞走了。

记者们，老是那样地提出了许多很严肃的问题，要他发表关于远东，中国，东北，社会……各种的意见。他也老是用着他习惯对付新闻记者的方法，象调侃又象讽刺说了一大篇谈话（详见今日各报所刊伯纳萧谈话）。中间有一个外国报的新闻记者，听见他揶揄苏俄革命的成功，和萧老头儿争辩了许多时候。老头儿照样说着俏皮话从容回答。宋庆龄女士脸上表现满足的神情，站在草地石阶前。闭紧着将要笑出来的嘴唇，很有兴味地倾听萧老头儿巧妙的议论。

三点廿五分了，我因事不得不离开萧老头。当我离开那个只能在上海勾留八小时的爱尔兰七十七岁老人时，我看见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和刺猬须发的中国老作家鲁迅，他们二人正静穆地站在草地一旁，仰头望着天空看云，我行色匆匆，也来不及问他们对于萧老头儿有什么意见了。

二月十七夜。

——《大晚报》，二月十八日。

① 洋泾浜，原为上海地名。自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当地居民接触外国人较多，对话时常用一些不合规范的外语（多为英语），人们因以“洋泾浜”借指不规范的外语。

② 朱如洞先生，此系暗讽张若谷。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当时的投机文人。

《马相伯老人之答问》按语*

马相伯老先生的话，句句都“对”！不过“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是说：人是越旧越好，军器是越新越好。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或者假抵抗，大概就是因为老人太少而新军器也不够，等够了大概就可以抵抗了？现在不是在募飞机捐吗？还少一种“制造老人捐”，尤其是加特力（天主教）式的老人应当加工制造。此外，马相伯先生是老前辈，总还记得慈禧时代的“兴复海军捐”和袁世凯时代的“爱国储金”罢。所以马老先生向萧老先生去募飞机捐的时候，假使他真要“代表”老大中国，那么，除掉申说“非众寡之势不敌，乃新旧之器不同”的理由以外，请他不要忘记告诉萧先生“兴复海军捐”和“爱国储金”等等的经验。假使竟忘了，那真是老得只剩“幽默”了。

〔附〕

马相伯老人之答问

余读今晨《时事新报》载萧伯纳香港旅次来电，称伊此来正欲反叩中国人民，对于余及西方人之意见若何。老迈如余，请代表

* 本篇原载《萧伯纳在上海》第一部分中《马相伯老人之答问》一文之后。标题为编者所加。

“老大中国”一言。

余忆一八八四年访英时，观光牛津剑桥大学，彼时希腊古剧尚流行；如今萧氏一流之新剧，不仅能在英国扮演，且推广至其他国家，此余对于萧氏之彼，不禁有今昔之感。且其时爱尔兰在英压迫中，禁用其语言，今爱尔兰自治邦得公然提倡，励行国语教育。萧氏为爱尔兰人，虽似不关切此种事，当亦熟悉也。余之感想，中国成语“人惟求旧，器惟求新！”与古经有“太阳之下无新世事”相印证，我国人民，方羡慕爱尔兰之恢复独立自主，以其发扬加特力宗教之精神，不知萧氏，亦有怀旧之心乎？惟余在国难时期，夙主张人民自救，诚以我有四万万七千万人民，果能发奋自强，真如萧氏所谓，“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世有谁人能与之抗？”惟我国以机械军器不如人，故日前受困于东邻岛国，非众寡之势不敌，乃新旧之器不同。希望我执政当局，采萧氏“China help thyself”^①之嘉言，努力救中国！此则应向萧氏，表示余之同情。余尤希望国人效法爱尔兰人，求独立自主之精神，以抵抗暴日到底，故目前对平津热河，更誓死自卫，诏告世人，民为邦本，造成民治之新中国。

——《大晚报》，二月十七日。

① “China help thyself”，英语，“中国自助”的意思。

张资平著作义务广告*

《跳跃的人们》——一九三〇年出版，主仆恋爱，姊弟恋爱，以宣传劳资合作为宗旨。定价大洋若干角。

《恋爱错综》——一九三二年出版，内容和前书相仿佛，然决非雷同翻版可比，因书中人物之姓名略有改易，详细情形亦稍有变动，而宣传劳资合作一点则更着重，特别露骨。定价大洋若干角。

《萧伯纳论》——全文见《申江日报》附刊《海潮》第二十一期，此文并未将宣传劳资合作之张资平与“真正老牌”马克思主义者(或“Ultra-marxist”)①之张资平“相提并论”，故不至于不伦不类，而对于中国文人之认萧为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一事，亦能无中生有，毫无实例，即加以肯定，笔力之强可想而知，殊有百读不厌之价值也。定价大洋若干分。

* 本篇原载《萧伯纳在上海》第一部分中张资平《萧伯纳论》一文之后。原标题作《〈义务广告〉张资平著》。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之一。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堕落为汉奸。

“革命的表现是在行动，——并且要是永续的行动！”我常常以这句话来批判在中国最流行的伪革命家和伪马克思主义者(Pseudomarxist)。现在我又要这句话来批判萧伯纳了。即萧伯纳决不能称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作家。……

我国文人竟有以“萧伯纳之读资本论先于列宁”夸示于读者，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发见，这又何苦。至于拖着不必要的尾巴说，“就 Humourist^②一点，我国有××足与萧伯纳相提并论，更是不伦不类了。……”

——《海潮》，第二十一期。

① “Ultra-marxist”，英语，意为过激的马克思主义者。

② Humourist，英语，意为幽默家。

呶萧的国际联合战线*

萧伯纳到中国来，在香港就放了一个大炮——“宣传共产”^①；在上海也没有说什么好话——很有鼓动民众推翻戏子统治的嫌疑；^②在北平又骂“中国过于酷爱和平，反受和平之累”（二十二日《申报》）。这老头儿最爱说人的坏话，自然是讨厌而可恶得很。他既然处处得罪人，难怪引起了国际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

英国的上海政府半官报，《字林西报》，骂他想做鲍罗廷^③。

中国的上海当局半官报，《大陆报》和《大晚报》，^④骂他“不诚恳”，骂他“卖狗肉”。

日本的上海殖民地机关报，《每日新闻》，骂他怕老婆。

白俄的上海移民机关报，《上海报》，骂他“挂羊头”（下半句和《大晚报》同）。

上海的国际联合战线还不够，在北平，因为胡适博士的主张——那主张也很“幽默”的——学界和教育界拒绝招待他。

这联合战线煞是好看。因此，我们把萧伯纳一九三三年游华事件的“呶萧文件”都收集在这里，请大家看看。

* 本篇为《萧伯纳在上海》第二部分的引语。

① “宣传共产”，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申报》曾刊载路透社十四日发自香港的电讯，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

②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字林西报》报道萧伯纳在上海曾说：“中国的民众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

③ 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 1884—1951)，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由孙中山聘任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中起过积极作用。

④ 《大陆报》，美国人密勒(F. 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字林西报》的“幽默”

——萧伯纳和鲍罗廷

萧伯纳到上海的那一天，《字林西报》的记者大概没有单独见着他这位贵同胞，因此也没有能够和他谈几句“体己话”。是萧太不爱国了，不以大英帝国的“臣民”自居，不肯单独的接见上海的英国政府半官报的记者呢？还是那位记者先生“不屑”去见他？这是无从查考的了。总之，《字林西报》之内发现了一个什么 In Parenthesis——“引号里”先生，而萧伯纳之外，又出现了一个 Mr. George Bernard Shaw——呶萧求纳。于是乎《字林西报》上就登出了这位 Mr. 呶萧求纳接见“引号里”先生的谈话记的“幽默文章”：

〔附〕

In Parenthesis——引号里

一个谈话

“Houp-la，我们又在这里了！” In Parenthesis 奉命去访问 Mr. George Bernard Shaw 的时候，他仿佛受着一个突然的打击，而那位上了年纪的老教员正在面对着窗洞看那甲板上走过去的船长。In Parenthesis 站在呶萧先生的舱门口，慎重的咳了一声嗽，而这篇文章开始就写着的那句话，却使得那位哲学家回过身

来，他向着可能的访问记者说：

“你要什么？”

就是这模样，不过还要严肃些，假使你们懂得这个意思。也许应当写下来：“你要什么？”

“我是 In Parenthesis，呸萧先生，我奉命来调查：你要想把你的伟大归在什么上去。”

“谁说我是伟大的？”这个长胡须的滑稽家就问了。

“好罢，你晓得，Sir①，”访员就回答了，“有些人以为你伟大，有些人倒是另外一种意见。我是奉命来调查你的伟大是属于那一方面的。”

“主要的是因为人类都是些蠢货，他们永久不会找着我。”

* * *

“假使他们找着了 you，你的提议是要他们想什么呢？”

呸萧先生停顿了一下，就说：

“为什么你要提议叫人类去想呢，我在最近四十年来一直在这里替他们思想呢。”

“你以为世界是非常之感恩的吗？”

“没有利润是不带着尊敬的，除非在自己的国家里。”这位哲学家象宣读判决词似的说了。

“Sir，我还要问一问，你是否的确是那样想呢？”

“我的小孩子，我在你没有出生以前很久的时候，也曾经和你一样的想法。你难道真的以为你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就一定每一次都有什么意思吗？”这位伟人说了这句话，还斜着眼睛看我们，“你知道，我并不想丢掉一颗难得的珍珠，但是，为什么我一定不可以用整串的珍珠去装饰 Gadarene②的项颈呢，我无论如何也不懂得。不过，你到底说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好呵，Sir，我说过，我是来要求你的谈话的。”

“我向来不发表什么谈话。有时候，一个偶然的访员自然也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来偷窃一次谈话，然而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能够为这一类的事来枉费。”

* * *

“但是，呶萧先生，他们说你在香港劝二十岁的青年做共产党？”

“他们为什么不应当做呢？难道你以为对于他们——做一个真正道地的革命党，倒比熟读我最近四十年来所写的昏话要好些吗？”

“然而我坚决的以为这是昏话，呶萧先生。”访员冒险的说。

“我对于你的思想过程是不负责的，青年人，而且这个事实给了我很好的安慰，尤其现在我看见你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当他们被共产主义纠缠住了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枉费自己的金钱去买 H. J. Bells(韦尔斯的“改姓”——译者)，或者我所想得到的别些废话商的梦话了。”

“但是，”访员又冒险了，“你是否以为布尔塞们(布尔塞维克的缩写——译者)还有比你更能干的人材，他们会宣传他们的教义，而你却把这种教义拉在自己身上。Micheal Borodin(鲍罗廷)之类，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

“假使你的意思是我所非常之怀疑的，”呶萧先生回答，“那我就不知道这算什么。”

* * *

“好罢，”访员被呶萧先生的态度弄糊涂了，就这样问他——“你可知道：

‘你是老了，威廉爸爸’——那青年人说，——

‘你的头发已经白了；
‘你还是不断的要把脑袋放在底下，
你想，在你这样的年纪，这是不是对的呢？’”
“Houp-La，”呶萧先生回答说，“我知道怎么答复你：——
‘我年轻的时候，’——威廉爸爸回答，——
‘我怕这要使得我的脑筋腐败，
但是我现在是完完全全的呶萧，
我没有什么了，
为什么我还要做了又做呢！’
你出去的时候，青年人，随手把门带上了罢。”
于是乎他转过身去，把背朝着访员，而又面对着窗洞了。

——《字林西报》，二月十八日。

《字林西报》似乎出了一口气，萧伯纳被它刺倒了！帝国主义的大人先生和小访员之流，其实自己倒是这样想着：“没有利润是不带着尊敬的；除非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萧伯纳收一点儿版税，坐一趟周游世界的“不列颠皇后”^③，还得着殖民地民众的真正的尊敬。这难道是“亿万富翁”的殖民专家所眼热的吗？当然不是！他们是讨厌他不肯变成“僵石”。他们自己拿着枪炮飞机到殖民地上来购买“尊敬”，搜括几万万民众的膏血，而萧伯纳之流偏要来戳穿他们的西洋镜，所以可恶，所以说他是抢了鲍罗廷的饭碗。如果萧伯纳是把自己的脑袋“放在底下”，那么，这班“殖民专家”——Colonisators 是要把殖民地民众的脑袋永久捺在地下。

抬起头来罢！抬起头来，向这些帝国主义者说：我们的确不愿意做僵石，我们要请你们出去了。出去罢，去！去！——

假使你们到那时候，慌乱得来不及随手带上中国的大门，那也可以不必费心了！

附记：《字林西报》的记者只访问到了一个 B.G. 呶萧；而路透社却忽然拿出殖民家的通信机关的身份来，表示非常之关心中国的国难，而讨厌中国人的欢迎萧伯纳：——

〔二十日北平路透电〕……政府机关报（？）

“今晨载有大规模之战事正在发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广大之篇幅，载萧伯纳抵北事，闻此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

而《大晚报》的春秋笔法又在这电报上加上头号字的标题曰：——

“大战将发中·平报迎萧·用广大篇幅载
萧氏事·路透评华人不知痛苦”云云。

① Sir, 英语, 意即先生。

② Gadarene, 英语, 意为头朝下的。

③ “不列颠皇后”, 船名, 又名“英国皇后”号。

《大陆报》和萧伯纳的“不诚恳”

——中西会串的双簧

《大陆报》：

中国报界怀疑萧的思想——

——“英国作家的不诚恳”是各报社论的基调

——《大陆报》，二月十八日。

这样的大字标题，是要寄到西洋外国去，给外国老百姓看看：中国的“文明”报界怎样冷酷的对待了萧伯纳。

但是，在上海的人看见这种标题，未免觉得奇怪。那里又跑出了什么“基调”，什么“不诚恳”，什么“怀疑”？

不要说上海的民众，他们早就被萧伯纳“宣传共产”的标题惊动了……他们假使有什么“怀疑”，大报上还会不登么？而我们看到的是：有许多团体的代表去欢迎，有许多传单飞在群众里，有许多口号……这些是报纸上都登载了的。

说是报界罢，那么《大陆报》自己也用小字记载着：——各中文报纸大抵出版了萧伯纳附刊，大致都说萧伯纳是伟大的文学家，是现代的天才，是费边社会主义者^①，但是赞成苏联的共产主义，中国人欢迎他，因为他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同情于被压迫的民众。这显然是《大陆报》自己打自己

的嘴巴。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报界，那·一·家·的·报·纸·，谁——对于萧很“怀疑”，认为他“不诚恳”？谁?!? 真的是全上海的报界吗?!

把《大陆报》的这段记载细细的看了一遍，呵，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这里是说上海有一家报纸，而且只是晚报，就是现在不大有人要看的《大晚报》，——这上面有一篇社论②。这篇社论的确骂萧伯纳“不诚恳”——“挂羊头卖狗肉”，而它自己却又要讽刺萧的讽刺。朋友告诉我：《大陆报》上的社论常常译好了转载在《大晚报》上去，这里是一套中·中·会·串·的·双·簧·戏。我就不辞劳瘁的，在隔壁弄堂的字纸筐里，找着了《大晚报》社论的原文。读了一遍，不大懂得，似乎《大晚报》是要萧伯纳分散家财实行共产似的。实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想请萧先生来坐中国的模范监狱，或者反省院之类。总之——言归正传——一·家·晚·报·馆·就·可·以·代·表·全·上·海·的·中·国·“·报·界·”，一·篇·社·论·变·成·了·多·数·的·社·论·（Editorials），而且还是一切社论的基调！这个戏法实在变得有些离奇。

不过，英文语法里只要两篇社论就可以用复数，称之为“Editorials”，而第二天的俄文报倒也有同样意思的两篇小文章③，这就成了中英俄的三簧戏，——一张《大晚报》加上一张白俄报就代表了全上海的“中国”报界！哈哈！

① 费边社会主义，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费边社于一八八四年在伦敦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萧伯纳是费边社的主要成员和代表人物之一。

② 指《萧伯纳究竟不凡》，刊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

③ 指《我们和萧》及另一篇“文艺评论”，刊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上海霞报》。

《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

汉文《大晚报》——据洋文《大陆报》的说法，仿佛代表着全上海的中国界(!)，但是《大晚报》关于萧伯纳的社论，在汉文报之中却是独一无二的，真所谓“究竟不凡”。这社论不用说是反对萧伯纳的，弦外之音大有一笔勾销萧的伟大之概。看它怎样勾销罢：

萧伯纳究竟不凡

“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的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①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

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锱铢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象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

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萧先生究竟不凡。

——《大晚报》，二月十七日。

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元”^②，“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一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

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

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象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① 《命运之人》，现译《支配命运的人》。萧伯纳一八九五年写的剧本。

② “神武的大元”，“民族主义文学”者黄震遐的诗剧《黄人之血》中宋大西的台词。宋大西原是宋朝的军人，后来降元。

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卑污

日文《每日新闻》关于萧伯纳的“记载”——其实是谩骂，可以算得杰出的了，请看罢：

萧的念念不忘者

(太太的“娇羞病”出诊记)

世界的嘲弄专家萧翁在十七日的早晨，说是“因为太太生病”，拒绝了宋庆龄女士请他上陆的事实，传了开来的时候，等在税关码头上的记者团之间，就有了一个电光似的宣传的故事。——

有一个萧所念念不忘的东西，就是他的太太。虽是世界第一的嘲讽老头子，却是很怕老婆的呵。最不高兴旅行，但只要老婆一拉，就连朝山也会去。对着老婆，是抬不起头的。老婆也不象她的男人，非常怕羞，听说还没有和萧一同照在新闻照相的镜箱里面过。今天的“病”，也是“娇羞病”呀，一定的。

但到午后，此翁竟难却宋女士的邀请，蹩上陆来了。于是记者……就和漫画家波多江种末氏一同，到吴淞洋面的“英后”上去诊病。正如翁自己对于“好共产主义者”所下的定义，说“是住在布尔乔亚的邸宅里，用着不要工钱的管家婆的头脑之所有者”一样，他俩的船，实实在在是海上的浮城。……走进船里面去，只是两个字：“奢侈”！所说此翁站在朋卑^①的废墟上，曾经说过“真还想破坏

它一次来看看”，记者也很想破坏这海上的宫殿起来了。走到事务长室去，问问萧翁的“不要工钱的管家婆”的所在，回答是：

——太太是第三舱的一六一号室，萧翁是对面的一五九号。

漫画氏和记者就赶忙跑去想诊脉，然而对手乃是连讨厌记者的萧翁也没法想的“娇羞家”。这回的出诊，不知道在胸脯上按着手，来打诊呢，还是不过牵线脉那样程度就算呢？出诊者们正在船室面前想，机会可赏给了这位萧太太的出现了。是从头发到脸，皮肤，从衣服到袜，鞋，全部都是褐色的老婆子。脸是圆的，眼睛下面的肌肉，松掉了，在银脚的，没边的圆眼镜后面画着脸谱。鼻子圆，是和萧翁的鹰嘴鼻取着调和的。右手拿一本厚厚的书，是从读书室的归路。

——这婆子会怕羞吗？

记者轻率地断定着“害羞者，女孩儿家也”，而婆子却将下巴抵在记者的鼻子跟前了，一面用手推着门。

——过道上就请走过去，不要站住。

真是一八九八年和世界第一的嘲弄专家结婚以来，三十有五年间，受了灌输的辛辣。但一知道“新闻记者的访问”，那挑战的态度就无影无踪。

——因为，我，不见人。

连拒绝的话也不过这一点，脱兔一般跳进了门里面——恐怕——屏住呼吸了罢，一点声息也没有。漫画氏与记者于是完成了“娇羞病”的诊断，回到小火轮上了。

日文上海《每日新闻》夕刊，二月十九日。

这种“文章”真正是村妇骂街，无聊之至。日本新闻记者想不出什么别的话来骂萧伯纳，就乱造一大篇谣言，说离不了

女人，怕老婆之类。这难道还不是卑污无能吗？

① 朋卑，现译庞贝（一译庞培），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约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因其距维苏威火山甚近，公元七十九年八月火山爆发时全城遭湮没。

俄国公主论萧伯纳

上海俄文报《Shanghai Zaria》(《上海霞报》)——颜色当然是白的，二月十九日也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和萧》。这里的“我们”是谁？我想用不着注疏。好在这篇“美文”并不长，而且照署名看起来似乎还是一位“高贵的”美人儿写的：“Mery Devid”，所以赶紧重译转载如下：

我们和萧

如果著名的伯纳萧能够在上海多留几天，那他就可以看一看人家谈论了他些什么。也许，他还要请当地的新闻记者去，自己问他们几个问题，譬如说罢：

——你们还承认我是“伟大的人”吗，或者，你们以为“伟大”这个字只是形容我的过去和我的身量的吗？

——我的共产爱国同志，这样冷淡的招待了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你们是否以为我和著名的俄国革命祖母白菜史珂·白菜史珂夫斯嘉^①有点儿相同呢？

——你们是否以为我提出来的口号，劝当地的共产党员“赶快逃跑罢”，是非常之妙的呢——？

——我对于苏联没有私心的忠顺，我的赞美苏联是不受报酬

的，你们是否认为可爱呢；为着这个缘故，你们是否以为我也受得起象“列宁的玻璃棺材”那样的纪念碑呢？

——一般的说罢，你们是否认为我是“躲在盒子里去”的时候了，因为除此之外，我是什么也不能够做的了？

然而可惜萧走得太早了，因此，他简直不知道上海人对于他有些什么样的想头。

我自己，无论同什么人都很少谈起萧，然而，照我在各处所听见的零碎的意见看起来，我却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上海人从萧所得到的欣喜，比他从上海人所得到的欣喜还要少些。

譬如有一位体面的先生，当萧从杨树浦那边就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一批新闻记者去问他怎样就可以找着萧，这位先生的回答是：

——你们在报纸上去登一个广告罢，就说：“遗失山羊式胡子，花白头发的老头儿一枚。”

另外一位先生，以前是很崇拜萧的创作的，他读过了这个著名的罗达莱俱乐部的戏剧作家的答复，很诚恳的表示他的惊异：

——唔，你要知道——他说——这个之后，我要认为萧以前的好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的当差的写的。那些剧本，萧当然是写不出来的。

至于私人谈话之中加在萧的姓名上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我在这里不愿意说，这并不是因为我怕羞，而是因为我本来不是造谣专家。

上海对于这个著名的老头儿的态度，最好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它，这句俗语，在萧还没有来得及回到轮船上去继续自己旅行的时候，就已经传遍了全城。

这句俗语固然是老话，不过特别为着萧改造了一下：

——来了，看见了，撒了滥污②了。

Mery Devid

——白俄报《Shanghai Zaria》，二月十九日。

这里的署名写着“Mery”，是一位“女作家”，当然更是公主了。

这位公主还害羞，自己声明不是造谣专家。但是，她居然代表上海市的二三百万市民说：“上海人”怎么怎么对待萧，又是冷淡，又说萧是山羊式的老头儿，又说“那些剧本，萧当然是写不出来的”等等。她自己说“无论同什么人都很少谈起萧，但是，她立刻就跑遍了上海市，而且调查得清清楚楚：仿佛上海人已经把一句拉丁成语改成了“俄国俗话”，而且“传遍了全城”。这位公主的“并不造谣”的本领实在不小。

但是，她不敢提起萧伯纳说的一句话！“假如今日君返国之后而仍能逃走者——君于此时返国一观察，必知今日情形之甚佳矣。”

附记：据从俄文译成英文的英国朋友 MY. Arnold 说，她这篇“美文”有几句不大通，例如末了一大句。但是，这个俄文通不通的问题，我们管不着，——万事有公主自己负责，——所以仍请 A 君逐字逐段“直译”，再重译转载在此。

① 白菜史珂·白菜史珂夫斯嘉 (E. K. 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 1844—1934)，现译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卡娅，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和

领导者之一，属该党右翼。

② 撒了滥污，即拆烂污。上海方言。不负责任，马虎了事的意思。

白俄报的义愤

二月十九的俄文报《Shanghai Zaria》还有一篇“文艺评论”，据说很“幽默”。但是，这并不是对于萧伯纳的批评，而是赞美一个不知道是从什么年代成名的英国青年作家，名字叫作 J. B. Priestly。问问英国朋友，——英国朋友说不大清楚，问问中国的世界文学专家，专家说没有听说过。上海的尊贵的白俄，向来只会读些“花园马路文学”(Literature of boulevards)，或者英国人的所谓“黄封面的文学”(Yellow covered Literature)。但是，上海的“黄封面”的小说似乎也不少，查起来未免太麻烦了，连我的英国朋友都拒绝我的请求，不肯替我跑腿；他马马虎虎的写了上面那样一个拼法，还申明这个姓名的拼法“J. B. Priestly”未必就对，因为只是从俄文字母一个一个的译成英文的。总之，据这篇“文艺评论”说，这个新进的青年作家普里斯脱莱(Priestly)，要比萧伯纳高明得多，正直得多，诚恳得多……

这位青年作家写了些什么呢？第一部小说叫做《好同志》，第二部小说叫做《安琪儿的行人道》(“Angel Pavement”)，第三部大概还没有写出来。这个“大作家”的作品能够使得“小人物的世界……成为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世界”。那《安琪儿

的行人道》里，描写了一个小会计密斯脱斯密司，——据说这是一个建设精神的代表。这里说的当然不是苏联式的建设，而是白俄式的建设。俄文报还唉声叹气的说：

“这个小会计密斯脱斯密司和最近在美国暗杀罗斯福的那个发疯的意大利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当然没有什么共同之点，然而，他们两个人都是自己的时代底产儿。”

为什么？因为现在时代的“小人物”都有点儿倒楣。问题是在于一种“小人物”很“满意自己的命运”，而另外一种“小人物”却不肯安分。普里斯脱莱小说里的“小人物”是安分的——所以是建设精神的代表。而事实上的“小人物”，譬如美国的“暗杀党”，都不满意自己的命运，所以是破坏的无政府主义的魔鬼。

这个美国的暗杀党的口供说，他在学校里的時候，“就痛恨自己的同学，只要他们比他穿得好些。后来，他就痛恨一切富人，一切有幸福的人，一切成功的人。这样，他的痛恨达到了极端的时候，他就决定去暗杀一切国王和总统……”俄文报接着就说：“不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充满着这种情感，就是低等阶级对于高等阶级生活和享福的敌意和嫉妒，也是这一种琐屑的庸俗的情感。”于是那个所谓新进的“伟大的，正直而有绝对的天才的英国作家，甚至于是这样的世界作家，”——这个普里斯脱莱的功绩，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比较一切宣传不满意和不妥协的人起来，普里斯脱莱之类的作家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他们能够在社会的不满的高潮上灌注一

些安慰的油。”说句中国话，就是他们会灌迷魂汤。而据说，“这些作家，比我们地球之上的一切反抗派和不调和派，都要更加真实。”“他们是真实的，——因为没有群众对于自己命运的满意和安分，就不能够建设任何的文明，甚至于共产主义的文明”(!!!)。

阿呀呀，不得了！白俄不但很关心文艺的“真实”，而且还关心“共产主义的文明”！

萧伯纳自然是很不伟大的了，很不真实的了，因为他喜欢宣传抵抗，不满意，不妥协等等。因此，萧伯纳还没有白俄那么热心于文明的建设，甚至于“共产主义文明”的建设。

于是乎白俄报纸就义愤填膺，以至于语无伦次，忽然间关心起中国工人的生活，中国西崽的工资……来了。请看白俄报纸从“安分的”普里斯脱莱的“小人物”说起，居然做出了这么激进的，几乎是“革命的”结论：

普里斯脱莱之类的作家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比那些口头上说的是这样，而事实上做出来的又是另外一样的人，要正直得多。”

“请你们读一读关于前天欢迎萧伯纳的奢侈的午饭的描写罢。

“吃那一次午饭的，或者是名人，或者是喜欢和名人挨肩并坐的人们。

“那次午饭，当然布置得非常之好，桌子旁边有数不清的仆人侍候着。

“然而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的萧的诚意，那样

不彻底呢？为什么他只到了这一家阔气的洋房里，而且是坐着非常之奢侈的汽车，刚刚从奢侈得象神话里的传说似的大轮船上下来；这只轮船所载的都是些百万富翁，照别人的描写，这轮船的奢华富丽是不用说了。

“为什么他不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上海贫民窟里去看一看？”

“为什么他不问一问这一所欢迎他的洋房里的西崽和苦力的工资是多少，——就使在午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的问一问的？”

“而最主要的是：为什么他不肯承认——这一点他所很知道的——如果他是天堂式的苏维埃国家的作家，那么，他什么也不能够有，除非还有一条旧裤子，他也不能够在‘不列颠皇后’上周游全世界！”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普里斯脱莱和他的‘英雄’，比较起空想的萧伯纳的英雄，以及萧伯纳自己，都要正直些，都要更加有意义些。”（白俄的《上海霞报》，二月十九日。）

好了，好了！俄文报的“文艺评论”也就这么完了。这是他们的“结论”。

这里中国读者可以得到了一些教训：例如高尔基只该一条旧裤子，此外什么也没有；萧伯纳没有到贫民窟里去，就证明了他的不诚恳；而俄文报的记者，在萧伯纳的桌子旁边去数过了西崽的数目，但是没有数清楚等等的“文人轶事”。至于中国贫民区域的生活，中国洋务工人的工资，萧伯纳在国际反帝大同盟^①的调查表里，也许早就看见过，也许没有看见过。这都不要紧。最主要的是：——他忘记了早这么一二十年到

俄国去劝告“群众满意自己的命运”。

是的，萧伯纳大概早就知道做绅士和资本家的保镖的，薪水并不大，因此，他决计不替他们保镖。他“背叛了”绅士阶级和资本家。幸而 he 自己是“百万富翁”，否则又要说是人穷志短，得了苏联的卢布。但是做了“百万富翁”也不好，害得俄文报义愤填膺，又去责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看上海的贫民窟。原来因为俄国群众的“不满意”的爆发，弄得他们这些王孙公子变成了丧家之犬，几乎要流落到这个贫民窟里，永世只做中国工人的罢工破坏者。仿佛他们的流落，萧伯纳也“与有罪焉”。

唔，俄国的王孙公子和资本家的少爷小姐呵，你们现在也知道了贫民窟是“非常之可怕”的了?! A?!

① 国际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保卫和平组织。一九二七年二月成立于布鲁塞尔。一九三三年八月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合并，改称“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

胡适博士的词令

胡适博士最近对《字林西报》记者说：“一个政府一定要有保护它自己而镇压危害它的存在的一切运动的权利”（见二月二十一日该报）。胡适博士现在既然这样忠顺，不但不再讲什么“人民的权利”^①，而且坚决的拥护“政府的权利”了，那么，象萧伯纳那样的“叛徒”，自然是他所不愿意见的了，——也许是不敢见，因为万一天良发现起来，脸上难免要热辣辣的飞起两朵红云，显得象梅兰芳博士似的有点儿“驻颜术”。于是他也忽然“语妙”起来：明明是他主使北平学界不理萧伯纳，他还说这是最高尚的欢迎方法。他说听凭萧伯纳要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要看什么东西，就看什么东西。仿佛很自由。但是，假使萧要看看北平的监狱，见见政治犯，那就未免有人要赶紧去通知张学良将军^②，教他事前怎样布置收拾一下罢。

〔附〕

路透社电

萧伯纳今晚六时三刻抵此，在车站欢迎者，有中国新闻记者若干人，彼等包围之，欲与之晤谈，但萧氏谢绝之，俟诸明日。北平教育界及学界决定在萧游北平时不予以招待，胡适之于萧氏抵平之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

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

——路透社二十日电。

①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胡适曾写过多篇侈谈“人权”的文章。见一九三〇年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

②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政治的凹凸镜*

——“比较翻译学”和“小辫子的科学研究”

萧伯纳到上海说了些“闲话”，这样也谈谈，那样也谈谈，其实都是人家逼着他，他才说的，他本来并没有“宣传目的”。他一生一世都在“宣传”，你要去问他，他自然只会说他所要说的话。但是，一些政治背景浓厚的记者，受着主人的嘱咐，却想利用萧的话来替自己宣传。他们也会纪录他们所要的“纪录”，原文不大中意，还会捏造一些谎话。何况萧说的是英文，从英文翻成汉文，或者翻成日文，甚至于象《大陆报》似的，还会从英文翻成汉文，从汉文再重新翻成英文。（不要忘记《大陆报》是中国当局的英文半官报），——这种复杂的过程之中，很可以做些手脚。这样转辗传译，就把萧伯纳的谈话翻陈出新，弄出许多“修正”，“删改”，“补充”，“捏造”的把戏来。

好罢，我们就借此来研究一下“比较翻译学”。

真正的英国报，冒充的英文报，日本报，中国报都在我们的面前。萧伯纳的同一次的谈话，而记载的大不相同，尤其是关于政府和革命的问题，以及关于李顿报告书的问题。

* 本篇为《萧伯纳在上海》第三部分的引语。

先说关于中国政府和革命的问题罢。

(一)《字林西报》——“回答着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他们应当怎么干的问题，萧伯纳先生说：‘他们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这几句话不见于其他各报。什么道理。大概因为统治着中国民众的那些戏子和封建王公心上会不舒服。而英国帝国主义的《字林西报》把它登载出来，却有点儿奇怪。莫非那些“戏子”还不大合于英国的胃口？可见做戏也不容易，美国人爱看了，英国人又有些讨厌了。

(二)《大陆报》——“关于现在中国中部共产党反对南京政府的战争，萧伯纳先生说：‘一个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不会有好名声的，因为十次之中有九次统治者不是一个好戏子，他不知道怎么去取悦于他的民众。’”看罢，这里的“戏子”变更了自己的地位了！从这句捏造出来的“萧先生说的话”，仿佛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南京政府在民众之中没有好名声，因此(!)，南京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统治者，如果它永久没有好名声，就证明(!)它永久是好的；而且南京政府的好，正在于它不象一个“戏子”——不会“媚众得宠”(!!!)呜呼，戏子呀，我们的好戏子呀，你们真正会唱戏，实在比萧伯纳自己还要“幽默”万倍了。

(三)《每日新闻》——日本文的上海《每日新闻》记载得更有趣：“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那一个呀？’中国记者

只得转为左翼，另整姿势……”这里的论调很象日本政府的外交公文。因此，萧伯纳说的“戏子”就消灭得无影无踪，萧伯纳所说的“中国民众”总算还没有变成“满洲国”的顺民！

(四)《上海日报》——日本文的《上海日报》捏造得还要“象真”，仿佛萧伯纳说过这么“一串得意的共产主义的讲解”：“世界各国的反对共产主义，实在很可笑，而且不愉快的，例如亚美利加就是这样的国度。亚美利加是压制者的国家；没有什么国民的自由之类，简直和奴隶没有两样。而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东西，好象弄错了似的，掠夺东西，压迫国民的所谓共产军，那简直是土匪。”萧伯纳被《上海日报》的日本记者改造过了之后，简直是一个奸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阴影：他一方面恨美国，说美国是压制者的国家，甚至于要劳动他的大驾去替美国奴隶争取解放似的；别方面，又恨中国的共产军，说他们是土匪，“并非真正共产主义”，所以和中国当局同心同德，分工合作，一边在北部“剿匪”，一边在南部“剿匪”。不幸哉，萧伯纳。

(日文的《每日新闻》和《上海日报》的访员其实根本就没有见着萧伯纳，它们的记载的蓝本是《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泰晤士报》的记者虽然是爱尔兰人，而这个报的本身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把它们作为附录，放在本章的后面。)

(五)中国各报——关于被压迫民族和中国政府的问题，大半都是这样的记载：“上项问题殊难作复，不如俟余离上海

后，再作答复，因在此地似乎不甚安全也。”但是，同时又发见另外一段，说是：“中国今日所需要者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绝非一般民众所欢迎。”这一句，大概就是半官报的《大陆报》的记载的“根据”了。不过究竟是谁根据谁，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后台的“戏子的把戏”，比涂着花脸的前台姿态更不容易看见了。这里要提出的只是一点：中国的普通报纸，一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幻想家，还知道“抓到”萧伯纳的另外一句话：“中国为政，每苦言论过多，殊无实在效果，”这是半官报的《大陆报》上所没有的。殊不知，假使“言论”过少，怎么能够在袁世凯的“爱国储金”之后，再来谎骗二千万的“救国公债”呢？

（至于其他的详详略略的地方，自然还多得很，此地不必论列。）

（六）《大晚报》——“民族主义”的而又“文艺”的《大晚报》最漂亮，索性把萧的谈话完全取消，一字不登，关于“政府”和“革命”的谈话当然首先在勾消之列。（而《大晚报》上却登了一篇“作为全上海中国报界的基调——基本腔调的”社论。关于这个“基本腔调”，请看另外一栏。）

再说一说关于李顿报告的问题罢，各报所载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字林西报》——《字林西报》上的萧伯纳说：“李顿报告是没有偏私的，而且是很能干的写出来的。”

（二）《大陆报》——《大陆报》上的萧伯纳，一个字也没有提起。

(三)《每日新闻》——日文《每日新闻》上的萧伯纳，说：“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唯一的说明，是李顿的报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无学之辈，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吏要细看它，也太吃力。李顿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消说的，然而我想，再写得简洁一些，可就好了。我自己，是只看了两章，然而就是这一点，在我头里也还是太重的担子。”

(四)《上海日报》——萧伯纳在日文《上海日报》上所说的话和在《每日新闻》上一样，不过说得“简洁一些”，不“太长”罢了。

(五)中国各报——萧伯纳在中国各报上大半没有提起李顿报告，只在《申报》上说：“李顿报告书可称公平，然以篇幅过长，恐无人能全部予以熟读耳。”

(六)《大晚报》——萧伯纳在《大晚报》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谈话。

这样，单在这两个问题上，萧伯纳就做了各种政治立场的凹凸镜：——日本要说中国并无中央政府，仿佛萧就说了“中国政府不只一个”；英国要说中国政府只听美国玩弄，不能尽如大英之意，于是萧说中国民众不要戏子做政府的话，就记载出来了；国民政府要说自己是很好的统治者，于是萧说的话又变了：“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没有好的名声”；自由主义的幻想家要请政府少说些话多做些“改良的”实际工作，于是萧的说话里，仿佛又加了一句，居然也有些责备中国政府多讲空话难于骗人的意思。而萧对于李顿报告的批评，也是“因报而异”，简直“一气化三清”^①，同时当了伦敦，东京，南京三个

政府的外交总长了。固然，萧自己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而日本报的记者最侥幸，他们完全没有见着萧，而居然“亲自”听见了萧骂红军“简直是土匪”的话。

总之，每一方面都想把萧伯纳变成凹凸镜，借他的“光”，照耀自己的“粗壮”，“圆转”，而把别人照成扁塌塌的矮子。其实，他们各自现了原形：是戏子的还是戏子，是畜生的还是畜生，是强盗的还是强盗。那有什么法子呢？

“比较翻译学”完了——这只有政治上的说明，没有文法上的解释，抱歉得很，因为这凹凸镜的文法实在太艰深，小子谨谢不敏：请问，譬如“Chinese people Should orgaise themselves, and choose for Their rulers not an actor or a feudal Baron”这么一句，怎么会一变变成了“a good ruler……in nine out of ten cases is not a good actor and does not know how to please the people”②?? 哈哈！

最后，这篇文章还要缀上一条“小辫子”——就是新闻纸上的小标题的“科学研究”。

中国各报关于萧的记载，大概是同一样的稿子，不过有详略的不同，但是各报上各自添上了自己的小标题，于是萧的谈话上就同时缀上了各种各式的“小辫子”：

(一) 萧接见记者发表警辟妙论，谓英国对华根本并无政策(申报)

(二) 讽刺家所发议论轻松幽默，取旁观态度博人一笑者也(时报)

(三) 孙夫人等前往欢迎，萧见记者颇多妙论(时事新报)

(四)世界殊途同归必实现社会主义(商报)

(五)萧对于革命理想的智识只是浮光掠影而已，但是突然停止了她的鼓吹革命(大陆报)

(六)访问 Adelphi 贤人……没有理想! (字林西报)

好了。这还用得着“科学的研究”吗? 各人的态度, 各人的私心, 往往在几个字之中流露出来, ——虽然古代有句成语说: “人生着舌头不是为着说出自己的心思的, 而是为着掩盖自己的心思的。”

〔附录一〕

二月十八日, 日文《上海日报》——

在上海一时失了踪迹, 给新闻记者莫名其妙的伯纳·萧翁, 为宋庆龄所同伴, 访问了各处的中国要人之后, 至下午六时光景, 在法租界莫利爱路的孙科氏邸内, 落在记者团的警戒网里了。美丽的白鬚, 颊上泛着孩子一般的粉红色, 而满口嘲弄, 回答着记者的质问, 扬起他一流的怪气焰来。

记者: “为什逃避着新闻记者的?”

萧翁: “并不是逃避, 因为我不看新闻, 所以没有想到有新闻记者要来访问的。”于是大言道: “我是和基督, 梭格拉底一样伟大的呵, 假使诸君知道了我的本心, 就不会给我活下去。”

“关于我所说了的一切, 是都保留着后来加以否定的权利的。”翁先行声明之后, 就吐出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气焰, 接着是一串得意的共产主义的讲解, 道: “世界各国的反对共产主义, 实在是可笑, 而且不愉快的。例如亚美利加, 就是这样的国度。亚美利加是

压制的，没有什么国民的自由之类，简直和奴隶没有两样。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东西，好象很弄错了似的，掠夺东西，压迫国民的所谓共产军，那简直是土匪。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抛炸弹，在安全地带撒传单，被巡捕看见，给他殴打的人。真的共产主义者，是怀着一种一定的理想，由建设的方法，来改善本国的社会政治状态的。所以即使是国王之下的忠实的臣民，也尚且可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好象是对于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还不容易弄明白似的。”

讲了一通之后，是嘲笑英国的对华政策：

“对于中国，英国是一点政策，一点知识也没有。倘要说有，那就是英国知道中国要武器和弹药。只要中国要买，中国有现钱，英国是总将这武器和弹药来卖给中国的。

“在西洋人的眼前，说明了中国的情势的唯一的东 西，是李顿的报告书，很出色，很细致的，但在我似的无教育者，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员看起来，也好象很吃力。李顿是很能干的，但再简略一些，就好。老实说，我是只看了开头的两章，就很够了。

“关于中国的事情，即使英国来说许多话，中国自己先靠不住，别人的事，不是真实的帮忙也无从办到吗？”

接着问起中日问题，则他拒绝了发言，那理由是“只要从中国安全地走出了一步去，就什么都说，但在中国的时候，这问题是要用 No No 来推掉的。”这使中国记者苦笑起来，“东洋人是太有了所谓‘教养’，却太缺着常识，大学毕业生太多了。”

“马克思并不是大学出身，然而极好的组织者，实行家，”漫谈没有穷尽，这样的来饶舌，记者这面却觉得无聊，就走散了。

〔附录二〕

二月十八日，日文上海《每日新闻》——

“我是全不看新闻的，不知道竟在这么苦心地寻觅我。”

“对于无论什么问题，我是总不怀定见的，怀着的只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是人到七十，当然要达到的结论。”

“其实，英国是完全不识得中国的，倘说有些识得，那就是只识得中国需要多量的武器和弹药。只要中国能付现，无论多少都卖，这就是立场呀，纵使你说些何谓中国，现状如何，但以西洋人的心理所能懂得的惟一的说明，是李顿的报告。那很是一件大工作。但在我似的无学之辈，却太长；本国政府的官吏要细看它，也太吃力。李顿卿是有能之士，那是不消说的，然而我想，再写得简洁一点，可就好了。我自己，是只看了两章，然而就是这一点，在我的头里也还是太重的担子。总之，即使在英国有着对华认识，便有非有对华政策不可的道理么？英国的立场，就如一家的主人，看见了在偷客厅里的银器的偷儿的一样。自己这里正在为难，能来赶掉别人头上的蝇子么？”

记者问：“可是听说日本就要决计退出国联了。”

萧答：“可是日本好象还没有发出宣战布告呵，——但是，对于日华关系，却因为还未远离中国，不能够保证此身的安全，所以不能详论的，因为便是我，也觉得 Upper cut 是痛的呀。只是倘使我说起来，则在东洋，所谓‘教养’这东西太多了，平凡的头脑却太少，大学毕业生太多呵。可怜，一跨进大学，就自动的成为傻子，不懂得成群前去了。马克思并非大学毕业生，但作为组织者，管理者，却是出色的人物。不，比什么都好的，首先是在他乃是一个有着住布尔乔亚的府邸，用不要工钱的管家妇的头脑的好共产主义

者。”

这时候，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呢？”

“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那一个呀？”

中国记者只得转为左翼，另整姿势，问道：“那么，中国有什么可以学学苏联的处所么？”

“那是‘政治的构成’那样的东西罢。革命的训练，与和巡捕打架的方法是两样的，但在俄国有革命博物馆，是聚集着先前的革命家的遗物的，一看那样的东西，就深觉得史太林政见的革命的必要了。”

于是将谈锋转向苏联，发了一遍共产主义论之后：“上海也象香港一样，讨人厌的，——是 gangs(狐群狗党)所造成的都会，我要回去了。”

此翁将同一的屁股，向了上海和记者团，走掉了。

① 三清，道教尊奉的三个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此三神居于玉清、上清、太清之境，统称三清境。“一气化三清”，指玉清、上清和太清都是由元始天尊变化而来。

② 这里的英语前一句意为：“中国人民应该组织起来，选出他们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既不是演员，又不是封建王公。”后一句意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十之九不是一个好演员，而且不知道怎么使人们满意。”

补 白* (三则)

上海寓公某，阅《大晚报》“萧伯纳应散尽家财”^①之论，恍然若有所悟，即用小报称萧伯纳谓“包僚销”^②之新古典，口占一绝云：

长江滚滚滚萧萧 为恐家财一旦消^③
去后是非谁管得 满街听唱包僚销^④

二 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

去年今日此吴淞 大炮飞机相应轰^⑤
大炮不知何处去 飞机依旧打秋风^⑥

三 两 雄 吟

两雄握手太荒唐 万里相逢个半郎^⑦

* “补白”三则，均刊于《萧伯纳在上海》第一部分。其一刊于废名作《关于萧伯纳》之后；其二刊于《翁照垣将军致萧伯纳书》（翁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之后；其三刊于《东西戏剧家两权威晤谈》之后。

笑问驻颜狂伯纳 漫夸爱族俏兰芳③
夫人莫道华伦贱 博士能令文学香④
只恨匆匆又离别 未曾色相一登场⑤

① “萧伯纳应散尽家财”，见于本卷第 326 页《萧伯纳究竟不凡》一文。

② “包僚销”，“僚”，苏白“你”的意思。当时上海一些无聊小报以此作为伯纳萧的谐音。

③ 废名在《关于萧伯纳》一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中说：“可惜萧伯纳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上海的时候，正是冬寒乍退的初春，如果是在万树落叶的秋天，我倒可以用一句唐诗来欢迎他们了：‘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④ 这两句系套用宋代诗人陆游《小舟泛近村，舍舟步归》（其四）中句：“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⑤ 这两句指一二八战争。

⑥ 打秋风，旧时指以各种借口进行敲榨勒索。此诗系套用唐代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原诗为“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⑦ 两雄握手，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申报》在关于萧伯纳与梅兰芳会见的报导中有此用语。个半郎，指梅兰芳，因梅擅演旦角，故称。

⑧ 驻颜，“青春常在”的意思。上述《申报》报导中有“萧氏闻梅君有三十年之舞台生活，而注视其面容曰，君诚有驻颜术哉”的话。漫夸爱族，亦为该报导中的记载：“梅氏称述爱尔兰人富于忠实友谊。”

⑨ 华伦，萧伯纳作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中的主人公华伦夫人。博士，指梅兰芳，一九三〇年梅兰芳赴美访问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南加州大学曾授以文学博士学位。

⑩ 同前的报导中载有梅兰芳对萧伯纳说：“余乃不得以东方戏剧之特有艺术，以男子饰女角者为君观之，殊深歉疚！”

缺 页

诗歌说唱辑存

本辑收入作者作于一九三五年前的新、旧体诗及说唱文学作品共十九首。题名系编者所加。

雪 意^{*}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①
犹折梅花伴醉眠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

* 本诗约作于一九一七年。现据作者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书赠鲁迅的手迹收入。手迹署名魏凝。题目为编者所加。

① 长安，西汉、隋、唐皆建都长安，后来常通称国都为长安。当时作者正在北京，故以长安代称。

赤 潮 曲^{*}

赤潮澎湃，
晓霞飞动，
惊醒了
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 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 本诗最初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署名秋菓。同期卷末附有曲谱，曲谱中歌词与此稍有不同。

何论黑，白，黄，
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
只待共产大同……

看！
光华万丈涌。

飞来峰和冷泉亭*

飞来峰①下坐听瀑泉，——
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
且来此冷泉石上，
做个中流的砥柱。

只听你湍流奔泻，
急节繁响怒号千古。
始终听不出个：
“你为什么飞来，
为什么又飞不去？”

难道虚名儿叫冷，
出山心却热！——
怪不得这样咆哮奔放，如泄积怒；
毕竟也枉称飞来，原来是力求飞去。

一九二三年，七月。

* 本诗最初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① 飞来峰，一名灵鹫峰，位于杭州西湖灵隐寺前；山上建有冷泉亭。

铁 花*

我不在柔和细腻的自然里，
我不在繁美华盛之中；
在这烟气迷天的工厂内，
锻炼着我的铁花，火涌。

铁花受不着阳光的煦和，
铁花领不着月光的抚慰；
小炉里融融的火腮，
嗤嗤地烧着了花蕊。

那地方锤子的声音来得蠢，
那地方金铁的声音来得紧；
好一似铜松拂着刚风，
我真爱上了，舍却不忍。

* 本诗最初发表于《时事新报·文学》第九十二期（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不是那轻挥羽扇，妙舞回旋的——
而是那胼胝满目，——是有力的掌。
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苗，
照耀我这壮勇无畏的胸膛。

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之怒，
我幻想，幻想着大同，
引吭高歌的……醉着了呀，群众！
锻炼着我的铁花，火涌。

过 去*

淡绿色的落叶儿，
秋意中轻轻飘展呢。
落叶儿，我送你归去，
祝你安安心心抛离“生意”。
春华秋实，你的使命尽了：
地上枯死了绿茵的草，
枝上飞去了啁啾的鸟，
只落得把秋来报告。

* 本诗最初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署名巨缘。

天 语^{*}

大地山河，如今还剩得几许，
便欲倚飞云，一直叩天门去。
静悄悄里，象听得宇宙低语；
寒浸浸，光芒涵照斗牛^①路。
飘忽归来天国，故乡已无住处，
那莽尘寰乱攘攘，怎能回顾？
何处，何处？

.....

天却有情，恨我高绝，
殷勤来问我那人间苦。

* 本诗最初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署名双莫。

① 斗牛，星名，亦作牛斗。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北周庾信《哀江南赋》中有“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句。

江南第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
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色上云梢。

* 本诗摘自作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广州给王剑虹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王剑虹，四川酉阳人。一九二四年一月与瞿秋白结婚，同年七月于上海病故。

爱*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
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

* 本诗摘自作者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给王剑虹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失 题*

那网罗宇宙的诗意，
它唯一的仇敌，
便是语言文字。
那贯彻金石的光，
它唯一的屏蔽，
便是前思后想。

天地间真挚的心性，
凡百“有情”都会自然的感召，
又何劳你咏风弄月，
絮叨个不了？
当前坦荡荡的大道，
只要你大踏步的前去；
又何必再踌躇踟蹰，
绞尽了脑髓？

* 本诗及下一首《寄××》，约作于一九二三年冬或一九二四年春。上海《鲁迅风》第十四期（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曾据手稿刊出；《寄××》第二节后部分稿阙。

寄 × ×

—

灯塔般的光明，
照耀着将来的人生；
若非自己是来自歧路，
何至于决不定途程！

原来三岔路口：
 贵族的血，冷；
 市侩的铜，臭；
 劳工的汗，香。

别人家的臭铜，
决买不动你的肝胆；
所怕自己的冷血，
竟暖不了你的心肠。

洪炉大冶的人间，
正好似轮机声里的钢铁，

——锻炼得你只剩些汗和血；
这期间未必没有风花雪月，
——又何必定要风花雪月！
澎湃的赤潮，涌出诗神历万劫。

汗血，汗血，
偶然间凉透了晓风残月。
凝结，凝结，
留得个“前生”小影，不堪回忆。
鼙鼓声中哀弦急，
那道你热汗和冷血双绝。
到如今说什么忏悔悲哀：
牺牲是牺牲了，徘徊的还是徘徊。

过去的情天使者，过去的心儿之神，
只勉强笼罩得你，“前生”性灵的残焰。
怕只怕恩深怨深，旧时代的血尽；
那点滴的膏儿，又来得冷，怎挣得到天明！

灯昏梦香，只剩得个倩倩小影，
博得个深深心印，毕竟是清晨劳作之声，
才涌得出炎炎的红日，普照的光明。
血冷汗香，这才融尽，成就这整个儿的生命。



同样是历史的误会，
同样是时代的牺牲。
沧海中的波涛，
沉溺了几多个性！

一个是浪漫世界中的豪客，
一个是情天万劫里的皇冠；
一个撤废了一切藩篱，
一个却还尽着痴憨；
这期间数不清的泪珠儿，

（以下稿阙）

群 众 歌*

(大家都要唱熟)

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
罢市要取大规模，坚持到底勿为动。
大家不纳巡捕捐，外国钞票不要用。
中国人帮中国人，热度勿要五分钟。
南京路上杀同胞，大家听了都心痛。
外人砰砰几排枪，我们流血染地红。
倘然死一外国人，割地赔款负担重。
我们华人不值钱，难道个个是饭桶。
奉劝诸君自救自，不然就是亡国种。
大家起来大家醒，全靠我们是群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热血日报》，未署名。

小小的蓓蕾*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 本诗摘自作者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在苏联给杨之华的信，是赠其女儿独伊的。标题为编者所加。杨之华（1900—1973），浙江萧山人。程秋白夫人。早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妇女部长；解放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团委员兼女工部部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等。

东洋人出兵*

——乱来腔

日本出兵满洲，国民党的政府军队的长官却赶紧逃命，叫做什么无抵抗，只剩得小百姓和兵士，给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的国家，本来应当是我们几万万穷人的国家，现在要亡在国民党手里了。我们穷人要救自己的命，救自己的国才好。国民党原本是富人的党，他们宁可把国家送给日本帝国主义，送给美国帝国主义，送给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他们决不能救国的。我们千万不能够再让中国放在国民党手里，放在这个富人党手里。因此，在下编了一首歌，叫做《东洋人出兵》，说说这里面的道理。这首歌的调头是没有什么一定的，大家随口可以唱，所以叫做乱来腔。谁要唱曲子唱得好，请他编上谱子好了，欢迎大家翻印。欢迎大家来唱。欢迎大家来念。一人传百，百人传千。提醒几万万人的精神，齐心起来救国。底下写着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歌词，大家请便。

*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署名史铁儿。当时曾印成小册子宣传散发。

(上海话)

一

说起出兵满洲格东洋人，
先要问问为仔啥事情。
只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
生成狗肺搭狼心，
日日夜夜吃穷人，
吃得来头昏眼暗发热昏。
有仔刀，杀工人，
有仔枪，打农民，
等到日本出兵占勒东三省，
乌龟头末就缩缩进，
总司令末叫退兵，
国民党末叫镇静，
不过难为仔我侬小百姓，
真叫做，拿侬四万万做人情。

二

杀千刀格国民党末勿是人，
打来打去只打小百姓，
就是为仔抢吃人，

帝国主义淘里抢勿清，
先叫国民党未来帮衬，
帮忙帮得勿称心，
日本自家来出兵，
张学良走狗要做勿成。

三

还要问一问国民党末是啥人，
原来是资本家地主格假名称，
俚笃才是奴才性，
卖国卖民要卖个干干净净。
只怕碰到工农兵，
外国格中国格大人先生全惊心，
国民党就赌神罚咒去打红军，
勿晓得，打勒半年打不胜，
帝国主义说我对侬勿相信，
要想亲手来打中国格工农兵，
也是东洋军阀出兵格大原因。

四

帝国主义是外国人，
外国人淘里也有好人，

格班好人末是工人，
还有农民搭穷人，
只有资本家末是坏人，
俚笃才是帝国主义成勒精。
讲到露松格工农兵，
十四年前大革命，
俚笃格地主资本家末打得个干干净净，
各国格工人搭穷人，
露松苏联工农兵，
只有格班人末能够帮侬中国格穷人。

五

大家要是勿相信，
请看啥格叫做国际联盟。
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
帝国主义格代表末吮淘成，
听见日本占勒东三省，
谈谈讲讲讲勿清，
讲到结局末来封信，
倒叫我侬中国也要撤兵，
真叫做帝国主义格世界末有理讲勿清；
其实国际联盟还是帮着日本人。

六

还有啥格美国人，
一样格货色一样格人，
口口声声中日双方勦动兵，
日本早就杀进东三省，
还叫中日勿要动刀兵，
格末真叫做活送命。
格班帝国主义吮良心，
趁火打劫是说勿定。

七

日本人末已经勒拉大杀人，
英美德法趁火打劫也说勿定，
俚笃自伙淘里虽则抢勿清，
不过随便啥人也拿勿稳，
为来为去总要为仔打平中国格工农兵，
作兴还想趁此去打露松格大革命。
说起我侬自家格中国人，
国民党末因此勒拉漫定心，
俚笃心上只说勿要紧，
国际联盟会调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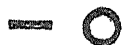
美国人未一定来帮衬，
就算瓜分未，国民党还想得一份。

八

说来说去还是难为仔穷人，
有钱人搭有钱人，
轧淘轧得漫漫紧，
实在无法也好逃命，
纽约伦敦搭东京，
外国银行吒淘成，
成千成万去存进，
官僚军阀有得是金银。
一仗勿打就会逃得个干干净净，
横竖死只死得佢小百姓。

九

哎唷哎唷吒性命，
实梗样子难能成，
要想法子还是自家人，
就是我佢工农兵，
还有普通格贫民，
自家起来救自家格命。



侬工人团体末顶要紧，
罢工既末工会末就罢勿成，
工会也要自家人，
勿要国民党包探那摩温①，
罢工起来打倒日本人，
中外资本家一概黝留情。
现在预备枪炮要赶紧，
快快联络兵士弟兄们，
革命起来我侬是首领，
第一自家要团结得紧。



说到农民真伤心，
大水淹勒十七省，
还要交租纳税养闲人，
地主官僚都是闲人精。
大家起来快革命，
一钿黝交顶要紧。
勿管俚是英美日本中国人，
只要是地主就请俚滚，

中外军阀要派兵，
我侬就请工人来练红军。

— 二

说起兵士更伤心，
天天只替别人去送命，
请看现在东三省，
军官逃得干干净，
兵士倒拨勒日本杀脱几千人。
军阀扣着军饷发勿清，
还要叫人家去打红军，
赛过要我侬去杀亲人，
其实兵士手里枪炮哧淘成，
为啥吃仔苦头勿做声，
赶紧掉过枪头来打司令，
勳让国民党去送拨外国人，
掉过枪来拨军阀杀干净，
自家组织红军去打日本人。

— 三

现在除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
大家才要起来大革命，

问侬阿是好好格人，
做奴隶阿是侬甘心，
劝侬反对国民党，还要赶早来申明，
勿要等到工农大革命，
那时候逃命也逃勿成，
因为国民党等于是私通日本人，
走狗做得成勒精，
花言巧语会骗人，
现在戳穿西洋镜，
大家起来要俚笃格命。

一 四

蒋介石是个牛屎精。
俚说三年废约一定废得成，
还说废不成尽管要俚格命，
现在三年过勒是格啥情形，
原来废约废到勒送脱东三省，
我侬就要起来要俚格命，
还有啥个张学良，王正廷，汪精卫，胡汉民，^②
一搭咕噜请俚笃滚。

一 五

全中国格工农兵，
大家起来大革命，
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
国民党叫侬镇静是送命，
请问啥人肯送命，
国民党格话就请俚去听。
勿止蒋王张汪几个人，
地主资本家末才是祸根，
我侬穷人起来练大兵，
打倒国民党救自家格命。
难能才能救自家格命，
大家选出代表工农兵，
起来管理中国格事情，
自家组织起来做红军，
联合世界上格工农兵，
保护苏联格大革命，
叫醒日本格工农搭日本格兵，
打退日本格军阀搭有钱格人。
全中国格工农兵，
大家起来大革命，
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

国民党叫侬镇静是要送侬格命。

(末节可以循环着念)

(北方话)

—

说起出兵满洲的东洋人，
先要问一问原因才成。
只因为一班有钱的中国人，
狼心狗肺是生成，
天天晚晚吃穷人，
吃得个头昏眼花发热昏。
有了刀，杀工人，
有了枪，打农民，
等到日本出兵占了东三省，
乌龟头就缩缩进，
总司令在叫退兵，
国民党在叫镇静，
可是难为了咱们小百姓，
真是把我们四万万人送人情。

—

千刀万剐的国民党不是人，

打来打去只打小百姓，
就是为着抢吃人，
帝国主义里头抢不清，
先叫国民党呀来帮衬，
帮忙帮得不称心，
日本自己来出兵，
张学良走狗要做不成。

三

还要问一问国民党竟是什么人，
原来是资本家地主的假名称，
他们都是奴才性，
卖国卖民要卖得干干净。
只怕碰着工农兵，
外国的中国的大人先生都惊心，
国民党就赌咒发誓去打红军，
那知道打了半年打不胜，
帝国主义说我对你不相信，
要想亲手来打中国的工农兵，
这也是东洋军阀出兵的大原因。

四

帝国主义是外国人，
外国人里头也有好人，
这些好人是工人，
还有农民跟穷人，
只有资本家才是坏人，
他们是帝国主义成了精。
讲到俄国的工农兵，
十四年前大革命，
他们的地主资本家已经打干净，
各国的工人跟穷人，
俄国苏联的工农兵，
这些人能够帮助我们的穷人。

五

大家要是不相信，
请看什么是国际联盟。
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
帝国主义呀一大群，
听见日本占了东三省，
谈谈讲讲讲不清，

讲到够了来这么一封信，
反而叫咱们中国也要撤兵，
真是帝国主义世界有理讲不清；
其实国际联盟还是帮的日本人。

六

还有什么美国人，
一样的货色一样的人，
口口声声中日双方别动兵，
日本早就杀进东三省，
还叫中日不要动刀兵，
这么真正是送老命。
这些帝国主义没良心，
趁火打劫是说不定。

七

日本人已经在那里大杀人，
英美德法趁火打劫也说不定，
他们自个儿里头虽然抢不清，
可是谁也保不定，
为来为去总要为着打平中国的工农兵，
也许还想趁此去打俄国的大革命。

说起咱们自己的中国人，
国民党呢，因此在那儿很定心，
他心上只说不要紧，
国际联盟会调停，
美国人也一定来帮衬，
就算瓜分，国民党还想得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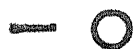
八

说来说去还是难为了穷人，
有钱人跟有钱人，
打仗打得挺挺紧，
实在没法也好逃命，
纽约伦敦跟东京，
外国银行多得很，
成千成万拿去存，
官僚军阀有的是金银。
一仗不打就会逃得个干干净净，
反正死只死咱们小百姓。

九

哎呀哎呀没性命，
这个样子怎么行，

要想法子还得自己人，
就是咱们工农兵，
还有普通的贫民，
自己起来救自己的命。



咱们工人团体最要紧，
罢工没有工会就罢不成。
工会也要自己人，
不要国民党包探那摩温，
罢工起来打倒日本人，
中外资本家一概别留情。
现在准备枪炮要赶紧，
快快联络兵士弟兄们，
革命起来咱们是首领，
首先自己要团结得紧。



说到农民真伤心，
大水淹了十七省，
还要交租纳税养闲人，
地主官僚就是闲人精。

大家起来快革命，
一钱别交最要紧。
不管他是英美日本中国人，
只要是地主就请他滚，
中外军阀要派兵，
咱们就请工人来练红军。

— 二

说起兵士更伤心，
天天只替别人去送命，
请看现在东三省，
军官逃得干干净，
兵士可给日本杀掉几千人。
军阀扣住军饷发不清，
还要叫人家去打红军，
简直是要我们去杀亲人，
其实兵士手里枪炮多得很，
干吗受着苦处不做声，
赶紧掉过枪来打司令，
别让国民党去送给外国人，
掉过枪来把军阀杀干净，
自己组织红军去打日本人。

一 三

现在除出有钱的中国人，
大家都要起来大革命，
问你是不是好好的人，
做奴隶你是不是甘心，
劝你反对国民党，还要趁早申明，
不要等到人家卖掉国，
那时候逃命也逃不成，
因为国民党等于私通日本人，
走狗做得成了精，
花言巧语会骗人，
现在戳穿西洋镜，
大家起来要他们的命。

一 四

蒋介石是个牛屎精，
他说三年废约一定废得成，
还说废不成尽管要他的命，
现在三年过了是个什么情形，
原来废约废到了送掉东三省，
咱们就要起来要他的命，

还有什么张学良，王正廷，汪精卫，胡汉民，
一古脑儿请他们滚。

一 五

全中国的工农兵，
大家起来大革命，
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
国民党叫咱们镇静是送命。
请问那一个肯送命，
国民党的话就请他去听。
不止蒋王张汪几个人，
地主大资本家都是祸根，
咱们穷人起来练大兵，
打倒国民党救自己的命。
怎么才能救自己的命，
大家选出代表工农兵，
起来管理中国的事情，
自己组织起来做红军，
联合世界上的工农兵，
保护苏联的大革命，
叫醒日本的工农跟日本的兵，
打退日本的军阀跟有钱的人。
全中国的工农兵，

大家起来大革命，
革命才能打退日本人，
国民党叫咱们镇静是要送咱们的命。

(末节可以循环着念)

① 包探，即侦探。那摩温，英语 Number one 的音译，意即工头。

②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囚禁。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一九二八年六月起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被迫辞职。汪精卫(1883—1944)，广东番禺人。曾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及该党副总裁。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主张对日妥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投敌后，组伪国民政府，并自任主席。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右派政客。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等。

上海打仗景致*

诸位静心听呀，唱点啥事情？要唱一只，上海打仗景呀，让我末，细细说分明呀。从头那个到底末，唱不大众听。

有钱东洋人呀，本来既理性。要求条件，市长在答应呀，百姓末，死也勿甘心呀！日本那个军阀末，马上就派兵。

大炮辘轮腾呀，洋枪匹拍声。打仔一夜，死脱既淘成呀。东洋末，发急讨救兵呀，再来那个几千末，冲锋死干净！

打仔十几仗呀，仗仗吃败仗。东洋小兵，勿肯开洋枪呀。军官末，眼睛白洋洋呀，活人那个装来末，死尸回东洋。

小兵十九路呀，本领实在大。东洋军队，一点无生路呀。日夜末，装来三万多呀。冲突那个几天末，仍旧打勿过。

胜仗打勿成呀，军官太可恨。公共租界，一步勿准进呀。日本末，勿用怕追兵呀。中国那个小兵末，永久打勿胜。

永久打勿胜呀，失败早存心。党国大人，害怕小百姓呀。打仗末，只要骗骗人呀。放仔那个租界末，安顿日本兵。

日本真野蛮呀，飞艇掷炸弹。闸北地方，房子在炸坍呀。人家末，烧脱交交关呀。害得那个百姓末，一齐要遭难。

* 本篇系仿《无锡景》调写成。天津《文艺学习》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曾据手稿刊出。原件无标点，为《文艺学习》编者所加。

说起逃难人呀，苦处说不尽。单身出来，腰无半分文呀。
大哭末，小喊顶伤心呀。只有那个富人末，老早搬端正。

东洋便衣队呀，要拿百姓害。男女捉去，一淘关起来呀。
妇女末，衣裳要解开；调戏那个以后末，拖来就强奸。

虹口老百姓呀，捉去最伤心。麻绳捆绑，再要挖眼睛呀。
弄得末，性命活勿成呀。毒害那个大众末，将来有报应。

啥人来报应呀？全靠小百姓。东洋中国，一致来革命呀；
反对末，东西洋大人呀！穷人那个出路末，只有义勇军。

国贼大商人呀，老早要调停，答应条件，命令叫退兵呀。
端正末，拍卖上海城呀；请求那个英美末，大家来瓜分。

穷人顶要紧呀，万众一条心。对内对外，革命才赞成呀。
有志末，加入义勇军呀，驱逐那个国贼末，幸福过光阴！

读《自由谈》有感*

不向刀丛向舞楼，
摩登风气遍神州。
旧书摊畔新名士，
正为西门说自由。

近读《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此外，尚有“冷摊负手对残书”之类的情调①，实在“可敬”。欧化白话文艺占领《自由谈》，正象国民革命军进北京城②。欲知后事如何，只要看前回分解可也，因此打油一首。

* 本诗据作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书赠鲁迅的手迹。《上海周报》第二卷第八期（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曾据手稿刊出。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这里说到《申报·自由谈》的文章，前者见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郁达夫的《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后者见于同年同月二十五日施蛰存的《买旧书》。

②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组成，开始时多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工作，曾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仍沿用旧称。一九二八年它进占北京，取代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并改称北平。

题远东第一伟人铜像*

妖孽忽神圣 蓝天向太阳
一生皆矛盾 无话不荒唐
梦绕黄金国 魂飞鸟托邦
只因承道统 断发复华装①

* 本诗据作者手迹。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曾予刊载。

① 道统，国民党政客戴季陶在其所著《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曾说：“孔子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向下传给孟子、韩愈……一直传到孙中山。”下句中的断发，指去辫；华装，指长袍马褂。

江北人拆姘头*

闸北地方出新闻。姘头拆脱江北^①人，诸位要听勿要听，让我细细说分明。闸北地方，自从中国兵队，奉着总司令命令，倒说是听从各国调停，自动退兵四十里，弄得来七零八落，都被日本资本家派兵占领了。那地方，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天天打到租界边境，就又奉命退后，不说小丘八一肚皮好气，就是闸北地面，也就禁不起日本大炮，一连轰打这么三十多天，自然是轰得个东倒西歪，烧得个一塌糊涂。却说，日本兵开到闸北，看看中国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满街满巷都是尸屍，日本资本家的混蛋总司令想了一想，就说中国党国司令真是饭桶，他出让闸北，也该收拾收拾干净，从来买卖，都是公平交易，有钱不买齷齪货，这次算是撞着了这个蹩脚卖国贼。说着，就叫人赶快先去多雇几批小汉奸，来暂时维持地方，等到请着了王彦彬先生，还有上海的著名绅士，商界领袖，那时候自有办法。

于是有一个江北流氓，名叫四喜子的，也被东洋军官雇了去，当马路巡查。上海市面上，大家知道江北人当汉奸。其

* 本篇及下篇《英雄巧计献上海》曾都收入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霞社出版的《街头集》。现据作者手稿辑入本卷。手稿署名均作易阵风。

实，江北人成千成万，那里会有个个去当汉奸的道理。只不过，因为江北人里面，苦力穷人实在来得多，上海场面上的阔人自己暗地里勾结日本，恐怕拆穿了西洋镜有点难为情，所以替东洋资本家出力，雇了一些小流氓，对外头只说江北人穷极无聊，去当汉奸。真正是穷人倒霉倒到极点，什么冤枉都是穷人担当。譬如这位四喜子，他就并不是穷得没有饭吃的朋友，老实不客气，还是一位刮刮叫的白相人^②，赌场燕子窝^③都有他的进账。他只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天天想发财。这次去当东洋小走狗，也是这个想发财的念头害了他。他当了巡查，一天好拿三十块日本洋钱，就招集一班狐群狗党，在闸北地方胡闹起来。看见马路上有中国人走过，他就挑嫩头的欺侮，不是拉到司令部，就是捉去填壕沟，背尸屍。他的一党，无锡人，浦东人，宁波人都有，自然都学着他的样。

那天晚上，他又发了一些小财，回到家里，把一副墨晶眼镜脱下来，口袋里摸出一个皮夹子，就往桌子上一摔，对他老婆说，你看，你老子又弄了些油水来啦，你这个滥胡货不要再瞧不起人。他老婆说了一声，稀罕你这小汉奸的臭钱，你是越来越不象了。说着，他就抓起那副墨晶眼镜往地板上重重的一掼，打得个粉碎。四喜子跳起来，一把抓住他老婆的头发，劈劈拍拍一连打了七八个巴掌，嘴里骂着，你这个狗养的杂种，不识抬举，我现在要你死都做得得到，你知道老子现在是什么人。他老婆爬在地上，用那小拳头往他身上乱挺，嘴里只是嚷着，狗养的，狗养的，你那日本宰相，什么孙肿散的老朋友，才是狗养的，一天三十块，就把你这小狗仔买去了。四喜子坐在床沿

上,或许因为一天辛苦了,他也不再打了,他只说,你当心着,滥胡戾,明天我要你的命,什么三十块,嘿,大小都是官,过几年,你老子也和南京老总一样,一拿就是三十万,到美国去买只飞艇来坐坐。他老婆说,我知道,你还要讨小老婆呢,我是不要享汉奸的福,马上我们就拆散,各走各的路,我也有两三年不靠你吃饭了。我是自己做工的,你有钱,向来就是拿去浇裹④四马路上的野鸡臭咸肉。四喜子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老子给你拆姘头,便宜你,休想。你老子发了财,做了官,人家自然要送美人来,我留着给你做丫头呢。他老婆已经哭得喘气,听他这样说,更加气得发抖,就说,什么送美淋不送美淋,我只不管,我和你姘头是拆定的了,天一亮就走。只听得劈拍一声,四喜子把他老婆打得躺在地板上,牙齿缝里的血直流。他说,你敢再说,敢再说,再说送美淋的名字,你你你把我的眼镜打破了,这是大日本军官发的,江北司令的徽章。好,明天送你到司令部去,叫东洋人枪毙你。他老婆唿的站了起来,对准了四喜子的巴掌肉就是一口,咬得鲜血直流。两个人扭在一块,从床上滚到地板,打了许多时候。女的已经一句话也说不清了,只喊着杂,杂种,剥面皮,江北人,面皮。男的闷着头只顾打,一声也不响。

天一亮,女的就偷偷的逃了出来。他和四喜子姘上,已经四五年了,那时候她还只十九岁,没有爹,没有娘。最近两三年,四喜子学坏了,不管家。她就到闸北丝厂里去做工。现在是丝厂关了门,她和厂里的小姑娘一块儿,去闹着发工钱,发津贴,两三个月,一点影响也没有。东洋人打来了,丝厂烧坏

了，老板资本家更加逃得无影无踪了。什么社会局市政府，自然借口日本兵占着闸北更加不理他们了。这天，她跑到一个小姊妹的茅篷子里，那里，许多丝厂的男工女工挤在一间破屋子里，他们大半是江北人，自己的房子烧掉了。她一进去就嚷着，我那杂种当定了汉奸了，我和他拆散了。大家七张八嘴问长问短。有的说，臊他妹妹，他当汉奸，还打人，干掉他。有的说，打不得，有东洋人哪。后来一个男工说，怕什么，大不了又开枪罢了，前几个月中国公安局的什么游伯麓也开了枪，大汉奸小汉奸原是一样的，我们不怕大汉奸，难道怕小汉奸……只要大家齐心，干他妈的。有人问，打死了怎么办。一个女工忽起来说，那法子多得很，那年北伐军要到上海，我们就先干起来的，枪有的是，你们多找些人去抢，我帮你们送出去。那男工说，好，就这么着，大的干不起来，得先干小的，先得要聚这么几百个人，干死了那四喜子的杂种，我们再分了十几个小队伍，天天给日本混账王八蛋的军官捣蛋。工友们大家聚起来，一天多一天，不怕不成功好好的义勇军。一个女工说，还不止日本军队哪，我昨天听人说，这里保卫团团总王彦彬也要来哪。另外一个女工说，那算什么，还不是和党衙门向来的把戏一样，我们要干，就要把这些杂种狗养的大大小的汉奸，都干掉。大家都说是呀是呀，要来，就要来一个我们穷人自己的衙门，什么东洋西洋，什么姓蒋的姓王的，什么四喜子五喜子，一古脑儿都干完他。这时候，四喜子的老婆忽然想起来，说声不好，我那杂种就会追到这里来的。众人说，不要紧，我们大家帮你来拆这个冤家姘头。

哈哈，诸位朋友，果然，过不了几天，上海报上都说，闸北地方的一个汉奸小头目，给人打死了。并且直到最近几天，那地方听说总不安静，日本兵的枪，时时刻刻有给人抢走的；汉奸和日本兵常常有给人戳死的。因为这个缘故，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实在觉得不放心，就说暂时管理闸北卫生，派巡捕去料理，其实是帮着日本捉反动，还借此扩充租界。中国的商界领袖，衙门老爷，都不做声，心上还着实高兴呢。

原来，四喜子的老婆要拆姘头，为的是反对小汉奸。商界大人先生们却要轧姘头，为的是要当大汉奸。天下的事情，现在是样样都要翻身哪。

三月十六日。

① 江北，泛指江苏境内的长江以北地区。

② 白相人，旧时上海指称游荡无业，为非作歹的流氓。

③ 燕子窝，旧指妓院。

④ 浇裹，生活费用的意思，这里作动词用。下文的“野鸡臭咸肉”，指妓女。

英雄巧计献上海

诸位朋友，帮衬帮衬。在下虽然南腔北调，可会东扯西拉，来到上海滩上，十字街头，说说唱唱，骗碗饭吃。说句真话，倒象是个瘪三，不过不大不小，还是个现任马路巡阅使，义务包打听①，专门打听大人老爷的新鲜消息，壁角落里的时事新闻。难得诸位光顾，不免开开话箱，也算寻个穷开心。闲话少说，话归正经。

话说陆得胜，广东南海人，原本是种田出身，只因为穷得当光卖尽，来到十九路军当个勤务兵，侍候蔡廷锴②军长大人。这位蔡大人，现在是人人知道，个个晓得，总算是个了不得的英雄好汉。原来民国二十年那年，正当上海人过年的时候，东洋资本家派了好几十只大兵船，来打上海闸北。当时十九路军驻扎上海，一般小兵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出去和东洋人拚命，怕只怕蔡大人也是个不抵抗主义，会要下命令退兵。因此前线有些兵士，赶紧自动手匹匹拍拍打了起来。内中有一个精细点的小兵，叫做王阿福，他跟陆得胜是知己朋友，这天，他特地跑来找老陆，想打听打听军长大人是个什么主意。他一跑到军部门口，只看见汽车包车一大阵，进进出出许多军官，站岗的卫兵不放他过去。打听了半天，听说有人主张打，有人主张退，连那卫兵自己，也摸不着头

脑，只晓得吴铁城市长已经答应日本的条件，他是不主张打的。王阿福见不着陆得胜，正想回去，忽然看见军部里走出一个人，拿了几张纸，抓住一个军官说，老兄，这电报稿子请你顺便带去罢。哈哈，这次一定抵抗了。王阿福跑回自己的队伍，果真，连长那里已经下了抵抗的命令。这样一打就打了二十多天。

有一天，陆得胜侍候军长吃了晚饭，快要换班的时候，突然间房门外冲进了一个人，也不等他去通报，就一直闯进军长的房间，急急忙忙的说，报告军长，那边我们的兵冲进了租界岳州路，前锋已经有一个队伍冲到平凉路去了，怎么办。只听军长说混账。接着，里面说话的声音噉噉的听不清楚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军长大声的说，岂有此理，以前说我们不抵抗，他们不服从，现在我们抵抗了，谁还敢违抗命令，我说退，就得退，一定得退。我说退到那里，就得退到那里，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军官说，原说是打不得，这些丘八打出了性来，就真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哪。军长说，你懂得什么，不打，他们更不听话，现在，马上把这几队兵调到庙行^③那方面去，只说那边吃紧。军官答应着是，是，就走了。

陆得胜听到了这些话，心上十分不定，因为一则他的朋友王阿福就在那个冲过租界的队伍里面，他以前当过广州兵工厂的工人，主意最多，难保冲租界的事情不是他领头，回头不要查出来了吃苦头。二则，军长说他叫退到那里就得退到那里，要是他真的下命令退到苏州南京，退到洛阳长安去，那我们怎么办，难道也跟着做亡国奴，这倒也要找阿福商量商量。

可是，他要请假，军长总是不准，反而骂他爱管闲事，爱偷听客人的谈话。他闷着一肚皮的气，没处发泄，又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天天只听见人家说他的军长是个一等一的好汉，连日本报上也称赞蔡将军和马占山一样，是个新英雄。他想马占山现在做了日本人的省长，自然是日本的英雄了，蔡军长又要做什么新官呢。消息可一天天的坏起来了。日本军队安安稳稳的住在租界里，天天添兵调将，十分方便。中国的救兵，连影子也没有。

那一天，他正在愁闷，有两个穿着便衣的客人来看军长。他们是坐着汽车来的，也是说的广东话，看起来是两位阔人。他们对军长说，日本军队要在浏河^④登岸来抄我们的后路了，前线上知道没有。军长说，前线怎么能使他们知道这些，军部里可早就知道了。客人说，听说今天晚上能够上岸的日本兵，至多不过一两千人。军长说，是呀，一两千人。客人说，兵士的情形怎么样。军长说，日本兵要有两万人到浏河，我们的兵就再不肯退也只能够退了，哈哈。客人说，好极好极，就说两万人罢，就去说……军长说，慢些，慢些。陆得胜想再听下去，可是无论怎么样也听不清楚了。他正靠在墙壁上，拚命的想听清楚底下的话，突然间一阵脚步声，军长送客人出来了。他赶忙立正。军长送了客进来，就对他瞟了一眼，问他，你还站着干吗。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很不好意思的往后退了几步，让军长进去了。

他心上想，这一定要去通知阿福。他又想了想，随手在自己的铺盖底下抓了一身小裤褂，一把牙刷，急急忙忙的逃出军

部，躲过了卫兵的查问，就往庙行方面走去。

他一路问着，走到庙行附近，已经快十二点了。月亮底下，看得见壕沟里，乱坟堆里，伏着自己的兵队。乒乓，拍拉拍拉，搭搭搭搭，轰隆，嘘，嘘，那枪炮声越来越近。他经过了几个兵的查问，有一个熟识的兵指点他去找王阿福。等到找着他，自己已经吃了一个流弹，幸而好，是打在左手手臂上的。他一把抓住王阿福就说，不得了，我气死了，气死了，不得了。王阿福好好的问他，才问出了个头脑。原来他决计不干了，为的是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做奸贼的走狗。王阿福骂他说，你现在明白了，又想跑路，明白人都混蛋，让糊涂虫在这里白送命，不行，不行，你得留下，要叫大家一块来干，要叫大家明白，自己来指挥，才能够真正的打胜日本人。他们正说着，陆得胜原是伏着的，他把头一抬，才看见有个军官在他们的旁边。军官立刻抓住他说，你来泄漏军部的秘密，好混账。立刻，他就拔出手枪把陆得胜枪毙了。他又对王阿福说，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干得好事。王阿福不等他说完，掉过枪头就是拍的一响，军官倒在地下。王阿福说了一声丢那妈的。

正在这个时候，前线乱哄哄退下来，日本军队的枪炮越逼越近。中国兵队的阵线里有好几个人，手里拿着传令旗，到处跳来跳去的喊着，浏河，日本兵来了两三万，那边我们已经退兵，这里赶快退，赶快退。

这样子，上海的中国兵大家慌慌张张的只好往后退走。上海暂时献给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的洋大人了。

王阿福的下落究竟怎样，到现在还没有知道呢。

① 包打听，侦探的俗称。

②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一二八”事变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

③ 庙行，镇名。位于上海江湾以北。

④ 浏河，镇名。位于江苏省太仓县以东，为长江口区江防重镇。

狱中题照*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
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 本篇原为作者一九三五年五月于福建汀州监狱赠给国民党三十六师少校军医陈炎冰照片上的题词。标题为编者所加。陈炎冰系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

缺 页

书信辑存

缺 页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①)，想来已经收到了，——先生暇时，还请赐以批评。

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于“西子”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颈而望，好象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東西可以精密谨慎

* 此信曾收入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又未必够“家”里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③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

虽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④。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谨祝康健精进。

瞿秋白 一九二三，七，三十。

① 《新青年》，月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后，一九二三年六月改为季刊，移广州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出四期后休刊。《前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刊于广州，次年二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作者当时为《新青年》主编，并参与《前锋》的编辑工作。

② 商务，指商务印书馆。

③ 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领导设立的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一九二二年设于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作者当时任该校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④ 平伯，即俞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当时在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并编辑《民国日报·觉悟》。这里说到的“一篇文章”，指《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曾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三日《民国日报·觉悟》。

致鲁迅、冯雪峰*

迅、雪：

这篇序^①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其中所引《铁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译^②的，其余，不是曹译不在我手边（在下半部），就是作序者自己更动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这是“无关宏旨的”。不过，当我引着下面一段中的几句时，我细把《铁流》原文和曹译对过：

他们以为是自己正在拚命的喊，其实是奔流的雨水在咆哮；那些看不见的石块，从那看不见的山岩上尽着滚下来；风的活人似的嗓子发狂的吼着，不断的象是泼着一桶一桶的水。

这疯人院里指挥的那个人一下子把庞大的天幕揭开，于是一切——在这以前装在天幕的黑暗之中的一切，都在那青隐隐的寒战里，尖厉得极难受的抖动起来。远山的波纹，倒挂着的岩石的锯齿，山壑的边沿，马的耳朵，都抖动得青隐隐的刺目；而更可怕的是在这疯

* 此信约写于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曾予刊载。

狂的抖动着的光线之下，一切都是死了似的不动的：挂在空气里的斜条的雨水是不动的，飞溅着泡沫的急流是不动的，举起了腿要走的马是不动的，走了半步的人是不动的，发黑的说了半句话的嘴是张开着的，打湿的枕头之间的小孩子的青隐隐的手是死灰色的。这沉默的痉挛的抖动之中，一切都是不动的。

这个青得要死的抖动似乎继续了一整夜；但是，当那天幕同样是出于意外的突然闭上的时候，才觉到这不过是一秒钟的一忽儿罢了。

庞大的夜又把一切都吞没了；而立刻，盖过这“妖精的成亲”^③，山震动了一下，就从地心里迸出了这样一个霹雳，——使那庞大的整个的黑夜都容纳不下——它崩裂成圆滚滚的碎块，继续的粉碎着，向四面八方滚出去，越滚越响，充满着那看不见的山谷，森林，溪壑，——人都震聋了，孩子们死死的躺着。

① 指苏联文学评论家涅拉陀夫为绥拉菲摩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所写的长序：《十月的艺术家》。

② 指《铁流》的中译者曹靖华。

③ “妖精的成亲”是乌克兰的俗话，譬如雷雨之前——突然间乌黑起来，电闪飞舞，这叫做“妖女在行结婚礼”了，也指一般的阴晦的淫雨。——作者原注。

致郭沫若*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三四年來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①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闻记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实还不是为着“哄动”观众。可怜的我们，有点象马戏院里野兽。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吧？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②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渐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

* 此信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近代史研究》曾予刊载，现据手稿影印件辑入本卷。

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③。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象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④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廿八，汀州狱中，

① 西园寺公，即西园寺公堂(1894—1940)，曾任日本首相。他很赏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学术著作，曾为此于一九三四年春设宴款待郭沫若。

②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

③ 《创造十年》的上半部，即《创造十年》，郭沫若回忆创造社的著作，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版。其下半部名《创造十年续编》，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④ 据郭沫若回忆，那次会见是他在武汉北伐军政治部任职时，当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后。

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6年北京第1版

1986年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3931 定价 5.50 元



更用股沒有吐着。那呼吸一種若有缺心肝缺肝臟的怪物又覺
起了一根根的相面在噴着。狂風吹着西來的，血肉連骨出來的，
符號呼出來的，嚴嚴吐出來的相面噴出來的都早已經重。這
是對着。

誰能經受這長的夜了！

是公時他不黎明呢？

看那剛剛整理好的，新橋早沒有用的了。三
公公電就熄滅。那也二管理的人才已經吞了少
是長的鳥雲，讓太陽重新照到雲開透的臉。如果平雲天動地
齊度，那打雷響滿天的怒至修焉。這可只有自己做了公公電
閃閃地不無得到。雲信+少+雷電才成響天動地的齊度！

九. 三.

书 号: 10019·3931
定 价: 5.50 元